

2017年"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

北方民族考古

The Archaeology of Northern Ethnicity

第5辑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科学出版社

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2017年“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经费的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支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北方民族考古

THE ARCHAEOLOGY OF NORTHERN ETHNICITY

第5辑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北方民族考古》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主办的集刊，迄今已出版四辑。本辑内容包括研究与探索、碑铭研究、域外视野、学术史回顾等栏目，收录论文17篇，以中国北方地区的考古学探索为重心，也包括一些重要境外考古发现的个案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界在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方面的前沿动向和重要成果。

本书适合文物考古研究工作者及大专院校师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方民族考古. 第5辑 /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5

ISBN 978-7-03-058239-3

Ⅰ. ①北…　Ⅱ. ①中…　②中…　Ⅲ. ①古代民族–民族考古学–中国–文集
Ⅳ. ①K87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3203号

责任编辑：王琳玮 / 责任校对：邹慧卿
责任印制：张　伟 / 封面设计：张　放　李雨濛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 //www.sciencep.com

北京厚诚则铭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年5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8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4 3/4
字数：350 000

定价：1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北方民族考古》编辑委员会

目　　录

研究与探索

碑铭研究

域外视野

学术史回顾

兴隆洼文化生业模式与环境关系

孟庆旭[1]　刘肖睿[2]
（1.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春，130033；2. 吉林省博物院，长春，130117）

一、史前环境

研究和恢复古代环境是环境考古的重要内容，中国环境考古的任务是从恢复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中，探讨其文化起源、演变规律，诠释形成中国文化特点的环境原因。而从古环境上，"可以知道远古居民迁徙的趋势；了解造成文化差异的深层原因；弄清地理沿革变化的原委；分析出古遗址分布的自然因素；为寻找古遗址提供指导，使之更具方向性和主动性；解决古文化考证中所涉及的与环境相关的疑难问题"[1]。

所谓古环境，大体包括古代气候、地貌、植被和动物群。关于古代环境的研究，自1987年周昆叔先生完成北京地区环境考古研究后，有关区域性古环境的研究课题逐渐展开，相关文章也不断推出，其中，西辽河地区的相关研究较为深入，夏正楷等以河流阶地发育为切入点，研究史前文化的变迁，得出"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史前文化遗址的垂直分布与河流阶地的发育有密切的关系"[2]，杨永兴等通过对沼泽的研究得出"距今6400a（树木年轮校正为7000a B.C.）以来西辽河平原东部沼泽发育和古环境演变过程可以划分为5个时期"[3]，韩茂莉从聚落角度出发得出"400～700米高程区的近河山坡、坡地是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的首选位置"[4]，以及施雅风等对中国全新世大暖期的研究[5]，张兰生等对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演变[6]的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都为还原西辽河区域的古代环境尤其是全新世以来的古环境提供了条件，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资料。

本文即以这些研究资料为基础，进一步分析和整理，以此来初步复原西辽河地区兴隆洼文化时期的古代环境，并对区域内不同的小气候区的古环境进行分析，以期在此基础上探讨古环境与史前人类的关系，尤其是古环境对生业模式的影响。

二、生业模式

生业模式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依托自然资源而产生的生业方式的总和。而关于史前人类生业模式，目前国内较为深入的研究还比较少，较多见的

是关于食性的研究。而对于单个考古学文化的生业模式，都比较模糊地将其定义为采集渔猎经济或农业经济等。

关于兴隆洼文化的生业模式，目前学界大约有三种看法：第一种以杨虎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兴隆洼文化属于一种从事定居的农耕生活，同时兼营渔猎社会经济类型”[7]；第二种是以冈村秀典为代表的日本学者，他们认为“查海遗址和兴隆洼文化遗址，都不一定有农耕经济，其社会生产类型属于采集和渔猎经济”[8]；第三种以苏秉琦和严文明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兴隆洼文化属于农业与渔猎兼营，在比重上存在分歧。

实际上，兴隆洼文化作为东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延续时间为1000余年，其分布范围又在全新世以来我国东部气候敏感带上，地域间的差异也是较为显见的。因而，兴隆洼文化是否可以用简单的采集渔猎经济或者农业经济来概括，实在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即以近年来辽西地区的环境考古相关研究为基础，结合考古遗址发掘资料，对兴隆洼文化范围的每个遗址做单独的生业模式分析，最后进行整合，从而归纳讨论兴隆洼文化的生业模式。

三、兴隆洼文化各区生业模式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通过对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发掘，揭示出了一种比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都要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此遗存以筒形罐为代表陶器，聚落内房址成排分布，后被正式命名为兴隆洼文化。

兴隆洼文化分布空间范围从调查和发掘材料看，“大体分布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教来河和大凌河流域”[9]，同时在燕山南麓地区也有一定分布。绝对年代根据兴隆洼、查海及白音长汗三个遗址的^{14}C测定数据来看，约为距今8000～7000年，最早能到距今8200年左右。相对年代要略晚于小河西文化，早于赵宝沟文化。目前，兴隆洼文化遗址经过科学发掘并发表了资料的有敖汉旗兴隆洼[10]、阜新查海[11]、赤峰市兴隆沟[12]、克什克腾旗南台子[13]、白音长汗[14]、林西县西梁[15]、平谷上宅[16]、迁西西寨遗址[17]等。

本文即以上述发掘材料为基础，结合相关古环境研究成果，对这些兴隆洼文化聚落的生业模式做逐一的探讨。为了方便论述，根据前人对兴隆洼文化的分区和小区域环境的不同，本文在讨论过程中将兴隆洼文化划分为三个小区，分别为西拉木伦区、西辽河区和燕南区。西拉木伦区为西辽河支流西拉木伦河干流沿岸地区，代表性遗址有南台子、林西西梁和白音长汗；西辽河区指除西拉木伦河之外的西辽河流域，代表性遗址有兴隆洼、查海和兴隆沟；燕南区指燕山南麓地区，代表性遗址有平谷上宅和迁西西寨遗址。

（一）西拉木伦区

西拉木伦河流域处于内蒙古东南部与辽宁西部交界地带，是现今的农牧业交错带

和黄土－沙地过渡地带，也是我国北方干旱区与半干旱－半湿润区的过渡地带，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西拉木伦河及其支流普遍发育有两级阶地，其上为黄土台塬。黄土台塬由巨厚的黄土组成，塬面一般高于河面 150 ~ 180 米左右。在林西县西南西拉木伦河南岸的马家沟营子，台塬面上覆盖有巨厚的风沙层，其下部黑砂土夹层的 ^{14}C 年龄为 6380 ± 110a BP，指示黄土台塬形成于 6500a BP 以前。兴隆洼和赵宝沟时期的文化遗存往往被埋藏在风沙层的黑沙土夹层之中。”[18]即在兴隆洼文化时期，现代水系的雏形刚刚出现。

而其中的古土壤（黑砂土）的孢粉组合表明此时期为植被比较繁盛的温干疏林草原环境。白音长汗兴隆洼文化层的孢粉组合也显示了温干的疏林蒿藜草原环境。而动物遗存也说明“白音长汗遗址的生态环境比现代更优越，早期有较大面积温带湿润气候条件的森林及森林草原”[19]。施雅风等的研究也认为：“根据（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各种代用资料综合研究，认为中国大暖期开始于 8.5ka BP 左右，结束于 3ka BP 左右。”[20]

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位于西拉木伦河北岸支流碧柳河西岸。1991 年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发现了一处较为完整的兴隆洼文化聚落遗址。就发表的出土资料来说，南台子遗址出土了较多的兽骨，表现出了狩猎的生业方式。同时也出土了较多的石磨盘与石磨棒，日本学者冈村秀典认为：“兴隆洼文化时期还没有正式的农业，磨盘、磨棒用来加工坚果。”[21]这种组合工具，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逐渐走向消亡。由此来看，南台子遗址主要的生业模式为狩猎和采集，农业和捕捞没有明显的证据支持。

林西县西梁遗址是 2002 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调查时发现并发掘的兴隆洼文化聚落遗址，遗址出土较多的兽骨和少量磨棒及石臼，同样反映了狩猎与采集的生业模式。

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所于 1988 年开始发掘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主体二期乙类遗存为兴隆洼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遗址分为 A 区和 B 区，每个区为独立的环壕聚落，动物遗存研究表明，B 区聚落的狩猎能力要强于 A 区聚落；而在石磨盘与石磨棒的出土数量上，B 区聚落出土数量远少于 A 区聚落。也即表明，在白音长汗聚落内部，存在生业模式不同的两类人群，一类以狩猎为主要生业模式，另一类以采集为主要生业模式。另外，聚落遗址内还出土了 26 件贝壳标本，而这 26 件贝壳标本中经鉴定仅有 2 种陆相淡水生标本为本地产出，“这些个体不大、数量不多的软体动物是无法提供大量的肉食补充的，当主要做装饰品之用”[22]。由此来看，白音长汗聚落的生业模式也是狩猎和采集，但聚落内部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侧重。

综上来看，在西拉木伦区的森林草原环境中，现代水系刚刚形成，由于地理环境限制，此区域水资源不如西辽河区与燕南区。当地兴隆洼文化居民依赖本地自然动植物资源形成与之适应的生存方式，形成了狩猎和采集的生业模式。

（二）西辽河区

西辽河区在地理位置上处于西拉木伦区的东部和南部，其东部平原地区在中全新世存在大规模的湖沼。而且，本区也分布着教来河、大凌河等多条西辽河支流水系。因而，本区在水资源条件上较西拉木伦区丰富。

兴隆洼遗址位于大凌河支流牤牛河上游右岸岗地上，198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在此进行发掘，为首先发现的兴隆洼文化聚落遗址。该遗址出土了较多的兽骨和石磨盘，在出土的植物遗存中鉴定出了胡桃楸果实，并且在墓葬M118内有两头整猪陪葬。在之后的发掘中又出土了骨鱼镖，并发现了用来储藏鱼的窖穴[23]。说明了兴隆洼遗址居民以采集、捕鱼和狩猎为主要的生业模式。对人骨的碳同位素和氮同位素分析也说明了兴隆洼遗址人群食用坚果和肉类较多[24]。而关于猪骨的种属，有人认为是家猪，有人认为是野猪，更多的认为是一种驯养过程的过渡形态。碳同位素数据也表明，兴隆洼居民有一定的粟类食物摄入。综上来看，兴隆洼居民的生业模式较为复杂，既有采集渔猎等原始手段，也有原始的粟作农业，同时也开始家畜的早期驯化。

阜新查海遗址位于绕阳河一支流的源地附近，系丘陵地貌，地表土层薄，半地穴房址直接开挖于风化的基岩上，房址内出土有较多的石磨棒、石磨盘和敲砸器，并且出土了较多的大型铲状器，前者显示了采集生业；后者属于挖掘工具，“完全的狩猎采集经济是不需要这些工具组合的。人们没有必要投入大量的劳动来生产磨制的挖掘工具，因为他们用很简单的挖掘棒就能很快采集尽遗址周围的食物资源。如果离遗址的距离增大，携带这些大型石制工具是非常不经济的，所以这些工具应属作物栽培者所有”[25]，说明查海存在早期的农业生产。在1994年的发掘中，在墓区祭祀坑发现了较多的猪骨，几乎每座房址也都发现了猪骨。说明早期的猪驯养在查海遗址也已经出现。同时，遗址内也有少量石网坠和细石器出土，间接反映了狩猎和捕鱼生业方式的存在。综上所述，查海遗址的生业模式以采集、早期农业生产和猪驯养为主，同时存在狩猎和捕鱼生业。

兴隆沟遗址位于敖汉旗牤牛河西兴隆沟村附近的山坡上，自2001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发掘，在第一地点揭示了兴隆洼文化大型聚落。在遗址内出土了较多的兽骨，石器中出土了大型磨盘、磨棒等。“从发掘土样的浮选结果看，F31堆积层和居住面上发现数量较多的碳化粟。”[26]另外，浮选出占植物种子总数15%的炭化黍。在H35中出土了2个猪头骨和用陶片、残石器及石块摆出的“S”形身躯，显示了一定的祭祀崇拜意义。这种原始的崇拜，很难说是建立在驯化的基础上，更多可能是建立在不了解或者畏惧的基础上。上述资料显示了兴隆沟聚落的生业模式以早期农业生产、狩猎和采集为主。

（三）燕　南　区

燕南区在地理位置上处于燕山南麓，为华北平原北端，由于受燕山阻挡，冬季受西北季风影响较西拉木伦区和西辽河区小。兴隆洼文化所处的时间段正处于中全新世大孤山期（^{14}C 测年数据为 8000 ~ 2500a BP），此时期气候进一步转暖。“该阶段气候进一步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8000 ~ 5000^{14}C a BP）气候最为温暖湿润，属暖温带湿润气候，是冰后期气候最温暖湿润阶段。”[27]在这个大的温暖湿润的阶段里，也存在着多个时段的气候波动。白洋淀沉积物的孢粉分析表明：“早全新世……以松、蒿、藜科植物为主组合特征，表明在古全新世气候迅速变温和稍湿润之后，又出现了转凉偏干的气候波动。”[28]除此之外，还有童国榜等对华北平原综合资料的分析也显示：“9000 ~ 7500^{14}C a BP，气候转冷，植被组合中松等针叶成分显著增多，阔叶植物减少，此时正值北半球第一新冰期（8000 ~ 7200^{14} C a BP）。”[29]虽然此时期气候暂时转冷，但是湖沼发育却处于扩张期，河北任丘剖面古环境研究显示，全新世以来，该区经历了 3 次湖泊扩张期，第二期时间为 8110 ~ 7240a BP，“第二次湖泊扩张持续时间为 800 年左右，发育了泥炭层”[30]。也即说明，在此时期，该区域气候相对干凉，植被为松属森林草原景观，湖沼发育，水资源较为丰富。

平谷上宅遗址位于北京市平谷区一个山间小盆地中，具体位置在泃河西岸的台地上，其西部不远有错河。遗址第八层为兴隆洼文化堆积。根据环境考古资料，在 8000 ~ 3000a BP，该地环境最适宜，气温较今略高，雨量丰沛，泃河、错河河水丰满。遗址出土了石磨棒、磨盘及较多的细石器，另外还出土了陶网坠。虽然出土遗物没有说明层位，但是考虑到遗址第七层与第八层有直接叠压关系，第三层到第七层所代表的上宅文化在时间上与兴隆洼文化有衔接关系，在短时间内生业模式大规模改变的可能性不大，因而，可以认为这批遗物能反映上宅遗址第八层即兴隆洼文化居民的生业模式。其中的石磨棒和石磨盘代表了采集生业，网坠代表了捕捞生业，虽然简报中未提到出土兽骨，但是出土较多的细石器一般被看作狩猎生业的代表。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件陶猪头，但是从形象和刻画的獠牙等特点很难说有驯化发生。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上宅遗址兴隆洼文化居民生业模式归为以采集、狩猎和捕捞为主。

迁西县西寨遗址处于唐山市滦河中游北岸二阶台地上，1988 年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唐山市文物管理处进行发掘，其中的第一期文化遗存为兴隆洼文化晚期遗存。遗存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石网坠和石磨盘，显示了捕捞和采集生业在西寨居民生活中占了较大比例。简报中没有提到动物遗存，石器资料里只简单提到柳叶形石片和石球，有可能与狩猎活动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寨遗址二期遗存中发现了室外陶器堆，类似的遗存仅在查海遗址有发现，暗示着两者之间有有机联系。从出土资料来看，西寨遗址兴隆洼文化居民生业模式以捕捞和采集为主，可能存在狩猎生业。

总体来说，在燕南区，由于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因素，该区域的水资源较西拉木伦区和西辽河区丰富，山麓地区的森林资源也较前两个区丰富。在此区域，兴隆洼文化居民在当地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采集、捕捞和狩猎生业模式。从出土资料上看，该区域的早期农业证据较少，更缺少家畜（猪）的驯化资料。

四、生业模式与环境

兴隆洼文化作为东北地区早期新石器文化，其总体的生业模式具有一定的原始性，总体上离不开采集和狩猎这两种主要的生业手段，但是，应该注意到，在不同的区域，由于自然资源的差异，其生业模式组成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在西拉木伦区，由于其处于气候敏感带上，自然资源分布不均衡，且随时间变动较大，这一区域居民的生业方式分化较大，生业手段也更为专业，并在此基础可能形成了不同的族群分化。在西辽河区，由于水资源较西拉木伦区丰富，自然资源也更丰富一些，因此，该区域的兴隆洼文化居民的生业模式构成较为复杂，在有丰富水资源的地区出现了捕捞生业，还产生了早期动植物的驯化，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早期农业。在燕南区，水热条件较上述两区更为优越，因此，此区的居民形成了简单的捕捞和采集生业模式。

在史前时期，自然资源对原始居民的生业模式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在不同的自然资源下，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生业模式。史前居民通过扩大食谱、强化利用和专业分工来不断适应自然资源的时空变化。兴隆洼文化作为东北地区早期新石器文化，在其分布的地域范围内，地理气候条件有着较大的差异，在此基础上产生不同的生业模式是可以理解的，在研究中，这种差异应该被注意，而不是模糊地称为采集、渔猎或者农业经济。在兴隆洼文化时期，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生业模式能够独立地支持人类生存，而且，不同的遗址间虽然都存在采集、狩猎两种传统和原始的生业手段，但是应该看到其占生业模式的比重的差异和除此之外的其他生业手段。

除兴隆洼文化以外，对于其他早期的新石器时期文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因为地域环境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的生业模式构成。更应该注意到随着时间的变化、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业模式在不断的分化、简化、单一化，最终在亚洲东部地区产生了农耕与游牧两种主要社会模式。

注　释

［1］　汤卓炜．环境考古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2］　夏正楷，邓辉，武弘麟．内蒙西拉木伦河流域考古文化演变的地貌背景分析［J］．地理学报，2000（3）：329～336．

［3］　杨永兴，黄锡畴，王世岩，孔昭宸．西辽河平原东部沼泽发育与中全新世早期以来古环境演变［J］．地理科学，2001（3）：242～249．

［4］ 韩茂莉．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与环境研究［J］．考古学报，2010（1）：1～10．
［5］ 施雅风，孔昭宸，王苏民，唐领余，王富葆，姚檀栋，赵希涛，张丕远，施少华．中国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波动与重要事件［J］．中国科学（B辑），1992（12）：1300～1308．
［6］ 张兰生，方修琦，任国云．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环境演变［J］．地学前缘,1997,4（1～2）：127～136．
［7］ 杨虎．试论兴隆洼文化及相关问题［A］．中国考古学研——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8］ 冈村秀典著，白云翔译，白玉美校．辽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居住形态［A］．东北亚考古学研究——中日合作研究报告书［C］，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9］ 赵宾福．兴隆洼文化的类型、分期与聚落研究［J］．考古与文物，2006（1）：25～31．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1992年发掘简报［J］．考古，1997（1）：1～10．
［11］ 辽宁省文物考古所．辽宁阜新查海遗址1987～1990年三次发掘［J］．文物，1994（11）：4～13．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沟聚落遗址2002～2003年的发掘［J］．考古，2004（7）：3～8．
［13］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A］．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53～77．
［14］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15］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西拉木伦河流域先秦时期遗址调查与试掘［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16］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平谷县文物管理所．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1989（8）：1～18．
［17］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唐山市文物管理处，迁西县文物管理处．迁西西寨遗址1988年发掘报告［J］．文物春秋，1992（S1）：147～177．
［18］ 同［2］．
［19］ 同［14］．
［20］ 同［5］．
［21］ 同［8］．
［22］ 同［14］．
［23］ 杨虎，刘国祥．兴隆洼聚落遗址发掘再获硕果［N］．中国文物报，1993-12-26（001）．
［24］ 张雪莲，王金霞，冼自强，仇士华．古人类食物结构研究［J］．考古，2003（2）：62～75．
［25］ 陈胜前．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J］．考古学报，2011（1）：1～22．
［26］ 同［12］．
［27］ 靳桂云，王传明．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气候环境［J］．古地理学报，2010（3）：355～363．

［28］ 许清海，陈淑英，孔昭宸，杜乃秋．白洋淀地区全新世以来植被演替和气候变化初探［J］．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学报，1988（2）：143～151．
［29］ 童国榜，张俊牌，严富华，麦学舜．华北平原东部地区晚更新世以来的孢粉序列与气候分期［J］．地震地质，1991（3）：259～268．
［30］ 崔建新，周尚哲，韩海涛，王杰，许刘兵．河北任丘剖面河湖相沉积及全新世水文气候事件［J］．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2005（4）：107～113.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Human Subsistence Strategy in Xinglongwa Culture

Meng Qingxu　Liu Xiaorui

Abstract: By integrating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ical data and other materials, such as geology and environment, this paper sorts out prehistoric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such as ancient climate, geomorphology, vegetation and fauna.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Xinglongwa culture different district's human subsistence strategy and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prehistoric archaeological culture environment on human subsistence strategy.

Keywords: environment; human subsistence strategy; Xinglongwa Culture

衔鼎小考

黄锦前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开封，475001）

嘉德香港春季拍卖会图录《格物致知——泓燊堂吉金》录有一件衔鼎[1]，其铭文相当重要，本文拟对其做考释，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

该鼎系日本京都吉田家族旧藏。体呈盆形，窄沿方唇，浅腹圜底，下部倾垂，双附耳，三柱足。口沿下饰花冠式顾首龙纹，其下有一道弦纹，足上部饰浮雕兽面纹（图一、图三）。属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中鼎的Ⅳ型5式[2]，时代为西周中期前段，约穆恭之际。



图一 衔鼎

（《格物致知——泓燊堂吉金》）

鼎内壁铸铭文，有界格（图二、图三），作：

> 唯王三月初吉，东宫佑衔入门，立中庭，北向，王命衔韨、金车、旂，用司甡卓阳人，用作宝鼎，其子孙其永宝用。

其中“王命衔”下之字原篆作，同为西周中期的扬簋[3]铭云：“锡汝赤韨、銮旂”，其中“”字原篆分别作、，从从市。对照来看，该字或可分析为从从舄。从有关文例及上下文文义来看，推测其或与“”一样，皆为“”字异体，系增加义符的加繁写法，有待进一步详考。“王命衔韨、金车、旂，用司甡卓阳人”云云，与下引即簋“王呼：‘命汝赤韨、朱衡、玄衣、黹纯、銮旂。曰：司琱宫人、虢旛，用事’”可参照。

“甡”字原篆作，上揭《格物致知——泓燊堂吉金》释作“丰”，从字形看，不确。

“宝”字原篆分别作、，写法极为简省，颇少见。

有关文字、文句方面的问题暂简释如上。文义方面，有两个地方需要加以解释，一是“东宫佑衔入门”之“东宫”，二是对“用司甡卓阳人”句的理解。

先说“东宫”，“东宫”多见于金文，指太子所居之官，常用来指太子[4]。以往所



图二　衙鼎铭文
（《格物致知——泓燊堂吉金》）

见金文中“东宫”或与其相关者有两例：

1）驭簋[5]：唯三月初吉甲寅，王格于太室，伯东宫入佑驭，即位中廷，王呼内史册命驭：锡汝幽衡、鋚勒。驭稽首，敢对扬王休，用作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西周中期后段。

2）曶鼎[6]：昔馑岁，匡众厥臣廿夫，寇曶禾十秭，以匡季告东宫，东宫乃曰……曶又以匡季告东宫……东宫乃曰……。西周中期后段。

其中驭簋的“伯东宫”应即“东宫”，“伯”系尊称，笔者曾有小文讨论[7]。

驭簋为弇口鼓腹，龙首双耳，方形垂珥，盖面隆起，上置圈状捉手，圈足外撇，其下连铸三兽面小足。盖沿和器沿饰无目窃曲纹，腹饰瓦沟纹，圈足饰两道弦纹。属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中簋的Ⅳ型2式[8]，时代为西周中期后段。与弭叔簋[9]形制、纹饰皆近，与师酉簋[10]形制亦近，弭叔簋一般被认为系懿孝时器[11]，师酉簋为孝王时器[12]。综合来看，驭簋年代约为恭、懿之际，吴镇烽将其定为西周晚期，或偏晚。曶鼎已佚，器形未知，其时代一般被定为西周中期后段，从铭文字体和内容看，可从。然则此三件器铭之“东宫”或即一人。

再说对“用司甡卓阳人”句的解释。《说文》：“甡，众生并立之儿。从二生。”《诗·大雅·桑柔》：“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毛传：“甡甡，众多也。”伯硕父鼎[13]：“我用与司冢





图三　衔鼎拓本和铭文照片

戎、驭方。”“冢”读作“众”，可以对读。“卓阳”，从上下文及有关金文文例来看，应系地名，地望不详。所谓“卓阳”，或即“卓之阳”，卓或系山或水名。“人”谓“民”“百姓”。《荀子·王制》：“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铭文此句是说用来治理卓阳的民众。金文中有类似的材料可以对照：

1）申簋盖[14]：唯正月初吉丁卯，王在周康宫，格太室，即位，益公入右申〔立〕中廷，王命尹册命申，更乃祖考胥太祝官司丰人眔九戯祝，锡汝赤韨䌹衡、銮旂，用事。申敢对扬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孝孟尊簋，申其万年用，子子孙孙其永宝。西周中期前段。

2）即簋[15]：唯王三月初吉庚申，王在康官，格太室，定伯入右即。王呼：“命汝赤韨、朱衡、玄衣、黹纯、銮旂。曰：司琱宫人、虢旛，用事。”即敢对扬天子丕显休。用作朕文考幽叔宝簋，即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西周中期（懿王）。

3）师艅簋盖[16]：唯三年三月初吉甲戌，王在周师录宫。旦，王格太室，即位，司马共佑师俞入门立中廷，王呼作册内史册命师艅：总司佺人，锡赤韨朱衡、旂。艅拜稽首，天子其万年、眉寿、黄耇，畯在位。艅其蔑历，日锡鲁休。艅敢扬天子丕显休，用作宝〔簋〕，其万年永保，臣天子。西周中期后段。

4）卯簋盖[17]：唯王十又一月既生霸丁亥，荣季入右卯，立中廷，荣伯呼命卯曰：载乃先祖考尸司荣公室，昔乃祖亦既令乃父尸司莽宫、莽人，不淑，捋我家窠，用丧。今余非敢梦先公有禬后，余懋爯先公官，今余唯命汝尸司莽宫、莽人，汝毋敢不善。锡汝瓒四、璋瑴、宗彝一肆、宝；锡汝马十匹、牛十；锡于乍一田，锡于[illegible]一田，锡于队一田，锡于戠一田。卯拜手稽手，敢对扬荣伯休，用作宝尊簋。卯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西周中期。

5）卌三年逨鼎[18]：余弗忘圣人孙子，昔余既命汝胥荣兑总司四方虞、林，用宫御。今余唯经乃先祖考有爵于周邦，申就乃命，命汝官司历人，毋敢妄宁，虔夙夕惠雍我邦小大猷。西周晚期（宣王）。

不过，“人”或亦可读作“夷”，夷为古代中原地区华夏族对东部各族的总称，亦泛称中原以外的各族。《礼记·王制》：“东方曰夷。”《孟子·梁惠王上》：“莅中国而抚四夷也。”所谓“用司甡卓阳人”，即用来治理卓阳的众夷族。除上揭伯硕父鼎“我用与司冢戎、驭方”外，金文中还有类似的文句可对照：

1）大盂鼎[19]：余乃绍夹尸司戎，敏谏罚讼，夙夕绍我一人烝四方。

2）南宫柳鼎[20]：司羲夷场、佃史，锡汝赤韨、幽衡、鋚勒。

3）戎生钟[21]：天子歒灵，用建于兹外土，僪司蛮戎，用倝不廷方。

总之，“人”字究竟是当如字读还是应读作“夷”，主要是视卓阳之地望而定，今卓阳地望未能遽定，暂存疑。

还有一种可能，即将“阳”读作“场”，“阳”为喻母阳部字，“场”是定母阳部字，二者韵部相同，声纽同属舌音，古音极近，在古文字中也有通假的例证，如上揭南宫

柳鼎“司羲夷场佃事”之“场”即写作“阳”。所谓“用司甡卓阳人”，即用以主管甡卓的场人。“场人”是周代掌管国家场圃的官名。《周礼·地官·场人》：“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蓏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凡祭祀、宾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序官“场人”云：“每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郑玄注：“场，筑地为墠。季秋除圃中为之。《诗》云：‘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国语·周语上》：“工协革，场协入，廪协出。”韦昭注：“场人掌场圃，委积珍物，敛而藏之也。”有关情形在西周金文中也有记载，如：

1）同簋[22]：唯十又二月初吉丁丑，王在宗周，各于大庙，荣伯佑同，立中廷，北向。王命同佐佑虞大父司场、林、虞、牧，自滤东至于河，厥溯至于玄水。世孙孙子子佐佑虞大父，毋汝有闲。对扬天子厥休，用作朕文考惠仲尊宝毁，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西周中期。

2）南宫柳鼎：唯五月初吉甲寅，王在康庙，武公右南宫柳即位中廷，北向。王呼作册尹册命柳：司六师牧、场大父（？），司羲夷场、佃史[23]，锡汝赤韨、幽衡、鋚勒。柳拜稽首，对扬天子休，用作朕烈考尊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西周晚期（夷王）。

对照可知，“用司甡卓阳人”之“甡卓”当作地名解。“甡卓”究竟是一地还是两个邻近的地点，暂难以确知。不过据现有的材料来看，西周金文中“场人”一词一般皆以“场”来表达，从上古汉语和西周金文的表达习惯来看，将“用司甡卓阳人”之“阳人”读为“场人”，虽不无可能，但可能性似乎不大。不过以西周金文中的甸人或作“佃”，或径作“佃人”例之[24]，这种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以上三种读法，究竟哪一种更符合铭文本义，据目前的材料来看，尚难以遽定，还有待进一步的相关证据才能予以验证。

附记：小文在写作过程中，因觉将“用司甡卓阳人”之“阳人”理解为文献所记“场人”成立的可能性似乎不大，故未予列出。今见会议（“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再认识”青年学术论坛，河南大学，2016年10月29日）的发言中有于薇女士的大作《从率鼎看西周的场人与场地》，推测即如此理解。细究之，此种释读成立的可能性当不能完全排除，遂将这种可能的读法也补充进来。不过正如文中所述，这三种读法究竟哪一种更切合铭文本义，还有待进一步验证，而不便做过多的推论。是为记。

2016年10月28日

注　释

［1］　中国嘉德香港．格物致知——泓燊堂吉金．*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Hong Shen Tang Collection*［M］．香港：中国嘉德香港，2016：第571号．

［2］　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40，41．

［ 3 ］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 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994．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 8 册）［ M ］．北京：中华书局，2007：第 4294 号，第 4295 号．
［ 4 ］ a．李学勤．中方鼎与周易［ A ］．文物研究（六）［ M ］．合肥：黄山书社，1990：197 ~ 201；后辑入氏著．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 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475 ~ 485；又收入氏著．周易溯源［ M ］．成都：巴蜀书社，2006：210 ~ 219．
b．李学勤．柞伯簋铭考释［ J ］．文物，1998（ 11 ）：67 ~ 70；后辑入氏著．重写学术史［ 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77 ~ 183．
c．拙文．由叶家山 M107 所出“西宫”铭文谈曾国的族源问题［ J ］．待刊．
［ 5 ］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 11 卷）［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307 ~ 309，第 05243 号．
［ 6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 5 册）［ M ］．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 2838 号．
［ 7 ］ 拙文．由叶家山 M107 所出“西宫”铭文谈曾国的族源问题［ J ］．待刊．
［ 8 ］ 同［ 2 ］：88．
［ 9 ］ a．郭沫若．弭叔簋及訇簋考释［ J ］．文物，1960（ 2 ）：7、10．
b．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第 6 卷）［ 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第 130 号．
c．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 M ］．北京：中华书局，2004：147，745．
［ 10 ］ a．同［ 9 ］：173，790．
b．故宫博物院．故宫青铜器［ 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189，200．
［ 11 ］ 同［ 8 ］．
［ 12 ］ 拙文．爯器及相关铭文系联研究［ J ］．待刊．
［ 13 ］ a．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 5 卷）［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67 ~ 268，第 02438 号．
b．拙文．伯硕父鼎的年代与国别［ A ］．西部考古（十五）［ M ］．北京：科学出版社．待刊．
［ 14 ］ a．刘兴．申簋盖铭考释［ J ］．考古与文物，1983（ 2 ）：18，图三．
b．同［ 3 ］a：第 4267 号．
c．同［ 5 ］：473，474，第 05312 号．
［ 15 ］ a．同［ 3 ］a：第 4250 号．
b．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 M ］．成都：巴蜀书社，2005：306 ~ 308．
［ 16 ］ 同［ 3 ］a：第 4277 号．
［ 17 ］ 同［ 3 ］a：第 4327 号．
［ 18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眉县文化馆．吉金铸华章——宝鸡眉县杨家村单氏青铜器窖藏［ 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48 ~ 127．

［19］ a．同［6］：第2837号．

b．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第5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25．

［20］ a．同［6］：第2805号．

b．同［13］：第02463号．

［21］ a．《保利藏金》编辑委员会．保利藏金——保利艺术博物馆精品选［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117～128．

b．李学勤．戎生编钟论释［J］．文物，1999（9）：75～82；又载《保利藏金》编辑委员会．保利藏金——保利艺术博物馆精品选［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375～378．

［22］ a．同［3］a：第4270，4271号．

b．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12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4～26，第05322，05323号．

［23］ 黄锦前．从南宫柳鼎之“佃”谈到《周礼》的“甸师”及其他．待刊．

［24］ 黄锦前．从南宫柳鼎“佃”字的训释谈到古书的“甸师”与“甸人”．待刊．

Study on Xuan Tripod

Huang Jinqi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has researched about the Xuan Tripod recorded in *Gewuzhizhi—Hong Shen Church JI Jin.* it’s time is about Mu Gong occasion. The writing“Dong Gong”maybe is the same person as Yu Gui and Hu Tripod which is called the Prince. The word“Ren”in“Yong Si Shen Zhuo Yang Zhi Ren”exactly should be read as itself or should be read as“Yi”, mainly depending on the location of Zhuo Yang might be, but which is temporarily not sure. Perhaps the“Yang”should be read as“Chang”, and the so-called“Yong Si Shen Zhuo Yang Zhi Ren”is used to be in charge of shen zhuo . Which one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inscription, yet to be further proof of relevant evidence to be verified .However ,the writing is simple, and it has quite historical value.

Keywords: Donggong; prince; Si Shen Zhuo Yang Ren

试论两周青铜器波带纹的演变

郭郑瑞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北京，100872）

一、绪　　论

青铜器上的波带纹，是运用“S”形布局法，左右伸展呈带状分布的二方连续纹样，“其状如一条宽阔的（或几条窄而并列的）带子，呈现波状起伏形象，波峰间的空隙常填有近似于眉、口的纹样”[1]，又称“波状环带纹”“环带纹”“波曲纹”“波线纹”“波纹”“宽波纹”“山纹”“嶂纹”“山云纹”“盘云纹”等。

两周青铜器上的波带纹，处于幻想动物纹向几何纹饰过渡的阶段。对波带纹的研究，不仅对青铜器的分期断代有所裨益，也可以“透物见人”，根据波带纹的演变与使用情况，一窥当时的社会文化。

对青铜器波带纹的研究始于金石学。北宋元祐七年（1092年）吕大临所著《考古图》[2]用临摹的方式收录了饰有波带纹的青铜器。王黼的《宣和博古图》收录的波带纹青铜器较《考古图》更多，对波带纹或不做描述，或做“云雷”[3]“双角之间饰以人首”[4]等。

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后，青铜器研究不再局限于对铭文款识与器物形状的考订，青铜器纹饰逐渐得到重视。容庚先生最先对波带纹进行了类型划分，他的《商周彝器通考》将波带纹称为“环带纹”，依照波带上下辅纹的区别将该类纹饰划分为七型，实为开创之举[5]。容庚、张维持先生所著《殷周青铜器通论》将“波纹”分为“两条并行的波线纹，上下填以眉形和口形纹样；上下波纹两重，每重由几条波线所组成，其中缀以其他纹样”[6]。两位先生的分类说明，他们已经开始注意到波带纹变化的两个特征，即辅纹和波带本身的变化。陈梦家先生的《西周铜器断代》虽主要利用器形和铭文进行分期断代，但也论及纹饰。此书将环带纹称为“宽波纹”，并在夷王前后的时段中将其分为主体和带状两种[7]。朱凤瀚先生在《古代中国青铜器》中将波带纹分为五式[8]。

近年来，伴随着考古发现提供的新材料，彭嫦《周代青铜器波曲纹研究》[9]和余奕《中原地区西周中晚期青铜器几何纹饰研究》[10]对波带纹的型式划分、源流与母题等问题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毕经纬《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研究》[11]、车芳《三晋两

周地区青铜容器纹饰初步研究》[12]、陈志明《山西地区出土晋系青铜器纹饰类型和文化因素分析》[13]、王冰《东周时期秦国青铜器纹饰研究》[14]、吴伟华《春秋时期黄河流域青铜器纹饰研究》[15]等，亦涉及波带纹。

上述对波带纹的考古学研究，大多属于类型学的范式，旨在解决分期断代的问题。本文并不否认以往的分类，因为一切分类都有它的逻辑与目的。但本文希望在基础资料收集得更完善时，再进行分期、断代，进而讨论相关问题。对简讯、发掘简报、发掘报告、文物图录等资料尽可能做全面地排查后，本文共收录了西周昭王至战国共 213 件 / 组（372 件）饰有波带纹的青铜器信息[16]。描述时段时，西周采用三期说[17]；东周时期参照路国权的划分，分为七期[18]。在此基础上，尝试对两周青铜器波带纹的型式断代、发展演变、装饰特点、内涵意义等问题进行探讨[19]。

二、型式演变与使用情况

（一）型式划分

由于本文收录的 213 件 / 组（372 件）饰有环带纹的部分青铜器同时饰有多条波带纹，本文收录的波带纹样本总量为 483 条。其中有清晰图像、参与型式划分的样本数量为 449 条。本文依据波带纹中波带的不同将其分为 A、B、C、D 四型，各型之下又根据填充辅纹的不同分出若干亚型。

A 型　波带光滑简洁，无除凹线外的其他装饰与变形。早在西周早期偏晚就已出现，延续至春秋早期。根据填充辅纹的不同分为二亚型。

Aa 型　填充辅纹以口纹或口纹的变形为主，根据口纹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四式。

Ⅰ式：波内口纹为圆形或近似圆形的心形等，简洁，边缘光滑。标本为启卣颈部（图一）[20]。此式主要流行于西周早期偏晚。



图一　Aa 型Ⅰ式波带纹
（启卣颈部）

Ⅱ式：波内口纹变形，有枝桠生出。标本为伯康簋颈部（图二）[21]。此式主要流行于西周中期。



图二　Aa 型Ⅱ式波带纹

（伯康簋颈部）

Ⅲ式：波内辅纹填充效果更饱满，以口形为中心，边缘填充三角形、半月形等其他辅纹。标本为 1972 年乔家村出土青铜鬲腹部（图三）[22]。此式主要流行于西周晚期。



图三　Aa 型Ⅲ式波带纹

（1972 年乔家村出土青铜鬲腹部）

Ⅳ式：波内辅纹再次简化，已不是最初近似圆形的口纹，而是简化成近半圆形。标本为陇县边家庄 M1：2 腹部（图四）[23]。此式主要流行于春秋初期至春秋早期。



图四　Aa 型Ⅳ式波带纹

（陇县边家庄 M1：2 腹部）

Ab 型　填充辅纹由一口二眉构成。标本为 1960 年扶风齐家窖藏 206 号簋腹部（图五）[24]。流行于西周中期偏晚至春秋晚期。



图五　Ab 型波带纹

（1960 年扶风齐家窖藏 206 号簋腹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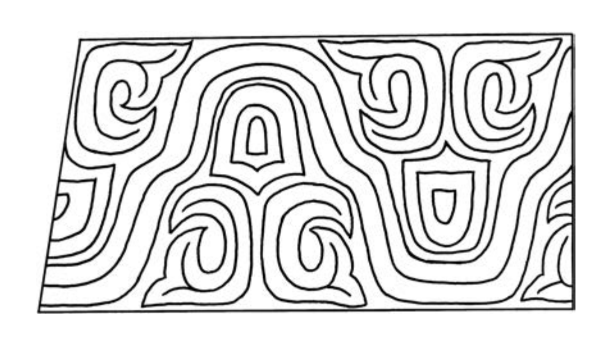
B 型　波带中部有褶皱或突出兽目。主要流行于西周中期偏晚至春秋晚期。根据填充辅纹的不同分为四亚型。

Ba 型　填充辅纹以口纹为中心，且口纹上有纵向的枝桠生出，类似金文“皇”字的上部。标本为扶风强家 M1：4 口沿（图六）[25]。流行于西周中期偏晚至春秋初期。

Bb 型　填充辅纹由一口二眉构成。标本为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10：28 腹部（图七）[26]。流行于西周中期偏晚至战国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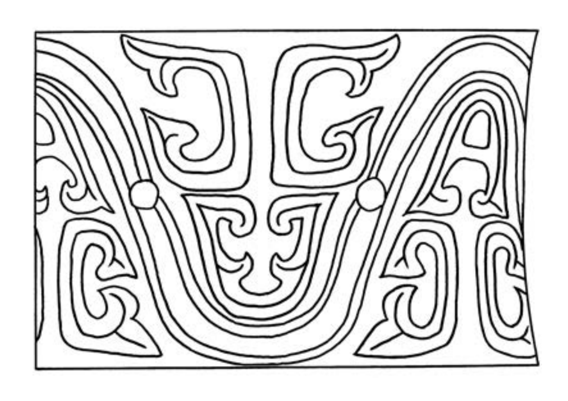
图六　Ba 型波带纹
（扶风强家 M1：4 口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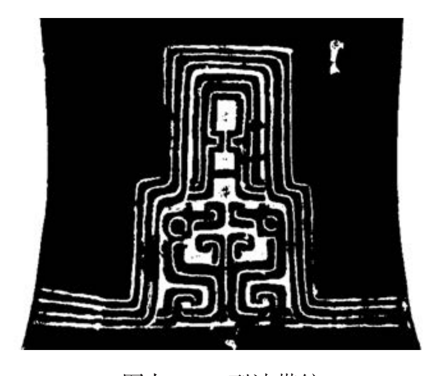
图七　Bb 型波带纹
（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10：28 腹部）

Bc 型　口纹、眉纹的枝桠、变形较多。标本为洛阳西工区 C1M3427：24 颈部（图八）[27]。流行于西周中期偏晚至春秋中期。

Bd 型　填充辅纹保留了较多变形龙纹的形态特征。标本为洛阳体育场 M8830：11 颈部（图九）[28]。流行于西周晚期偏晚至春秋晚期。



图八　Bc 型波带纹
（洛阳西工区 C1M3427：24 颈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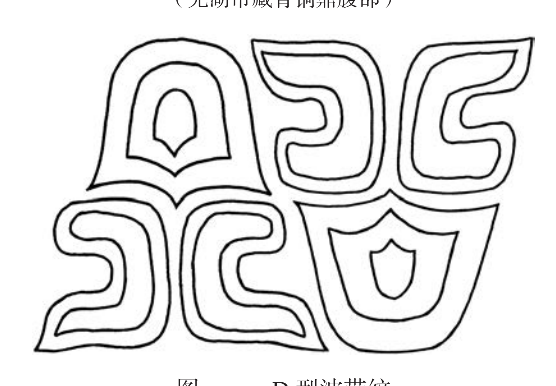
图九　Bd 型波带纹
（洛阳体育场 M8830：11 颈部）

C 型　波带上饰有云雷纹。标本为芜湖市藏青铜鼎腹部（图一〇）[29]。流行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D 型　波带被省去。虽然波带被省去，却能通过填充辅纹间的留白或底纹辨认出波曲造型。标本为平顶山应国墓地 M8：36 腹部（图一一）[30]。流行于春秋初期。



图一〇　C 型波带纹
（芜湖市藏青铜鼎腹部）



图一一　D 型波带纹
（平顶山应国墓地 M8：36 腹部）

通过对波带纹各型式样本的分期统计（表一），我们能够发现，正如学界普遍认为的，波带纹主要流行于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同时需要说明的是，Bb 型波带纹样本数量极多，也存在波带纹与内填辅纹的结合是否紧密、内填辅纹之眉形更近两个相背的“C”形还是两个相背的倒置“G”形等细部特征的区别，但不具备年代指征，因此不再细分[31]。

表一　波带纹各型式样本分期统计

时期＼型式	Aa 型Ⅰ式	Aa 型Ⅱ式	Aa 型Ⅲ式	Aa 型Ⅳ式	Ab 型	Ba 型	Bb 型	Bc 型	Bd 型	C 型	D 型	总计
西周早期	3											3
西周中期		17			3	9	14	2	3			48
西周晚期		1	3		19	9	65	13	13	1		124
春秋初期					11	3	91	15	4		7	131
春秋早期				5	4		63	6		3		81
春秋中期					2		12	2	3			19
春秋晚期					1		15		7		2	25
战国早期							2					2
战国中期							2					2
战国晚期							14					14
总计	3	18	3	5	40	21	278	38	30	4	9	449

（二）器物装饰

通过对饰有波带纹的青铜器数量的分期统计（表二），我们发现，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不仅装饰波带纹的青铜器数量多，而且有的青铜器上装饰有多条波带纹，波带纹的总数亦多。

表二　单件青铜器上饰波带纹数量分期统计

时期＼数量	饰有一条	饰有两条	饰有三条	饰有四条	总计
西周早期	1	1			2
西周中期	28	6	4		38
西周晚期	73	9	10	1	93
春秋初期	115	9	2	2	128
春秋早期	44	9	7		60
春秋中期	18	2	1		21
春秋晚期	17		4		21
战国早期		1			1
战国中期		1			1
战国晚期		7			7
总计	296	45	28	3	372

结合对饰有波带纹的青铜器器类的统计（图一二、图一三）与分期统计（表三、表四），能够发现以下特点。

表三　饰波带纹的青铜器器类分期统计（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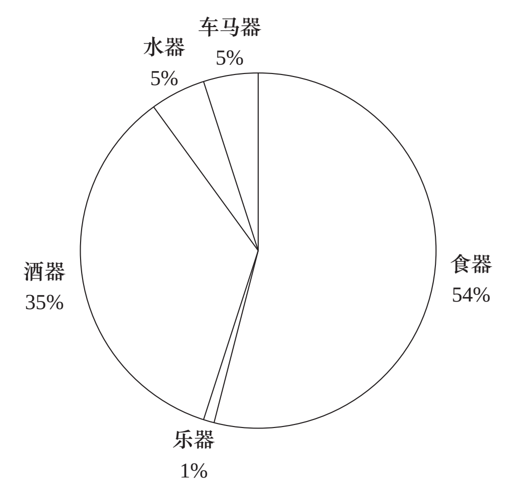
时期＼器物	食器	酒器	水器	车马器	乐器	其他	总计
西周早期		2（100%）					2
西周中期	12（31.58%）	12（31.58%）	4（10.53%）	8（21.05%）	2（5.26%）		38
西周晚期	46（49.46%）	29（31.18%）	7（7.53%）	5（5.38%）	4（4.30%）	2（2.15%）	93
春秋初期	73（57.03%）	43（33.59%）	3（2.34%）	9（7.03%）			128
春秋早期	38（63.33%）	21（35.00%）	1（1.67%）				60
春秋中期	10（47.62%）	11（52.38%）					21
春秋晚期	11（52.38%）	6（28.57%）	3（14.29%）	1（4.76%）			21
战国早期	1（100%）						1
战国中期	1（100%）						1
战国晚期	3（42.86%）	4（57.14%）					7

注：括号内为同一时期该器类波带纹青铜器数量占波带纹青铜器总量的比例。

表四　饰波带纹的青铜器器类分期统计（二）

器物／时期	食器						酒器			水器	车马器	乐器
	鼎	鬲	簋	铺	甗	簠	卣	尊	壶	盂	车軎	钟
西周早期							1	1				
西周中期		1	7	1		1			8	4	8	2
西周晚期	22	6	8		2	8			29	4	5	4
春秋初期	26	16	4	11	11	3		1	39	1	5	
春秋早期	26		8			2		1	18			
春秋中期	7								11			
春秋晚期	10				1				6		1	
战国早期			1									
战国中期			1									
战国晚期					3				4			

注：表中所列器类有省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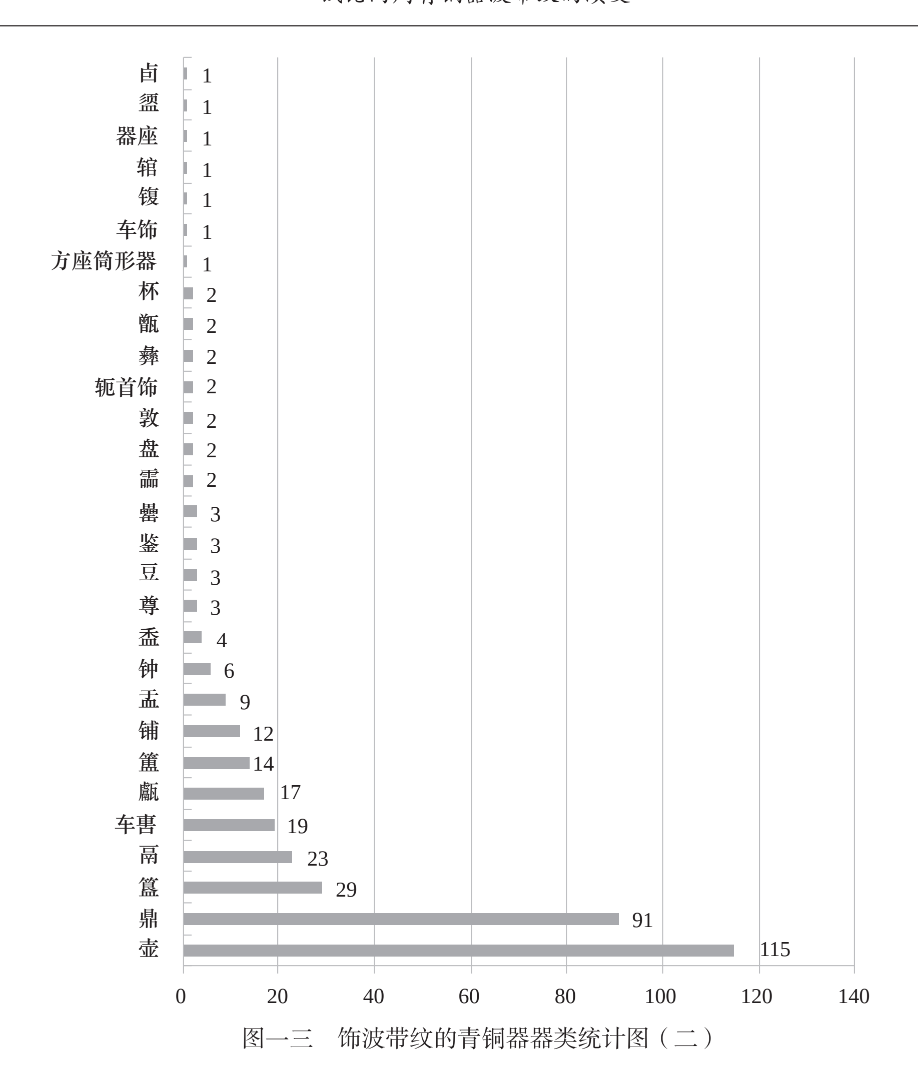


图一二　饰波带纹的青铜器器类统计图（一）

从总体来看，波带纹主要装饰在食器、酒器上，其中尤以壶、鼎为多，簋、鬲次之。

从分期来看，波带纹最早装饰在尊和卣上；西周中期，波带纹所饰器类范围扩大，簋、鬲、铺等食器以及车軎、钟等车马器、乐器上开始装饰波带纹，饰有波带纹的卣自此消失，壶成为波带纹装饰的重中之重，酒器装饰的变化应与卣的消亡和壶的继续发展有关；西周晚期，波带纹开始装饰在鼎上，且出现伊始数量便极多，其余器类继续发展；春秋初期，水器与车马器上装饰的波带纹数量锐减；春秋初期开始，乐器不再装饰波带纹，这与乐器所饰Aa型、Ba型波带纹基本消失是一致的；春秋早期开始，波带纹主要集中在鼎与壶上，其他器类分布零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波带纹自此渐趋衰落的现象。

波带纹型式与所饰青铜器器类交叉统计（表五、表六）显示：波带纹主要装饰食器和酒器，其中以壶、鼎为最多。Bb型装饰鼎、簋等食器的比重较大，与表一所显示的该型波带纹在春秋初期数量极多、表五所显示的春秋初期饰波带纹的青铜器中食器比重较高相联系，或许可以解释为，春秋初年，各诸侯国对之前等级较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的反叛[32]，急于用青铜器的铸造彰显自身的政治地位，但铸造技术尚不成熟或财力尚不充足，铸造饰有较简洁的Bb型波带纹的列鼎列簋（表七）



图一三 饰波带纹的青铜器器类统计图（二）

成为很好的选择。Bd 型波带纹主要装饰在盂、壶上，可能因为此型波带纹保留了较多夔龙纹的细部特征，需要较大的装饰空间，故其饰于腹部的比重极大（表八～表一二；图一四、图一五），而盂、壶腹部所占整个器物的比重较大所致。

表五 波带纹型式与所饰青铜器器类交叉统计（一）

型式 器物	Aa 型 Ⅰ式	Aa 型 Ⅱ式	Aa 型 Ⅲ式	Aa 型 Ⅳ式	Ab 型	Ba 型	Bb 型	Bc 型	Bd 型	C 型	D 型	总计
食器		5	1	5	16	4	181	9	2	1	2	226
酒器	3	5			18	12	80	27	15	3	7	170
水器					2	1	8	1	12			24
车马器		4	2		2		9	1				18
乐器		4				4						8

续表

型式 器物	Aa 型 Ⅰ式	Aa 型 Ⅱ式	Aa 型 Ⅲ式	Aa 型 Ⅳ式	Ab 型	Ba 型	Bb 型	Bc 型	Bd 型	C 型	D 型	总计
其他					2				1			3
总计	3	18	3	5	40	21	278	38	30	4	9	449

表六　波带纹型式与所饰青铜器器类交叉统计（二）

型式 器物	Aa 型 Ⅱ式	Aa 型 Ⅲ式	Aa 型 Ⅳ式	Ab 型	Ba 型	Bb 型	Bc 型	Bd 型	C 型	D 型	总计
鼎			5	1		75	2	2	1		86
鬲	1	1		9		12					23
簋	3			2		48	3				56
铺					1	13					14
甗						14	4			1	19
簠				4	3	11				1	19
壶	3			17	12	78	27	15		4	156
盂				1	1	3		5			10
车軎	4	2		2		6					14
钟	4				4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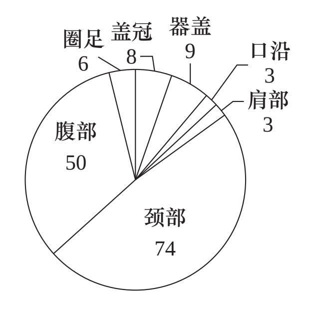
注：表中的统计器类为样本数在 5 件以上者。

表七　列鼎、列簋与波带纹型式交叉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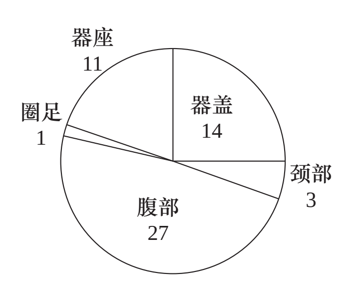
列鼎数量	2	3	4	5	7	10	列簋数量	2	4	6
Aa 型				1			Aa 型	1		
Bb 型	4	1	3	4	1	1	Bb 型	1	1	1

表八　波带纹型式与所饰铜壶部位交叉统计

所饰部位 型式	盖冠	器盖	口沿	肩部	颈部	腹部	圈足	总计
Aa 型Ⅱ式	1	2						3
Ab 型		2			7	2	6	17
Ba 型	3		1		8			12
Bb 型	4	5	2	3	34	27		78
Bc 型					14	13		27
Bd 型					7	8		15
D 型					4			4




图一四　波带纹饰铜壶部位统计



图一五　波带纹饰铜簋部位统计

表九　波带纹型式与所饰铜簋部位交叉统计

所饰部位 / 型式	器盖	颈部	腹部	圈足	器座	总计
Aa 型Ⅱ式		2	1			2
Ab 型			1	1		2
Bb 型	13		25		10	48
Bc 型	1	1			1	3

表一〇　波带纹型式与所饰铜鼎部位交叉统计

所饰部位 / 型式	腹部	口沿
Aa 型Ⅳ式	5	
Ab 型		1
Bb 型	75	
Bc 型	2	
Bd 型	2	
C 型	1	

表一一　波带纹型式与所饰铜鬲部位交叉统计

所饰部位 / 型式	腹部
Aa 型Ⅱ式	1
Aa 型Ⅲ式	1
Ab 型	9
Bb 型	12

表一二　波带纹型式与所饰铜盂部位交叉统计

所饰部位 / 型式	腹部	圈足
Ab 型		1
Ba 型	1	
Bb 型	3	
Bd 型	5	

（三）地域分布

对饰波带纹青铜器的分区分期统计（表一三）仅包括考古发掘出土者，虽然部分有铭者显示器物可能来源于其他地区，但考虑到大部分器物无铭文，而且各区域之间青铜器的交流既有青铜器实物的交流，也有设计理念的交流，故统计时的区域均以出土地为标准。

表一三　饰波带纹的青铜器分区分期统计

区域 时代	山东	陕西	河南	湖北	山西	甘肃	总计
西周早期	2（100%）						2
西周中期		29（90.63%）	3（9.38%）				32
西周晚期	12（17.91%）	42（62.69%）	6（8.96%）	3（4.48%）	4（5.97%）		67
春秋初期	13（10.24%）	32（25.20%）	49（38.58%）	22（17.32%）	5（3.94%）	5（3.94%）	127
春秋早期	6（12.00%）	7（14.00%）	5（10.00%）	15（30.00%）		16(32.00%）	50
春秋中期	3（14.29%）	4（19.05%）	11（52.38%）	2（9.52%）		1（4.76%）	21
春秋晚期		4（21.05%）	9（47.37%）		4(21.05%）		19
战国晚期		7（100%）					7

注：括号内为同一时期某地区的饰波带纹青铜器占该时期饰波带纹青铜器总数的比例。另外，其余地区虽也出土了饰波带纹的青铜器，但因数量少，未详细列出，仅计入了总计中。

统计发现，饰有波带纹的青铜器主要分布在今天的陕西、河南、湖北、山东、山西、甘肃等地，大致是周王畿、秦、楚、齐、晋等的所在地，大致都属于广义上的中原系统。从分期来看，西周早期饰波带纹的青铜器仅出现在山东，且仅有两例；西周中期，陕西占绝大部分的比例，陕西之外仅河南有三例；西周晚期，陕西比例有所下降，但仍占半数以上；春秋以来，波带纹的地域重心从陕西转移到了河南，同时重心不再明显，应与周王室东迁及各诸侯国实力增强有关；战国早期和战国中期没有饰波带纹的青铜器出土；战国晚期，陕西出现七例，可能是因为秦一直比较保守，或工匠技艺更新缓慢，流行于西周春秋的波带纹在秦国被一直沿用。

分器类来看（表一四），陕西、甘肃的食器比重远远高于酒器，可能与周人重食有关；陕西各种器类都较多，与它的总量大，尤其是西周时期数量多相符。

表一四　饰波带纹青铜器器类分区统计

区域 器	甘肃	河南	湖北	山东	山西	陕西	总计
食器	16（9.6%）	43（25.9%）	17（10.2%）	18（10.8%）	5（3%）	66（39.8%）	166
酒器	6（5.2%）	36（31.3%）	21（18.3%）	17（14.8%）	5（4.3%）	29（25.2%）	115
车马器		3（13%）	3（13%）			16（69.6%）	23
水器		1（6.2%）	1（6.2%）	1（6.2%）	2（12.5%）	10（62.5%）	16
乐器						3（100%）	3

注：括号内为某地区饰波带纹的某类青铜器占该类饰波带纹青铜器的比例。另外，其余地区虽也出土了饰波带纹的青铜器，但因数量少，未详细列出，仅计入了总计中。

通过对波带纹型式的分区统计（表一五），能够看出湖北 Bc 型波带纹占 Bc 型总量比例极高，应与楚文化的艺术风格有关——楚文化的纹饰往往好丽喜繁、细节丰富。这也提醒着我们，Bc 型波带纹可能是在 Bb 型波带纹的主要构图结构上细密化的呈现。

表一五　波带纹型式分区统计

区域＼型式	Aa 型Ⅰ式	Aa 型Ⅱ式	Aa 型Ⅲ式	Aa 型Ⅳ式	Ab 型	Ba 型	Bb 型	Bc 型	Bd 型	C 型	D 型	总计
陕西		12	3	5	9	10	97	4	12			152
河南		2			10		56	5	3		7	83
湖北					1	2	45	16	4			68
山东	3				13		23			2		41
甘肃							20	2				22
山西					2		10		6		2	20
安徽									1	1		2
河北					1							1
总计	3	14	3	5	36	12	251	27	26	3	9	389

（四）纹饰共存

通过表一六，我们发现：窃曲纹和C型之外的所有型式的波带纹共存，与B型波带纹共存比例极高；重环纹与所有型式的波带纹都有共存案例，但与Ab型、Ba型波带纹共存比例更高；兽面纹不与Ba型波带纹共存；凤鸟纹与Ba型波带纹共存比例高。

表一六　共存纹饰与波带纹型式交叉统计

波带纹数量	Aa 型	Ab 型	Ba 型	Bb 型	Bc 型	Bd 型	C 型	D 型
	29	40	21	278	38	30	4	9
窃曲纹	11（37.93%）	17（42.50%）	12（57.14%）	148（53.24%）	31（81.58%）	20（66.67%）		7（77.78%）
重环纹	7（24.14%）	16（40.00%）	7（33.33%）	56（20.14%）	2（5.26%）	1（3.33%）	1（25.00%）	2（22.22%）
夔龙纹			4（19.05%）	26（9.35%）		2（6.67%）		
鳞纹		13（32.50%）	3（14.29%）	67（24.10%）	10（26.32%）	1（3.33%）		2（22.22%）
蟠螭纹				13（4.68%）	2（5.26%）	1（3.33%）		
蟠虺纹				26（9.35%）	2（5.26%）			2（22.22%）
交龙纹			1（4.76%）	10（3.60%）	7（18.42%）			
盘龙纹				10（3.60%）				

续表

波带纹数量	Aa 型	Ab 型	Ba 型	Bb 型	Bc 型	Bd 型	C 型	D 型
	29	40	21	278	38	30	4	9
兽面纹	4（13.79%）	1（2.50%）		34（12.23%）	3（7.89%）	2（6.66%）		
凤鸟纹	7（24.14%）	11（27.50%）	7（33.33%）	5（1.80%）	1（2.63%）			
云雷纹	8（27.59%）	2（5.00%）		9（3.24%）			1（25.00%）	2（22.22%）
变形云纹	7（24.14%）	3（7.50%）	6（28.57%）	34（12.23%）		2（6.67%）		
涡纹	2（6.90%）	2（5.00%）		5（1.80%）				
“亚”字纹				18（6.47%）	8（21.05%）	1（3.33%）		
弦纹	2（6.90%）	1（2.50%）		25（8.99%）	3（7.89%）		1（25.00%）	1（11.11%）
绹纹				19（6.83%）		6（20.00%）		
瓦纹				6（2.16%）		1（3.33%）		

注：总数小于等于5的共存纹饰未列入表格，括号内为饰有某型式波带纹的青铜器中同时饰有某纹饰的青铜器所占比例。

纹饰的共存与否有的可以从艺术风格进行解释，如窃曲纹不与C型波带纹共存可能是因为减省了带状主纹的波带纹所饰的青铜器整体纹饰就较为简洁，而窃曲纹较繁复的风格与之不符；有的则与纹饰的母题有关。

（五）小　　结

综上所述，波带纹在不同时段的演变大致如下。

西周早期，波带纹处于由单首双身龙纹向波带光滑简洁型波带纹的转变之中，表现为波带光滑，每个波峰或波谷内填单个口纹，且有云雷纹填地。

西周中期，波带光滑简洁型波带纹进一步发展，波带中部有褶皱或凸出兽目的波带纹开始出现。波带之间所填的辅纹此时有变形口纹、“皇”字上部形纹、一口二眉形纹、变形一口二眉形纹、爬行龙纹。各型波带纹比例基本持平。

西周晚期，各型波带纹达到极盛。波带光滑、内填口纹型波带纹在口形边缘出现三角形、半月形等辅纹，填充效果更加饱满。波带中部有褶皱或凸出兽目的波带纹数量上开始占优势，其中又以辅纹填充一口二眉形者为多，辅纹填充“皇”字上部形者次之。

此时波带纹常与窃曲纹、重环纹、鳞纹、凤鸟纹组合出现。波带纹装饰器类涵盖食器、酒器、水器、车马器、乐器等。

春秋初期，各型波带纹开始由盛转衰。波带光滑、内填口纹型波带纹辅纹简化变形。波带中部有褶皱或凸出兽目、波带间填充一口二眉形的波带纹占据绝对优势，常装饰在列鼎、列簋之上。此时波带纹常与窃曲纹、重环纹、垂鳞纹组合出现。

春秋中晚期，多见波带中部有褶皱或凸出兽目、波带间填充一口二眉形的波带纹。也有少量波带光滑、波带间填充一口二眉形波带纹，波带中部有褶皱或凸出兽目、波带间填充变形一口二眉、爬行龙纹波带纹被沿用。

战国时期，仅有零星的波带中部有褶皱或凸出兽目、波带之间内填一口二眉形的波带纹被沿用。

三、母题与含义

学界或将波带纹归入几何纹[33]，或将其归入变形动物纹[34]。不过，较多学者都认为波带纹是动物纹高度抽象化的结果。容庚、张维持先生所著《殷周青铜器通论》将波带纹归入几何纹，认为它“是把三角形拉长，使交互角改为弧形，依照一定的距离连续组成的”[35]。在马承源先生主编的《商周青铜器纹饰》中，波带纹被认为是西周时期变形兽体纹饰的最佳成就[36]。朱凤瀚先生[37]与梁彦民[38]都认为单首双身龙纹是波带纹的重要祖型之一，无尾的单首双身龙纹是波带纹的初期形式。李松、贺西林先生合著的《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认为，西周艺术的总体发展趋势是理性化，波带纹是由神秘纹饰的具象逐步解体、衍化而成的抽象纹饰[39]。裴书研则认为波带纹由动物纹演变而来，不能被笼统划归几何纹饰[40]。

（一）母题的来源

A 型波带纹的主纹是光滑、无凹线外装饰与变形的波浪形纹饰，以往对波带纹源流的研究实际上大多集中在此处。朱凤瀚先生已经注意到了“如将此种纹饰（波带纹）与龙纹中的单首双身龙纹比较即可看出，单首双身龙纹中作波状的躯干形状及空间填心状或口状纹的构图方式与此种纹饰极为相近”[41]；梁彦民认为单首双身龙纹是波带纹的重要祖型之一，无尾的单首双身龙纹是波带纹的初期形式，“波带之间的装饰，最早也是由单首双身龙纹的足部逐渐变化来的”[42]。

本文赞同梁彦民的这一观点，包括他注意到的例证：山东黄县归城小刘庄出土的启卣，器身颈部与器盖装饰着两周波带纹，两条波带纹型式相同，均为 Aa 型Ⅰ式，不同之处在于器身颈部的波带纹上还以高浮雕的形式饰有两个龙首，当龙首被置于视野中间时，呈现出的便是单首双身龙纹的效果（图一）[43]。启卣和同时出土的启尊，

铭文均记载启从王南征之事，书体类似，纹饰以云雷纹为地，形制也是西周初年的风格，年代为昭王时期无疑[44]。因此，启尊和启卣所饰的波带纹是目前所见波带纹的最早型式，可以看作是单首双身龙纹向 A 型波带纹的过渡，A 型波带纹的主纹应来源于单首双身龙纹（图一六）。[45]



图一六　斿父癸壶颈部单首双身龙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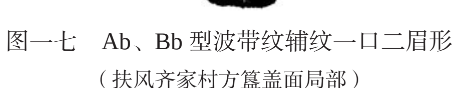
B 型波带纹自西周中期出现开始，其主纹就表现出与 A 型波带纹主纹不同的形态，而 A 型波带纹在西周早期仅有三例，即 A 型波带纹与 B 型波带纹基本同时产生，不存在其中一型是由另一型发展而来的可能。B 型波带纹主纹上装饰的褶皱与凸出的兽目经常同时存在，故二者意义极可能相同。又由窃曲纹与 B 型波带纹共存比例极高，不难推测 B 型波带纹的主纹部分应与窃曲纹同源，是由某种蜷曲变形的龙纹衍化而来，很可能是象鼻龙纹[46]。

本文将 A 型波带纹按波带间填充辅纹的不同，分成 Aa 型与 Ab 型。Aa 型波带纹最初也应由单首双身龙纹发展而来。但 Ab 型波带纹内填一口二眉形的辅纹并非来源于单首双身龙纹，而是来源于兽面纹。Ab 型的辅纹可能与 Bb 型的辅纹存在相互的影响。

Ab 型与 Bb 型的辅纹均为一口二眉形（图一七）[47]，马承源先生称此种辅纹为鳞瓣纹，也有学者因其像“虹”字而称之为霓虹纹[48]。本文认为其已经排列成的一口二眉的固定形式与鳞瓣的排列方式相差较远，而“虹”这种传说中的动物之前并未出现在青铜器上，该类纹饰一出现就如此程式化是不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一口二眉形来自体躯省略式外卷角兽面纹（图一八）[49]的可能性较大，这种兽面纹流行于晚商至西周早期，而 Ab 型、Bb 型波带纹最早出现于西周中期，故体躯省略式外卷角兽面纹向辅纹为一口二眉形的波带纹转变在时间上是符合逻辑的。体躯省略式外卷角兽面纹由两个向外侧卷曲的大角和面部组成，随着大角发展成为眉形，面部简化成口形，完成向一口二眉形的转变。

关于 Bb 型和 Bc 型的使用区别，通过前文的分器类统计，我们发现 Bb 型常出现于列鼎、列簋中，应是一种高度程式化的纹饰。在区域统计中，我们发现楚文化区域更倾向于使用 Bc 型纹饰，并推测其与楚文化好丽喜繁的艺术风格有关。而对 Bb 型与 Bc 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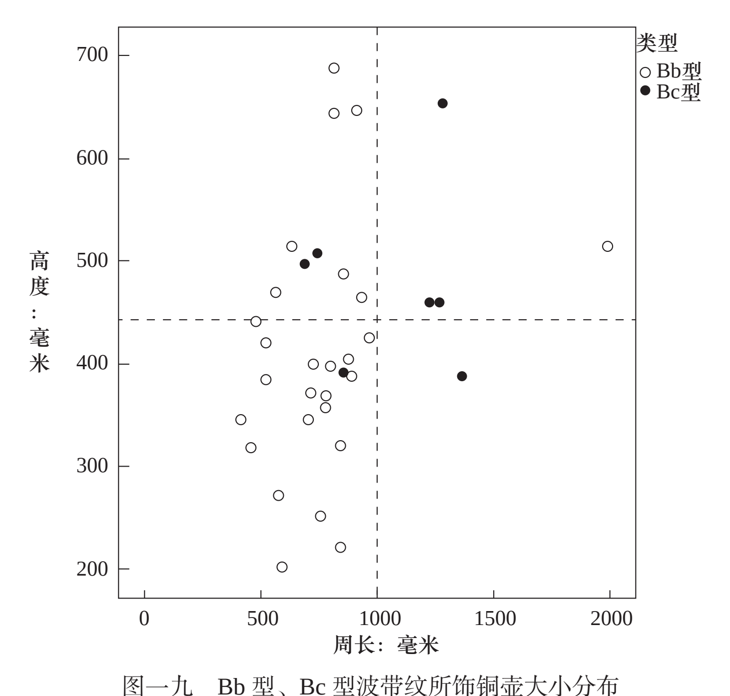


图一七　Ab、Bb 型波带纹辅纹一口二眉形
（扶风齐家村方簋盖面局部）



图一八　体躯省略式外卷角兽面纹

波带纹所饰铜壶的统计（图一九），可以发现 Bc 型波带纹比 Bb 型波带纹所饰铜壶的可装饰面积大。综上可得，Bc 型波带纹是 Bb 型波带纹纹饰细密化的结果，因此，Bc 波带纹也来自象鼻龙纹与体躯省略式外卷角兽面纹。



图一九　Bb 型、Bc 型波带纹所饰铜壶大小分布
Bb 型、Bc 型波带纹所饰铜壶大小散点分布，横轴表示由铜壶口径估算的口部周长，
纵轴表示铜壶高度，高度与周长的乘积大致为铜壶可装饰的面积

从共存纹饰的统计中我们已知：兽面纹不与 Ba 型波带纹共存，凤鸟纹与 Ba 型波带纹共存比例高。由于青铜器的总体装饰来源应该是较和谐的，这种纹饰共存也提醒着我们，凤鸟纹与 Ba 型波带纹之源存在某种关联。《国语·周语》记载："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50]鸑鷟即凤凰，它是天命传递的象征，表达着周人代商的合法性。在

此文化背景下，凤鸟纹得到了极大发展。Ba 型波带纹始见于西周中期，其辅纹以口纹为中心，且口纹上有纵向的枝桠生出，形似皇冠，（图二〇），[51]又似金文中的“皇”字上部（图二一）[52]。多齿冠凤纹（图二二）[53]流行至西周早期，“冠作多齿形”[54]。Ba 型波带纹的辅纹保留了多齿冠辅纹的冠部特征，而且时间上多齿冠凤纹之衰对应 Ba 型波带纹之兴，因此可以推测 Ba 型波带纹的填充辅纹由多齿冠凤纹发展而来。



图二〇　Ba 型波带纹内填辅纹主体部分（扶风强家 M1：4 颈部）



图二一　“皇”的金文字形（仲辛父簋）



图二二　多齿冠凤纹

Bd 型波带纹填充清晰的爬行龙纹，对其母题不再赘述。

C 型波带纹数量极少。山东沂水刘家店子出土的春秋早期霝颈部饰有 C 型波带纹，波带上饰云雷纹，波带中间装饰有与一口二眉形结构一致的小兽首（图二三）[55]。现藏芜湖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西周晚期鼎腹部饰有 C 型波带纹，波带上饰云雷纹，波带中间填一口二眉形（图一〇）。这种类型的波带纹可能属于 Ab 型波带纹发展过程中的复古。



图二三　沂水刘家店子出土青铜霝颈部波带纹

D 型波带纹仅见于春秋初期的三门峡虢国墓、平顶山应国墓与春秋晚期的上马墓地，应是对 Ab 型或 Bb 型波带纹的减省。

如上所述，各型波带纹源出不同的母题，简要概括如下。

单首双身龙纹→ Aa 型波带纹。

单首双身龙纹 + 体躯省略式外卷角兽面纹→ Ab 型、C 型波带纹。

象鼻龙纹 + 多齿冠凤纹→ Ba 型波带纹。

象鼻龙纹 + 体躯省略式外卷角兽面纹→ Bb 型、Bc 型波带纹。

象鼻龙纹 + 爬行龙纹→ Bd 型波带纹。

体躯省略式外卷角兽面纹→ D 型波带纹。

（二）组合的含义

艺术心理学认为，一个物体的外貌不仅仅由眼睛所看到的意象决定，故而复合纹饰的涵义也不能由所有元素简单相加。观者通过视觉将符号化的纹饰感知，进而联想出纹饰的其他部分，形成知觉上对纹饰主题内容的认识，在大脑中综合构建出新的“格式塔”。

部分辅纹并不是龙纹的一部分，它们为何填充在了波带纹的主纹之外？李格尔在研究埃及植物几何纹时遇到相似的问题，他认为那“只是古埃及艺术中流行的一个原始艺术原则的表现，而且也是这个艺术类型的根本的风格概念之一，即填补中轴线的原则。埃及艺术的风格趣味要求，在两条分叉的线形成一个角度的地方，都得填充图案。这个原则无疑应追溯到恐惧心理的现象上，这种心理又根源于成为所有原始艺术的动力的装饰欲上”[56]。中国的青铜器波带纹主纹间填充与主纹直接来源不同的辅纹，原因也有相似之处。从商晚期的满地“三层花”开始至春秋早期，青铜器纹饰的制作技术没有明显的变革，因此艺术风格的变化较为稳健。周人虽将晚商繁复的纹饰简化，却仍愿在装饰带中填充较多的图案。

可能是由于新兴的波带纹既能够保留龙纹、凤纹、兽面纹等传统纹饰的意义，又能够根据器物整体的风格、装饰部位的大小与制作的时间和财力灵活改变细节，故而波带纹由此流行开来。

需要强调的是，纹饰的直接来源并不是它的唯一来源，它在演化过程中也会受到其他纹饰的影响。纹饰的发展与演变不是单线的进化论能够解释的，它是不同具体纹饰的杂交和进化。视觉上的过渡形式也并不一定成为逐渐进化的证据。比如，B 型波带纹的主纹是否也受到了 A 型波带纹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无论波带纹是否可以被看作由单首双身龙纹、象鼻龙纹、多齿冠凤纹、爬行龙纹、体躯省略式外卷角兽面纹演变而来，周人都还是使用着波带纹。视觉习惯与文化心理在这里起到一定作用。

波带纹规整肃穆，简约质朴，体现着形式美的秩序感，与时代审美精神和意识形态相协调。商代“尊神先鬼”，商人坚定地相信“动物中有若干是帮助巫觋通天地的”[57]，

商代的青铜器也理所应当地“作为祭祀过程中的礼器向鬼神们表达着人的敬畏”[58]。西周时期，宗法制度以血亲为纽带，道德伦理色彩浓厚，“整个礼制时代呈现出一种中和、静穆、节制与和谐”[59]。“青铜礼器的功能从此由上帝与神灵和世人之间的媒介转换为区分社会等级的象征。”[60]也正如巫鸿先生在《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中认为的，西周青铜器装饰逐步图案化，此时青铜礼器的意义和功能，包括其纪念碑性，都发生了重要的转化[61]。

波带纹的主纹是波带，而就构成波带的基础元素——波纹线来说，霍格斯首先提出，它带给人的快感首先来源于人的探索心理和人的眼睛[62]。今天我们已经不再把视觉追踪归结于人眼睛的运动，但无论快感最终源自何处，波纹线都比直线更容易表现运动：当图形与基底完全平衡、波带纹在青铜器上水平环绕时，能够表现出一种波动，由于它的连续二方构图，即波带向两边的延伸，其中每一个波峰都能让我们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波谷，当我们的视线一次又一次从波峰转向波谷时，其实也是“图形”与“基底”的互相转化，波带纹也就由此展现出一种此起彼伏的效果，使观者领略到运动感与节奏感（图二四[63]、图二五[64]）。贡布里希认为，“波形线本质上是一种表明自由设计的纹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不规则性”[65]，这背后也是周代艺术中对人的发现。



图二四　陈侯簋腹部波带纹



图二五　史颂鼎腹部波带纹

四、余　　论

青铜器纹饰的研究是综合的，任何单一的理论或学科都有其局限性。因此我们在期待新材料出土的同时，也需要学习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长期的探索过程中不断注入源头活水，也借来他山之石。

通过类型学分析，归纳波带纹的典型特征与时代演变，以此来为青铜器断代服务，是考古学视野下波带纹研究的主要内容。我们完全可以不将其视为青铜器纹饰研究的唯一目的。定量分析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对青铜器纹饰的使用情况进行归纳，进而构建时空框架，这是对青铜器纹饰进行研究的基础。

艺术史等学科对波带纹的研究更多注重纹饰的文化内涵、社会背景与功能。选出“经典作品”作为时代代表的研究方法早已成为艺术史研究的过去式，不少艺术史学者都逐渐返回到历史研究的层面去考虑对艺术史的重构。这也与考古学“透物见人”的研究目标契合。当我们引入形式与视觉分析等新的观察角度时，考古学与相关学科或许是可以互相启发和验证的。

注　释

［1］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581．

［2］（北宋）吕大临．考古图［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北宋）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图［M］．扬州：广陵书社，2010：345．

［4］ 同［3］：232．

［5］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M］．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41：131，132．

［6］ 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108．

［7］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4：472，473．

［8］ 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400．

［9］ 彭嫦．周代青铜器波曲纹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10］ 余奕．中原地区西周中晚期青铜器几何纹饰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11］ 毕经纬．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12］ 车芳．三晋两周地区青铜容器纹饰初步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13］ 陈志明．山西地区出土晋系青铜器纹饰类型和文化因素分析［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14］ 王冰．东周时期秦国青铜器纹饰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15］ 吴伟华．春秋时期黄河流域青铜器纹饰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6］ 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为我国两周时期。本文研究的空间范围理应以两周疆域范围为限，但由于华夏系统列国与其他族群间的边界变化不定，对青铜器波带纹的收集大致以秦代疆域为界。

［17］ 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4．西周早期，约相当于武、成、康、昭王时期；西周中期，约相当于穆、恭、懿、孝、夷王时期；西周晚期，约相当于厉、共和、宣、幽王时期。

［18］ 路国权．东周青铜容器谱系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283．春秋初期，相当于公元前 770 ~ 前 680 年；春秋早期，相当于公元前 680 ~ 前 600 年；春秋中期，约相当于公元前 600 ~ 前 530 年；春秋晚期，相当于公元前 530 ~ 前 453 年；战国早期，相当于

公元前 453 ~ 前 370 年；战国中期，相当于公元前 370 ~ 前 280 年；战国晚期，相当于公元前 280 ~ 前 220 年。

［19］ 本文所录器物的年代与原始报告、简报、简讯不一致者，参考了 a．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3．
b．同［17］．
c．同［18］．

［20］ 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J］．文物，1972（5）：5．

［21］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组．商周青铜器纹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286．

［22］ 曹玮．周原出土青铜器［M］．成都：巴蜀书社，2005：2109．

［23］ 尹盛平，张天恩．陕西陇县边家庄一号春秋秦墓［J］．考古与文物，1986（6）：18．

［24］ 同［22］：83．

［25］ 周原扶风文管所．陕西扶风强家一号西周墓［J］．文博，1987（4）：10．

［2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10 的清理［J］．文物，2000（12）：4 ~ 22．原线图清晰度有限，插图为笔者重描。

［27］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西工区春秋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0（8）：18．原线图清晰度有限，插图为笔者重描。

［28］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体育场路东周墓（M8830）发掘简报［J］．文物，2011（8）：18．

［29］ 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21．

［3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八号墓发掘简报［J］．华夏考古，2007（1）：26．原线图清晰度有限，插图为笔者重描。

［31］ 本文曾尝试根据细部特征对 Bb 型波带纹进行更深入的型式划分，但对这些细部特征的区别与年代、地域、所饰青铜器种类、位置等的联系所进行的统计，结果并不乐观。因此对相关细部统计不再罗列、赘述。既然本文分类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把握总体规律进行下一步研究，在学界有一定影响的日本学者山内清男主张的“细分到最后”的分类原则（转引自赵辉．关于考古类型学的几点思考［C］．考古学研究（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488．）在此并不适用，即在本文被划分为同一型式的纹饰并非每一个细部特征都完全一致。

［32］ 本文的春秋初期（公元前 770 ~ 前 680 年）是各诸侯国称霸前夕。《史记·周本纪》：“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前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49．《史记·秦本纪》：“（秦武公）十九年，晋曲沃始为诸侯。齐桓公伯于鄄。”（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83．秦武公十九年即公元前 680 年。

［33］ 同［6］．

［34］ a．同［21］：25．
b．同［8］．

［35］ 同［6］．

［36］ 同［21］：25.
［37］ 同［1］.
［38］ 梁彦民．殷周青铜器双身龙纹及相关问题［J］．考古与文物，2006（6）：78～82.
［39］ 李松，贺西林．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102.
［40］ 裴书研．周原出土青铜礼容器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136.
［41］ 同［1］.
［42］ 同［38］：81.
［43］ 同［20］.
［44］ 同［20］.
［45］ 同［21］：130.
［46］ 本文赞同彭裕商先生所认为的窃曲纹源自象鼻龙纹的观点。彭裕商．西周青铜器窃曲纹研究［J］．考古学报，2002（4）：424.
［47］ 同［22］：1030.
［48］ 同［21］：26.
［49］ 同［21］：20.
［50］ （春秋）左丘明．国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12：10.
［51］ 同［25］.
［52］ 容庚．金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21.
［53］ 同［21］：174.
［54］ 同［21］：图录 171.
［55］ 罗勋章．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4（7）：7.
［56］ 〔奥〕阿洛伊斯·李格尔．风格问题：装饰艺术史的基础［M］．刘景联，李薇蔓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35.
［57］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434.
［58］ 牛镭．夏商周的青铜器美学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文学院，2011：25.
［59］ 朱志荣．夏商周美学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3.
［60］ 〔美〕杨晓能．另一种古史——青铜器纹饰、图形文字与图像铭文的解读［M］．唐际根，孙亚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381.
［61］ 〔美〕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M］．李清泉，郑岩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77.
［62］ 〔英〕E．H．贡布里希．秩序感——装饰艺术的心理学研究［M］．范景中，杨思梁，徐一维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153.
［63］ 同［21］：291.
［64］ 同［21］：289.
［65］ 同［62］：205.

The Evolution of Wave Pattern on the Bronze in Zhou Dynasty

Guo Zhengrui

Abstract: Wave pattern on the bronze was mainly popular in the late Western Zhou Dynasty to early the Spring and Autumn. It can be divided into a variety of types. Wave pattern comed from double dragon, trunk dragon, phoenix with multi-tooth crown, crawling dragon, animal facial pattern and other ornamentation. People in Zhou Dynasty decorated the neck and abdomen of tripod and pot or other kind of bronze with wave patterns, reflecting the rational aesthetic sense of them.

Keywords: bronze; wave pattern; Western Zhou Dynasty; Eastern Zhou Dynasty

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战国时期洞室墓的消亡与殉牲坑的出现研究

刘　騻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州，510275）

一、绪　　论

对殉牲的研究业已取得了一定成果。研究的时段集中于史前至战国时期。在较为宏观的层面上，包曙光在我国北方地区对夏至战国时期相关现象进行考察[1]；庄家铭则聚焦于东周时期内蒙古北方系青铜文化墓葬的殉牲现象[2]；黄展岳[3]、金龙[4]则将研究对象确定为商墓；刘羽阳与王辉[5]重点考察了先秦时期西北游牧地区的相关现象；而微观的研究则是就具体遗址而言，如小双古城墓[6]、忻州窑子墓地[7]与军都山墓地[8]等。以上的研究通过殉牲现象揭示其所反映的对生计模式、葬俗特征、社会等级、精神信仰与族群归属，考察点颇为全面。本文拟另辟蹊径，试探究殉牲与墓葬形制的演变关系。

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洞室墓的演变与殉牲现象是存在联系的。欲明确洞室墓的变迁情况，一方面需对具体墓葬结构（如二层台、壁龛、头龛）的演变进行考察，另一方面需要结合殉牲现象的演变特征并加以考察。因此，此处的研究将综合这两个角度，对洞室墓以及相关的殉牲现象（尤其是殉牲位置的演变）进行考察。

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最早的洞室殉牲墓见于白敖包墓地[9]，其年代为青铜时代。该类"曰"字形洞室墓系甘青地区洞室墓东向传播的产物[10]。具体而言，曹建恩与孙金松认为该地区的文化源于沙井文化[11]。洞室墓系统由甘肃中部沿黄河传播至土默川平原。鉴于西岔文化与西麻青墓地中未见洞室墓，对于洞室墓西来模式的认识当有两点：①该文化因素的直接接受对象当为朱开沟文化；②洞室墓的传播当为长期的过程，且经历多次完成。考虑到东周时期该类墓葬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出现较多，故洞室墓的传播主要发生于两个时段：首次为朱开沟文化所在的夏商时期；另一次当为东周时期，年代下限不晚于春秋晚期。春秋战国时期，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最为常见的洞室墓类型为"曰"字形洞室墓。"凸"字形洞室墓较为罕见，典型者如新店子 M9[12]。

该地域人群的经济生产方式具有畜牧的特征，其社会较为多元，呈现出家族化、小型化与分散化的社会形态。因此，该区域的人群流动性较强。区域内零星分布的墓葬群与其较小的规模也是这一文化现象的写照。该地域在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存在文化上的分区，也作为一个内部高度流动的文化圈而存在。在认识这一区域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文化传统时，不仅要建立考古学分区的意识，还要以整体的观点开展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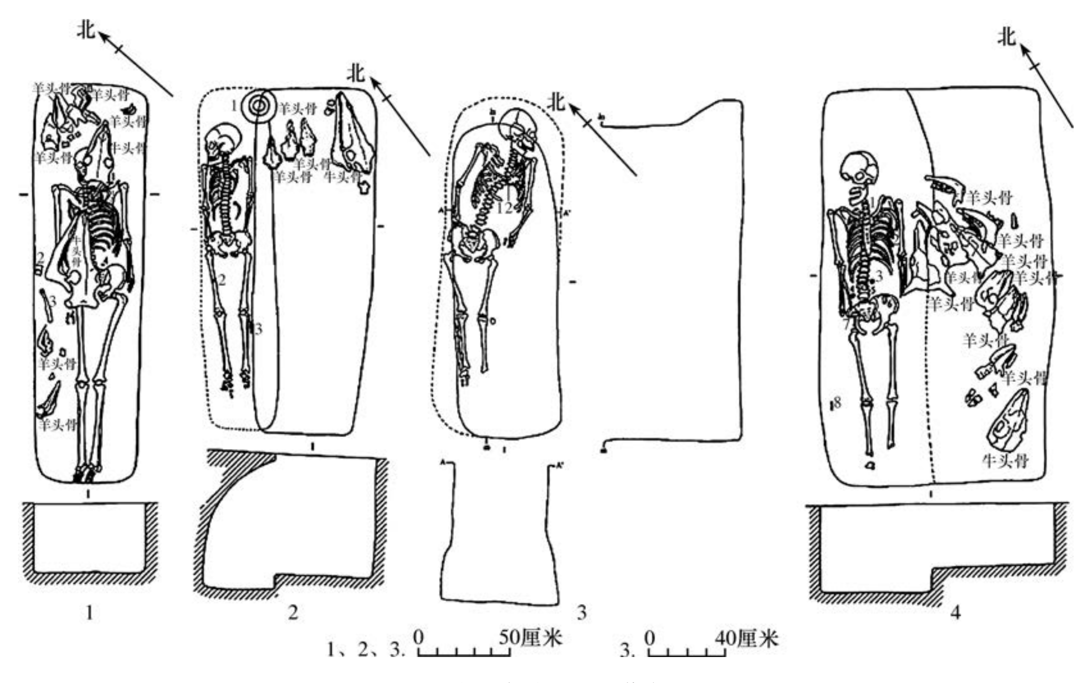
二、墓葬形制的演变与殉牲的关系

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洞室墓、二层台及其上置牲的葬俗源于朱开沟文化。现采纳其他学者的分区观点[13]，对这几类葬俗进行考察。

1）凉城及周边地区（蛮汗山以南，马头山以北，以岱海湖为中心的地带）。春秋至战国的殉牲墓葬中，殉牲皆位于墓葬底部（包括直接叠压于人骨之上的情况）与填土中，未见二层台上殉牲的情况。忻州窑子墓地[14]的情况较为特殊，其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墓主的人种构成复杂，主要为东亚人种与北亚人种，说明该地区的文化处于交融的状态，葬俗与墓葬形制存在内在差异：①墓主的面向存在面南与面北两类情况；②墓葬形制虽皆为竖穴土坑墓，但具体又存在仅设置头龛或二层台、设置二层台与头龛、不设置二层台或头龛的情况；③ 66 座墓中有 44 座存在殉牲现象。殉牲墓按照殉牲的具体位置，又可以划分为填土内殉牲与墓底殉牲两种情况。

忻州窑子墓地中二层台的筑造较为普遍，存在单面、双面、三面与四面筑台的情况。此外，崞县窑子墓地[15]中也存在使用头龛与二层台的墓葬 2 座。如此发达的二层台筑造习俗的背后应存在独特的文化内涵。

该地域的洞室墓仅见于小双古城墓地，其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根据报告，小双古城墓地[16]发掘 14 座墓。现可依据实际情况加以厘清，14 座墓葬可依据墓葬形制划分为如下三类（M14 内未见人骨，情况特殊，因此不参与分类）：甲类墓为竖穴土坑墓，如 M2 与 M15；乙类墓为土洞墓，如 M7、M9、M11、M13；丙类墓为异型墓（图一），实为退化的洞室墓。丙类墓具体可分为两型，A 型的典型墓葬为 M12。该类墓葬中洞室空间较小，墓葬的横剖面或纵剖面呈袋状。B 型的典型墓葬为 M3、M4、M5、M8、M10，该型墓的洞室顶部结构基本消失，原本的洞室与墓室之间仍存在空间间隔。从小双古城的材料可以辨析洞室墓的去向，即转变为竖穴土坑墓。其可能的演变途径有二：①其典型为丙类 A 型墓。这种演变的进程较快，洞室逐渐向墓室方向内收，最终与墓室合并。②其典型为丙类 B 型墓。首先，墓室的开口空间向洞室的上部不断扩展；其次，洞室墓的整体空间在竖直方向上缩减，墓葬的内部高度趋矮。与此同时，洞室与墓室的高度差趋减，最终位于同一平面。小双古城丙类墓的墓葬形制反映了洞室



图一 小双古城墓地墓葬类型图

1. 甲类墓（M2） 2. 乙类墓（M7） 3. 丙类 A 型墓（M12） 4. 丙类 B 型墓（M5）

墓向竖穴墓演变的两种过渡形态。相较于另外两区，凉城及周边区域的墓葬分布最为密集，且公布材料最为丰富，因此，其变化过程最为有迹可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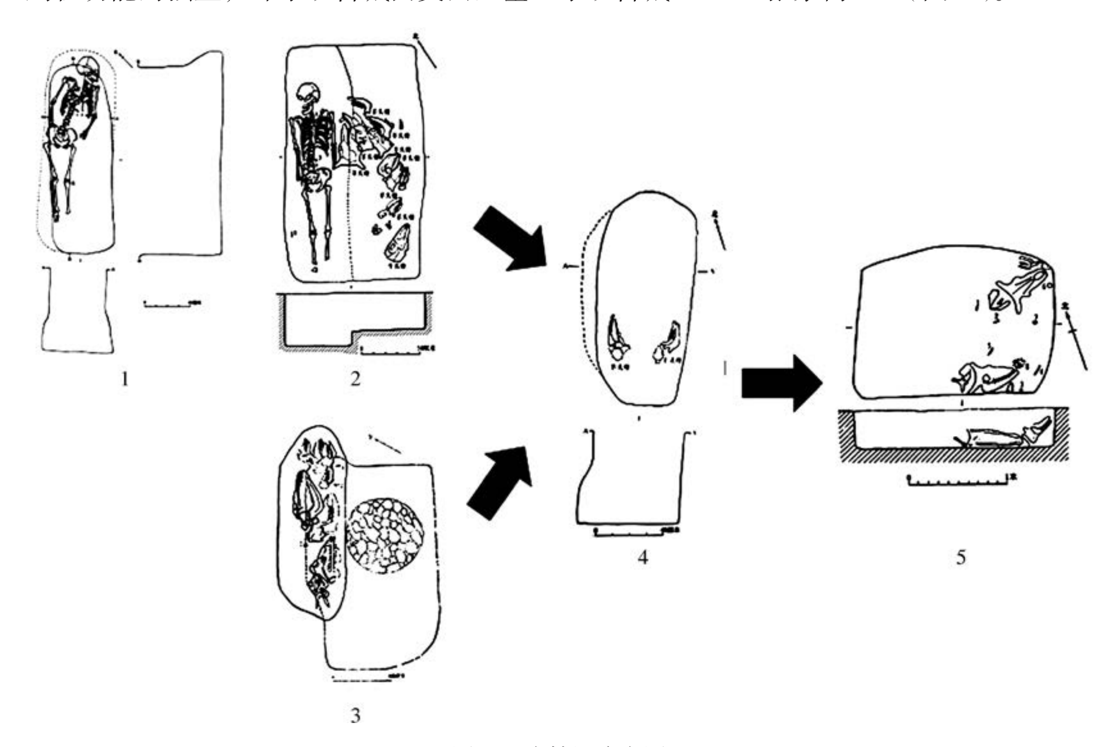
2）包头及呼和浩特地区（大青川南麓的土默川平原及浑河流域的丘陵地带）。西园墓地[17]与新店子墓地沿用该葬俗。西园墓地的墓葬与殉牲坑（报告称为祭祀坑）的形制皆为洞室墓，系承袭此前的洞室墓文化传统。西园墓地中仅一例殉牲坑（形制为洞室墓）内的殉牲位于洞室内，其余遗迹中殉牲都位于二层台上。该墓地的年代为春秋晚期。新店子墓地 56 座墓中有 31 座为洞室墓，其余为竖穴土坑墓。新店子墓地 43 座殉牲墓中仅 9 座墓葬的殉牲位于二层台上。该墓地的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春秋至战国，该地域洞室墓与二层台逐渐消失。洞室墓数量减少的同时，二层台上置牲的葬俗也逐渐消失。

3）鄂尔多斯及邻近地区（后套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春秋战国时期，该地区未见洞室墓。使用二层台的情况仅见于战国早期的桃红巴拉 M2[18]，其上置殉牲。及至战国晚期至秦，该地区以八垧地梁、纥赖梁[19]为代表的墓地中使用二层台的现象再次出现。实际上，两处墓地的墓主多为从中原迁徙而来，墓葬中筑造的二层台是中原文化因素影响下的产物，本土的二层台葬俗早已消声匿迹。

以上是对于各区的具体分析，在这里我们需要对整个区域的遗迹现象进行整合，以明确洞室墓的两条演变路径。包头的西园 J1 与 J2 的形制与其他洞室墓无异，原报告将它们解释为祭祀遗址。J1 墓室中部有一圆坑，内部填满白色鹅卵石；殉牲位于洞室内，包括牛头 2 具、马头 1 具、羊头 8 具。J2 的墓室底部与洞室内未见任何遗物，但其墓

室的二层台上放置有马头骨 11 具。需要明确的是，洞室墓本身具备两种职能：安葬与祭祀。墓室充当祭祀的功能，多以殉牲置于其内；而洞室则为安葬之用，负责墓主的安置。J1 与 J2 虽然并未摆脱洞室墓的形制，但两种遗迹的功能仅为祭祀。遗迹内部不存在功能分区，不再具备安葬的作用。在洞室墓中，墓室完全脱离洞室需要一定的过程，J1 与 J2 这两处遗迹的形制正处于由洞室墓向殉牲坑过渡的环节。下一阶段为小双古城 M14。M14 仍具备洞室与墓室的空间区分，但是洞室的空间极小，基本已经退化。其内仅见殉牲而未见人骨，可据此将其判定为殉牲坑的较早形态。这类演变的最终环节见于距离很近的固原地区，张街村墓地[20]的 ZK，该遗迹的形制与竖穴土坑墓无异，性质当为殉牲坑。根据杨建华[21]的研究，张街村墓地的年代约为战国中晚期。因此，张街村殉牲坑恰好处于殉牲遗迹发展的最晚阶段。这一演变路径遵循的逻辑为殉牲的功能先行独立，其后为形制的演变，即西园 J1 与 J2 →小双古城 M14 →张家街 ZK。

第二条演变路径见于上文已述的凉城地区。小双古城的丙类两型墓的墓葬形制处于由洞室墓向竖穴土坑墓过渡的阶段：墓葬空间逐渐变小，洞室基本与墓室位于同一空间。其后的两个阶段与第一条演变路径相似。演变所遵循的逻辑为形制先改变，其后为殉牲功能的独立，即小双古城丙类两型墓→小双古城 M14 →张家街 ZK（图二）。



图二　殉牲坑演变图

1. 小双古城 M12　2. 小双古城 M5　3. 西园 M1　4. 小双古城 M14　5. 张家街 ZK

综上，无论所遵循的是哪一条演变路径，其本质均殊途同归：殉牲由位于洞室墓的某一空间独立为占据特定空间的遗迹单位，即殉牲坑。遵循这一演变过程，我们可以

得出以下结论：殉牲现象的独立化为洞室墓衰退的一个原因。殉牲（位于洞室墓中的墓室）所包含的祭祀象征意义或礼制功能的强化直接导致了墓葬内部功能区的分隔：殉牲不再屈居于墓室的一隅，而是向占据独立遗迹单位的情况发展。因此，殉牲占据了整个墓葬单位，洞室墓中原本位于洞室的墓主与随葬品被排除在外。殉牲所占据的是一种具有墓葬形态的遗迹，实际为殉牲坑。这种遗迹虽具有墓葬的外在形态，但其功能却仅剩祭祀，极少见安葬死者与随葬品这一内容。在随后的阶段中，伴随功能的单一化，遗迹的形制亦趋向单一：殉牲所在的空间最终由洞室墓转变为竖穴土坑墓或灰坑的形态。综上可知，自春秋晚期以来，内蒙古中南部殉牲遗迹形制的演变与洞室墓的趋亡是基本同步的。

诚然，这类现象产生的原因也应归结于中原族群的北向扩张，具体反映在墓葬形制、墓向、人种、殉牲等方面。饮牛沟墓地[22]与毛庆沟墓地[23]中出现了两种墓向的墓葬组：南、北向墓组（外来农业人群）与东、西向墓组（本地游牧人群），同一情况亦见于二〇八墓地[24]。这一现象也得到了体质人类学研究的佐证：将军沟墓地[25]、崞县窑子墓地、小双古城墓地及忻州窑子墓地的墓主分属于东亚人种与北亚人种。该地区处于原住民（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墓与洞室墓）与外来族群（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墓）混居的情况，文化相互交融（竖穴土坑墓最终成为该地区的主流墓葬形制）。受文化传播影响的洞室墓的演变可简述如下：小双古城丙类 B 型墓迅速演变为竖穴土坑墓，而殉牲位于竖穴土坑墓的填土与墓底。这一演变途径的内在机理为：殉牲作为墓葬附属物的功能未变，其所在的空间并未脱离于墓葬。殉牲习俗与新来的竖穴土坑墓相融合，这是洞室墓彻底转变为竖穴土坑墓的途径，殉牲的功能未能独立化。因此，我们对丙类 B 型墓（形制退化的洞室墓）的认识存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将其与殉牲坑的出现相联系，另一方面将其与竖穴土坑墓中殉牲现象的出现相关联。

与此同时，二层台消失，壁龛功能简化。这一现象出现的年代上限不晚于春秋晚期。二层台上置殉牲现象的减少，也是二层台功能减少的真实反映。壁龛具体可分为头龛与壁龛，其功能兼具摆放随葬品（安葬）与安置殉牲（祭祀），这一现象在河套地区拥有自己的传统。例如，白敖包遗址 M60 的壁龛中摆放有两件罐与一件豆；朱开沟遗址的许多墓葬的壁龛里放置有殉牲。在其后的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壁龛的功能最终全然演变为安葬。壁龛最终走向了与殉牲坑的发展完全相反的道路，其功能被固定化，沦为墓葬遗迹的附属物而长期存在。

殉牲习俗独立化。洞室墓在经历长期的演化后，内部功能彻底分化：洞室墓的墓室为安置殉牲的空间，洞室则是墓主与随葬品的专属领域。殉牲坑按照西园 J1 与 J2 →小双古城 M14 →张街村 ZK 的演变序列发展。演变遵循的内在机理为：殉牲的祭祀功能独立化，存放殉牲的墓室部分独立成为殉牲坑。而洞室墓在墓室原本的功能失去以后，具有实际意义的仅存洞室部分。墓葬继续承担作为墓主与随葬品安置空间的功能，其形

制逐渐简化为竖穴土坑墓。这是洞室墓分解为竖穴土坑墓与殉牲坑的途径。

由此可见，殉牲现象的空间位置呈现出两条发展路径：进入竖穴土坑墓与独立为殉牲坑。它们所反映的不仅仅是遗迹形制的演变，更揭示出本土族群对于土著文化因素何去何从的抉择：前者是完全融入扩张至此的中原墓葬系统中，而后者则是中原祭祀思想下文化的在地化。

三、殉牲坑产生的原因

由墓内直接殉牲向构筑殉牲坑的转变，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墓葬行为的变化：由墓内祭祀向墓上祭祀的一种转变。这两种葬俗的文化内涵存在差异性。与祭祀用牲不同，墓葬内部一次性完成的殉牲行为与墓葬共时，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而祭祀用牲则体现出墓葬的空间性。殉牲祭祀功能的强化与洞室墓的转型之所以发生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是有因可循的。

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庙祭与祭祖制度逐渐松弛，出现了诸侯国在夺取祭祖权后筑造陵园，进行墓祭的现象[26]。《礼记·檀弓下》载："子路曰：'吾闻之也，过墓则式，过祀则下。'"由此可知，民众的墓祭活动普遍存在，这便是庶民与宗子依附关系瓦解的直观写照。实际上，墓祭的现象早在西周时期便在晋侯墓地出现。北赵晋侯墓地[27]的M8组、M64组与M93组墓葬旁便有随葬的祭祀坑，共计50余座。这些祭祀坑或独立存在，或打破墓葬的墓道与车马坑。祭祀坑中殉牲的种类包括马、牛、狗，个别祭祀坑中未见殉牲。而在羊舌晋侯墓地[28]中，祭祀坑的规模更为庞大。M1、M2的祭祀坑之间存在叠压打破关系，系多次祭祀的反映。祭祀坑中的殉牲包括马、牛、羊、狗，甚至有殉人的存在。

约在春秋晚期，内蒙古长城地带的族群受到了中原墓祭的影响。诚然，中原地区的祭祀坑在年代上远早于前者，但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殉牲坑具备明确的演变序列，加之该区域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较春秋战国时期更为频繁，这一推测应当是可取的。中原地区墓祭的影响主要为祭祀的思想观念，而非具体形制。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殉牲坑便是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中原地区墓上殉牲的出现是纯粹的祭祖行为。而在该地区，殉牲现象除了具备祭祀祖先神灵的功能外，还更多地表现出这一文化现象本身所呈现的功能：脱离墓葬内部空间，并最终转变为拥有独立遗迹的文化现象。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殉牲坑的出现所彰显的是墓祭现象在边疆区域的在地化。

四、长城沿线区域殉牲坑的情况

欲明确殉牲坑的性质与相关问题，需将研究视角拓展到战国时期的长城沿线：自西而东，庆阳地区的殉牲坑较多，且内部皆殉马。具体案例有庆阳城北、后庄村、后

庄村[29]、袁家村[30]。天水地区的战国晚期至秦初的马家塬墓地亦存在殉牲坑 M17[31]。该遗迹规模较大，埋葬马头、牛头、羊头及蹄骨，形成四层堆积，共计 226 个。在陕北地区，寨头河墓地[32]的年代为战国中晚期，该遗址的 K2、K3 当为殉牲坑，殉牲为马。晋中地区的陶寺北墓地[33]的墓葬旁亦存在殉牲堆，其内有羊和狗。燕山以南地区尚有甘子堡墓地[34]。墓地中存在两处近圆形的殉牲坑，其内包含羊下颚骨。该遗址的年代为春秋与战国之际。葫芦沟墓地[35]的情况较为复杂，墓外存在殉牲的墓葬共计 12 例，其中殉牲的遗迹单位有殉牲坑与殉牲堆两种。墓内无殉牲、墓外有殉牲的情况可分为两种：一为单墓圹外存在殉牲。有 7 例，其中殉牲堆 6 座，1 座为殉牲坑。二为两座或三座墓葬共有一个殉牲堆。共计 2 组，涉及 5 座。墓葬内外都有殉牲的情况，亦可分为两种：一为墓室内殉牲与墓葬旁存在殉牲堆；一为墓室内殉牲与墓葬旁存在殉牲坑。殉牲主要为牛或以牛为中心的动物组合。这里所记述的殉牲堆为殉牲坑的同类遗存，殉牲堆存在于墓葬附近，并和墓葬形成对应与组合的关系。

综上，殉牲坑的年代都集中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而殉牲坑演变序列最为完善的应为内蒙古中南部及其邻近地区。该地区当为北方边疆地带殉牲坑现象的发轫地。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殉牲坑沿着以长城沿线为路径的文化传播带，迅速普及于北方地带。相较于中原地区墓祭观念的传入，畜牧民的文化传播速度是迅速而惊人的。依据先思想后形制的路径，殉牲坑的产生与发展构成了一个“T”字形文化传播带。

五、结　　语

需要考虑的是，考古报告中殉牲坑的年代基本是由墓地中的墓葬年代所确定的。殉牲由一次性埋葬演变为稍晚、多次的祭祀活动。殉牲坑的形成时间当不早于墓葬的时代，因此，部分殉牲坑的年代下限或应当下延。

注　　释

[1] 包曙光．中国北方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殉牲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2] 庄家铭．试论东周时期内蒙古地区北方系青铜文化墓葬殉牲习俗［D］．长春：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3] 黄展岳．殷商墓葬中人殉人牲的再考察——附论殉牲祭牲［J］．考古，1983（10）：935～949．

[4] 金龙．商时期墓葬的殉、牲代表物［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5] 刘羽阳，王辉．先秦时期西北游牧地区动物埋葬习俗——从埋葬头蹄的现象谈起［J］．考古与文物，2017（1）：62～69．

[6] a．陈全家，曹建恩，孙金松，党郁，王春雪．凉城县小双古城墓地殉牲研究［J］．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2）：56～62．

b．党郁，孙金松．凉城县小双古城墓地殉牲问题探讨［J］．草原文物，2015（1）：86～92．

[7]　陈全家，曹建恩．内蒙古凉城县忻州窑子墓地殉牲研究［A］．边疆考古研究（第 5 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344 ~ 355．

[8]　靳枫毅．军都山玉皇庙墓地殉牲制度研究［A］．北京文物与考古（第 6 辑）［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116 ~ 166．

[9]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伊金霍洛旗文物管理所，鄂尔多斯博物馆．伊金霍洛旗白敖包墓地发掘简报［A］．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 2 辑）［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327 ~ 337．

[10]　韩建业．中国先秦洞室墓谱系初探［J］．中国历史文物，2007（4）：16 ~ 25．

[11]　曹建恩，孙金松．中国北方地区东周西汉时期偏洞室墓研究［C］．〔韩〕《中国史研究》（第 53 辑），2008：31 ~ 35．

[12]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店子墓地发掘简报［J］．考古，2009（3）：3 ~ 14．

[13]　同［ 1 ］．

[14]　a．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岱海地区东周墓群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14 ~ 167．

b．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凉城县忻州窑子墓地发掘简报［J］．考古，2009（3）：28 ~ 48，105 ~ 113．

c．同［ 7 ］．

[15]　a．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凉城县崞县窑子墓地［J］．考古学报，1989（1）：57 ~ 81，145 ~ 152．

b．陈畅．崞县窑子墓地研究［J］．中原文物，2012（3）：43 ~ 47．

[16]　a．同［14］a：168 ~ 212．

b．曹建恩，孙金松，党郁．内蒙古凉城县小双古城墓地发掘简报［J］．考古，2009（3）：15 ~ 27，101 ~ 104，113．

[17]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包头西园春秋墓地［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1）：13 ~ 24．

[18]　a．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J］．考古学报，1976（1）：131 ~ 144，169 ~ 172．

b．内蒙古文物工作队．桃红巴拉墓群［J］．鄂尔多斯式青铜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203 ~ 219．

[19]　崔璿．秦汉广衍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J］．文物，1977（5）：25 ~ 38．

[20]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阳县文物站．宁夏彭阳县张街村春秋战国墓地［J］．考古，2002（8）：14 ~ 24．

[21]　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22]　a．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凉城饮牛沟墓葬清理简报［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3）：25，9，10，26 ~ 32．

b．何嘉宁．内蒙古凉城县饮牛沟墓地 1997 年发掘出土人骨研究［J］．考古，2001（11）：80 ~ 86．

c．王海晶，常娥，葛斌文，张全超，周慧，朱泓．饮牛沟墓地古人骨线粒体 DNA 的研究［J］．吉林大学学报（理学版），2005（6）：847 ~ 852．

［23］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毛庆沟墓地［J］．鄂尔多斯式青铜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227 ~ 315．

［24］ 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包头市二〇八墓地［J］．内蒙古文物考古，1977（2）：72 ~ 74，79．

［25］ 张全超．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店子墓地人骨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58．

［26］ 高崇文．古礼足征 礼制文化的考古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59．

［27］ a．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J］．文物，1994（1）：1，4 ~ 28，97，98．

b．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J］．文物，1994（8）：1，4 ~ 21．

c．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J］．文物，1995（7）：4 ~ 39．

［28］ 山西省考古所．曲沃县羊舌村晋侯墓地［M］．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7．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174，175．

［29］ 庆阳地区博物馆，庆阳县博物馆．甘肃庆阳城北发现战国时期葬马坑［J］．考古 1988（9）：852，860．

［30］ 刘得祯，许俊臣．甘肃庆阳春秋战国墓葬的清理［J］．考古，1988（5）：413 ~ 424．

［31］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 2008 ~ 2009 年发掘简报［J］．文物，2010（10）：4 ~ 26．

［3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延安市文物研究所，黄陵县旅游文物局．陕西黄陵寨头河战国戎人墓地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2（6）：3 ~ 10．

［33］ 王京燕，崔俊俊．襄汾陶寺北两周墓地——一部静默的区域社会史［J］．大众考古，2016（4）：20 ~ 29．

［34］ 贺勇，刘建中．河北怀来甘子堡发现的春秋墓群［J］．文物春秋，1993（2）：23 ~ 40．

［35］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葫芦沟与西梁垙（一、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Study on the Emergence of Animal Sacrifice Pit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Earthen Chamber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Inner Mongolia

Liu Shuang

Abstract: The study is comprised of sections. Firstly, commencing the study which is based on two perspectives: on the one hand, focusing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omb structure with the diachronic observation; on the other hand, we systematic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imal sacrifice, especially its burial context. Secondly, by synthesiz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following section, we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accompanied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sacrificial and ritual function concerning animal sacrifice, tomb structure transforms from earthen chamber to shaft pit.

Keywords: The Southern Part of Central Inner Mongolia; animal sacrifice; earthen chamber

玉　　带

——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文化结晶

邓淑苹

（台北，11143）

一、文献所见 3～11 世纪玉带的入传

南北朝时（420～589 年），华北的北魏、北周等政权的皇族为发迹自东北亚的鲜卑族。隋朝、唐朝的皇室，出自混有鲜卑血统的关陇集团。对中亚、西亚的各种“胡人”文化都很包容接纳。位于昆仑山北麓的于阗地区，自古便居住着操印欧语系东伊朗语的塞族，发展出颇具影响力的政体于阗国（公元前 232～公元 1006 年），其王族尉迟氏即属此族[1]。

在浩瀚的文献中，有颇多关于从西亚、中亚输入玉器（包含美石制器）与玉料的记录，笔者曾做过梳理[2]。输入的玉器中，玉带是最常见的器类之一。本文附表列了 3～11 世纪从西亚、中亚输入玉带记录共 16 条。

玉带，就是镶嵌玉石带銙（带版）腰带的通称。三国曹魏（220～265 年）时的《魏略》虽属私撰，但史料价值甚高[3]。书中记载疏勒（今日喀什）进献大秦赤石带：“魏略曰疏勒王献大秦赤石带一枚。”（详附表第 1 条）这是有关西域进献玉带的最早纪录。

根据《后汉书·西域传》等考证，“大秦”是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及近东地区的称呼，后者即地中海东端，今日叙利亚一带。

《南史·列传第六十九》记载：西域地区，“人皆善骑射，着小袖长身袍，用金玉为带”。由此可知，五六世纪时以金玉装饰腰带已是西域地区服饰常制（附表）。

唐代文献清楚显示当时于阗国是制作玉带的主要地方，且在唐初，于阗国曾献玉带给开国之君唐高祖及其继位者，即是有“天可汗”尊号的唐太宗。

《新唐书》纪录唐高祖李渊在武德四年（621 年）曾赠送有战功的李靖一条“于阗玉带”：“李靖破萧铣时所赐于阗玉带十三胯，七方六刓，胯各附环，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此事更详细地纪录于《全唐文》，并明指：“高祖所赐于阗献三带其一也。”说明了于阗进献给唐高祖李渊三条玉带，李渊将其中一条送给李靖。由此可知 6 世纪前半叶，用玉带的习俗已从中亚东传到华北（详附表第 3、4 条）。

《旧唐书》记录：“于阗国，西南带葱岭，与龟兹接……其国出美玉……贞观六年，

遣使献玉带，太宗优诏答之。”（详附表第 5 条）从这些记载可知，“于阗玉带”已是当时珍贵的“时尚舶来品”。

于阗国境内的和阗地区是昆仑山北麓采集河中玉籽料的主要地方，因而发展了很好的玉雕工艺。许多迹象显示，于阗国统治者对玉料采取垄断策略[4]，故而唐王朝势力虽大，但境内玉料不足，所以礼神玉器常用似玉之“珉”代替。因而唐玄宗天宝十年（751 年）下令规定：“自今以后，礼神六器、宗庙奠玉，并用真玉。诸祀用珉，如以玉难得大者，宁小其制度，以取其真。”[5]唐德宗即位时（779 年）派朱如玉求玉于于阗，所得均为玉器而非玉料：“圭一，珂佩五，枕一，带胯三百，簪四十，奁三十，钏十，杵三，瑟瑟百斤，并它宝等。”（详附表第 7 条）

于阗国玉作的盛况被清楚地记录。后晋高祖天福三年（938 年）派遣供奉官张匡邺，假鸿胪卿、彰武军节度判官高居诲前往于阗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高居诲将旅行所见写成《高居诲行记》。此份记录已佚，但不少书籍保存部分内容[6]。例如，《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三引《高居诲行记》：“其采玉之地云玉河。在于阗城外。其源出昆山……一曰白玉河……二曰绿玉河……三曰乌玉河……每岁五六月大水暴涨，则玉随流而至，玉之多寡由水之大小，七八月水退乃可取，彼人为之捞玉。其国之法，官未采玉，禁人辄至河边者。故其国中器用服饰往往用玉，今中国所有多自彼来耳。”[7]

此一情势延续了近四百年，虽然于阗国已于 1006 年之前被喀喇汗国吞并，但北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 年），仍有来自于阗的白玉带入贡（详附表第 16 条）。

检视附表第 6 ~ 16 条可知，在漫长的岁月中，西亚、中亚持续进贡玉带。除了于阗，今新疆北部的回鹘以及盘踞西藏的吐蕃也常进贡玉带。当然不排除吐蕃、回鹘进贡的玉带，实际是于阗工匠的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附表第 6、11 两条，分别记载唐玄宗开元初（713 年）有来自大食的“宝钿带”，以及后唐闵帝应顺元年（934 年）有来自波斯的“宝绁玉带”。“波斯”即今伊朗。

唐代以来的中国史书均称阿拉伯帝国为“大食”。8 世纪前半叶的“大食”正值倭马亚王朝，除了原本的阿拉伯半岛外也占有伊朗高原。所以不排除附表第 6、11 两条所载的，713 年来自大食的“宝钿带”、934 年来自波斯的“宝绁玉带”，都是伊朗高原的腰带。

“宝钿”意指“镶嵌珠宝”，唐代确实见到不少珠宝镶嵌的服饰。但“宝绁”的“绁”是“高昌所产细麻布”。笔者窃疑“宝绁”可能是“宝钿”的误记?

《新唐书 · 车服志》：“起梁带之制：三品以上，玉梁宝钿，五品以上，金梁宝钿。”可知玉带中有一种“起梁带”。图一就是“玉梁宝钿带”的最佳实例。其出土自唐初上柱国左卫府中郎将窦皦的墓[8]，以优质白玉制作带板的框架，内嵌黄金及红绿等仿宝石的玻璃。承陕西省前文物局副局长刘云辉教授告知，镶嵌物中有明显的气泡。

目前考古资料显示，当时大唐帝国境内似乎尚无制作人造宝石的技术，但当时伊朗高原也无真正的闪玉（nephrite）资源与琢玉技术[9]，笔者窃疑图一这些镶人造宝石白玉带銙可能是于阗玉工模仿波斯“宝钿带”等制作，尚待日后进一步考证。



图一　唐代镶人造宝石玉带

［长安区南里王村窦皦墓（627 年）出土］

二、萨珊－粟特腰带传统的确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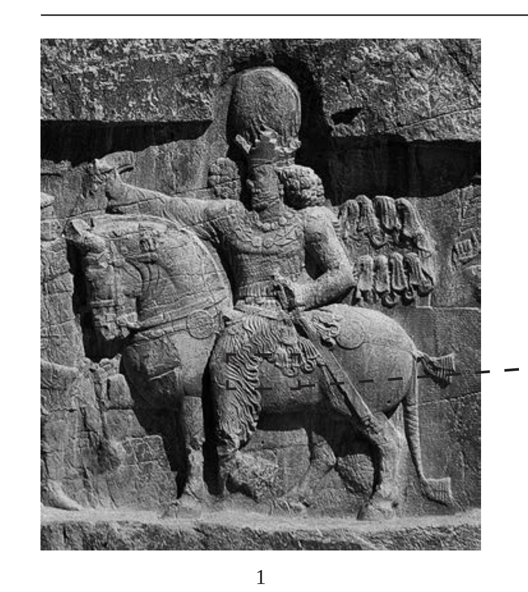
前文论及曹魏时（220 ~ 265 年）疏勒曾进献大秦地区的赤石带。“大秦”一词泛指罗马帝国及地中海东岸今日所称叙利亚地区。3 世纪伊朗高原上正是萨珊帝国（Sassanid Empire，224 ~ 651 年）创建之初并与罗马帝国争夺地中海东岸的时期。图二、图三分别描述帝国创立者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ir I，？ ~ 约 240 年）与其子沙普尔一世（Shapur I，约 240 ~ 272 年）的马上英姿[10]。图四也是萨珊帝国骑象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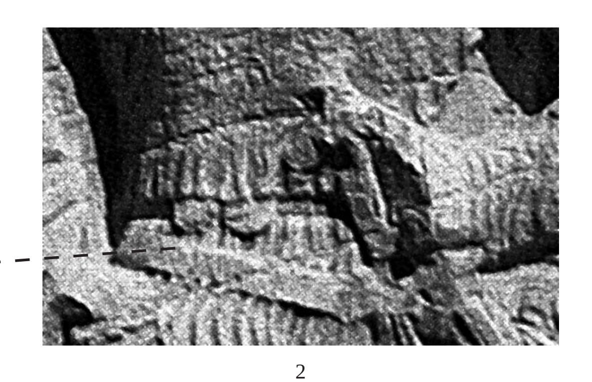
图二　萨珊帝国创建者阿尔达希尔一世 Ardashir I（？ ~ 约 240 年）执长枪比武英姿石雕

（在伊朗的 Naqsh-e Rustam）

1. 阿尔达希尔一世上半身像　2. 所系腰带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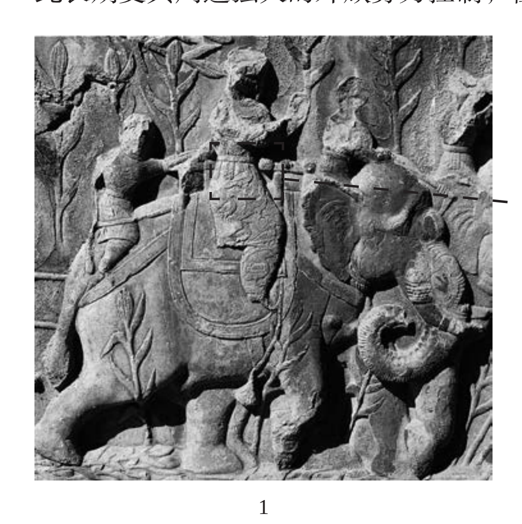


2

图三　萨珊帝国第二代君王沙普尔一世 Shapur I（215 ~ 272 年）骑马英姿的巨型石雕
（在伊朗 Naqsh-e Rustam）
1. 沙普尔一世　2. 腰带部分

雕，他们所系腰带上似乎都嵌贴或圆或方的饰片，甚至腰带下方连接有圆尖形、长条形装饰（？）[11]。与后文论及的粟特人腰带，北魏、北周至唐初蹀躞带颇为相似。

粟特（Sogdians），人种上属于伊朗系统的中亚古族，操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中的东伊朗语。在中国史籍中又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等，南北朝至隋唐时，在河中地区建立了康、史、安、曹、石、米、何等小国。历史上的粟特人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因此长期受其周边强大的外族势力控制，但粟特人非但没有灭绝，反而增强了自己的应变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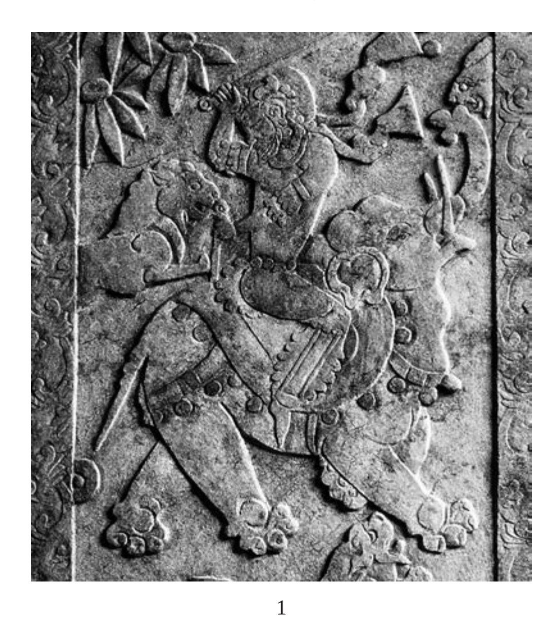


2

图四　萨珊帝国时期的骑象石雕
（在 Taq-I，Bustan）
1. 骑象者　2. 腰带部分

能力，不仅保存了独立的王统世系，而且成为中古时代控制陆上丝绸之路的一个独具特色的商业民族[12]。

近年，在太原、西安等地发掘粟特人的墓葬提供了重要的讯息。例如，图五、图六、图七石椁上的浮雕图，出自太原隋开皇十二年（592 年）鱼国人虞弘的墓葬，虞弘曾在北周担任“检校萨保府”，执掌祆寺及西域诸国事务。后又担任隋代的仪同三司，品阶为正五品。这些石椁上浮雕的都是当时粟特人熟悉的或向往的生活场景[13]，无论骑马或宴居，都系着钉饰金属（？）或玉石（？）片的腰带，图六粟特骑士腰带就与图三沙普尔一世的腰带很相似，下方都有圆尖形装饰（？）[14]。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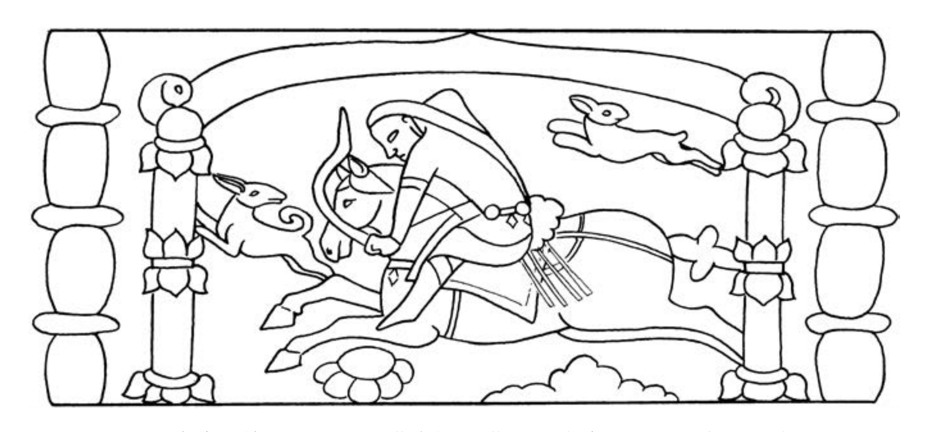


2

图五　隋代　石椁上浮雕系有带嵌饰腰带的粟特族骑士与狮子搏斗纹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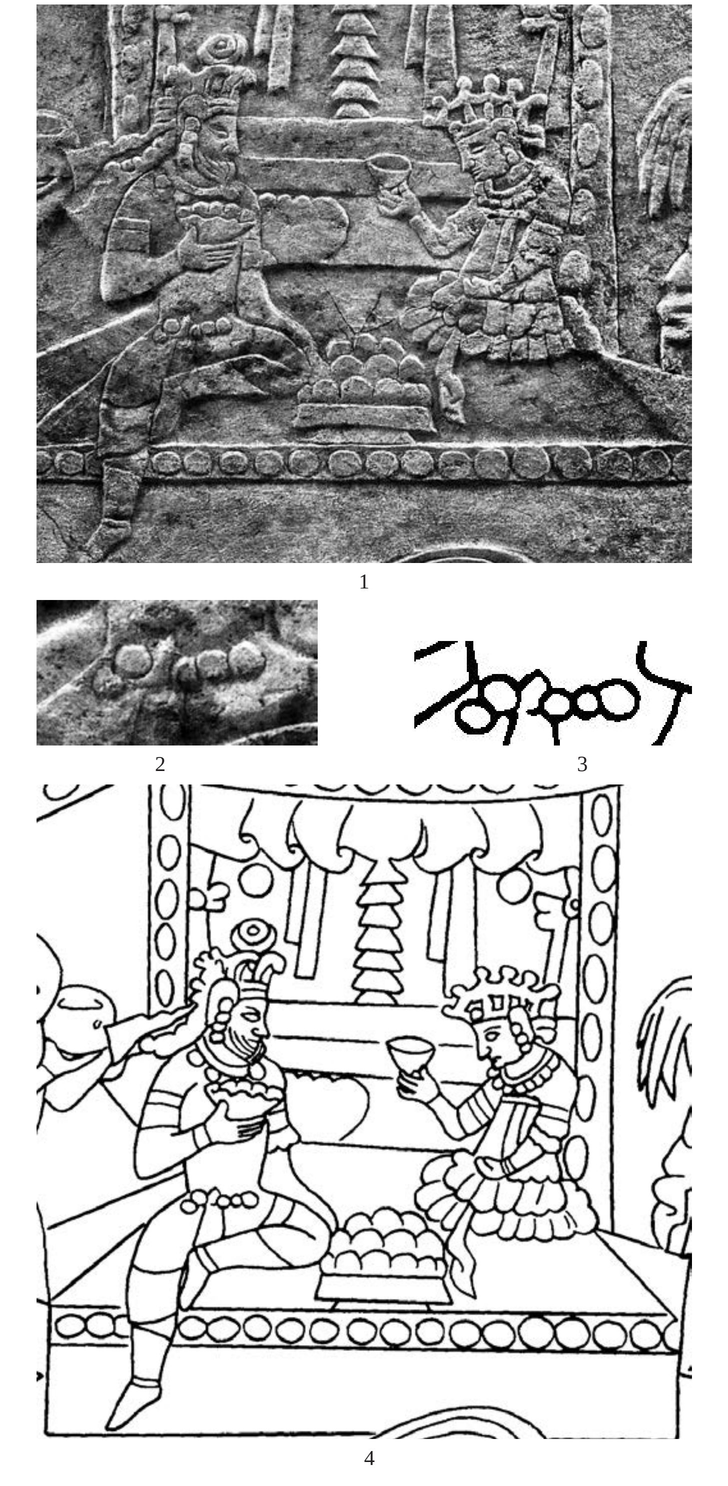
［太原虞弘墓（开皇十二年，592 年）出土］

1. 照片　2. 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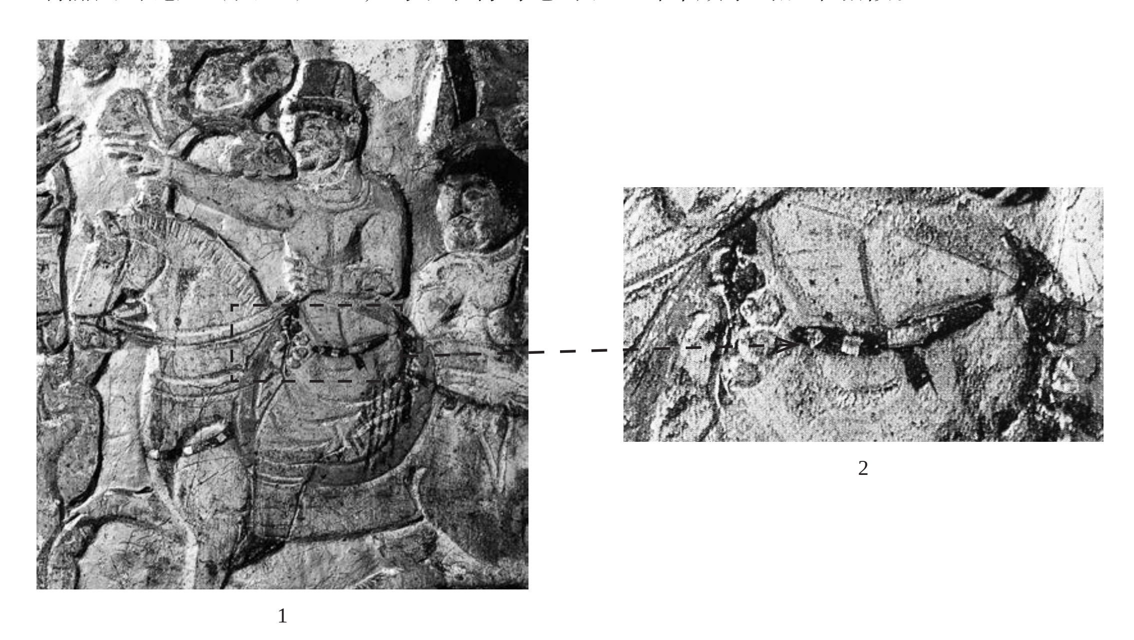
图六　隋代石椁上浮雕系有带嵌饰腰带的粟特族骑士骑马奔驰（线图）

［太原虞弘墓（开皇十二年，592 年）出土］



图七　隋代石椁上浮雕系有带嵌饰腰带的粟特族墓主，手执多曲杯与女主人对饮
［太原虞弘墓（开皇十二年，592 年）出土］
1. 照片　2、3. 墓主腰带的照片与线图　4. 手执多曲杯与女主人对饮

值得注意的是，西安出土北周大象元年（579 年）粟特人安伽墓中的壁画，骑马者所系腰带上等距离嵌着方或长方形带板，带头反转插入腰带，带头嵌有一端平直、另一端椭圆的铊尾（图八）[15]，与下节将讨论的北亚鲜卑族系的腰带相似。



图八　北周石椁上浮雕彩绘粟特墓主骑马图，墓主系着嵌有带板、铊尾的腰带

［西安安伽墓（大象元年，579 年）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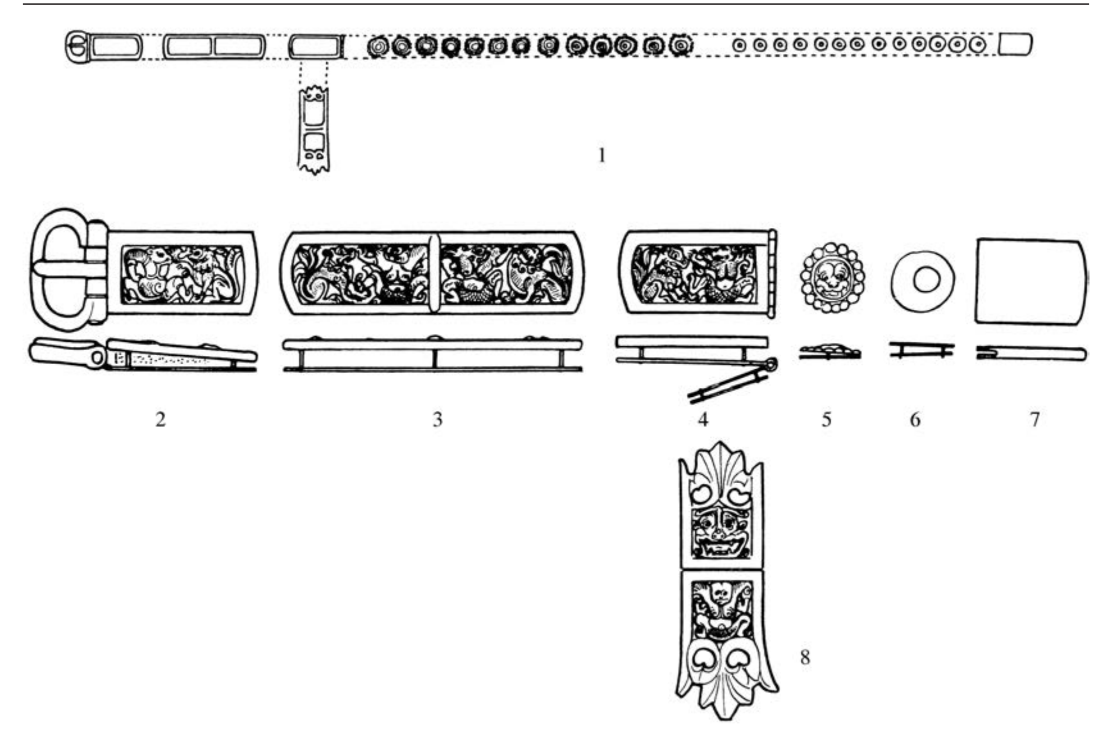
1. 粟特墓主　2. 腰带局部

三、西亚、中亚与北亚腰带传统的融合

上节已讨论西亚萨珊至中亚粟特文化中的腰带传统，事实上居于北亚的鲜卑族也有装饰腰带的传统，学者曾详加研究[16]。图九是北周武帝（561 ~ 578 年）的铜带饰[17]。皮质带鞓部分已朽，只见铜质带扣、带銙等。

图一〇是北魏洛阳永宁寺（516 ~ 534 年）泥塑像局部线绘图[18]。综合图九、图一〇资料可知，当时是在腰部正面左边腰带上嵌长条形带銙、在背面腰部腰带上嵌圆形带銙、腰部正面右边的腰带上嵌椭圆偏孔扣眼片，带銙与扣眼都是上下二层，中央空槽供腰带穿过。穿戴时，按照人身躯肥瘦选择扣眼穿系好，再将多出的一截绕插进腰带，带头所嵌金属铊尾则垂在人的左下方。

从图一〇永宁寺的资料来看，图九北周武帝的铜带饰上，那铸造得十分华丽、两端作花叶纹、被考古报告中称作“蹀躞饰带”的铜饰片，很可能才真正是带头前端的“铊尾”。



图九　北周武帝铜带饰（线图）（561 ~ 578 年）
1. 成组铜带复原示意图　2. 铜带扣　3. 条状带銙　4. 活页带銙　5. 兽面纹圆带銙　6. 扣眼片　7. 铊尾
8. 蹀躞饰带（？ 或是铊尾）（《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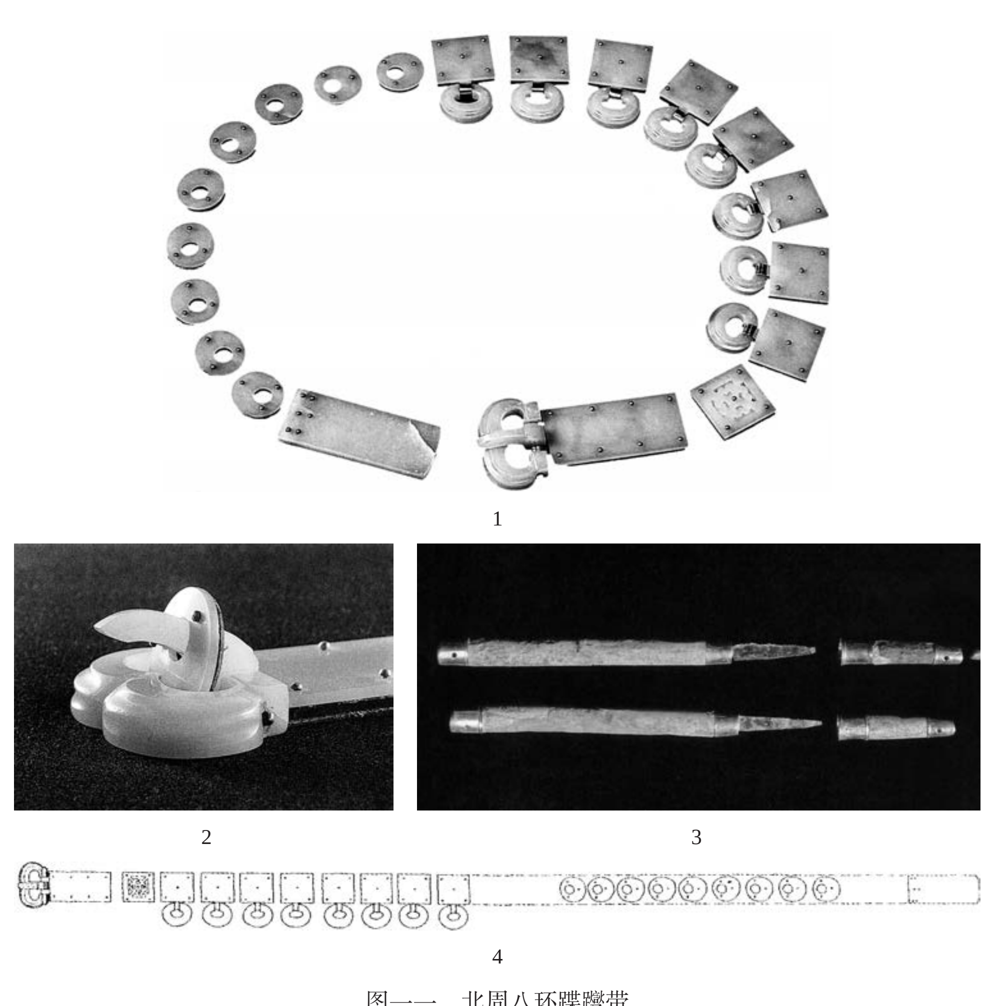


图一〇　北魏泥塑像线绘图（局部）
［洛阳永宁寺（516 ~ 534 年）出土］
（《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 ~ 1994 年考古发掘报告》）

这种北亚鲜卑民族嵌金属为饰的腰带传统，与西亚大秦、波斯，中亚粟特的嵌美石为饰的腰带传统在北朝晚期至隋唐之际做了某种程度的融合。所以前文窦皦墓出土的玉带（图一），在形制上相似于图九、图一〇所示的北魏腰带，但带板以及铊尾外框已改为白玉制作，内中所装饰的“宝钿”可能源自西亚波斯传统。

图一一为北周骠骑大将军若干云墓（北周宣政元年，578 年），出土的一组完整的八环蹀躞玉带，因该墓未经扰动，玉带还系在墓主身上，确知位于腰后的八个方銙下方各以金圈连接可供悬挂生活用品（火鉴、大觿、算囊等）的玉环外，九个椭圆形带偏心孔的“扣眼玉片”就绕到腰前，出土时还有一个“扣眼玉片”被带头上的

扣针插入[19]。这些方銙、扣眼玉片都分上下两层，下层为铜片，两片以金质铆丁结合，中央空隙供皮质鞓穿过。经研究，原报告中两件被称为“蹀躞骨饰”的实为象牙质圆柱柄铁刀，出土时分左右挂系于墓主腰后（图一一，1 ~ 3）[20]。有学者做了正确的复原线图（图一一，4）[21]。



1

2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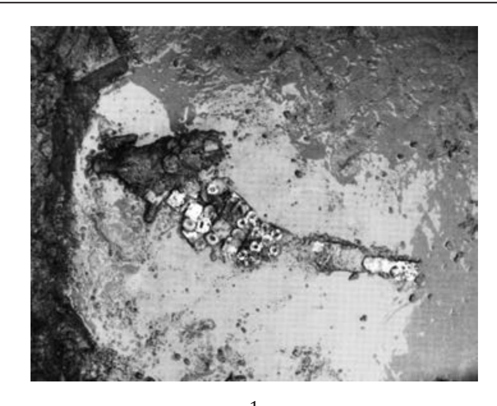
图一一　北周八环蹀躞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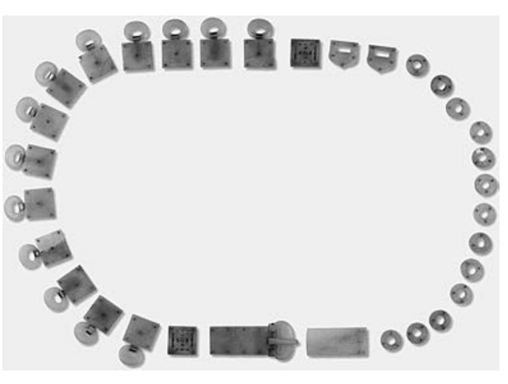
［若干云墓（579 年）出土复原长度 1.5 米］

1. 全组玉带饰　2. 出土时带头扣针还插有扣眼片　3. 腰后两侧悬挂象牙柄小刀　4. 复原线绘图

近年发掘隋炀帝墓，出土了当时最高规格的十三环蹀躞玉带。可能由于该墓曾经迁葬，出土时所嵌玉饰堆栈无序（图一二, 1）[22]。经过整理排列，公布如图一二, 2[23]。

北朝至初唐的蹀躞带[24]，多在人腰背的带銙下方连以圆环，用来垂挂一些生活中实用的小工具。有学者认为不是一定要垂圆环，也可直接在带銙上开个所谓“古眼”，即是窄长孔，来悬挂小用品[25]。这种随身佩戴实用工具本是马背民族的习性，所以北周至隋的玉带上多有活环（图一一、图一二）。到了唐睿宗景云年间（710 ~ 712 年），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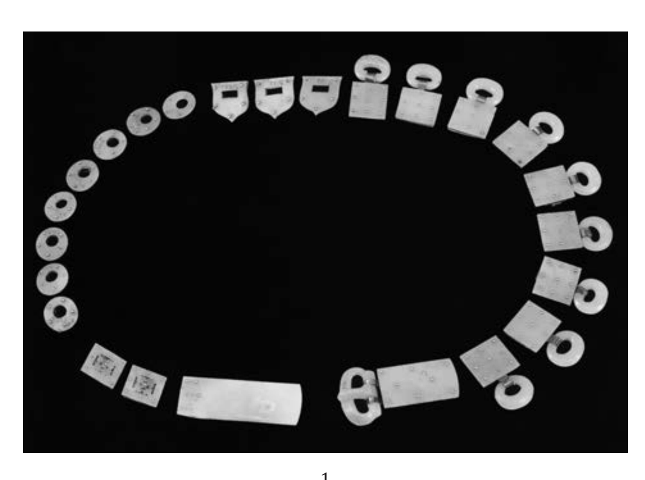
图一二　隋十三环蹀躞玉带

（炀帝墓出土）

1. 出土情况　2. 全器

曾规定“武官五品以上佩蹀躞七事”，即是在腰带上挂上佩刀、刀子、砺石、契苾真、哕厥、针筒、火石袋七件工具。但到了唐玄宗开元初年，就罢除了这条规定[26]。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朝廷对腰带及其配件又有“禁断”等新规定[27]。故开元二年可能是正式下令停止佩戴“蹀躞七事”的时间点[28]。

所以盛唐以后的玉带多只有玉带銙，下方不连可悬物的圆环。有名的何家村出土的十副玉带中[29]，九副均属之，仅一副“九环蹀躞玉带”是在带銙下方连有可悬物的圆环（图一三）。推估其制作时间应在开元年间以前[30]。



1

2

图一三　北朝至初唐九环蹀躞玉带

（何家村出土）

1. 照片　2. 线绘图

四、结　　语

《新唐书 · 舆服志》记载了唐高宗显庆年间（656 ~ 660 年）制定官服颜色与带銙质地、数目的使用情况。据此可知，玉带是三品以上官员才可使用的服饰[31]：

以紫为三品之服，金玉带，銙十三；绯为四品之服，金带，銙十一；浅绯为五品之服，金带，銙十；深绿为六品之服，浅绿为七品之服，皆银带，銙九；深青为八品之服，浅青为九品之服，皆鍮石带，銙八；黄为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铜铁带，銙七。

自从唐代将玉带订入官服制度后，基本上，玉带制度一直沿用至明末，在中国有近千年（656 ~ 1644 年）的历史。

学界关于玉带制度的论文甚多，但多关注其晚期发展。笔者从文献、图像、实物三类史料综合研究，初步推测：中国玉带制度应始于北朝时期，糅合西亚、中亚、北亚的腰带传统，在和阗美玉大量采集下发展的新服饰，可说是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文化结晶。

注　　释

[1] 张广达，荣新江．上古于阗的赛种居民［A］．于阗史丛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49 ~ 165．

[2] 邓淑苹．探索历史上的中亚玉作［J］．台北故宫学术季刊，2016，33（1）：1 ~ 78．

[3] 《魏略》是魏国郎中鱼豢私撰，为记载三国时代魏国的史书。早佚，其内容被历代史书引用，清人张鹏一辑佚为《魏略辑本》二十五卷，被认为是较佳的辑本。

[4] 笔者曾梳理三国至明代（220 ~ 1644 年），有关西域输入玉器与玉料的记录，整体而言，从南北朝至唐代（420 ~ 907 年）只从西域进献玉器，而未记载进贡玉料。五代、北宋时（907 ~ 1126 年），既进献玉器也进献玉料。南宋、金（1127 ~ 1279 年），官方记载退却大食、西夏入贡宝玉、珠玉。明代（1368 ~ 1644 年）不但退还“回回”贡玉碗，还二度赏赐玉带给册封的西域领袖，赠送金玉器给撒马尔罕的统治者一次。明代时，西域各国多次进贡“玉石”以换取“给赏”，常因品质不佳而有纷争。官方也记录私下交易的玉料比进贡的玉料质量较精良。详同［2］．

[5] 《太平御览》卷八百五：“天宝十载诏曰：礼神以玉，盖取其精洁，表里温润合德，为器有象，正辞乃信，以达馨香在其璧。顷来礼神六器及宗庙奠玉，自冯绍王奏后，有司并皆用珉。礼所谓：君子贵玉而贱珉不可用也。自今以后，礼神六器、宗庙奠玉，并用真玉。诸祀用珉，如以玉难得大者，宁小其制度，以取其真。”

[6]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七卷 · 中古时期，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下）第四节旅行家及其游记》中，清楚说明《高居诲行记》的写成及流传。

[7] （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M］．蒙古定宗四年张存惠晦明轩刻本．文渊阁四库全书：740 册，89．

［8］　窦皦下葬于贞观元年（627 年），资料及图片引自：刘云辉．北周隋唐京畿玉器［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

［9］　曾有伊朗裔的法国学者根据罗浮宫博物馆藏一件绿色玉石椭圆容器，指称何家村出土的白玉多曲杯在波斯制作。为此笔者亲自前往罗浮宫博物馆申请检视该玉石容器，目验为闪玉作品，可能是深绿色玉髓（chaclcedony）。邓淑苹．二件具国际争议性玉杯的探索［J］．台北故宫学术季刊（33 卷），2015，33（3）：211 ~ 241．

［10］　Ferrier R W (ed.). *The arts of Persia*［M］.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 65，68.

［11］　同［10］：78.

［12］　荣新江．从撒马尔罕到长安——中古时期粟特人的迁徙与入居［A］．从撒马尔罕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3 ~ 8．唐代曾在撒马尔罕一带设置“河中府”，故近代多称该区为”河中地区”。

［13］　事实上当时华北可能不会有大象、狮子，但骑象猎狮可能是粟特族系向往的尊贵生活，同一母题常见于波斯美术品上。

［1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旅游局．太原隋虞弘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15］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16］　a．孙机．中国古代的革带［A］．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b．左骏、王志高著，陆建芳主编．中国玉器通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M］．深圳：海天出版社，2014：113 ~ 117．

［1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阳市考古研究所．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1997（2）：24 ~ 26．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 ~ 1994 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19］　员安志．中国北周珍贵文物［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60 ~ 72，157 ~ 160．

［20］　刘云辉．北周若干云与其玉带考［J］．历史文物（台北），1999（7）：52 ~ 56．

［21］　刘思哲．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九环玉带制作时间考［J］．考古与文物，2013（4）：95 ~ 99．

［22］　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江苏扬州市曹庄隋炀帝墓［J］．考古，2014（7）：71 ~ 77，图 5．

［23］　首都博物馆．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223．

［24］　“蹀躞”原意指“小步急走”或“马行貌”，或也指“佩带上的饰物名”。“蹀躞带”则指本文图一、图九、图一一 ~ 图一三等腰带。

［25］　a．左骏．腰玉横金——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元范文虎墓玉带具的考古学观察［J］．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2）：114 ~ 135．

b．同［16］b．

[26] 《旧唐书·舆服志》:“景云中又制，令依上元故事，一品已下带手巾、算袋，其刀子、砺石等许不佩。武官五品以上佩鞢韄七事，七谓佩刀、刀子、砺石、契苾真、哕厥、针筒、火石袋等也。至开元初复罢之。”所谓“契苾真”就是锥凿，所谓“哕厥”就是解结的觿角。

[27] 《唐会要·舆服上》记载:“开元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敕，百官所带銙巾算袋等，每朔望朝参日着，外官衙日着，余日停。其年七月二十五日敕，珠玉锦绣，既令禁断，准式，三品以上饰以玉，四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者，宜于腰带及马镫酒杯杓依式，自外悉禁断。”或据此。

[28] 沈从文.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 香港：商务印书馆，1981. 书中亦论及开元二年禁令鞢韄七事。

[29] 齐东方认为何家村窖藏是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时，被租庸使刘震埋入地下的珍宝。见齐东方. 何家村遗宝的埋藏地点和年代[J]. 考古与文物，2003（2）：70～74. 该文亦刊于：齐东方，申秦雁主编. 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但刘云辉、韩建武认为该窖藏文物的规格高，应该属于皇室收藏。见陆建芳主编. 中国玉器通史·隋唐卷[M]. 深圳：海天出版社，2014.

[30] a. 古方主编. 中国出土玉器全集[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b. 同[21]. 后文作者认为，该玉带不是唐代制作，宜修改为早于开元年间制作。

[31] （北宋）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车服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75：529.

附表　3 ~ 11 世纪西亚、中亚输入玉石带记录

时代	序号	史料原文	分析史料内涵	玉器名、玉料
三国	1	《艺文类聚·卷六十七·服饰部·带》："魏略曰。疏勒王献大秦赤石带一枚。"（台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88 册，第 475 页）	三世纪时，位于今日喀什一带的疏勒国曾向（三国的）魏帝奉献地中海以东地区制作的赤石带	赤石带
南北朝	2	《南史·七十九·列传第六十九·夷貊下》："人皆善骑射，着小袖长身袍，用金玉为带。"（台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265 册，第 1133 页）	南北朝时（420 ~ 588 年）西域人民多带着用黄金、美玉装饰的腰带	金玉带
	3	《周书·卷四十四·列传第三十六·李迁哲传》："太祖嘉之，以所服紫袍玉带及所乘马以赐之，并赐奴婢三十口。"（台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263 册，第 787 页）	北周太祖在位时间（507 ~ 556 年），华北已有玉带，但未说明玉带是否来自西域？	玉带
唐	4	《全唐文·卷七百三十三·韦端符·端符穆宗朝官拾遗·卫公故物记》："有玉带一。首末为玉十有三。方者七。挫两隅者六。每缀环焉。为附而固者以金……公擒萧铣时。高祖所赐予阗献三带。其一也。佩笔一。火镜二。大觿一。小觿一。笇囊二。椰杯一。盖常佩于玉带环者十三物。已亡其五。其存者八。"（《全唐文》，台北：中华书局，1983 年，第 755 页） 相同记录见：《新唐书·卷九十三·列传第十八·李靖》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 年），曾赐给功臣李靖"于阗玉带"，上面有十三块带銙，用黄金固定所附玉环，上面又经常挂着火鉴、大觿、算囊等物。唐穆宗三年（823 年）韦端符见到此玉带，在《卫公故物记》上面佩挂了：笔一、火镜二、大觿一、小觿一、笇囊二、椰杯一，其余五件已遗失。并记录是于阗国所献三条玉带之一	玉带三
	5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列传第一百四十八·西戎》："于阗国，西南带葱岭，与龟兹接……其国出美玉……贞观六年，遣使献玉带，太宗优诏答之。"（台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271 册，第 759 页）	唐太宗贞观六年（632 年）西域的于阗国献玉带	玉带一
	6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列传第一百四十八·西戎》："大食国，本在波斯之西……开元初，遣使来朝，进马及宝钿带等方物。"（台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271 册，第 766 页）	唐玄宗开元初（713 年），位于阿拉伯半岛的大食国，进贡给唐玄宗马匹及宝钿带	宝钿带一
	7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上·西域上》："初，德宗即位，遣内给事朱如玉之安西，求玉于于阗，得圭一，珂佩五，枕一，带胯三百，簪四十，奁三十，钏十，杵三，瑟瑟百斤，并它宝等。及还，诈言假道回纥为所夺。久之事泄，得所市，流死恩州。"（《新唐书》，台北：中华书局，1997 年，第 1591 页）	唐德宗即位时（742 年）派朱如玉求玉于于阗，所得玉器种类有：圭、佩、枕、带胯、簪、奁、钏、杵。此外还有碧绿色宝石（瑟瑟）百斤等	圭一、佩五、枕一、带胯三百、簪四十、奁三十、钏十、杵三
	8	《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二·外臣部十七·朝贡第五》："宪宗……元和……十二年……四月吐蕃使论乞髯献马十匹玉腰带二条金器十事。"（台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919 册，第 282、283 页）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 年）位于今日西藏的吐蕃献玉腰带两条	玉腰带二

续表

时代	序号	史料原文	分析史料内涵	玉器名、玉料
唐	9	《唐会要·卷九十八·回纥》:“长庆元年三月……六月，回鹘宰相并公主献……鸭头子玉腰带……。”(《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073页)	长庆元年三月（821年）回鹘献玉腰带	鸭头子 玉腰带一
	10	《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二·外臣部十七·朝贡第五》:“文宗太和元年……八月吐蕃使论壮大热进国信金银器玉腰带及马等。”(台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19册，第283页)	唐文宗大和元年（827年）吐蕃进贡玉腰带	玉腰带一
后唐	11	《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二·外臣部十七·朝贡第五》:“闵帝应顺元年正月……回鹘可汗仁美遣使献故可汗仁裕遗留贡物鞍马器械仁美献马二团玉秋辔硇砂羚羊角波斯宝绁玉带。”(台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19册，第289页)	后唐闵帝应顺元年（934年），回鹘可汗仁美进献二团玉之外还有波斯宝绁玉带	二团玉、波斯宝绁玉带
后晋	12	《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二·外臣部十七．朝贡第五》:“少帝天福七年回鹘都督来朝献马三百疋玉百团玉带一。”(台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19册，第290页) 相同纪录见:《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三》	后晋少帝天福七年（942年）回鹘都督进献玉百团、玉带一	玉百团、 玉带一
后周	13	《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二·外臣部十七．朝贡第五》:“周太祖广顺元年二月西州回鹘遣都督来朝贡玉大小六团一团碧琥珀……白玉环子碧玉环子各一铁镜二玉带铰具六十九玉带一诸香药称是。”(台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19册，第291页)	后周太祖广顺元年（951年）西州回鹘进贡玉大小六团、一团碧琥珀、白玉环子、碧玉环子各一，玉带铰具六十九、玉带一	玉六团、白玉环子、碧玉环子、玉带铰具六十九、 玉带一
	14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外国列传第二》:“周广顺元年二月，遣使并摩尼贡玉团七十有七，白迭毛、貂皮、牦牛尾，药物等。先是，晋、汉以来，回鹘每至京师，禁民以私市易，其所有宝货皆鬻之入宫，民间市易者罪之。至是，周太祖命除去旧法，每回鹘来者，听私下交易，官中不得禁诘，由是玉之价直十损七八。”(《旧五代史》，台北：艺文印书馆，1982年，第916页) 《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二·外臣部十七·朝贡第五》:“周太祖广顺元年二月……回鹘遣使摩尼贡玉团七十七白迭毛段三百五十青及黑貂鼠皮共二十八玉带玉鞍辔铰具各一副。”	后周太祖广顺元年（951年）回鹘进贡玉团七十七、玉带、玉鞍辔铰具各一副。周太祖除去原有对民间与回鹘买卖玉的禁令，使得玉的市价下跌百分之七八十	玉团七十七、玉带玉鞍辔铰具各一副

续表

时代	序号	史料原文	分析史料内涵	玉器名、玉料
宋	15	《宋史·卷四百九十·外国六》："大中祥符四年……秦州回鹘安密献玉带于道左。"(《宋史》，台北：艺文印书馆，1982 年，第 5855 页）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 年）秦州回鹘献玉带	玉带
	16	《宋史·卷四百九十·外国六》："天圣三年十二月，遣使……贡玉鞍辔、白玉带……"(《宋史》，台北：艺文印书馆，1982 年，第 5851 页）	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 年）于阗呈贡玉鞍辔、白玉带	玉鞍辔、白玉带

Jade Belt

——Cultural Crystallization of Northern China and Eurasian Steppe

Deng Shuping

Abstract: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of jade carving traditions. From the mid-Neolithic age to the end of Eastern Jin Dynasty (6200 BC-42 AD), which lasted for over 6000 years, the ancestors used jade as a sacrificial device to worship ancestors and sacrifice gods in order to seek God's blessing. During this period, they also make jade daily life utensils often carved with special decoration about a communication between people and God or other meaning. It can be said that Chinese native growing jade culture is full of mystery. From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420 ~ 589 AD), jade culture has a new look, most of the jade is daily life utensils. This change is obviously influenced by the exotic culture.

The belt is a very important clothing accessory of nomadic, with a major function of protection of the internal organs from the bumpy. The belt decoratived stone rubbings custom in the Iranian Plateau in Western Asia, spread through the commerce to the eastern Kunlun Mountains in Central Asia, and developed the fashion which is used Khotan jade to decorate belt. Then absorb the North Asian belt decorated with copper inserts, integrate into the jade belt style during Northern Zhou Dynasty and early Tang, become part of the Tang Dynasty official uniform system.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ies, that is, from Tang Dynasty to Ming Dynasty, the “jade belt system” formed by integrating elements of Western Asia, Central Asia and North Asia garments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China, East Asia.

Keywords: Northern China; Eurasian Steppe; jade belt

早期金属时代中外文化联系的走向

——读杨建华教授等著《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有感

乔　梁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100101）

近日承杨建华教授惠寄新著《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一书[1]，此前张忠培师已在先睹其书后与笔者在电话中有所讨论交流，并嘱笔者写篇书评。无奈笔者于西文基本属于一窍不通，对境外欧亚草原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基本只能借助于零星的翻译资料或国内相关论著的二手传递，所以很难形成更系统的认识，显然也难于承此大任，故一直未敢应承。但先生的交代总要有所回应，故书到手后，还是比较认真地通读了一遍，借助以往支离破碎的知识或印象，居然也能产生些许启发，所以不嫌鄙陋略记于此，以盼识者正之教之。

尽管在现代中国考古科学诞生之初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曾有西来之说[2]，但经过了近百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现已基本可以廓清，历史上中国大陆的腹心区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基本是以单元内部交互的主流方式独立地完成了新石器时代的发展进程[3]。然而进入早期金属时代，这种文化演进与发展的主流模式有可能有所改变，外来文化影响的作用似乎已达非可忽略不计的程度。尽管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青铜技术的主要来源尚存在着不同的认识[4]，但按照现有的发现与研究至少已大致可以了解，所谓广义中原地区金属技术的发生与发达最初可能与来自区域之外的影响不无关系。虽然可能早在仰韶时代就曾出现过金属制品，但因并未形成一种技术潮流而对文化进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所以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仍多将二里头文化形成阶段的前后视作中国青铜时代的开端，而这一阶段甚或稍早时期青铜技术的率先兴起似乎又以西北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来自西方积淀深厚且更为成熟的青铜文明的影响在中国青铜技术起源与发展中的作用无疑是不能视之不见的因素。

西方金属技术向东的传播可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途径或通道可能也并非单一的，但如就既有发现分析，其主要线索多与中国西部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渊源于广义中原的系列考古学文化的西向扩张相关联，马厂文化、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等很可能是西方金属技术东传的早期受益者和向中原、北方传播的中介角色[5]。

古代中国青铜时代初始或偏早阶段来自西方或西北侧的金属制品或因素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得到了研究者比较充分的钩稽和认知[6]，虽然对于部分材料相对年代的判定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偏差或失于宽泛，但对当时文化或技术影响整体趋势的认识而言并不足以产生颠覆性的结果。杨建华等所著《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对此则进一步做了一番系统地梳理，并在对整个欧亚草原东部相关时期不同考古学文化系统条析类分的背景之下加以分析和讨论，当然，演绎的逻辑和形成的认识也都会更具合理性与可信度。借助于《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征引的资料和研究成果，观察早期金属时代古代中国广义中原区域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流，则不难发现，在较早的阶段反映文化影响因素呈现的状态几乎是单一的走向，即基本上只能见到来自西方的金属物品出现在甘青乃至中原或北方的相关遗存之中，而在对应西方一侧输出区域的同时期遗存中则很难发现源自中国大陆文化的物品或因素。梳理相关发现与研究，广义中原地区渊源于西方的文化因素可能尚不止金属技术这一项，同样，在这一时期前后甚或偏早阶段出现的小麦[7]、子安贝[8]、权杖头[9]、御马术[10]和马车[11]等也多已为研究者视作自西徂东的影响。因此，这一阶段新出现东西方文化交流影响走向的趋势或许不是偶然的现象。

根据既有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至少在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阶段，中原系统青铜文化已清楚地显露出一些区别于西方系统青铜文化的特质，并且这些具有指标性的物质文化特征在整个所谓的原史时期一直得以强化或延续，构成了特立独行的中国青铜文化系统。观察此类特征的空间分布或扩散过程或许能够为更加准确地认识和理解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影响提供帮助。

以青铜材质制作容器并将之礼器化、制度化是中国商周文明最重要的物质文化特征之一，辅之以兽面、饕餮等形象恐怖、诡谲的装饰题材，使青铜器成为已知体现中国上古时期礼仪秩序的最重要的物化因素，并使之成为区别于世界民族之林众物质文化的特质。在二里头文化阶段即已出现可能具有礼器性质的青铜容器和表现兽面等题材的形象[12]，因此原史时期文明的系脉无论是理解为朝代变革还是族系更替至少于此或可视作一脉相承。

二里头文化阶段相关青铜容器的发现尚十分稀少，更无从了解和认知其向外扩散的具体情况。到了商代，大约在所谓早商偏晚的阶段，青铜容器在非传统中原地区以及商文化势力新占据区域的表现已十分突出。江淮之间的安徽阜南[13]、长江以南的湖南宁乡等地都发现了典型的商式青铜重器[14]。发现于西南的三星堆文化[15]和赣江流域的大洋洲遗存[16]，尽管都反映出与中原商系统文化的显著差别，但仍在大量地应用商式或接受了商文化强烈影响的青铜容器。在北方，鄂尔多斯朱开沟的商式青铜容器和铜戈等或可视作商文化势力的到达[17]，但在约略同时或可能稍晚的阶段，分布在南流黄河沿岸晋陕高原畜牧色彩相对浓厚的非商系统文化也在应用商式或受商文化影响的青铜容器[18]，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商式青铜礼器与北方系统的青铜器和金饰品共存[19]，而在东北西部的大凌河、西拉木伦河流域等地的一些窖藏中也多有典型的商式青铜容

器出土[20]。根据已知商式青铜容器的分布外缘，大体可以界分出当时的一个青铜文化圈，地域上基本包括了上古中国文化的腹心和外扩地区，虽然区域内各考古学文化的表征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华夏与夷狄之俗似乎也格格不入，但应用具有礼器性质的青铜容器以及赋予特定的含义仍基本可以视作这一文化圈的指标性特征。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特定的文化关联，才有可能形成周武王伐商活动中联合西、南诸部族的文化基础，而《左传·召公九年》记述周景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所述之“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21]的地理范围也当大体基于这一文化圈，基本能够体现西周王朝的建立对原商王朝及其方国政治地理格局的接纳或继承。

在青铜兵器的应用中，中国原史时期文明也拥有区别于世界其他同时期文明的特质，其中表现最为突出和普遍的当属所谓“勾兵”的铜戈（包括所谓的“戣”等）的应用，特别是以内与柄相结合方式的无銎式戈几乎可以视作中国古代文化的专擅[22]。观察无銎戈类兵器的空间分布，大致能够体现出与礼器性青铜容器相同的趋势，但有可能具体范围存在一些变化，其中在南方稍晚阶段，此类铜戈分布的远端已大大超出了中原系青铜礼器（容器）的范围，有可能一直远达越南北部[23]，而在东北向的早期分布则又可能略逊于青铜礼器的影响，这可能与非传统中原文化势力所占据的北方所流行的更多是受到了西方或北方有銎类兵器的影响而使用有銎戈有关[24]。尽管形制存在着一定的变化，但仍大体可以确认的是，至少目前在前述文化圈之外基本没有无銎戈类兵器的分布或发现。

治玉、用玉并形成特定的礼乐仪轨也是中国上古文明重要的特质之一。自距今8000年前后的兴隆洼文化有意识地选择和利用玉材开始，经历了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及龙山时代诸文化等不同考古学文化系统族群集团的先后实践或推进，玉器的制作和应用逐渐制度化并异化出特殊的社会属性，进而为原史时期文明所继承和发扬，而在与儒学观念结合后，玉之所用、所示似乎更成为统治阶级所尊崇和提倡的社会道德表征的最佳物化代表。观察早期原史时期玉器的分布，似乎反映出与青铜礼器的分布规律存在着一定的变化。在北方，尽管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广泛应用玉器，但进入金属时代后那些曾经接受了商周青铜容器影响的非中原系统文化却基本没有应用玉器，特别是体现礼制的所谓“瑞玉”的现象，而至多是将玉材视同为用于装饰的宝石。与北方所反映的不同，在南方区域应用青铜容器的非中原系统文化之中，诸如，琮、璧、圭及戈等玉器应用也表现得比较突出，而其中更值得关注的是所谓的“牙璋”向南一直传播到中南半岛[25]，牙璋的南向分布和稍晚的铜戈一样体现了中原系统早期青铜文明向低纬度南方的影响。玉器在向南北方传播中的不同表现，也许体现着古代中国不同文化系统所植根的地域环境或生业传统因素，而作为其北向传播历史环境背景的欧亚草原文化深远的影响无疑也应当作为必须重视的因素之一。

以鬲所代表的陶质空三足类容器大约自仰韶和龙山时代交接之时兴起于黄河流域

后，曾经向古代中国的广大区域扩散，并一直沿用到秦汉阶段前后。青铜时代的中原考古学文化多有应用陶鬲的传统或以陶鬲等空三足器构成日常生活器皿的基本组合。不同考古学文化集团的陶鬲以不同的制作工艺按照趋同的步骤重复演进，已成为中原原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重要内涵。与古代中国的广泛应用不同，鬲类陶器在中国境外的发现却属凤毛麟角[26]，由此基本可以将鬲类陶器的应用视作中国上古文化的基本特质之一。就目前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来看，鬲类空三足陶器的扩散可能分为不同的途径和品类，在东南以及华南主要是自龙山时代起来自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的陶鬶类器具的传入或模仿；在长江上游则虽然也是陶鬶或盉类陶器的传入与模仿，但直接的影响源却可能是盘踞于中原的青铜文化的南向扩张；在广大的北方地区鬲类陶器的分布比较普遍，而其中又以陶鬲的流行更为突出，大约在商周时期陶鬲的北向分布至少已达外贝加尔区域，而其背后的宿主很可能是分布在大兴安岭两侧的先期或同期的考古学文化集团。

观察上述可以作为广义中原区域原史时期文明特质的基本文化要素的传播或流布，或大致能够理解中原原史时期考古学文化所据及影响在地理分布上的梯次结构和背景因素，而其中综合多数因素所框定的地域范围也大致可以作为中国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聚合单元，以界分和区别于更大背景环境之下的其他系统文化单元。

所谓“牙璋”和陶鬲类器具分别向南、向北的流布，大约可以视作明确的中原青铜文化因素在地理上传播或影响的空间极限，虽然此类文化现象背后隐藏的含义可能十分复杂，而且两者所表述的文化含义可能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如果就相关中原因素的分布与扩散趋势分析，大致可以反映出这两种特定的文化因素由中原腹心向南或向北渐次递减的涟漪状态，因此，无论经过多少中介乃至变异，最终将它们视作中原文化基本要素的传播应当也在情理之中。东向由于面海，所以原史时期考古学文化虽然反映了由中原向东的扩张，但是更远的影响只有胶东半岛的夷系集团可能在中原文化集团东扩的压力中跨海向辽东半岛的发展并间接地带去相关中原文化因素的表现尚有迹可循。西向的发展似乎乏善可陈，基本是因循新石器时代相关文化扩展之旧，甚至还有退却之嫌。相对于由西徂东的金属文化因素传播，中原青铜时代早期文化因素的西向流布似乎没有太大的进展。一方面是来自西或西北方向金属技术或产品的强力介入，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作为接受影响一方的青铜时代早期中原文化西向影响的衰减，这种此消彼长的态势可能一直到周人在关中崛起才有所改变。如果拿近些年广为研究者所关注的所谓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矛的东渐和早期中原式铜戈西向、北向分布的态势做一些对比[27]，则能够对上述文化影响表现的现象或趋势反映得比较突出或清晰。

考古学发现与研究所揭示的现象耐人寻味，一方面中国早期青铜时代（或包含所谓的铜石并用时代）诸考古学文化中来自西方青铜文化的影响表现得颇为突出，从产品到技术无不体现着这一影响的深远。另一方面中国一侧作为受授方的诸考古学文化特别是最为强势的中原青铜文化却很少能够将作为核心文化的特质因素向相关影响源的西方进行回馈，故而在目前的考古学发现中，至少在欧亚草原的中亚区域绝少发现来自中原早

期青铜文化的产物甚至因素。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原早期青铜文化利用从西或西北方金属文明吸纳的先进技术或文化，丰富和壮大着自己，并在不断地调整和积淀中为秦汉帝国的形成提供了能量。但是，在这一阶段考古学中观察到的东西方文化交互的势态却多少有点“来而不往”的意味，作为产品或技术提供者的西方，究竟在这种联系中获取了什么？如仅就杨建华等学者所著所引的考古学发现与研究来看，似乎尚很难找到清晰的答案。

由前文所述所引的发现与研究分析，中原青铜文化并非完全取内敛为态势的考古学文化，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表明中原王朝均以扩张为发展要务，作为其核心文化因子的许多特质性因素曾经广泛影响了周边文化或方国（诸侯国），但这一影响的涟漪似乎在到达前述文化聚合单元的外缘时便戛然而止，特别是在西向的分布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或典型。“来而不往，非礼也”，尽管汲取了外来文化的技术或养分，应用着西方文明的产品，但似乎并未对早期中原文明的地理观或“天下”观念产生明显的影响，“居天下之中”的心理优势、《禹贡》的“五服”概念可能束缚了时人对更远西方的探索，这一现象可能一直持续到传说中穆天子西巡后才有所转变。

按照目前的考古学知识，西亚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诞生最早的区域，特别是金属应用在这里也远远早于世界其他地区。长期以来西亚或近东作为强大的文化输出源，一直向中亚或所谓的内陆亚洲施加着影响，甚至输出着人群。据人类遗骸 DNA 的分析研究，哈萨克斯坦的史前居民在公元前 7 世纪及更早的样本线性粒体 DNA 属于与欧亚大陆西部世系（单倍群）有关的标记，却没有欧亚大陆东部的标记，而年代在公元前 7 世纪以后的样本中含有欧亚西部和东部的单倍群混合标记——混合比例几乎恰好是五五开[28]，体现了欧亚大陆不同方向的人群向中亚或内陆亚洲迁徙、集聚不同时期的情景。因此，中国中原早期青铜文化向西传播或影响受限的态势，可能也与当时及更早的西方文化势力更为强大有关，文化传播或人群的迁徙大概处于一种“西风压倒东风”的情势之下，所以古诗“春风不度玉门关”描绘的意境用于此一阶段似乎也算贴切。

进入东周时期，随着大国兼并扩张的愈演愈烈，所谓的四夷也更多地融入或参与到中原文化系统之中，中原文化向西方的输出或影响在戎狄的中介作用下开始表现得突出或频繁起来，当交流成为双向的有来有往并达成一种常态或稳定，丝绸之路的形成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故而在西域甚至更遥远的西方来自中原以及南方的产品开始不断出现，巴泽雷克冰冻大墓中的楚系丝织品和铜镜等应当是当时文化联系或影响的最明确证物[29]。

附记：为塞张忠培师所嘱之责，本文草成于 2016 年夏，由于缺乏对全面材料的掌握和梳理，所以总有意犹未尽的感觉，也就搁置了下来。此次应魏坚教授人民大学“中国北方考古与欧亚文明”盛会之约，无奈之下只得重新捡起略作修订，聊以充数而已。敬请读者谅之！

又记：小文尚未及请先生寓目，忠培师就驾鹤西去。治丧期间特请来京的杨建华教授指点，似乎尚无大谬，所以权做对先生的悼念以慰！

注　释

［1］杨建华，邵会秋，潘玲. 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的孕育过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2］安特生著，袁复礼节译. 中华远古之文化［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关于中国彩陶的来源问题，目前仍有学者持西来的意见，参见宋亦潇. 中国与世界的早期接触：以彩陶、冶铜术和家培动植物为例［J］. 吐鲁番学研究，2015（2）：19～32.

［3］苏秉琦著，赵汀阳、王星选编. 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M］. 北京：中信集团出版社，2016.

［4］李水城. 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J］. 考古学报，2005（3）：239～278.

［5］李水城，水涛，王辉. 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J］. 考古学报，2010（2）：229～274.

［6］林沄. 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A］. 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7］赵志军. 小麦传入中国的研究——植物考古资料［J］. 南方文物，2015（3）：44～52.

［8］彭柯，朱岩石. 中国古代所用海贝来源新探［A］. 考古学集刊（12）［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9］李水城. 权杖头：古丝绸之路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J］.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2（3）.

［10］袁靖. 中国古代家马的研究［A］. 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G］.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11］郭静云. 古代亚洲的驯马、乘马与游战族群［J］. 中国社会科学，2012（6）：184～204.

［12］杜金鹏，许宏主编. 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13］葛介屏. 安徽阜南发现殷商时代的青铜器［J］. 文物，1959（1）：2.

［14］高至喜. 湖南宁乡黄材发现商代铜器和遗址［J］. 考古，1963（12）：646～648.

［1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三星堆祭祀坑［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16］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新干商代大墓［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17］张忠培，朱延平，乔梁. 晋陕高原及关中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结构分析［A］.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G］.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18］杨建华，蒋刚主编. 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19］北京市文物管理处. 北京市平谷县刘家河发现商代墓葬［J］. 文物，1977（11）：1～8.

［20］郭大顺. 赤峰地区早期冶铜考古随想［A］.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G］.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2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2］ 周纬．中国兵器史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23］ 松井千鹤子著，唐虹、孙晓明译．越南北部出土的青铜戈［J］．东南亚南亚研究，1987（1）：62～69．

［24］ 井中伟．早期中国青铜戈、戟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25］ 彭长林．越南北部牙璋研究［J］．华夏考古，2015（1）：63～71．

［26］ 乔梁．中国境外发现的鬲形陶器［J］．文物，2002（1）71～78．

［27］ 高江涛．试论中国境内出土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J］．南方文物，2015（4）：160～168．

［28］ 米华健著，马睿译．牛津通识读本——丝绸之路［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

［29］ 杨建华，包曙光．俄罗斯图瓦和阿尔泰地区的早期游牧文化［J］．西域研究，2014（2）：75～84．

The Trend of Cultural Link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in Early Metal Age

——Reading Professor Yang Jianhua Waiting for “the eastern Eurasian prairie metal road”

Qiao Liang

Abstract: In the early Bronze Age, the exchange of bronze technology in the east and west of Eurasian Steppe showed a one-sided state. On the one hand, the metal technology or products from the west or northwest had a strong interven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as a receptive party to westward decayed. Such a shift from one direction to another might not change until the rise of Zhou people in Guanzhong. The output or influence of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to the West started to appear prominently or frequently under the mediation of Rong Di. When the exchange has become a two-way exchange, then been normal and stable, the formation of the Silk Road will naturally come of its own accord.

Keywords: Eurasian Stepp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early Bronze Age; Silk Road

西汉诸侯王墓棺椁构造研究

陈海霖[1]　王晓丹[2]

（1. 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北京，100160；2.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北京，100872）

一、绪　　论

我国古代墓葬中主要以棺椁作为葬具来装殓死者进行埋葬，棺椁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得到推广和普及，后逐渐形成成熟的棺椁制度，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礼制。西汉时期，诸侯王墓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多使用棺椁，且文献中有相关记载，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日益丰富，为棺椁的系统研究提供了条件，在棺椁大小、质地、重数及装饰等方面均做过深入探讨，但缺乏对棺椁构造形制的研究。进入西汉时期，墓葬形制发生了划时代变革，传统的竖穴密闭椁墓走向衰退，横穴开通的室墓则迅速崛起，以诸侯王墓为代表的大型墓葬起到主导和推动作用，随后影响波及中小型墓，黄晓芬先生对此已做过深入研究[1]。诸侯王墓的棺椁构造在墓葬形制的变革中受到影响，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将在先学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考古和文献资料的系统整理，界定棺椁概念，统一认识，然后分析西汉诸侯王墓在各时期棺椁构造特点，以探究在墓葬形制变革中，棺椁构造形式的发展演变全过程及规律。

二、棺椁概念的界定

西汉诸侯王墓考古发掘资料的日益丰富，为棺椁研究提供了条件，但在研究中也存在一定问题，就是对于棺椁概念缺乏统一认识。一些简报、报告、研究文章中对于棺椁的界定不同，导致概念模糊，缺少可供比较的共同标尺，为研究棺椁构造发展变化规律造成障碍。所以在进入主题讨论之前，首先要界定棺椁的概念。

棺是直接收纳死者尸体的葬具,《汉书·龚胜传》载:“胜敕以棺敛丧事：衣周于身，棺周于衣。”棺一般为长方体箱形构造。

周棺以椁,《汉书·朱云传》载:“云遗言：棺周于身，土周于椁。”椁是收纳棺和部分随葬品的葬具,《礼记·丧大记》载:“棺椁之间，君容柷，大夫容壶，士容甒。”郑玄注:“间可以藏物，因以为饰。”椁一般也是长方体箱形，但却与棺不同，椁是在造

墓时于墓坑中垒成，而棺是在墓外预先做成，下葬时放入墓中。《汉书·外戚传》：“太后诏曰，因故棺，为致椁作冢。”颜注：“致，谓累也。”说明棺是可以整体迁移出去的，椁则是可以在墓中拆卸和堆垒的。《仪礼·士丧礼》：“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还椁，反位，哭，不踊。”胡培翚《正义》说：“葬时必先施椁乃下棺。”椁的型式基本可以分两种，一种是箱形椁，一种是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椁内分箱形制，即把箱形椁的椁内空间分割成若干个。

三、西汉诸侯王墓棺椁构造形制的分期及特征

目前，学术界根据建造方法的差异将西汉诸侯王墓分为竖穴土石坑墓和横穴崖洞墓两大类，竖穴土石坑墓又根据墓葬材质和建造的不同分为木椁墓和石室墓。墓葬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设计建造的，棺椁与墓葬形制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对棺椁构造的研究要放到整体中来研究。崖洞墓、石室墓作为一种全新的墓葬形制，棺椁构造也有新的表现，一般只使用单棺，没有反映棺椁构造形制的演变过程。所以下面主要对棺椁结构保存较好的竖穴土石坑木椁墓进行分析，根据棺椁构造形制的演变过程，结合文献纪年，大致可以分早、中、晚三期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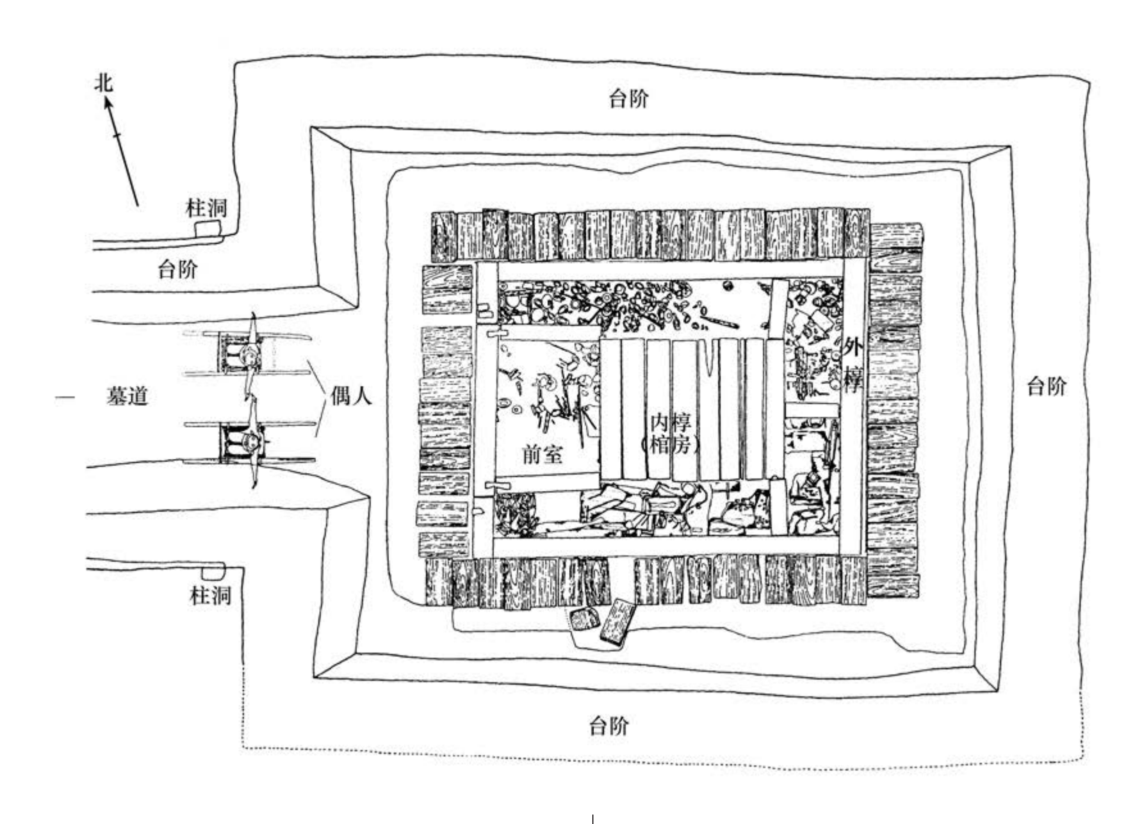
1. 西汉早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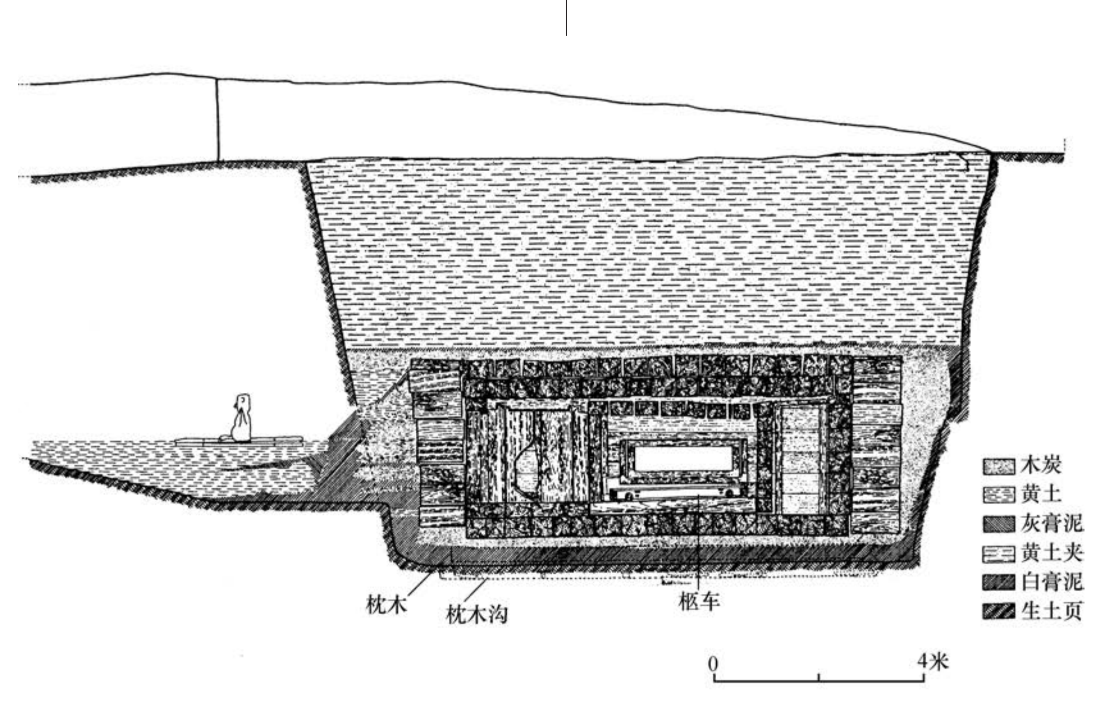
早期分为早、晚两段，早段是高祖至文帝时期，即公元前 206 ~ 前 157 年，这一时期的墓葬有河北石家庄小沿村西汉墓、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河北献县 36 号墓。墓葬多受当地文化传统的影响，继承了一些战国墓葬的特点。

河北石家庄小沿村西汉墓是一座“中”字形大墓，因出土一枚铜印刻有阴文“长耳”二字，发掘报告推测墓主是西汉初年赵王张耳，卒于公元前 202 年[2]。墓葬早期被盗后焚毁，破坏严重，从棺椁痕迹看，该墓为一椁二棺，是典型的箱形椁，继承了中原、北方战国时期大型墓葬的特点。椁外有题凑结构，题凑与木椁四壁呈垂直状堆垒，对椁结构有加固、保护作用。

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是一座“甲”字形大墓（图一），从出土器物与马王堆一号、三号汉墓和沅陵侯吴阳墓的相类似，以及出土的“长沙后府”封泥，推测为西汉初年吴氏长沙国王后墓[3]。该墓的棺椁继承了战国楚墓的特点，椁内分箱，报告中称其为“藏室”，分为北藏室、南藏室、东藏室三部分，东藏室内有一门又将其分为南北两室，棺房内有两重套棺。紧贴木椁四周垒叠有题凑，题凑端头朝向椁壁，加固了椁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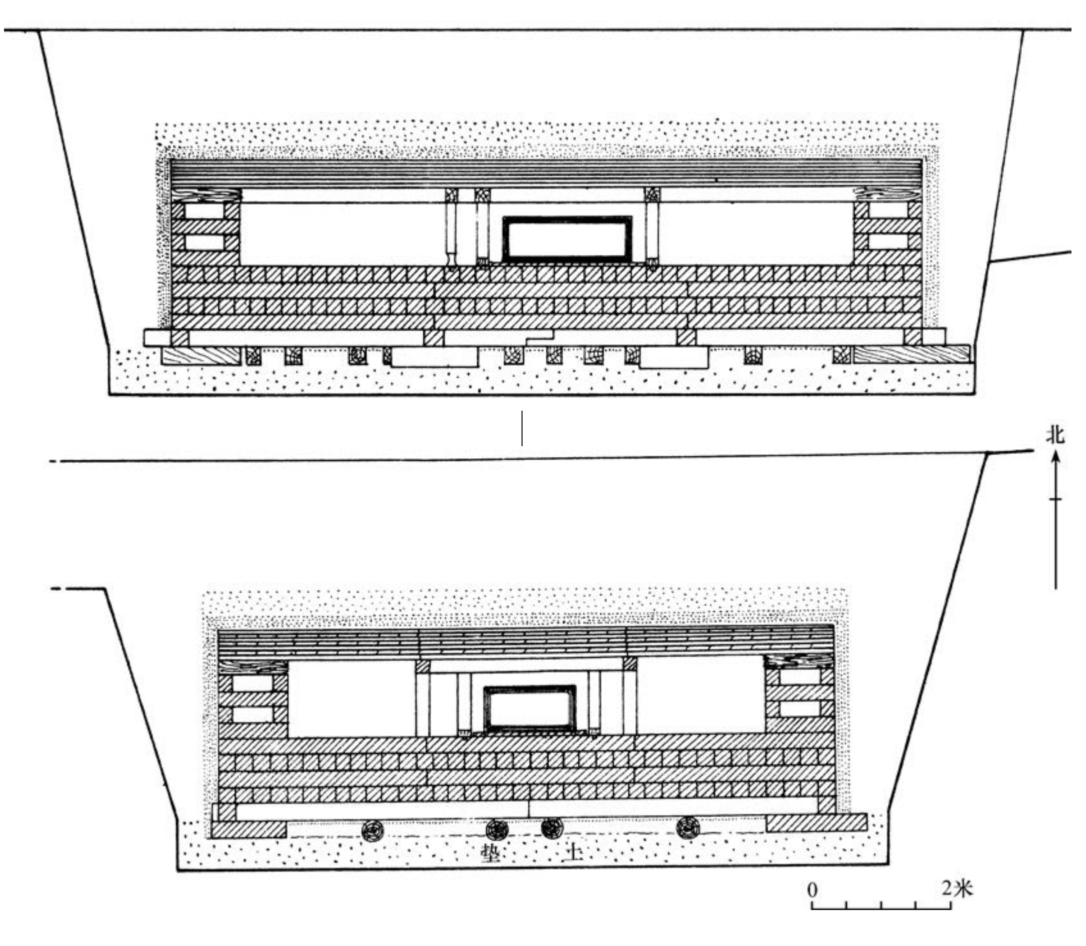
河北献县 36 号墓（图二），平面呈“凸”字形，分为墓道、侧室和主室三部分，报告根据墓葬规模、形制和随葬品推测其为西汉早期诸侯王级别墓葬[4]。该墓为一椁三棺，属于箱形椁，继承了中原、北方战国时期大型墓葬的特点，椁室结构复杂，椁





图一　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平、剖面图

底、椁壁、盖板用大量方木和木板多层次、纵横交错垒砌。椁底由 4 层交错叠压的方木构成，每层方木分 3 路铺设。椁壁是由 4 层方木相互叠压垒砌，以长约 1、直径为 0.2 米的短方木依椁外壁垒砌一周，先东西边各紧密垒砌一排，然后南北边再紧靠东西边排列，类似“题凑”形式，在第一层短方木上顺椁外壁方向叠压长方木，长约 3、直径 0.2 米，在该层方木上再垒砌一周短方木，如此相互叠压四层，形成椁内空间。盖板共七层，上部四层腐朽严重，尺寸无考，可以看出是分三路铺设，第一层是南北向铺设，第二层是东西向，交错叠压至七层。木棺腐朽严重，从棺木残迹辨认，可分为三重。可见该墓建造所用木枋数量和所费工时与石家庄小沿村西汉墓、长沙渔阳汉墓相比毫不逊色。



图二　河北献县 36 号汉墓平、剖面图

早期晚段是景帝至武帝前期未发行五铢钱时，即公元前 156 ~ 前 118 年，这一时期的墓葬有长沙象鼻嘴一号汉墓、山东巨野红土山汉墓、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长沙陡壁山汉墓。

长沙象鼻嘴一号汉墓是一座大型竖穴岩坑墓，报告依据墓葬规模和随葬品推测，墓

主人可能是长沙王吴著或刘发[5]。墓室由甬道、题凑、外椁、前室、内外回廊、棺室、套棺组成。题凑紧贴外椁墙板四周，呈长方框形。这种题凑围椁壁的形制与长沙渔阳汉墓和石家庄小河村汉墓相似，应该有继承关系。但其内部结构又更加复杂，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椁内形制类似于分箱式椁，在外椁墙板和内椁墙板之间分 12 个空间放置随葬品，各间由立柱、隔板、门扉、横梁相隔离，内椁与棺房之间也分成 7 个空间放置随葬品，棺房内放置三重棺。

山东巨野红土山汉墓[6]，相关研究认为墓主人是山阳王刘定，卒于公元前 136 年[7]。墓葬由封土、墓道、墓室构成，是一种新形制。墓室为长方形，分为前后室，中间有排水沟相隔，后室地面低于前室 0.5 米，墓室顶部铺盖木料。棺椁放置在后室正中间，腐朽严重，从残留痕迹判断是一椁一棺，为箱形椁。

江苏盱眙大云山一号汉墓是一座“中”字形大墓，发掘简报根据出土银盘上“江都宦者沐盘十七年授邸”和漆器上“廿一年南工官造容三升”等文字纪年推断墓主人是第一代江都王刘非[8]。该墓由外回廊、题凑、前室、中回廊、内回廊、内椁、外棺、内棺等构成，外回廊分为上下两层放置随葬品。该墓为一椁两棺，但因报告中没有相关线图，具体形制尚不清楚。内椁和两重棺均因被盗而破坏严重，从残留痕迹分析，内棺为镶玉漆棺。大云山二号墓为王后的墓，其封土叠压在大云山一号墓的大封土之下，所以年代应早于大云山一号墓，又因出土刻有纪年铭文“廿五年五月甲”的漆盘，推断其下葬年代为公元前 129 ~ 前 127 年或稍后[9]。该墓由主室、北室、南室组成，主室应为椁室，继承了战国楚墓的特点，椁内分箱，用隔板分出东、西、南、北四个边箱，棺房位于正中间，内有一个玉棺。

长沙陡壁山汉墓是一座大型竖穴岩坑墓，从墓葬形制、规模及出土文物看属于西汉早期诸侯王级别的墓葬，简报推测墓主人可能是长沙定王刘发的王后[10]。该墓外椁壁板四周垒砌黄肠题凑，南北两边各垒砌 3 层，东边垒砌 3 层，西边连接墓道处垒砌 2 层。椁的形制继承了战国楚墓的特点，为椁内分箱，椁内有三对立柱，报告推测立柱间可能有门扉或隔板，分隔椁内空间，棺房内放置三重棺。

2. 西汉中期

中期分为早、晚两段，早段是武帝中后期，即公元前 117 ~ 前 87 年，这一时期的墓葬有山东长清双乳山汉墓、河北高庄汉墓、河北定县三盘山 122 号汉墓。

山东长清双乳山汉墓是一座“甲”字形大墓[11]，相关研究认为墓主人是济北成王刘胡[12]。椁室位于墓室底部中央偏北，棺椁结构继承了战国楚墓的特征，椁箱平面呈“Ⅱ”字形，椁内分东、西、南、北四个边箱，椁内中间偏南构成棺箱，棺箱内有三重棺。

河北高庄汉墓是一座“中”字形大墓，报告根据墓葬形制、出土文物特征及组合、铜器上的铭文“常山”“常山食官”，以及纪年铭文“二十九年”，推断墓主人是常山宪

王刘舜[13]。在墓坑底部中央用浅红色页岩条石砌筑石椁，平面呈长方形，石椁内的木质葬具因被盗后焚毁而形制不明，但根据遗迹可推测木椁的建造方法：在石椁底石上贴四壁部署枋木，交接处用榫卯结构固定，再置东西 2 条枋木、南北 3 条枋木，也用榫卯结构固定，其上再铺底板，于底板上立壁柱、壁板，椁顶和椁内结构不详。木椁建成后，在其四周垒砌石墙，形成石椁。虽然该墓被焚毁严重，但可以确定有两层椁，其在木椁外砌筑石椁的形制在西汉诸侯王墓中属首次发现。

河北定县三盘山 122 号汉墓为大型土坑竖穴木椁墓，发掘者推测墓葬年代是公元前 104 年前后，或略晚些[14]。墓葬平面呈刀柄形，坐北朝南，前面是斜坡墓道，后面是墓室，墓室分为前后两室，前室分为三路，东路分六格，放置陶器、铜器，西路分为七格，随葬车马，中路为通向后室的通道。前后室之间有砖砌隔墙，后室因盗扰严重，棺椁情况不详。这种墓室结构像是由战国楚墓椁内四周设置边箱放置随葬品的形式演变而来的。

晚段是昭帝至宣帝时期，即公元前 86 ~ 前 49 年，这时期的墓葬有河北定县 40 号汉墓、安徽六安双墩一号汉墓、江苏高邮天山一号汉墓、北京老山汉墓。

河北定县 40 号汉墓，平面呈“凸”字形，分为墓道、前室、后室三部分。发掘报告根据墓葬的规模、形制、出土文物，以及出土竹简记录的最晚时间是五凤二年四月十日，推断墓主人是中山怀王刘修，卒于公元前 54 年[15]。墓圹内用木枋垒成前室和后室。前室分为东、中、西三室，室内放置随葬品。后室与前室不相通，中间有木壁相隔，底部低于前室 0.6 米，室壁是用六层木枋一横一顺叠垒而成，顶部纵横铺四层或五层盖板。后室也分东、中、西三室，中室的后半部放置木棺，共五层，中室南部、东室、西室放置随葬品。

安徽六安双墩一号汉墓是一座“中”字形竖穴土坑墓，根据墓葬规模、形制、陪葬坑、陵园，以及墓中出土“六安飤丞”封泥和铜壶肩腹部铭文“共府”，推测为六安国第一代王——共王刘庆，卒于公元前 83 年[16]。墓室使用“黄肠题凑”葬制，由外回廊、黄肠题凑、内回廊、椁室组成。棺椁位于墓室正中央，为二椁二棺，外椁为木椁，是用木板以榫卯方式构筑而成。内椁是石椁，同样为石板采用榫卯方式构筑而成，两重椁的东端都有对开式门。石椁内有“目”字形棺床，棺床上放置内外两重棺。

江苏高邮天山一号汉墓是一座大型竖穴石坑墓，根据墓葬规模、形制，以及出土文物上的铭文“广陵”“食官”“船官”“中府”“尚浴”等推断墓主人为广陵王刘胥[17]。墓葬使用“黄肠题凑”葬制，由外回廊、黄肠题凑、内回廊、椁室构成。发掘者认为此墓包括“题凑”有三椁两棺，“题凑”是外椁，在内回廊与内椁之间，东、西、北三面用木板围起来的木墙是中椁。结合墓葬实地考察来看，这两个结构应不算作椁，该墓应为一椁二棺，椁位于墓室正中央，椁内分为前室和后室，类似椁内分箱，设有两重前门，一重双扇门式后门，后室放置两重套棺。

北京老山汉墓为长方形竖穴岩坑墓，根据出土随葬品推断墓葬年代为西汉中期，墓

主人是一代燕王王后[18]。该墓使用“黄肠题凑”葬制，由外回廊、题凑、内回廊、前室、后室构成。后室中间放置棺椁，为二椁三棺，外椁和内椁均为长方形，由粗大的方木构成，南面有门，内椁中放置三重套棺。

3. 西汉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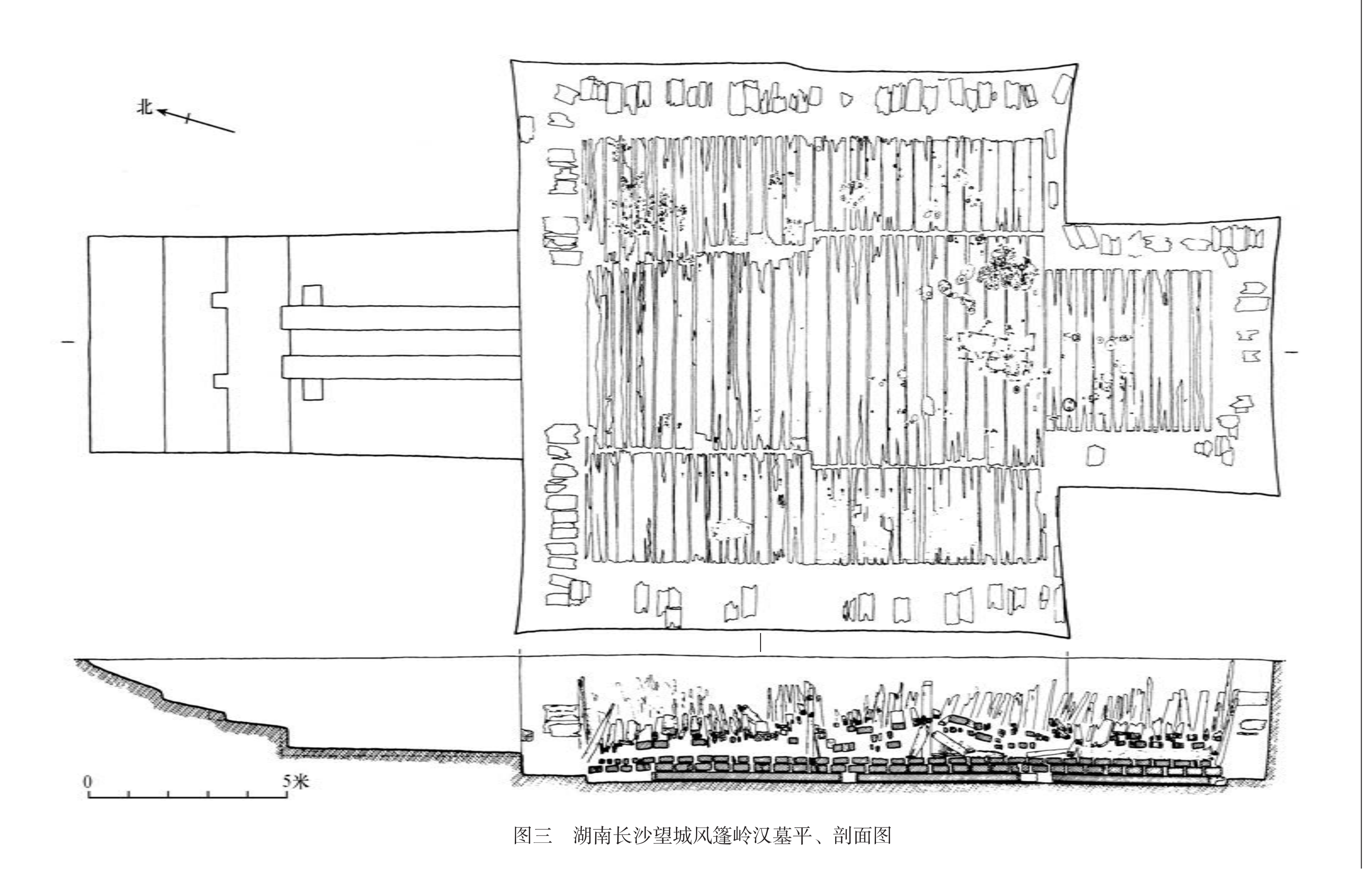
晚期是元帝至新莽时期，即公元前 48 ~ 公元 8 年，这一时期的墓葬有北京大葆台汉墓、江苏泗阳大青墩汉墓、湖南长沙望城风篷岭汉墓、山东定陶汉墓。

北京大葆台汉墓是一座大型土坑竖穴墓，发掘报告从墓葬形制、规模、出土器物，以及一件残漆器上针刻纪年“二十四年五月丙辰丞”判断墓主人是广阳顷王刘建，卒于公元前 45 年[19]。该墓使用“黄肠题凑”葬制，由甬道、外回廊、题凑、前室、内回廊和后室组成。后室即棺室，是东、西、北三面用扁平立木围成的，偏于墓室的后方，棺椁放置在后室棺床正中处，为二椁三棺，与老山汉墓相似。两椁是造墓时先在墓室内垒好的，三棺是下葬时推入椁内的，五重棺椁都是用木板经榫卯和扣接方法拼合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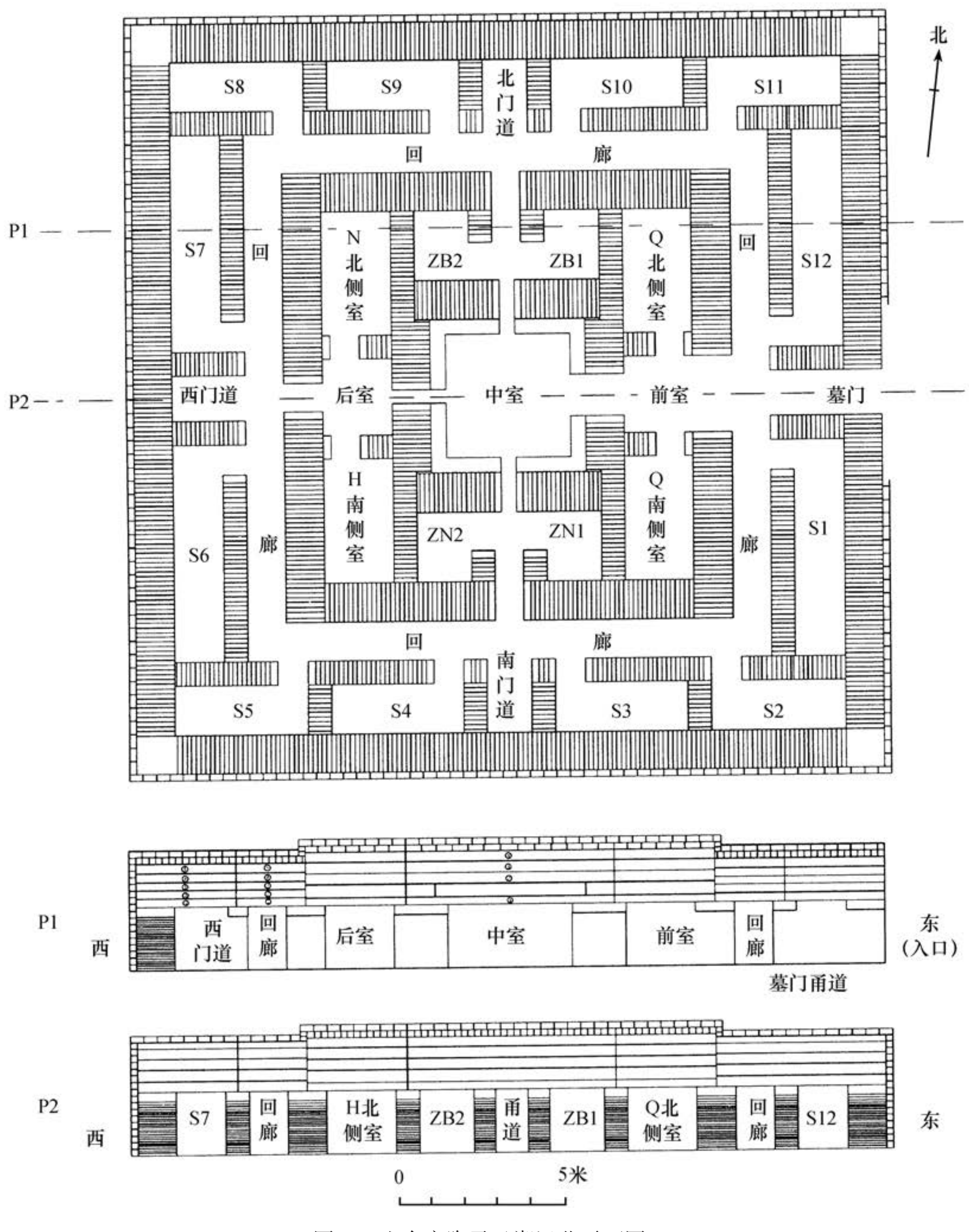
湖南长沙望城风篷岭汉墓是一座大型竖穴岩坑墓[20]（图三），通过对墓葬规模、形制、出土器物及器物上“铭文”的全面分析，何旭红先生认为墓葬年代为公元前 49（或前 48 年）~ 公元 7 年，墓主是西汉长沙国剌王刘建德或炀王刘旦或孝王刘宗或缪王刘鲁人之王后[21]。黎石生先生认为墓主是长沙孝王刘宗的王后，年代为元、成时期，其上限为孝王刘宗元年，即公元前 46 年或公元前 45 年[22]。该墓由墓道、题凑、椁室等组成，墓圹平面呈“凸”字形。椁外侧垒砌一周题凑，椁室以墓道、棺室为中轴线，分为东、中、西三列，每列又分为前、中、后三室，各分室设置有门相通。棺放置于中列后室正中位置，有内外两层套棺。

江苏泗阳大青墩汉墓为大型土坑木椁墓[23]，结合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及椁盖板上刻的“泗水王冢”，推断墓主当是第四代勤王刘综或第五代戾王刘骏[24]。墓室由主椁室和正南外藏椁、东外藏椁、西外藏椁组成，主椁室与南外藏椁之间还有夹层，主椁室分为东西两室，各放置一棺，西侧是主室，葬泗水王，东侧为副室，葬王后，夫妻同穴合葬。已发现的西汉时期帝陵和诸侯王墓均是夫妻异穴合葬，夫妻同墓合葬多见于西汉中期平民墓葬，直到东汉时期的诸侯王墓才多实行夫妻同墓合葬，如江苏邗江甘泉东汉广陵王刘荆墓，所以此墓是已发掘年代最早的诸侯王夫妻同穴合葬墓。

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是一座“甲”字形大墓（图四），报告根据墓葬规模、形制以及出土青砖上楷书兼隶、行书体的文字判断是西汉晚期诸侯王级别的墓，结合文献记载推测为哀帝生母丁姬之墓[25]。墓室由前、中、后三室和侧室、门道、回廊、外藏室、题凑墙组成。墓室最外围是“题凑”墙，回廊内侧和中室四周也有用黄肠木垒砌的“题凑”墙。中室为主室，放置漆棺一具。



图三 湖南长沙望城风篷岭汉墓平、剖面图



图四　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平面图

四、西汉诸侯王墓棺椁构造形制演变的分析

丧葬礼俗与制度是一种群体文化心理的积淀与升华，它的发生、发展与衰亡有其特殊性，即一般不因朝代的更替而断裂[26]。西汉早期阶段的诸侯王墓更多的是继承本地域的文化传统，北方的诸侯王墓主要继承了北方、中原地区战国大型墓葬特点，多使用箱型椁，南方的诸侯王墓则是保留了战国楚墓的特征，多见分箱型椁，南北方诸侯王墓的棺椁构造存在地域性差异。

与此同时，新的丧葬观念正在建立，诸侯王墓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丧葬礼制逐步发生变化。棺椁构造上表现出的新特点是椁壁外垒砌题凑，如河北石家庄小沿村西汉墓、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长沙象鼻嘴一号汉墓、长沙陡壁山汉墓，都是紧贴椁壁四周垒砌题凑。多位学者研究认为题凑出现于战国时期，“题凑”最早的文献记载出于《吕氏春秋·节丧篇》，河北平山三汲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铜版有铭文“题凑长三尺”[27]。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墓普遍被认为是考古发现最早的“题凑”实例，但其与汉代题凑“木头皆内向”不同，该墓的椁室四壁是用长短木枋纵横迭错垒砌而成，共垒砌 17 层，属于题凑的早期形态[28]。河北献县 36 号汉墓与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墓的椁室形制极为相似，特别是椁室四壁也是由长短木枋纵横叠压垒砌而成，应该也属于早期题凑形态。这一时期的题凑紧贴椁壁，与其融为一体，共同承担着扩大椁内空间、加固整个椁结构的作用，所以题凑即是椁。《礼记·檀弓上》：“柏椁以端长六尺。”郑玄注曰：“以端，题凑也，其方盖一尺。”孔颖达疏曰：“以端者，犹头也。积柏材作椁，并葺材头也，故曰以端。”又云：“椁材并皆从下垒至上始为题凑。”《吕氏春秋·节丧篇》：“题凑之室，棺椁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高诱注曰：“室，椁藏也，题凑，复垒也。”这些记载都说明了题凑即为椁。

到了早期晚段，可以看出题凑结构的发展逐步脱离椁壁而独立，不再仅仅指代椁。墓葬内设置回廊，像长沙象鼻嘴汉墓在外椁墙板和内椁墙板之间分 12 个空间放置随葬品，各间由立柱、隔板、门扉、横梁相隔离；大云山汉墓有外回廊、中回廊和内回廊，外回廊保存的较好，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放置明器 20 余辆马车，下层按功能分区放置随葬品。黄晓芬先生研究认为，回廊是来源于战国楚墓椁内分箱的传统[29]，所以在“椁墓”向“室墓”转化中可以看出，室墓是来源于棺椁本身，是椁箱进一步扩大成“室”。椁是作为地上居室的象征物而出现的，这一时期随着墓葬形制本身宅地化的不断发展，传统的棺椁组合被放置于象征居室的主体建筑中，回廊则象征附属建筑，放置相应的随葬品。

西汉中期早段的诸侯王墓仍然多是继承战国墓葬的特点，因受地方文化传统的影响而存在地域性差异。例如，山东长清双乳山汉墓处于鲁北地区，是楚文化的边缘地带，棺椁结构继承了战国楚墓的特征，椁内分东、西、南、北四个边箱，中间偏南构成棺

箱。河北高庄汉墓在木椁外垒砌一周石椁，似是从战国时期的积石墓发展而来，有加固椁结构的作用，而石椁的形态和结构又类似于木质的题凑，属于题凑的雏形。

到中期晚段，从整个墓葬形制看，规整的“黄肠题凑”和回廊的设置标志着西汉诸侯王墓制确立，并且迅速流行，各地诸侯王墓表现出更多的共性，像地处华北地区的北京老山汉墓与江淮地区的六安双墩一号汉墓、高邮天山汉墓的墓葬形制已经基本一致。传统的竖穴密闭“椁墓”转化为横穴开通“室墓”，墓葬的宅第化倾向强化，墓葬从以“器物”为主的设计转到以“空间”为主的设计，棺椁组合放置于墓室中央象征居所的主体建筑中。椁墓发展为室墓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入葬方式的改变，由悬入式变为横入式，所以这时期的椁是造墓时先在墓室内垒好，在面向墓道的椁板上开设双扇门扉，下葬时将棺推入椁内。但是，西汉诸侯王墓制的确立过程中也存在不平衡性，像河北定县M40，其与中期早段的河北定县三盘山122号汉墓形制相似，都由墓道、前室和后室构成，前室和后室又分为东、中、西三室，可能有一定的继承关系。后室外层是用六层木枋一横一顺叠垒而成，其中室的后部放置棺，东、西室放置随葬品，与回廊结构类似，报告中称为“黄肠题凑”，但分析其结构应该是“黄肠题凑”的雏形，可见该墓是在继承当地文化传统的同时向规整的“黄肠题凑”葬制发展。

这一时期出现了石质材料的椁，像河北高庄汉墓在最外围用石板砌筑石椁，石椁内再建造木椁；安徽六安双墩一号汉墓有两重椁，内椁为石椁，东端有对开式门。石质葬具最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使用，但没有成为主流。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在墓圹内利用积石加固椁的现象，高庄汉墓的石椁应该是由此发展而来。木质棺椁的发展与普及对石椁产生了影响，六安双墩一号汉墓的石椁应该是受木质椁的影响，用加工整齐的石板拼合而成，石板之间接缝处采用凸、凹形榫卯方式构筑，也有一对开式门，石椁内壁髹黑漆，在北壁上端石板上有红色云纹彩绘，与这一时期的木椁相类似。

西汉晚期的诸侯王墓从墓葬形制来看，“黄肠题凑”葬制由盛转衰，有的诸侯王墓已不再使用规整的“黄肠题凑”结构，如江苏泗阳大青墩汉墓没有使用“黄肠题凑”葬制，湖南长沙望城风篷岭汉墓虽然在墓室外侧垒砌一周题凑，但是墓室内部结构却与“黄肠题凑”葬制完全不同。定陶汉墓是个例外，墓主人是王后丁姬，《汉书·成帝本纪》载：“建平二年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上曰闻夫妇一体。诗云：‘榖则异室，死则同穴。’昔季武子成寝，杜氏之殡在西阶下，请合葬而许之……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圆。遂葬定陶。发陈留、济阴近郡国五万人穿復土。”另，《汉书·外戚传》载：“遣大司马骠骑将军明东送葬于定陶，贵震山东。”汉哀帝是以“天子之制”殡葬其母，可能更讲究礼制，所以定陶汉墓形制更为规整，在墓室外围、回廊内侧、中室四周垒砌三重黄肠题凑，与一般诸侯王墓不同。墓葬以前、中、后室为中轴线，南北两侧的侧室呈对称配置的布局，与西汉时期崖洞墓的形制相类似。

晚期的棺椁构造形制吸收使用了一些中小型砖室墓的特点。像大青墩汉墓的棺室内有东西两室，各放一棺，西侧葬泗水王，东侧葬王后，实行夫妻同墓合葬，而已发现的

西汉帝陵和诸侯王陵均为异穴合葬。西汉中期的中小型砖室墓实行夫妻同穴合葬，出现双棺室，如南阳市唐河县电厂汉墓、济南市平阴县新屯M2，都有双棺室，诸侯王墓吸收使用了这一特点。直到东汉时期，诸侯王墓也有实行夫妻同墓合葬的现象，墓中有双棺室，如江苏邗江甘泉东汉广陵王刘荆墓。这一时期，随着诸侯王墓的全面衰落，墓葬宅地化的表现特征也减少，但是并未消失，棺椁仍然放置在象征寝殿的后室或中室，但有棺无椁，如风篷岭汉墓、大青墩汉墓、定陶汉墓在棺室中均只发现了棺，没有椁。到东汉时期，诸侯王墓也是在后室放置棺，而没有椁，说明西汉诸侯王墓从椁墓向室墓发展的过程中，在棺椁构造方面，椁的概念逐渐淡化，或者是将棺室作为椁。

五、结　　语

西汉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促进了丧葬礼制的发展，墓葬形制由传统的竖穴密闭“椁墓”转变为新型的横穴开通“室墓”，在其变化、发展和形成的过程中，以诸侯王墓为代表的大型墓葬起到了主导和推进的作用，从它们开始转变，随后影响波及中小型墓葬。在这次划时代变革中，诸侯王墓的棺椁构造形制也发生了演变，本文根据其发展演变序列，结合文献纪年，分为早、中、晚三期来认识棺椁构造形制的特点，以探究其演变过程和规律。西汉早期阶段，诸侯王墓的棺椁构造形制主要是继承本地区文化传统，北方诸侯王墓多使用箱形椁，南方诸侯王墓则保留战国楚墓的椁内分箱特征，存在着地域性差异。同时又出现了新的特点，即在椁壁外垒砌“题凑”，以扩大椁内空间，加固椁结构。中期随着传统竖穴密闭型“椁墓”向横穴开通型“室墓”的转变，“题凑”结构逐步脱离椁壁成为“黄肠题凑”葬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墓葬的宅第化倾向也不断加强，棺椁组合放置于象征居室的主体建筑中。这时期的椁多是造墓时于墓室内事先垒好，根据室墓横入式的入葬方式，前端挡板开设双扇门，下葬时推入棺。后期“黄肠题凑”葬制衰落，棺椁构造吸收使用一些中小型砖室墓的特点，出现夫妻同墓合葬的双棺室。墓葬宅第化特征减少，但棺椁仍然放在象征寝殿的后室或中室，一般有棺无椁，直到东汉时期，诸侯王墓也是在后室只放置棺，没有椁。说明西汉诸侯王墓在从“椁墓”向“室墓”的转化过程中，棺椁构造形制里椁的概念逐渐淡化，抑或是将棺室作为椁。

注　　释

[1] 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03．

[2] 石家庄市图书馆考古小组．河北石家庄北郊西汉墓发掘简报［J］．考古，1980（1）：52～55．

[3]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简牍博物馆．湖南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0（4）：4～35．

[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考古文集［G］．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5]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象鼻嘴一号西汉墓［J］．考古学报，1981（1）：111～130.
[6]　山东省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巨野红土山西汉墓［J］．考古学报，1983（4）：471～499.
[7]　刘瑞．巨野红土山西汉墓墓主新考［N］．中国文物报，2008-02-29（007）.
[8]　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J］．考古，2013（10）：3～68.
[9]　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二号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3（1）：25～66.
[10]　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长沙咸家湖西汉曹𡡉墓［J］．文物，1979（3）：1～16.
[11]　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省文物局，长清县文化局．山东长清县双乳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J］．考古，1997（3）：1～9.
[12]　刘瑞，刘涛．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鹿泉市文物保管所．高庄汉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1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考古重要发现（1949～2009）［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1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 40 号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1（8）：1～10.
[16]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研究（第 17 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17]　梁白泉．高邮天山一号汉墓发掘侧记［J］．文博通讯，1980（32）：36～38.
[18]　国家文物局主编．2000 中国考古重要发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19]　大葆台汉墓发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葆台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20]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望城县文物管理局．湖南望城风篷岭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7（12）：21～41.
[21]　何旭红．湖南望城风篷岭汉墓年代及墓主考［J］．文物，2007（12）：56～60.
[22]　黎石生．湖南望城风篷岭一号汉墓的年代与墓主［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1）：148～155.
[23]　江苏省大青墩汉墓联合考古队．泗阳大青墩泗水王陵［J］．东南文化，2003（4）：28～31.
[24]　黄展岳．泗阳大青墩汉墓论证会纪要［J］．东南文化，2003（4）：30～35.
[25]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菏泽市文物管理处，定陶县文管处．山东定陶县灵圣湖汉墓［J］．考古，2012（7）：60～67.
[26]　赵化成．国学研究（第五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7]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1979（1）：1～31.
[2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29]　同［1］.

Study on the Structure of Inner and outer Coffins in the Princes' Tombs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Chen Hailin

Abstract: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re was a change in the shapes of Princes' tombs, from vertical earthen pit tomb to horizontal cave chambered tomb, accordingly the structure of inner and outer coffins changed.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these changes. First, it defines the concept of inner and outer coffins so as to remove the obstacles to research. And then, classifies the tombs into three periods by the structure of inner and outer coffins. Finally, discusses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and rules basing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ner and outer coffins structure.

Keywords: Western Han Dynasty; Princes' tombs; the structure of inner and outer coffins

北魏平城墓葬分期标准探讨

倪润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100871）

一、北魏平城墓葬分期研究现状

北魏平城墓葬经过多年的积累，特别是近 20 年来的快速增长，展示了大量的新信息，弥补了 5 世纪墓葬演变发展的缺环，已成为南北朝考古研究的热点之一。其中出土了一些纪年墓葬，但大批的无纪年墓葬需要进一步判断年代。这就需要建立起一套墓葬分期标尺。目前，对北魏平城墓葬进行过系统分期的，只有大同南郊北魏墓群。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位于大同市电焊器材厂扩建工地，1988 年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联合发掘，实际清理北魏墓葬共 167 座。墓地保存状况良好，墓葬分布密集，排列有序，出土北魏时期遗物 1000 余件。2006 年，考古发掘报告《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出版，完整展示了这批墓葬资料。报告分析了墓葬形制、墓道方向、墓葬之间的层位关系、随葬品、装饰纹样等年代要素，并与已发表的墓葬资料进行年代对比，由此将北魏墓葬分为五个期段（表一）。第一段为迁都平城之前，即 398 年以前的墓葬，共计 3 座；第二段约为迁都平城初期，即道武帝天兴元年（398 年）至太武帝统一黄河流域之前（439 年）的墓葬，共计 33 座；第三段约为太武帝统一黄河流域之后（439 年）至太和初年（477 年）左右的墓葬，共计 60 座；第四段约为太和初年（477 年）至迁洛（496 年）以前的墓葬，共计 41 座；第五段为迁洛（496 年）以后的墓葬，共计 9 座；另有 21 座墓葬无陶器，暂未定期段[1]。

2011 年，论文《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研究》发表，它从陶器特征和组合入手，对大同南郊墓群进行重新分组和分期，提出新的五期段说，把大部分墓葬分别归入五组，每组为一期（表一）。第一组有 4 座墓葬，年代最早，绝对年代待定；第一、二过渡组有 8 座墓葬，绝对年代待定；第二组有 20 座墓葬，有 5 世纪 30 年代的纪年；第二、三过渡组有 20 座墓葬，年代在 5 世纪中期左右；第三组有 77 座墓葬，有 5 世纪 70 ~ 80 年代的纪年，下限应不晚于 500 年，约为 5 世纪晚期；另有 38 座墓葬没有分组分期[2]。

表一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与《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研究》墓葬分期比较

期段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	分组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研究》
第一段	M24、M73、M227	第一组	M1、M73、M81、M185
第二段	M1、M9、M41、M45、M49、M52、M54、M63、M74、M86、M97、M108、M139、M162、M170、M180、M185、M195、M197、M203、M204、M205、M206、M210、M211、M212、M226、M228、M230、M235、M236、M240、M246	第一、二过渡组	M3、M6、M28、M35、M49、M180、M226、M240
第三段	M3、M6、M7、M8、M13、M15、M17、M18、M19、M22、M28、M33、M35、M38、M42、M43、M46、M50、M51、M56、M57、M65、M66、M75、M79、M81、M95、M102、M103、M105、M106、M107、M109、M112、M113、M114、M116、M124、M126、M128、M129、M132、M133、M149、M150、M153、M156、M157、M192、M194、M199、M207、M208、M214、M215、M216、M221（早）、M225、M229、M253	第二组	M13、M38、M45、M52、M56、M78、M86、M105、M108、M151、M153、M203、M204、M205、M206、M216、M228、M229、M230、M253
第四段	M14、M20、M23、M36、M40、M48、M53、M67、M72、M78、M80、M82、M83、M84、M85、M87、M89、M92、M99、M101、M121、M130、M134、M136、M137、M140、M141、M147、M151（早）、M168、M175、M181、M186、M187、M191、M209、M222、M224、M233、M238、M243	第二、三过渡组	M19、M41、M48、M54、M65、M67、M103、M107、M124、M129、M156、M157、M170、M187、M195、M208、M215、M225、M227、M235
第五段	M26、M39、M68、M77、M110、M117、M127、M146、M239	第三组	M7、M8、M9、M14、M15、M17、M18、M20、M22、M23、M24、M26、M33、M36、M39、M40、M42、M43、M46、M50、M53、M57、M68、M72、M75、M77、M79、M82、M83、M84、M85、M87、M89、M92、M97、M99、M101、M102、M106、M109、M110、M112、M113、M114、M116、M117、M121、M127、M128、M130、M132、M133、M134、M136、M140、M141、M147、M149、M150、M175、M181、M191、M194、M197、M199、M209、M211、M214、M221、M222、M224、M233、M236、M238、M239、M243、M246
未分期	M4、M11、M21、M30、M31、M34、M37、M55、M62、M64、M69、M90、M93、M135、M148、M163、M171、M183、M189、M193、M232	未分组	M4、M11、M21、M30、M31、M34、M37、M51、M55、M62、M63、M64、M66、M69、M74、M80、M90、M93、M95、M126、M135、M137、M139、M146、M148、M162、M163、M168、M171、M183、M186、M189、M192、M193、M207、M210、M212、M232

这两项研究对大同南郊北魏墓葬的分组和分期差异明显，虽然都进行了陶器的类型学分析，但得出的年代判断结果不同。给分期造成如此不确定性的最主要的客观原因是这批墓葬本身没有发现一座纪年墓葬，其他的分期参照也相当不充分。2002 ~ 2004 年整理发掘报告且进行分期研究时，所对照的平城及周边地区的纪年墓葬有大同地区的太和元年（477 年）宋绍祖墓[3]、太和八年（484 年）司马金龙夫妇墓[4]、太和十四年（490 年）入葬的冯太后永固陵[5]、正始元年（504 年）封和突墓[6]、永平元年（508 年）元淑夫妇合葬墓[7]，以及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太和二十三年（499 年）姚齐姬墓[8]。这些墓葬的年代集中分布在 5 世纪晚期至 6 世纪初。发掘报告显然缺乏 5 世纪早、中期平城纪年墓葬的参照。稍晚发表的论文有了太延元年（435 年）沙岭北魏壁画墓[9]作为对照，才增强了对 5 世纪 30 年代平城墓葬特征的把握。在平城 100 年左右的时段内，发掘报告分出五期，各期以迁都、改元、统一等政治事件的时间为界，并不是与墓葬文化演变相贴切的最好选择。论文依然分为五期，但放弃了按政治事件划界的做法，所分第一组和第一、二过渡组的墓葬，在没有纪年墓葬支撑的情况下均不做绝对年代的推测。

本文试图对分期问题再次进行探讨，相比前两项研究，本次能获得的有利条件是纪年墓葬又增加了，有太安三年（457 年）尉迟定州墓[10]、和平二年（461 年）梁拔胡墓[11]、天安元年（466 年）叱干渴侯墓[12]、太和八年（484 年）杨众庆墓[13]。这样纪年墓葬大致可以贯穿 5 世纪的早、晚期。不过要进行更准确的分期，当前的纪年墓葬的数量还是不够的。某一时段的孤例墓葬能否反映该时段墓葬的文化全貌是存疑的。而且部分纪年墓葬出土的陶器不多或很少，并不能涵盖非纪年墓葬陶器的多样性。因此，本文从墓向、砖室墓形制、陶器形制、陶俑与模型明器、墓葬图像等多个方面来综合探讨北魏平城墓葬的分期标准，目的是把握平城墓葬的演变趋势，也将尝试重新划分期段，但各期段分界的年代还不易确定。

二、分期标准的多角度分析

以下从多个方面对北魏平城墓葬的分期标准进行分析。

1. 墓向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指出，平城时代在平城地区，越是早期的墓葬，墓道方向朝西或朝其他方向的比例就大一些；越是晚期的墓葬，墓道方向朝南的比例越大[14]。这种墓向由坐东朝西向坐北朝南转变的时间节点，实际上已经可以把握。沙岭壁画墓坐东朝西，年代为太延元年（435 年）；尉迟定州墓亦坐东朝西，年代为太安三年（457 年）。到梁拔胡墓时，墓向转为坐北朝南，该墓年代为和平二年（461 年）。此后，天安元年（466 年）叱干渴侯墓、太和元年（477 年）宋绍祖墓、太和八年（484 年）司马金龙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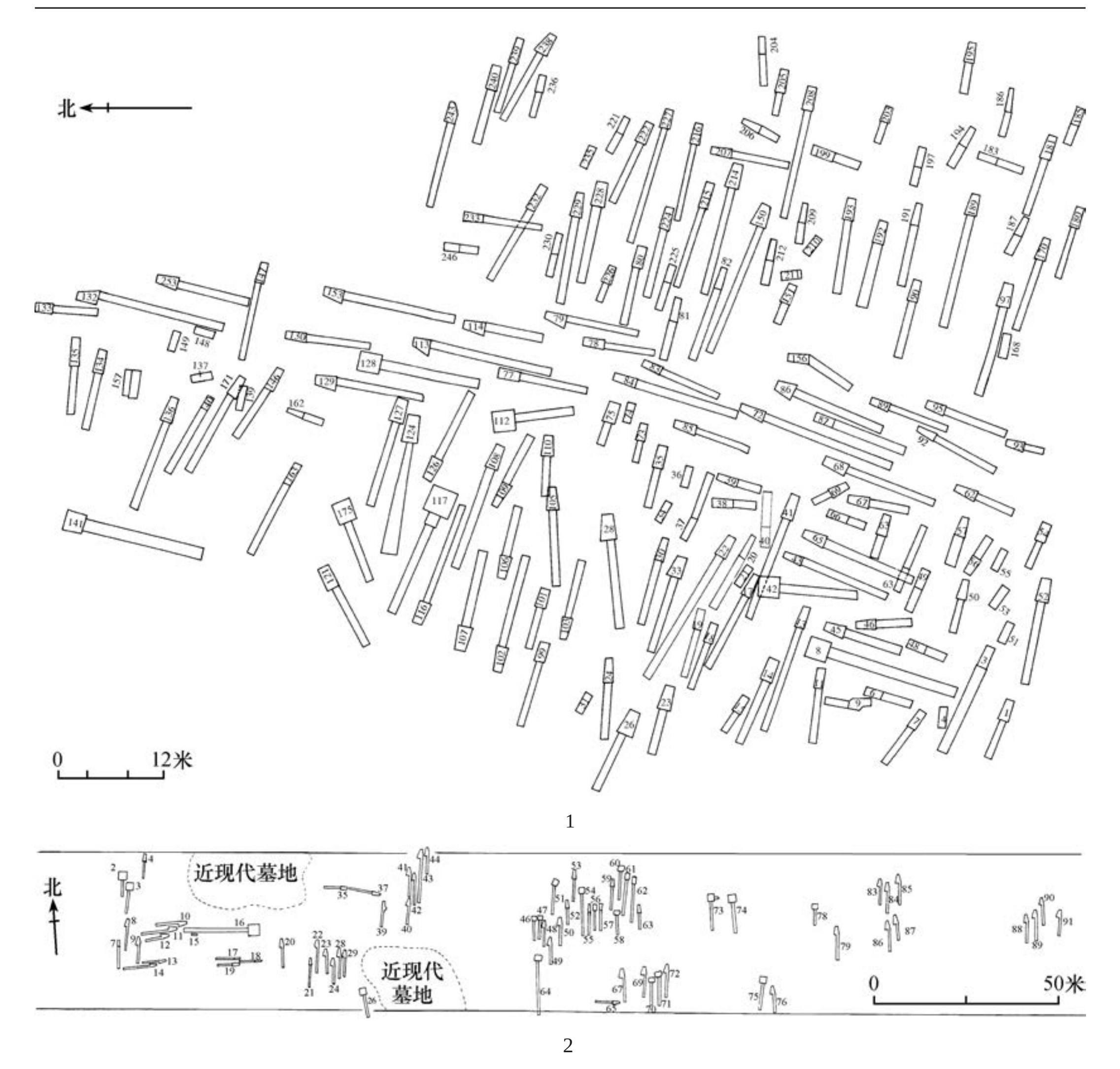
妇墓、太和十四年（490 年）入葬的冯太后永固陵[15]等都是坐北朝南。可以清楚地看到，在 457 ~ 461 年墓向由朝西转向了朝南。

墓道西向是拓跋旧俗的一种体现，来源于对檀石槐鲜卑葬俗的继承。在拓跋兴起的呼伦贝尔地区，墓葬的主流朝向是北向，其次是西向，东向仅有 1 例，没有南向；在中原王朝北部边疆地带的鲜卑相关墓葬中，北向墓葬仍是主流，但西向墓葬的比例和出现墓地的数量大大增加[16]。其中东大井墓地[17]、三道湾墓地[18]、下黑沟墓葬[19]、郝家窑墓葬[20]等西向墓葬所占比例很高的墓地，都是檀石槐鲜卑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因此，墓葬西向是檀石槐鲜卑的葬俗特色之一。在拓跋力微重振部落，并在檀石槐旧根据地建立新的鲜卑联盟的过程中，很大程度地依靠了檀石槐鲜卑遗部的力量，也由此吸收了檀石槐鲜卑的西向葬俗。南向则是中原汉文化墓葬的主要特征，受晋制墓葬文化的影响。

在平城地区的北魏墓地中，西向的墓葬与南向的墓葬通常各自集中分布，分区明显，并不混乱。例如，大同南郊墓群中较早出现的是西向墓葬，形成了东、西两区，中间本留有狭长的空地；后来，南向的墓葬埋进来，主要占据了中间的空地，只有少量墓葬埋入东、西区墓葬的间隙，有几座墓打破了西向墓葬（图一，1）。还有迎宾大道墓地中，南向墓葬集中分布在多片，东、中、西三区都有，西向墓葬则基本集中在西区，夹在两片南向墓葬之间（图一，2）[21]。这说明无论是西向墓葬还是南向墓葬，都是整齐划一地分布着，而不是多种墓向并存，明显受到了国家礼制的规划和调控。因此，墓道从西向到南向的转变是国家礼制发生重大转变的信号，是拓跋旧俗被晋制文化更替的表现。

2. 砖室墓形制

目前平城地区的北魏墓葬形制可分为竖穴土坑墓、竖井墓道土洞墓、长斜坡墓道土洞墓、长斜坡墓道砖室墓等几种。其中竖穴土坑墓在拓跋的早期发展阶段流行，到平城地区后日益被淘汰，其他三种形制在平城的兴起都与河西因素的影响有关[22]。而长斜坡墓道砖室墓中出有纪年墓葬，可窥其演变阶段。沙岭壁画墓为长斜坡墓道砖砌单室墓，墓室平面呈弧长方形（图二，1）；尉迟定州墓为长斜坡墓道砖砌单室墓，墓室平面呈弧长方形，趋向接近弧方形（图二，2）；梁拔胡墓为长斜坡墓道砖砌单室墓，墓室平面呈弧方形（图二，3）；宋绍祖墓为长斜坡墓道砖砌单室墓，墓室平面呈弧方形（图二，4）。此后，司马金龙夫妇墓（图二，5）、冯太后永固陵（图二，6）虽为双室砖砌墓，前室仍为方形或近方形，后室均为弧方形，司马金龙夫妇墓前室带有一个侧室，也是弧方形。这样，我们发现砖室墓形制变化的节点仍在尉迟定州墓与梁拔胡墓之间，与墓向变化一致。



图一　北魏平城墓地分布图举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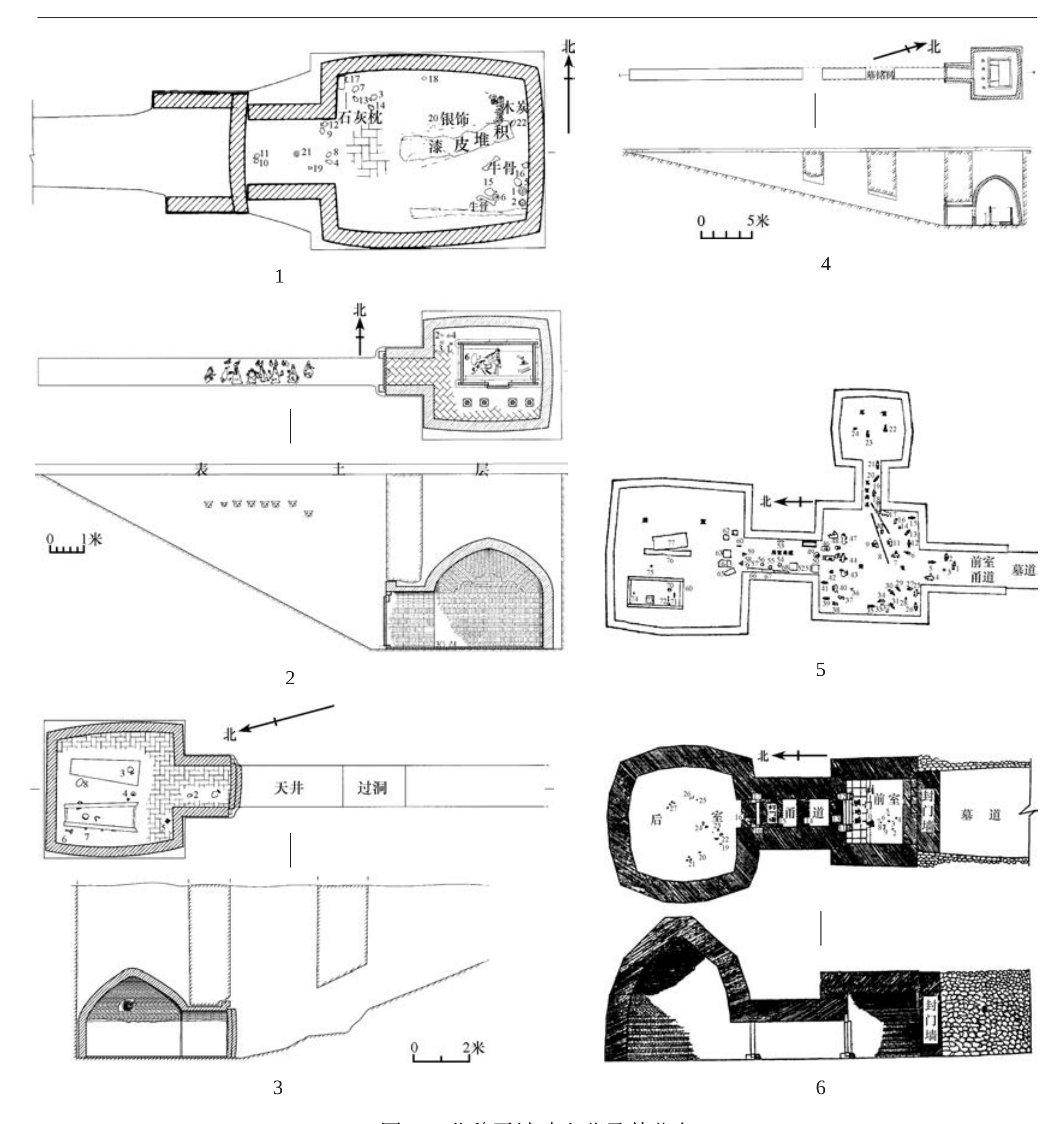
1.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　2. 大同迎宾大道墓地

3. 陶器形制

北魏平城墓葬陶器的种类主要为各种罐、壶。从形制上较容易观察到年代特征的陶器可分为两组。

第一组以平沿罐、盘口罐、平沿壶为代表。

沙岭壁画墓出有平沿罐、平沿壶，均为宽平沿，鼓腹，腹部最大径居中。无釉平沿罐除了颈、肩结合部饰一周凹弦纹外，还在腹部饰多周凹弦纹（表二，1）；无釉平沿壶在颈、肩结合部饰两周凹弦纹，腹部则以三周凹弦纹间隔两周水波纹（表二，3）；有釉平沿壶只在颈、肩结合部饰两周凹弦纹（表二，4）。还出有无釉盘口罐，素面，短颈，鼓腹，腹部



图二 北魏平城砖室墓及其墓向

1. 沙岭壁画墓 2. 尉迟定州墓 3. 梁拔胡墓 4. 宋绍祖墓 5. 司马金龙夫妇墓 6. 永固陵

最大径居中，盘口还不甚规范（表二，2）。尉迟定州墓出有无釉盘口罐和有釉平沿壶。无釉盘口罐的盘口已很标准，短颈，鼓腹，腹部最大径居中，通体饰有纹饰，比沙岭壁画墓复杂，口沿外饰一周短斜线戳点纹，颈、肩结合部饰一周凹弦纹，腹部饰两周凹弦纹，颈部饰锯齿状暗纹，肩部饰网格暗纹，下腹部饰竖线暗纹（表二，5）。有釉平沿壶的形制与沙岭壁画墓相同，纹饰也很简单，只在颈、肩结合部和肩部各饰一周凹弦纹（表二，6）。

梁拔胡墓出有无釉平沿罐和有釉平沿罐、有釉平沿壶，均为宽平沿向外微斜，鼓腹，腹部最大径提升到上腹部。其中，一件无釉平沿罐在颈、肩结合部，肩部和上腹部各饰一

周忍冬纹带，忍冬纹带上下各有一周凹弦纹，颈部、下腹部饰锯齿状暗纹（表二，7）。一件有釉平沿罐和一件有釉平沿壶仍保持着以往的素净风格，仅在颈、肩部饰数周凹弦纹（表二，8；表二，9）。也有新的突破出现在另一件有釉平沿壶上，除了在上腹部饰三周凹弦纹外，还在肩部贴饰一周八瓣的浮雕莲花纹（表二，10），将纹饰由阴刻转为浮雕。

叱干渴侯墓出有1件无釉盘口罐，盘口规范，短颈，鼓腹，腹部最大径居中，口沿外饰一周戳点纹，肩部饰一周凹弦纹和一周戳点纹（表二，11）。相比沙岭壁画墓、尉迟定州墓的盘口罐，此罐变得较矮胖，继续保留戳点纹特征。

宋绍祖墓所出无釉盘口罐仍如叱干渴侯墓那样矮胖，短颈，鼓腹，腹部最大径提升到上腹部，从颈部到下腹部饰八周凹弦纹，其间加饰三周水波纹（表二，12）。

到司马金龙夫妇墓时，盘口罐变得较沙岭壁画墓、尉迟定州墓的更显修长，鼓腹，腹部最大径提升到上腹部，肩部饰两周凹弦纹夹一周索绹纹，腹部饰竖线暗纹（表二，13）。

永平元年（508年）元淑夫妇墓所出盘口罐的形制与司马金龙夫妇墓的近同，纹饰则不近同：有的颈部、肩部饰竖线暗纹，下腹部饰网状暗纹（表二，14）；有的腹部饰锯齿状暗纹（表二，15）；有的肩部饰四周凸弦纹（表二，16）。

表二　北魏平城地区墓葬第一组陶器

墓葬＼陶器	平沿罐	盘口罐	平沿壶
沙岭壁画墓	1	2	3　4
尉迟定州墓		5	6
梁拔胡墓	7　8		9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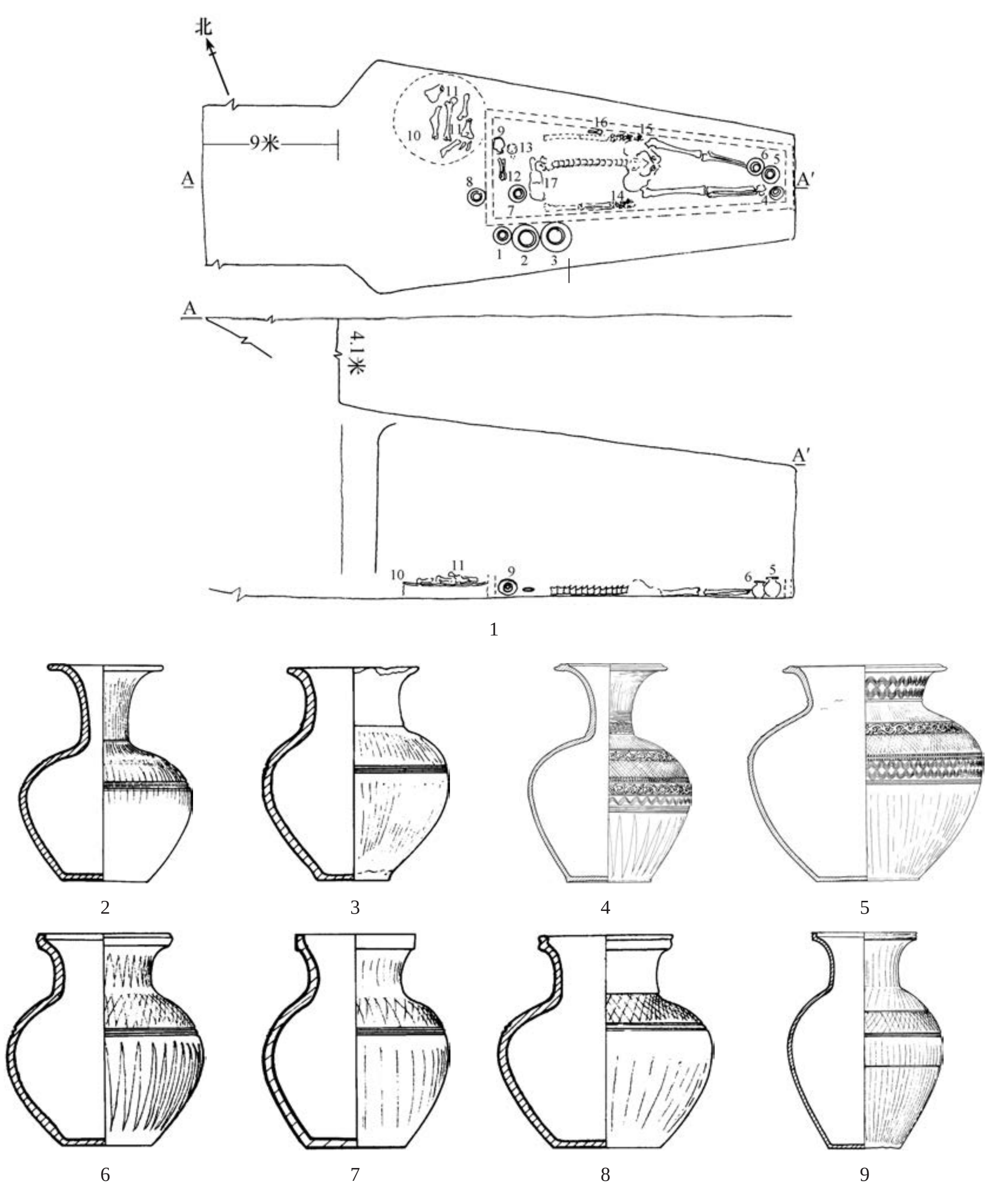
续表

墓葬 \ 陶器	平沿罐	盘口罐	平沿壶
叱干渴侯墓		11	
宋绍祖墓		12	
司马金龙夫妇墓		13	
元淑墓		14 15 16	

依据以上诸墓葬陶器特征的变化，可以看到平城陶器的形制和纹饰所呈现出的演变阶段。平沿罐、平沿壶的宽沿由完全水平变为向外倾斜，变化节点在尉迟定州墓与梁拔胡墓之间。盘口罐则显示出整体形制由短颈、修长，变为短颈、矮胖，再变为长颈、修长的二次变化过程。第一次变化或与平沿罐、平沿壶一致，第二次变化节点则在宋绍祖墓与司马金龙夫妇墓之间。纹饰方面，弦纹、水波纹、暗纹出现得比较早，也延续到较

晚阶段，忍冬纹、莲花纹出现在尉迟定州墓与梁拔胡墓之间，索绹纹出现在宋绍祖墓与司马金龙夫妇墓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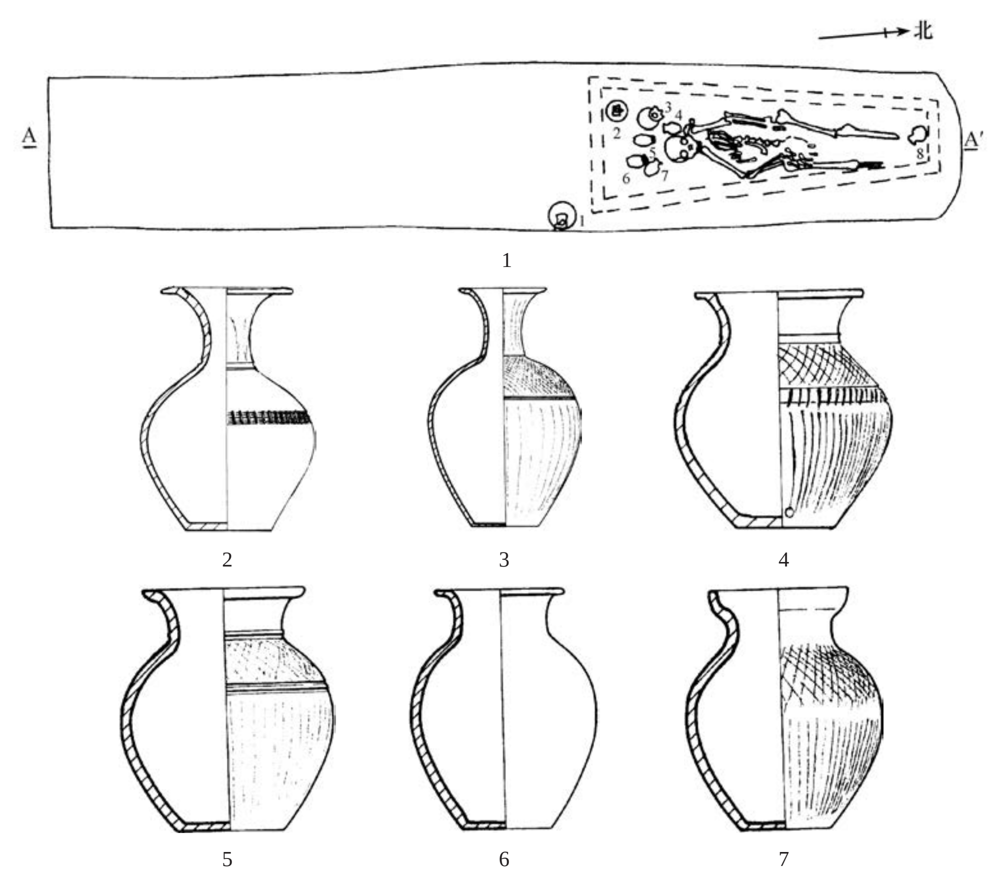
在大同南郊墓群中，我们看到一些墓向与陶器特征呈现早、晚混合的墓葬。例如，M14[23]，墓向为坐东朝西（图三，1），属于较早的时代特征；宽平沿完全水平



图三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 M14 墓葬形制与出土陶器

1. M14 平、剖面图　2、4. 平沿壶　3、5. 平沿罐　6 ~ 9. 盘口罐

的平沿壶（图三，2）、平沿罐（图三，3），以及体型呈中等比例的盘口罐（图三，6、7），都属于较早的时代特征；而宽平沿向外倾斜的平沿壶（图三，4）、平沿罐（图三，5）及器表装饰的忍冬纹，还有体型矮胖的盘口罐（图三，8）、体型修长的盘口罐（图三，9），都属于较晚的时代特征。还有 M38[24]，墓向为坐北朝南（图四，1），属于较晚的时代特征；宽平沿向外倾斜的平沿壶（图四，2）也属于较晚的时代特征；而宽平沿完全水平的平沿壶（图四，3）、平沿罐（图三，4 ~ 6），以及体型呈中等比例的盘口罐（图四，7），都属于较早的时代特征。这样的混合型墓葬应在尉迟定州墓、梁拔胡墓时代前后，为 5 世纪 50 年代晚期至 60 年代。



图四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 M38 墓葬形制与出土陶器

1. M38 平面图　2、3. 平沿壶　4 ~ 6. 平沿罐　7. 盘口罐

第二组以短口沿广口罐、非平沿中口罐为代表。

这类陶罐在大同南郊北魏墓群中出现的并不多，只有 M24[25]、M73[26]、M185[27]、M212[28]、M227[29]等墓葬出土。这几座墓均为坐东朝西的斜坡墓道土洞墓，墓室平面呈长梯形。这些陶罐遗留了东汉至魏晋时期早期鲜卑陶器的特征。M227 所出素面短口沿广口罐（表三，3），器形与山西原平市北贾铺墓地 M15：3（表三，1）[30]、内蒙古察右

后旗三道湾墓地 M105∶1（表三，2）[31]的相近，皆为纵长鼓腹，侈口，口沿很短。另外还有一些非平沿中口罐，如 M24∶7（表三，6）、M212∶3（表三，7），均为素面，与山西右玉县善家堡墓地 M2∶1（表三，4）[32]、内蒙古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墓地 DM14∶1（表三,5）[33]的相似；M73∶3(表三,8）是以素面为底，饰上了网状暗纹；M73∶6(表三,11）、M185∶8（表三，12）均在颈、肩结合部饰两周戳点纹，与内蒙古察右后旗赵家房村墓地出土陶罐（表三，9）[34]、山西朔县王吉峁地墓葬 M1∶1（表三，10）[35]的器形、纹饰相近。这些陶罐在沙岭壁画墓均未见到，推测相关墓葬的年代应比沙岭壁画墓偏早。

表三　北魏平城地区墓葬第二组陶器及相关比较

陶器 / 器型	早期鲜卑墓葬陶器	北魏平城墓葬第二组陶器
短口沿广口罐	1　2	3
非平沿中口罐	4　5 9　10	6　7　8 11　12

4. 陶俑和模型明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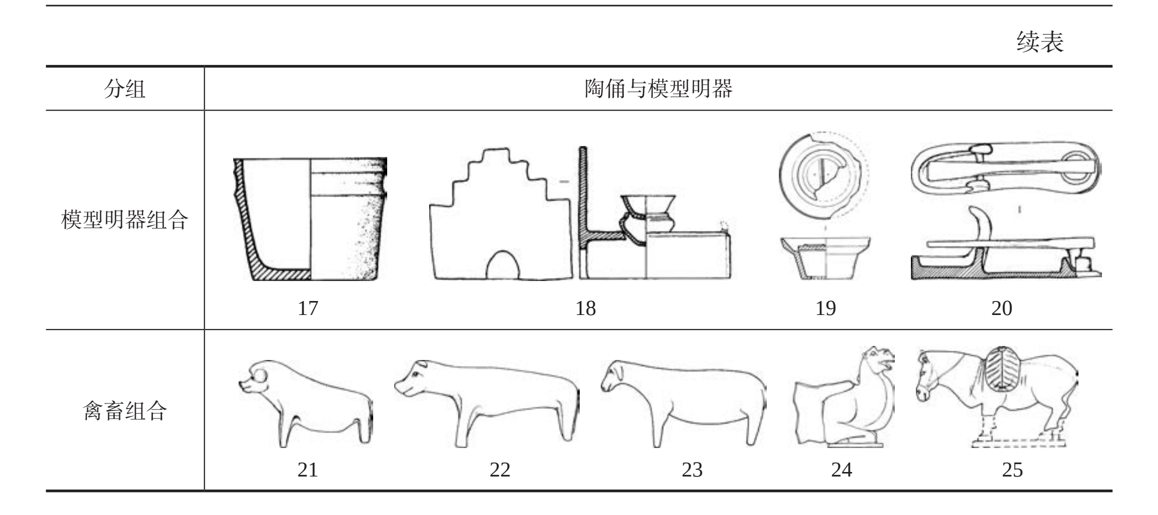
沙岭壁画墓、尉迟定州墓、梁拔胡墓均未出土陶俑和模型明器。到宋绍祖墓时，出了一批成规模的陶俑和模型明器，共 153 件。从功能角度，可将它们分为四组：第一组为镇墓组合，包括镇墓武士（表四，1、2）、镇墓兽（表四，3）；第二组为侍从仪仗组合，包括男侍俑（表四，4～6）、女侍俑（表四，7）、步兵俑（表四，8）、甲骑具装俑（表四，9）、鸡冠帽骑马鼓吹男乐俑（表四，10）、胡人站立伎乐俑（表四，11～14）、牛车（表四，15）、鞍马（表四，16）；第三组为模型明器组合，包括井（表四，17）、灶（表四，18）、磨（表四，19）、碓（表四，20）；第四组为禽畜组合，包括猪（表四，21）、狗（表四，22）、羊（表四，23）、驼（表四，24）、驴（表四，25）。这四组的框架是对西晋墓葬文化的继承[36]。西晋亡后，中原北方地区只有关陇地区还在发展陶俑和模

型明器，十六国时期俑群的内容大大丰富了，但缺少镇墓组合；430 年北魏占领关中之后，才将镇墓组合重新恢复[37]。从 435 年沙岭壁画墓的情况看，关陇地区的陶俑和模型明器没能被及时引进到平城，而且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在平城获得发展。再看宋绍祖墓的陶俑，造型已经相当成熟，组合完整，做工也细致，显然不是平城刚刚出现陶俑的情况。陶俑传入平城的时间应比宋绍祖墓早。

表四　北魏宋绍祖墓陶俑与模型明器分组

分组	陶俑与模型明器
镇墓组合	1　2　3
侍从仪仗组合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续表

分组	陶俑与模型明器
模型明器组合	 17　18　19　20
禽畜组合	21　22　23　24　25

田村北魏墓[38]，大同县湖东北魏墓M11[39]，雁北师院北魏墓M2、M52[40]，文瀛路北魏壁画墓[41]，阳高县下深井北魏墓[42]，大同县陈庄北魏墓[43]，司马金龙夫妇墓等也都出有陶俑和模型明器。其中，田村北魏墓的镇墓组合尚存武士俑（图五，1）；侍从仪仗组合尚存站立侍俑（图五，2～5）、跽坐侍俑（图五，6）、牛车（图五，7）等；禽畜组合尚存狗（图五，8）、骆驼（图五，9）；模型明器组合有井（图五，10）、碓（图五，11）、磨（图五，12）、灶（图五，13）、箕等，组合基本完整，造型和做工则显稚拙。该墓为长斜坡墓道单室砖墓，坐东朝西，墓室平面呈弧方形，朝向与尉迟定州墓相同，墓葬形制与梁拔胡墓相同。所出陶壶为宽平沿，特征早于梁拔胡墓那种口沿稍外斜的陶壶。这表明该墓年代或可到5世纪50年代晚期，大致处于平城模仿关中制作陶俑的初始阶段，技艺不精而显稚拙。

5. 墓葬图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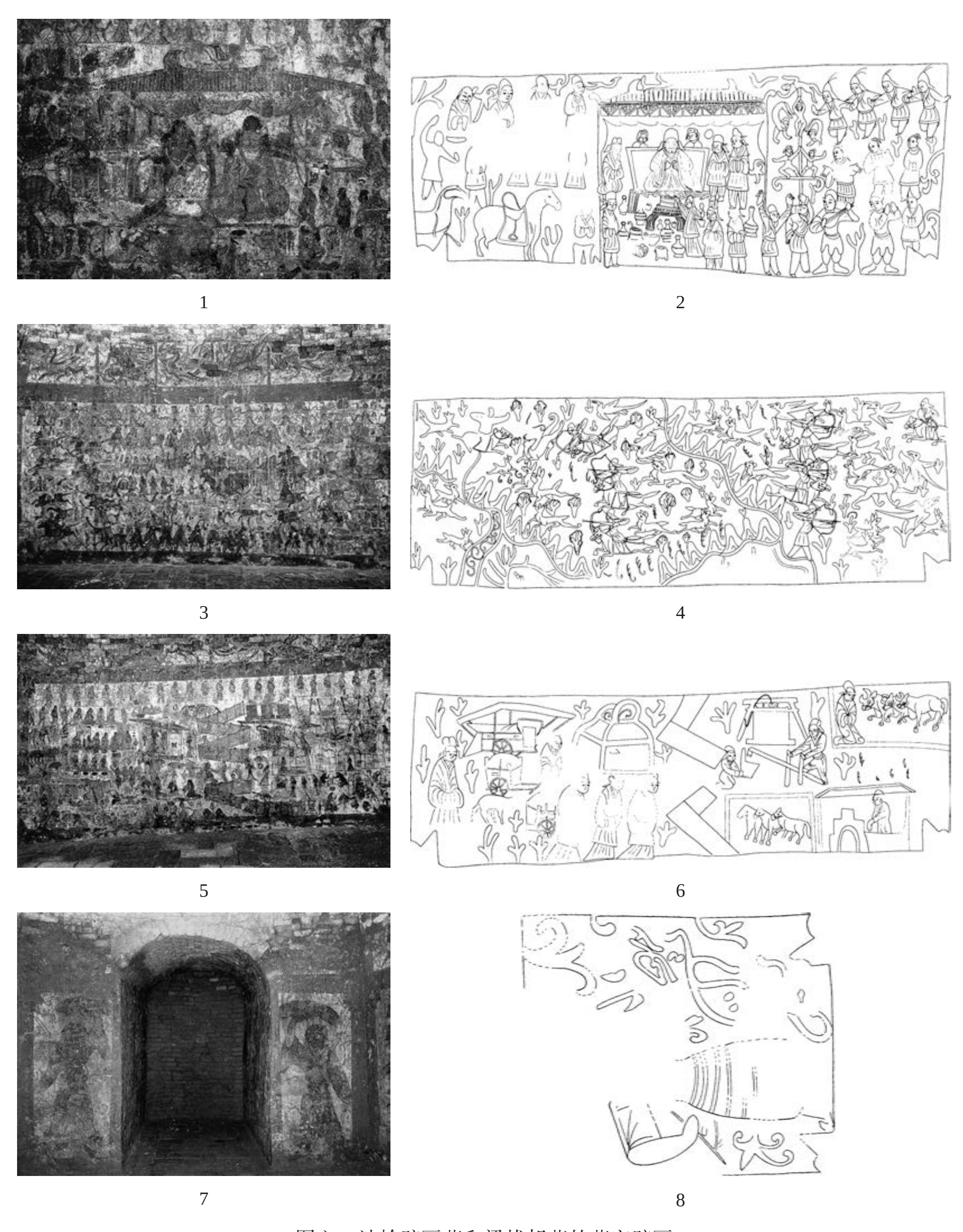
墓葬图像主要为墓室壁画和葬具图像。

沙岭壁画墓是目前所知北魏最早的纪年壁画墓。从该墓到26年后的梁拔胡墓，都体现着一套相同的墓室壁画模式。其核心是出现在墓室后壁正中的墓主夫妇并坐或男墓主正坐宴饮图（图六，1、2），墓主人位于建筑物悬挂的帷幔之下，坐于榻上，背后设有屏风，榻前设案及食具，旁有侍者；墓主人正坐宴饮图并非孤立存在，两侧还有与之相配的画面，沙岭壁画墓两侧绘有大树，右侧还绘有鞍马、侍从，梁拔胡墓左侧绘鞍马、侍从，右侧绘杂耍乐舞。墓室两侧壁的画面也是围绕墓主人生活展开的，一侧壁绘车马出行图或山林狩猎图（图六，3、4），另一侧壁绘庄园生活图（图六，5、6）。墓室前壁，沙岭壁画墓在甬道口两侧各绘一持刀、举盾的武士（图六，7），梁拔胡墓也绘门吏武士（图六，8）。甬道的壁画内容最不稳定，伏羲、女娲、青龙、白虎、侍女等题材均有出现。没有纪年的云波里路壁画墓，坐东朝西，墓葬建构虽遭严重破坏，但从残存的壁画看，仍能判断其符合上述壁画模式，其年代应在沙岭壁画墓与梁拔胡墓的年代之间。



图五　田村北魏墓的陶俑与模型明器

1. 武士俑　2 ~ 5. 站立侍俑　6. 跽坐侍俑　7. 牛车　8. 狗　9. 骆驼　10. 井　11. 碓　12. 磨　13. 灶



1　2　3　4　5　6　7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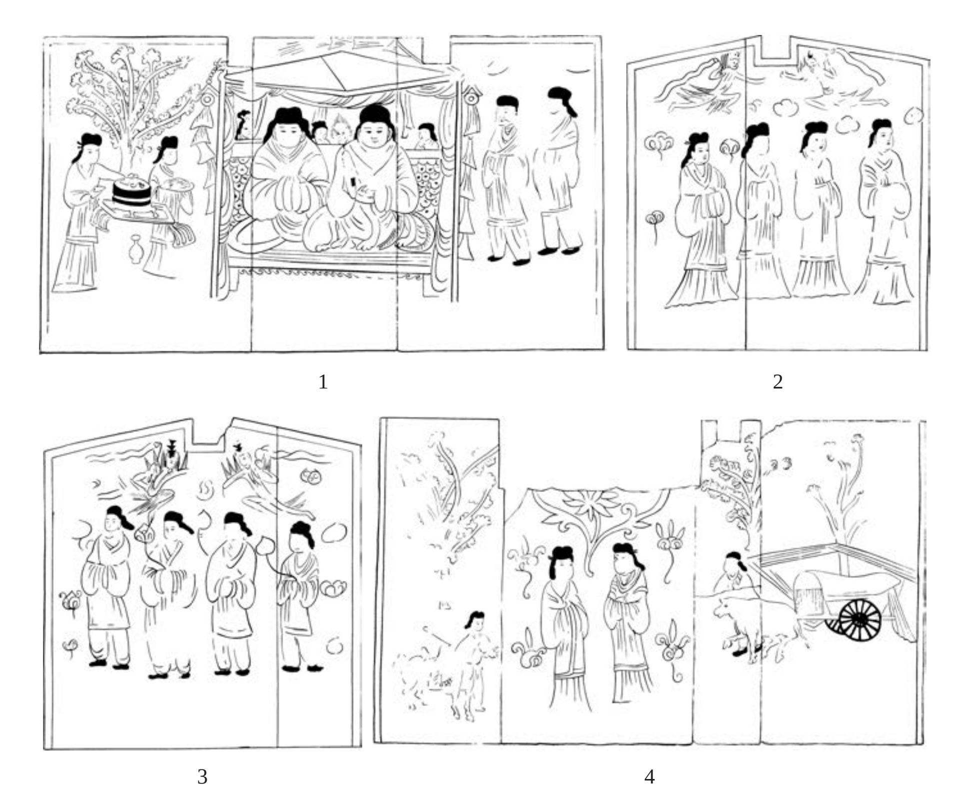
图六　沙岭壁画墓和梁拔胡墓的墓室壁画

1、3、5、7．沙岭壁画墓　2、4、6、8．梁拔胡墓

上述墓室壁画模式也出现在同时期的墓葬棺画上。沙岭壁画墓的彩绘漆棺，经复原，前挡绘墓主夫妇并坐宴饮图，右侧板绘庄园生活图，左侧板绘车马出行图[44]，与该墓壁画题材是一致的。大同智家堡棺板画墓残存三块彩绘棺板[45]，A 板画左侧绘车马出行图，右侧绘山林狩猎图，中间以“S”形的山水间隔，是将壁画中二选一的两个题材并列在一起，且用壁画的常规手法设计了河流作为分隔线；B、C 两块板画有帷屋、庖厨、奉食、侍从、车舆等内容，共同构成庄园生活图。这三块棺板对应了墓室两侧壁壁画的内容。大同南郊墓群 M229 出有 7 块棺板残片，其中较为完整的一块是左侧棺板，内容是山林狩猎图[46]。大同南郊墓群 M253 仅存右侧棺板，分左右两部分，其间以曲折的围障分割，内容为庄园生活图[47]。

梁拔胡墓之后，已知的平城纪年墓再未见到上述模式的壁画，尤其是太和元年（477 年）后，宋绍祖墓、司马金龙夫妇墓、冯太后永固陵等高等级墓葬都不在墓室四壁绘壁画，表明此时的墓室壁画确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先前的壁画模式时期形成明显的年代区别。

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具有过渡性质的墓葬。智家堡石椁壁画墓[48]的墓室四壁没有绘壁画，但在屋形石椁的内壁绘了壁画；梁架及顶部绘莲花、忍冬纹；北壁正中绘墓主人夫妇在帏帐中并坐于榻，旁有男女侍仆、树木、奉食图（图七，1）；西壁上部绘二羽人持幡，下部绘四女侍（图七，2）；东壁上部也绘二羽人持幡，下部绘四男侍持莲蕾



1　2　3　4

图七　智家堡石椁壁画墓的石椁壁画

1．石椁内北壁壁画　2．石椁内西壁壁画　3．石椁内东壁壁画　4．石椁内南壁壁画

（图七，3）；南壁绘牛车、鞍马、男女侍仆、树木、忍冬纹（图七，4）。这所有的内容实际上只是先前壁画模式中后壁的题材。宋绍祖墓石椁内也绘有壁画，与智家堡石椁壁画墓相比更加简单，墓主人图像消失，可看清的是北壁、西壁上绘有奏乐、舞蹈人物。从简化的趋势看，智家堡石椁壁画墓应晚于梁拔胡墓，早于宋绍祖墓。因此，5 世纪 60～70 年代中期或是墓葬图像演变的过渡期。

随着墓葬图像的进一步衰落，石椁葬具的顶部和四壁也被撤除，仅余下底部的石棺床。而石棺床上的常见图案是忍冬纹、水波纹、联珠纹、莲花纹、兽面等，装饰性题材已经替代人物图像成为主体。司马金龙墓的石棺床上，就雕刻着忍冬纹、水波纹、联珠纹、莲花纹、托举力士、伎乐童子、凤鸟、虎、狮子、龙、人首鸟等。大同南郊墓群 M112 的石棺床上，雕刻着忍冬纹、水波纹、莲花纹、兽面、插花净瓶[49]。七里村 M14 的石棺床上，雕刻着忍冬纹、水波纹、莲瓣纹、人物和铺首衔环等[50]。

三、北魏平城墓葬的分期尝试

综合以上五种分期标准，可发现北魏平城墓葬文化有三个主要的变化节点：一是 5 世纪 30 年代中期；二是 5 世纪 50 年代晚期；三是 5 世纪 80 年代中期。据此，可将北魏平城墓葬的演变划分为四期（表五）。

表五　北魏平城墓葬的分期标准与期段划分

年代 / 文化特征	5 世纪 20 年代及以前	5 世纪 30 年代	5 世纪 40 年代	5 世纪 50 年代	5 世纪 60 年代	5 世纪 70 年代	5 世纪 80 年代	5 世纪 90 年代及以后
墓向								
砖室墓形制								
平沿罐、盘口罐、平沿壶								
短口沿广口罐、非平沿中口罐								
陶俑和模型明器								
墓葬图像								
分期	一期		二期			三期		四期

第一期　5 世纪 30 年代中期以前。

这个界线目前是基于沙岭壁画墓所处的 5 世纪 30 年代中期所做的判断，应该还可以向稍早的时段前移。本期的墓葬文化特征还不是很清晰。从墓向上来说，西向应已确立为墓葬的统一朝向。这是与北魏西郊祭祀制度的确立是相适应的。西郊祭祀正式确立于道武帝天兴元年（398 年），完善于道武帝天赐二年（405 年）[51]。也就是说，墓地中各墓葬统一规划为西向是能到道武帝时期的。另外，短口沿广口罐、非平沿中口罐与东汉魏晋时期的早期鲜卑陶器相似，是鲜卑旧俗的体现和延续，应当出现在平城墓葬的最早阶段。

第二期　5 世纪 30 年代中期至 50 年代中期。

本期表现出的文化特征比较明确。墓向基本上为西向。长斜坡墓道砖室墓的墓室平面呈弧长方形，不过宽度较大，并非窄长。陶器中，平沿罐、盘口罐、平沿壶开始流行，皆为鼓腹，腹部最大径居中；平沿罐、平沿壶均为完全水平的宽平沿，盘口罐体型比例中等；器表纹饰偏向简洁素净，或素面，或仅饰凹弦纹，或凹弦纹配水波纹等。墓室壁画形成一套以墓主人为中心的新模式，墓室后壁正中绘墓主人正坐宴乐图，一侧壁绘庄园生活图，另一侧壁绘车马出行图或山林狩猎图，前壁绘门吏或门神；棺画的格局与壁画基本一致。

第三期　5 世纪 50 年代晚期至 80 年代中期。

本期上限以 457 年尉迟定州墓、461 年梁拔胡墓为参照，下限以 484 年司马金龙墓为参照。这个时期实际上是新、旧特征混合的过渡期，有些墓葬中并存两种文化特征。文化特征的演变趋势是：墓向越来越多地由西向转为南向；长斜坡墓道砖室墓的墓室平面日益发展成弧方形或方形。平沿罐、平沿壶的宽平沿由完全水平变为向外微斜，盘口罐由中等比例向矮胖或修长两个方向发展；器表纹饰偏向繁复，仅饰凹弦纹或凹弦纹配水波纹的装饰方法仍存在，但周数增多；流行通体饰磨光暗纹，新出现忍冬纹、莲花纹等纹饰。墓葬图像上，墓室壁画日益简化、衰退，并向葬具转移，与人物相关的图像越来越少，墓主人图像消失。新出现陶俑和模型明器组合。

第四期　5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

在本期，第二期旧有的文化特征消失，第三期出现的新文化特征继续发展，并在陶器和墓葬图像方面出现新的变化。盘口罐流行修长体型、通体饰磨光暗纹，新出现索绳纹。墓室内和葬具上绘制的壁画基本消失，葬具图像进一步简化，以装饰性的浮雕图案占主导，趋势也是消失。

附记：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长城地带鲜卑墓葬研究”（项目编号：17ZDA08）的研究成果。

注　释

［1］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472．

［2］ 韦正．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研究［J］．考古，2011（6）：72～87．

［3］ a．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1（7）：19～39．

b．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刘俊喜主编．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71～162．

［4］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J］．文物，1972（3）：20～33．

［5］ 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J］．文物，1978（7）：29～35．

［6］ 大同市博物馆，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墓清理简报［J］．文物，1983（8）：1～4．

［7］ 大同市博物馆．大同东郊北魏元淑墓［J］．文物，1989（8）：57～65．

［8］ 郑隆．内蒙古包头市姚齐姬墓［J］．考古，1988（9）：856，857．

［9］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6（10）：4～24．

［10］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阳高北魏尉迟定州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1（12）：4～12．

［1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南郊仝家湾北魏墓（M7、M9）发掘简报［J］．文物，2015（12）：4～22．

［12］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迎宾大道北魏墓群［J］．文物，2006（10）：50～71．

［13］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发掘简报［J］．文物，2006（10）：25～49．

［14］ 同［1］：466，467．

［15］ 同［5］．

［16］ 倪润安．光宅中原：拓跋至北魏的墓葬文化与社会演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145．

［17］ 李兴盛．商都县东大井墓地［A］．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55～102．

［18］ a．乌兰察布博物馆．察右后旗三道湾墓地［A］．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407～433．

b．杜承武，李兴盛．察右后旗三道湾墓地［A］．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16～54．

［19］ 郭治中，魏坚．察右前旗下黑沟鲜卑墓及其文化性质初论［A］．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434～437．

[20] 托克托县博物馆. 呼和浩特托克托县郝家窑鲜卑墓葬的清理[J]. 草原文物，2014(2)：36，37.
[21] 同[12].
[22] 同[16]：142～144.
[23] 同[1]：137～142.
[24] 同[1]：36～39.
[25] 同[1]：159～161.
[26] 同[1]：66～68.
[27] 同[1]：86，87.
[28] 同[1]：110，111.
[29] 同[1]：311，312.
[3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原平市博物馆. 原平北贾铺东汉墓葬发掘简报[A]. 三晋考古（第三辑）[C].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262～285.
[31] 同[18].
[32] 王克林，宁立新，孙春林，胡生. 山西省右玉县善家堡墓地[J]. 文物季刊，1992(4)：1～21.
[33]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通辽民族博物馆. 内蒙古南宝力皋吐鲜卑墓地发掘简报[J]. 华夏考古，2010(2)：3～11.
[34] 盖山林. 内蒙古察右后旗赵家房村发现匈奴墓群[J]. 考古，1977(2)：139～141.
[35] 雷云贵，高士英. 朔县发现的匈奴鲜卑遗物[A]. 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1)[C].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140～147.
[36] 杨泓. 北朝陶俑的源流、演变及其影响[A]. 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C].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268.
[37] 同[16]：184，185.
[38]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山西大同南郊区田村北魏墓发掘简报[J]. 文物，2010(5)：4～18.
[3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山西大同县湖东北魏墓（M11）发掘简报[J]. 文物，2014(1)：28～36.
[40] 同[3]b：27～70.
[41]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山西大同文瀛路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J]. 文物，2011(12)：26～36.
[42]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山西大同下深井北魏墓发掘简报[J]. 文物，2004(6)：29～34.
[4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山西大同市大同县陈庄北魏墓发掘简报[J]. 文物，2011(12)：37～46.
[44] 曹丽娟. 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研究[D]. 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10～19.
[45] 刘俊喜，高峰. 大同智家堡北魏墓棺板画[J]. 文物，2004(12)：35～47.
[46] 同[1]：316～318.
[47] 同[1]：332～334.

［48］　王银田，刘俊喜．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壁画［J］．文物，2001（7）：40，50．
［49］　同［1］：350，351．
［50］　同［13］．
［51］　杨永俊．论北魏的西郊祭天制度［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56～62．

Discussion on staging criteria of the Northern Wei tombs in Pingcheng

Ni Run'an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stage of Northern Wei tombs in Pingcheng has not been solved. From some aspects of the burial directions, brick tomb shapes, potteries, figurines and funerary objects, images etc, we discuss the staging criteria of the Northern Wei tombs in Pingcheng, and grasp theirs evolvement trends.We think that the burial culture of Northern Wei in Pingcheng has experienced three major changes. They occurred successively in the middle of 30s, the late of 50s and the middle of 80s of fifth century. Therefore, we divide the Northern Wei Tombs in Pingcheng into four periods.

Keywords: tombs in Pingcheng；Northern Wei Dynasty; staging criteria

中国境内发现的下颌托及其相关研究

王飞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100710）

近年来，随着一批来自中亚、西亚人群墓葬（安伽墓[1]、史君墓[2]、虞弘墓[3]和康业墓[4]等）的发现，中西交流及相关研究再次成为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下颌托便是其中一个较受关注的器物。2007年至今笔者先后拜读了国内外多位先生的与下颌托相关的大作，结合笔者的学习体会，浅谈与下颌托有关的几个问题，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一、研　究　史

根据已有的考古资料，早在1953年陕西西安市曾发现一件北魏铅质下颌托（当时称“下颚托”）[5]，但是并不知道其用途，有学者认为其可能是刑具，这是目前我们可以知道的国内最早见于正式考古报道的下颌托[6]。迄今为止，国内已经发现了许多先秦至元代的下颌托，从数量和地域等方面来看，其已经具备了研究的条件。目前最早对下颌托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当属王银田和王雁卿先生等[7]，他们在整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的过程中发现167座北魏墓葬中12座随葬品较为丰富的墓葬发现了金属下颌托（以铜质下颌托为主，兼有银质和铅质下颌托），报告结语部分对下颌托的形制、使用人群及当时国内发现下颌托的情况进行了全面梳理，并结合口腔的生理特征等将其称为“下颌托”。德国慕尼黑大学宋馨教授[8]在《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发现的下颌托做了系统研究，特别是对国外收藏的北魏及唐代下颌托、希腊地区的金属下颌托及希腊陶瓶上发现的两例与“下颌托”有关的图像进行了报道，丰富了国内学者关于这一器物的研究地域和空间。德国学者 Sonjia Filip[9]在研究唐代李倕墓出土冠饰及装饰品的同时对唐代发现的部分下颌托也进行了探讨，认为这是当时一种较为特殊的葬俗。冯恩学先生[10]在搜集吐尔基山辽墓下颌托及国内下颌托的基础上认为下颌托的使用可能与萨满教或袄教有关。吴小平和崔本信先生等[11]则对三峡地区及国内各区域出土的下颌托进行了形制、年代和源头等多方面的研究，并同意宋馨教授的观点，认为下颌托的使用可能与萨满教有关。王春燕、佰嘎

力先生[12]对国内出土下颌托进行资料整理的同时，再次重申了冯恩学先生的观点，即认为下颌托的使用与祆教有关。付承章先生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使用下颌托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下颌托的使用可能与萨满教相关，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护魂[13]。王银田、王亮先生[14]在回顾下颌托研究的同时通过对琐罗亚斯德教及祆教的出现和传播、中国境内纺织品下颌托和金属下颌托的发现等相关研究，认为下颌托的出现和使用与祆教无关。王维坤、赵今先生则基于目前关于下颌托的研究对中国境内下颌托的性质和来源进行了研究[15]。此外周大成先生[16]从医学等角度对考古发现的几例中国古代下颌托进行了探讨。

二、中国境内发现的下颌托

中国境内发现的下颌托主要有玉质下颌托、纺织品下颌托和金属下颌托三类，其中玉质下颌托发现于西周晚期至战国早期，数量较少；纺织品下颌托主要流行于汉魏南北朝时期，地域多在今新疆地区，其质地主要包括丝织物、棉织物、麻织物和绢织物等；金属下颌托主要流行于北魏至元代，表现出以京畿地区为中心向四周地区扩散的趋势。其中金属下颌托又包括金、银、铜、铜鎏金和铅五大类。在探讨与下颌托相关的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将对国内发现的下颌托资料进行叙述，中国境内下颌托的发现情况见表一 ~ 表三。

目前国内已经发现西周晚期至战国早期的玉质下颌托实物，分别见于山西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M31、M64 和 M91）[17]、陕西韩城市梁带村芮国墓地（M27）[18]和湖北省随州市曾侯乙墓[19]等。晋侯墓地 M31 出土玉覆面及下颌托见图一的 1。这一时期的下颌托是与玉覆面一起使用的，虽然目前发现的先秦时期玉覆面的数量较多，但是发现的下颌托数量较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出土玉覆面的墓葬多数被盗，随葬品残缺不全，这是发现较少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在没有被盗的出土玉覆面的大墓中，发现的下颌托也极少，晋侯墓地、芮国墓地和曾侯乙墓出土下颌托的墓葬其墓主人或为一国之君，或为国君夫人。因此我们认为先秦时期使用玉质下颌托的人群不但地位极高，而且使用玉质下颌托可能存在着比玉覆面更加严格的规定。先秦时期的下颌托形制基本相同，大体为半圆形，下颌托四个角或四个角的内侧及立面上各有一个穿孔。台湾地区也收藏有此类下颌托（图一，2）[20]，依其形制及纹饰判断时代大体在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应当是当时大陆地区的诸侯国国君或国君夫人墓葬的被盗品。曾侯乙墓发现的下颌托（图一，3）形制大体为半圆形，但是两端呈尖状，两尖端各有一个对穿的小钻孔，内凹面经过抛光，外表面粗糙，未经抛光。已经发掘的战国中晚期国君或国君夫人级别的墓葬多数被盗，是否使用下颌托尚不能确定。两汉时期玉衣制度流行开来，帝王级别的墓主人在下葬时整个头部完全被玉片包裹起来，已经没有单独使用下颌托的必要性了。

表一　中国境内发现的玉质下颌托

编号	所在地	墓号及墓葬形制	墓主人	年代（时代）	随葬品	出处
1	山西省曲沃县	晋侯 M31，单墓道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晋献侯夫人	西周晚期	玉颌饰、玉覆面、组玉佩、三鼎二簋等	《文物》1994 年第 8 期，第 27 页，图七
2	山西省曲沃县	晋侯 M64，单墓道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晋穆侯费王	西周晚期	玉颌饰、玉覆面、组玉佩、五鼎四簋等	《文物》1994 年第 8 期，第 4 页
3	山西省曲沃县	晋侯 M91，单墓道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晋靖侯宜臼	西周晚期	嘴部玉饰、玉覆面、组玉佩、七鼎五簋等	《文物》1995 年第 7 期，第 10 页，图一〇
4	陕西省韩城市	梁代村芮国 M27，双墓道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芮桓公	春秋早期	玉晗、组玉佩、七鼎六簋、编磬、“山”形青铜器等	《赫赫宗周——西周文化特展》第 258 页，图 146
5	湖北省随州市	曾侯乙墓，多边形竖穴土坑墓	曾侯乙	战国早期	琀玉、编钟、编磬、青铜鉴、金杯、九鼎八簋等	《曾侯乙编钟》（上），第 91 页，图 3-71

表二　中国境内发现的纺织品下颌托

编号	所在地	墓号及墓葬形制	墓主人	年代（时代）	随葬品	出处
6	新疆且末县	札滚鲁克 85M2，竖穴土坑棚架墓	一男三女合葬，其中一男一女尸体保存较好	约公元前 800 年西周时期	毛线绳（2）、毛织物、皮靴、弓矢、骨角器、马鞍具等	《新疆文物》1998 年第 3 期，第 6 页，文字描述
7	新疆且末县	札滚鲁克 89M2，土坑墓	婴儿	公元前 8 世纪		转引自宋馨文章
8	克里雅河下游			约前 1000 年		转引自宋馨文章
9	新疆洛浦县	84LSIM01，刀形竖穴土坑墓	133 人丛葬，其中成年男女占多数，小孩较少	西汉晚期东汉早期	护领罩（2+）、陶罐、木盆、木钵、木盘等	《中国新疆山普拉——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图 426
10	新疆洛浦县	84LSIM24，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8 人合葬	东汉早期 ~ 东晋	护领罩（5+）、头带、木盆、木盘、核桃、麦粒等	《中国新疆山普拉——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图 316、图 317、图 429、图 430、图 436

续表

编号	所在地	墓号及墓葬形制	墓主人	年代（时代）	随葬品	出处
11	新疆洛浦县	84LSIM49，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16人合葬，其中成年男女占多数	东汉早期—东晋	护颌罩（5+）、陶罐、陶纺轮、木盆、木碗等	《中国新疆山普拉——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图427、图428、图431、图432、图433
12	新疆尉犁县	营盘M15，长方形箱式木棺墓	可能一位是来自西方从事贸易的富商	东汉中晚期	绢带、麻质面具、毛织品、丝织品等	《文物》1999年第1期，封二
13	新疆尉犁县	营盘M18，竖穴土坑墓	幼儿	东汉魏晋	绢带、覆面、帛鱼饰、木篦、木钵、佩囊等	《文物》2002年第6期，第8页，文字描述
14	新疆尉犁县	营盘M26，竖穴二层台墓	成年女性	东汉魏晋	绢带、项链、毡镜袋、铁镜、木杯、木篦、木纺轮等	《文物》2002年第6期，第13页，图一四
15	新疆尉犁县	营盘M22，竖穴二层台墓	老年女性	东汉魏晋	绢带、耳坠、皮囊、铁镊子、帛鱼、木杯、面饼等	《文物》2002年第6期，第17页，图一八
16	新疆尉犁县	营盘M14，竖穴二层台墓	女性（30岁左右）	东汉魏晋	下颌系带、覆面、漆耳杯、铁剪刀等	《文物》2002年第6期，第15页，图一六
17	新疆尉犁县	营盘M19，竖穴土坑墓	成年男性	东汉魏晋	下颌系带、覆面、木梳、木篦、皮囊、佩囊等	《文物》2002年第6期，第7页，图四
18	新疆尉犁县	营盘M6，圆角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成年女性	东汉魏晋	勒口带、额带、覆面、漆奁、漆粉盒、夹砂陶罐、木盘等	《考古》2002年第6期，第59页，图二
19	新疆尉犁县	营盘M8，不规则圆角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夫妇合葬墓	东汉魏晋	勒口带、额带、覆面（2）、铜戒指、木盘、铁刀等	《考古》2002年第6期，第65页，文字描述
20	新疆尉犁县	营盘M13，圆角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夫妇上下叠葬	东汉魏晋	勒口带、额带、覆面（2）、漆奁、木杯、铁镞等	《考古》2002年第6期，第68页，文字描述
21	新疆尉犁县	营盘M59，长方形竖穴二层台偏室墓	成年女性	东汉魏晋	勒口带、额带、覆面、铁剪刀、铜镊、木盘等	《考古》2002年第6期，第72页，文字描述
22	新疆民丰县	尼雅M5，船棺墓	青年女性	东汉魏晋	黄色绢带、覆面、铜镜、木盆、小木桶等	《新疆文物》1998年第2期，第25页，文字描述

续表

编号	所在地	墓号及墓葬形制	墓主人	年代（时代）	随葬品	出处
23	新疆民丰县	95MN1M8，箱式木棺墓	夫妻合葬	东汉魏晋	素绢带（男）、铜镜、木栉、弓矢、皮制品、丝织品等	《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图版八十三，1
24	新疆民丰县	95MN1M4，箱式木棺墓	男 -A（四人叠葬、上为男 -A，下为中年女性、老年男、幼儿）	东汉魏晋	布袋（男 -A）、木器、石器、铁器、铜器、皮质物等	《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 111 页，文字描述
25	新疆民丰县	95MN1M6，船棺墓	中年女性（附葬一婴儿）	东汉魏晋	黄褐色毛布、木杯、纺轮、料珠等	《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图版百五，2
26	新疆民丰县	97MN1M2，	老年男性（56 岁以上）	东汉魏晋		《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图版百五，3
27	新疆民丰县	95MN1M1，船棺墓	双人叠葬（青壮年男性和中年女性）	东汉魏晋	长耳披绢帽（2）、耳环、项链、木叉等	《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图版八十七，2
28	新疆民丰县	95MN1M5，船棺墓	青年女性	东汉魏晋	黄色绢带、项链、陶器、铁器、铜器、木器等	《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 123 页，文字描述
29	新疆和田县	伊玛目·木沙·卡孜木麻扎墓地 82HBYM1，竖穴土坑墓	12 岁左右女童	上限不早于唐代，下限五代至北宋初	白绢带、彩绘木棺、嵌宝石铜戒指、绯绫连衣裙等	《考古与文物》2002（Z），第 53 页，文字描述
30	新疆和田县	伊玛目·木沙·卡孜木麻扎墓地 83HBYM1，竖穴土坑墓	中年女性	上限不早于唐代，下限五代至北宋初	白绢带、彩绘木棺、红绢裙、刺绣布鞋、白棉布袜、鸡鸣枕等	《考古与文物》2002（Z），第 62 页，图一一
31	新疆和田县	伊玛目·木沙·卡孜木麻扎墓地 84HBYM1，竖穴土坑墓	50 岁左右男性	晚唐五代	白绢带、彩绘木棺、白绢长袖短袍、白绫头巾、红绫长方形枕等	《考古与文物》2002（Z），第 56 页，文字描述
32	新疆且末县	扎洪鲁克墓地 89QZM2，长方形竖穴墓	两岁半左右小男孩（为殉葬，位于第二层）	上限距今 3000 年左右，下限不明确	黄色羊毛织带子、陶罐、毛毯、羊皮袋装饰等	《新疆文物》1992 年第 2 期，第 4 页，文字描述
33	新疆且末县	扎洪鲁克墓地 85M2，长方形圆角竖穴墓	60 岁左右女性（1 男 3 女，一名女性有纺织品下颌托）	距今约 3000 年	红色编绦、绛红色长裙、皮靴等	《新疆古尸》，第 73～93 页

表三　中国境内发现的金属下颌托

编号	所在地	墓号及墓葬形制	墓主人	年代（时代）	随葬品	出处
34	山西省大同市	南郊 M24，斜坡墓道土洞墓	女，50～55 岁	398 年以前	铜下颌饰、陶壶、侈口罐、矮领罐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第 161 页，图七七 B，4
35	山西省大同市	南郊 M170，斜坡墓道土洞墓		398～439 年	铜下颌托、釉陶壶、平沿罐、矮领罐等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第 272 页，文字描述
36	山西省大同市	南郊 M211，竖穴土坑墓	女，15～20 岁	398～439 年	铜下颌托、铜耳环、漆器、平沿罐、夹砂戳刺纹罐等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第 24 页，图一六 A
37	山西省大同市	南郊 M35，竖井墓道土洞墓	女，25～30 岁	439～477 年	铜下颌托、铜带扣、银带扣环、绿松石、陶壶等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第 33 页，图二一 A
38	山西省大同市	南郊 M107，斜坡墓道土洞墓		439～477 年	铜下颌托、银罐、鎏金錾花银碗、金耳环、漆耳杯等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第 233 页，图一〇五 G：1
39	山西省大同市	南郊 M109，斜坡墓道土洞墓	女，20～25 岁	439～477 年	铜下颌托、素面银碗、鎏金錾花高足银杯、漆盘等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第 238 页，图一〇七 A
40	山西省大同市	南郊 M116，斜坡墓道土洞墓		439～477 年	铜下颌托、铜铺首、石灯、陶壶、铁釜等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第 245 页，图一〇八 A
41	山西省大同市	南郊 M208，斜坡墓道土洞墓		439～477 年	铜下颌托、铜颈饰、釉陶壶、珠饰、陶罐等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第 291 页，图一二七 A
42	山西省大同市	南郊 M214，斜坡墓道土洞墓	女	439～477 年	铜下颌托、五铢钱、铁镜、漆案、漆碗、铜带扣等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第 300 页，图一二八 D：5
43	山西省大同市	南郊 53，竖穴土坑墓	女，50～55 岁	477～496 年	铅下颌托、银耳环、珠饰、盘口陶罐、平沿陶罐等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第 12 页，图七 A
44	山西省大同市	南郊 M87，斜坡墓道土洞墓	儿童，10～15 岁	477～496 年	铅下颌托、铜指环、陶壶、平沿陶罐、盘口陶罐等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第 197 页，图九三 A
45	山西省大同市	南郊 M239，斜坡墓道土洞墓		496 年以后	铜下颌托、铜带扣环、釉陶壶、珠饰、平沿陶罐等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第 327 页，图一三八 A
46	山西省大同市	迎宾大道 M37，斜坡墓道梯形墓室土洞墓	女性	北魏	铜下颌托、铜带扣、铜指环、陶罐、陶壶、漆盘等	《文物》2006 年第 10 期，第 53 页，图八

续表

编号	所在地	墓号及墓葬形制	墓主人	年代（时代）	随葬品	出处
47	山西省大同市			北魏	银下颌托（征集）	大同市博物馆藏品
48	河南省偃师市	YDIIM926，砖券单室墓		北魏，6世纪初	银下鄂托、铜镜、铜盂、铁剪、金箔饰片、瓷器等	《考古》1991年第9期，第829页，图一五
49	陕西省西安市	任家口M229	邵真，魏阿阳令、假安定太守	北魏正光元年（520年）	银饰具、墓志、镇墓兽、武士俑、陶磨、陶井、漆器等	《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2期，第62页，文字描述
50	陕西省西安市		男	北魏	铅下鄂托等	《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第62页，文字描述
51	内蒙古正镶白旗	伊和淖尔墓地，M1		北魏	鎏金饰件、玻璃器、波斯银碗、金珠、鎏金铺首等	《中国文化遗产》2011（Z），第96、97页
52	内蒙古正镶白旗	伊和淖尔墓地，M3		北魏	下颌托、金项圈、金蹀躞带、铜帐钩、漆器等	中国文物报，2014年8月15日第6版
53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	九龙山，M33		隋末唐初	金颌托、金冠饰、东罗马金币、白瓷杯等	《固原九龙山汉唐墓葬》，图版四六，1
54	陕西省西安市	斜坡墓道土洞墓	贺若厥（女）	唐武德四年（621年）	金圈、墓志、金头饰、金篦、东罗马金币等	《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6期，第51页，图五，3
55	陕西省西安市	金乡县主墓，斜坡墓道土洞墓	金乡县主、于隐合葬墓，大周朝散大夫、行蜀州司法参军	开元十二年（724年）	铜鎏金鄂饰、墓志、鎏金铜头饰、石椁等	《金乡县主墓》，图版126
56	陕西省西安市	韩森寨唐墓，土洞墓	雷姓内侍之妻宋氏	天宝四年（745年）	金下颚饰、墓志、铜镜等	《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第60页，图二
57	陕西省西安市	东郊王三村唐墓		唐代	下颌托等	转引自宋馨文章
58	陕西省西安市	长安风雷仪表厂唐墓		唐代	铜鄂托等	《大唐皇帝陵》，第75页，图40
59	河南省洛阳市	关林70IIIM109，土洞墓	卢夫人，中散大夫、景城郡别驾卢廷芳之女	天宝九年（750年）	铜下颚托、墓志、金银平脱镜等	《考古》1980年第4期，第383页，文字描述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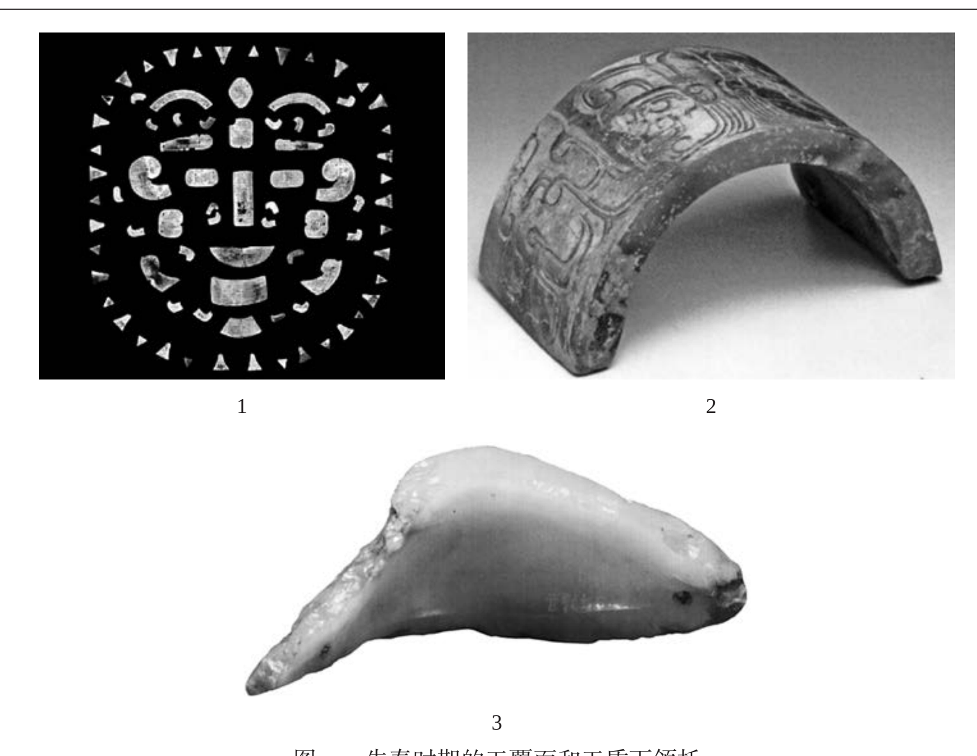
编号	所在地	墓号及墓葬形制	墓主人	年代（时代）	随葬品	出处
60	河南省洛阳市	C5M1542，土洞墓	高秀峰（朝散郎、试左青道率府兵曹参军）、李氏	元和十四年（819年）太和三年（829年）	银下颚托2、墓志、银平脱镜等	《文物》2004年第7期，第61页，图一六：3
61	河南省偃师市	M5109，土洞墓	李全礼（轘辕府折冲都尉、授游击将军）妻郑夫人	天宝五年（746年）	铜下颚托、墓志、开元通宝、瓷盘、滑石器等	《偃师杏园唐墓》，第99页，图84
62	河南省偃师市	YHM3，土洞墓	窦承家，润州丹阳主簿	至德元年（756年）病故，葬年不详	铅下颚托、墓志、开元通宝、玉石器、铜镜等	《偃师杏园唐墓》，第166页，附表三
63	河南省偃师市	M5036，土洞墓	郑洵及夫人合葬墓，监察御史、岳州沅江县尉	大历十三年（778年）	铜下颚托2、墓志、开元通宝、铜镜、铁券等	《偃师杏园唐墓》，第100页，图85
64	河南省偃师市	M2003，土洞墓	韦河，偃师县主簿	大和三年（829年）	铜下颚托、墓志、开元通宝、铜镜、银勺等	《偃师杏园唐墓》，第170页，图156
65	河南省偃师市	M5013，土洞墓	崔防，舒州怀宁县令	会昌二年（842年）	铜颌、墓志、开元通宝、银箸、银杯、铁鍑等	《偃师杏园唐墓》，第252页，续附表三
66	河南省偃师市	M2443，土洞墓	李郃，贺州刺史	会昌三年（843年）	铜下颚托、墓志、开元通宝、银护膝、铜剑、铁牛等	《偃师杏园唐墓》，第171页，图157
67	河南省偃师市	M1819，土洞墓	李归厚亳州鹿邑县主簿	大中十二年（858年）	铜下颚托、墓志、铜镜、银钗、陶罐等	《偃师杏园唐墓》，第175页，图163
68	河南省偃师市	M0954，土洞墓		晚唐	铜下颚托、开元通宝、铜镜、铁剪、陶罐等	《偃师杏园唐墓》，第185页，图177
69	重庆市奉节县	宝塔坪2001IM1006，土洞墓	成年男性	唐代	铜下颌托、开元通宝、乾元通宝、四系罐等	《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上），第440页，文字描述
70	重庆市奉节县	上关IIM34，洞室墓		唐玄宗时期	铜护颌、开元通宝、盘口壶等	《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上），第292页，图一七：4
71	重庆市奉节县	上关IIM44，洞室墓		唐代	铜护颌、开元通宝、盘口壶等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第293页，文字描述

续表

编号	所在地	墓号及墓葬形制	墓主人	年代（时代）	随葬品	出处
72	重庆市奉节县	宝塔坪 M1010，土洞墓		唐代	铜发饰、开元通宝、铜镜、盘口壶、瓜棱罐等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 卷（上），第 542 页，图一九，3
73	重庆市巴东县	雷家坪 2003M1，土坑墓		唐代	银下颌托、墓志、金戒指、铁剑、四系盘口壶等	《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四集》，第 92 页，图五六，1
74	重庆市巫山县	江东嘴 2001IIM5，长方形砖券洞室墓	可能为女性	唐代	银冠饰、开元通宝、金指环、铜镜、釉陶盘口壶、铁剪等	《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 卷（上），第 31 页，图三四，6
75	湖北市秭归县	登天包 2004M6		唐代	银下颌托等	《考古》2010 年第 8 期，第 91 页，文字描述
76	湖北省郧县	M5、M6，斜坡墓道砖室墓（壁画）	李徽、阎婉合葬墓	嗣圣元年（684 年）、天授元年（690 年）	银下颌托 2、墓志、开元通宝等	《文物》1987 年第 8 期，第 31 页，图一；第 38 页，图一六，1
77	广东省广州市	皇帝岗唐墓，木椁墓		晚唐	银下颚托、银头饰、开元通宝、铅块等	《考古》1959 年第 12 期，第 668 页，图一
78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	斜坡墓道土洞墓	史道德	仪凤三年（678 年）	金护额饰、金覆面、墓志等	《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第 90 页，图六五
79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			唐代	金颌饰（1989 年征集品）	《固原文物精品图集》（下册），第 20 页，金覆面
80	四川省成都市	砖筑多室墓	王建（前蜀国王）	前蜀天光元年（918 年）	银颐托、墓志、玉册等	《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图版三七，5
81	山西省大同市	五代贾府君墓，砖筑单室墓	河东道横野军副使	911 ~ 913 年	银下颌托、墓志、铜镜、铜带具、陶器等	《文物》2016 年第 4 期，第 29 页，图八
82	湖北省秭归市	老坟园 2002BM22，土坑墓		北宋	铜构件、政和通宝、咸平元宝、金耳坠、铁钱等	《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卷·第二卷》，第 72 页，图三七

续表

编号	所在地	墓号及墓葬形制	墓主人	年代（时代）	随葬品	出处
83	湖北省秭归市	庙坪 M90，土坑洞室墓		北宋	银下颌托、银头饰、熙宁通宝、政和通宝、瓷罐等	《秭归庙坪》，第 210 页，图一七〇，第 212 页，图一七二
84	重庆市奉节县	宝塔坪 2001IM5001，土坑竖穴墓		北宋	铜下颌托、铜钗、釉陶罐、皇宋通宝、咸平元宝等	《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 卷》（上），第 456 页，文字描述
85	湖南省衡阳市	何家皂宋墓		北宋	银饰、铜镜、铜钱、衣物等	《文物》1984 年第 12 期，第 74 页，图三
86	湖南耒阳县	城关镇 M60，砖室墓		北宋	银下颌托、金耳环、银钗、铜镜、铜钱、魂坛等	《考古学报》1996 年第 2 期，第 267 页，图三四：12
87	湖南耒阳县	城关镇 M277，石椁土坑墓		北宋	银下颌托、铜镜等	《考古学报》1996 年第 2 期，第 259 页，图二二
88	内蒙古通辽市	石室墓		辽代	金属箍、金杯、木棺等	《考古》2004 年第 7 期，第 51 页，文字描述
89	辽宁省凌源市	凌源小喇嘛沟 M1，土圹木室墓（有石棺）	相当于重要节度使一级或高级贵族家族的重要成员	辽圣宗时期	下颌托、银鎏金面具、银鎏金冠、银鎏金带具、瓷器等	《凌源小喇嘛沟辽墓》，第 18 页，图一四
90	安徽省安庆市	砖室券顶墓	范文虎（尚书省右丞商议枢密院事等职）、陈氏合葬墓	大德五年（1301 年）大德九年（1305 年）	银饰、金冠、金花饰、墓志（陈氏）、玉带、墓志等	《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第 5 期，第 54 页，图一九
91	江西省德安县	长方形砖室墓（有石椁）	新太平州通判吴畴妻周氏	咸淳十年（1274 年）	银下颌托、墓志、金头饰、鎏金银香薰、铁镜等	《文物》1990 年第 9 期，第 11 页，文字描述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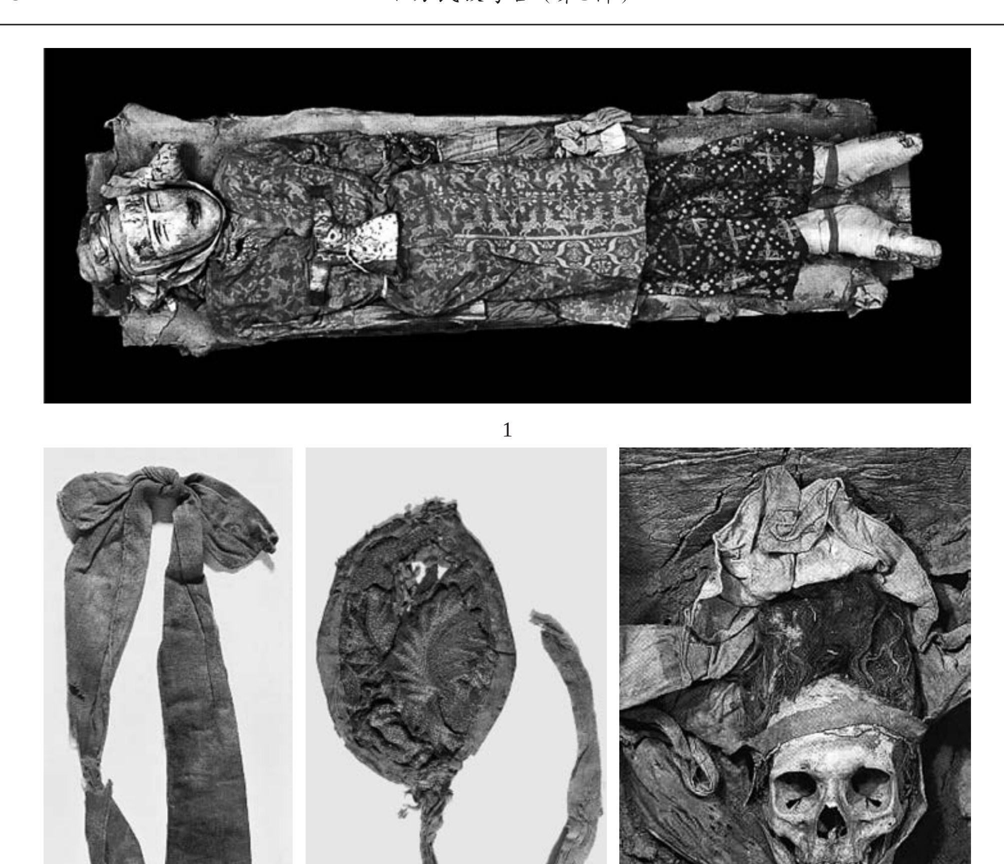
3

图一 先秦时期的玉覆面和玉质下颌托

1. 晋侯墓地玉覆面（M31：73）及下颌托 2. 台湾地区收藏的玉质下颌托 3. 曾侯乙墓下颌托

中国境内发现的纺织品下颌托主要见于今新疆地区，数量较多，主要流行于汉晋时期，部分下颌托的时代可以早到公元前一千纪左右，甚至更早，其年代的下限可能要晚到十六国时期。以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图二，1）[21]、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图二，2、3）[22]、和田县伊玛目木沙卡兹木麻扎墓地[23]、民丰县尼雅墓地（图二，4）[24]、且末县扎洪鲁克墓地[25]等发现的纺织品下颌托较为集中。

国内发现的金属下颌托以当时的京畿地区为中心，同时表现出向周围地区逐渐扩散的特点，此类下颌托从北魏一直延续到元代。北魏下颌托主要见于平城地区（14 例）、西安（2 例）、洛阳（1 例）及内蒙古地区（2 例）。已经发掘的西魏北周、东魏北齐、隋代高级别大墓如咸阳北周武帝陵[26]、磁县湾漳大墓（墓主人可能为北齐文宣帝高洋）[27]、江都隋炀帝陵[28]、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墓主人可能为隋废太子杨勇）[29]等存在不同程度的被盗现象，因此这一时期的帝陵是否使用下颌托仍不得而知。目前所见隋代（时代为隋末唐初）下颌托仅在宁夏固原发现 1 例[30]。唐代下颌托主要见于两京地区（洛阳 10 例、西安 5 例），南方地区（共 10 例，其中重庆 6 例、湖北 3 例、广东 1 例）、宁夏固原地区（2 例）。五代十国时期的下颌托在四川成都前蜀国王王建墓和山西大同五代贾府君墓各发现 1 例。宋元时期的下颌托发现较少，其中北宋下颌托 6 例（湖南 3 例、湖北 2 例、重庆 1 例），辽代下颌托 2 例（内蒙古、辽宁各 1 例）1 例，元代下颌托 2 例（安徽、江西各 1 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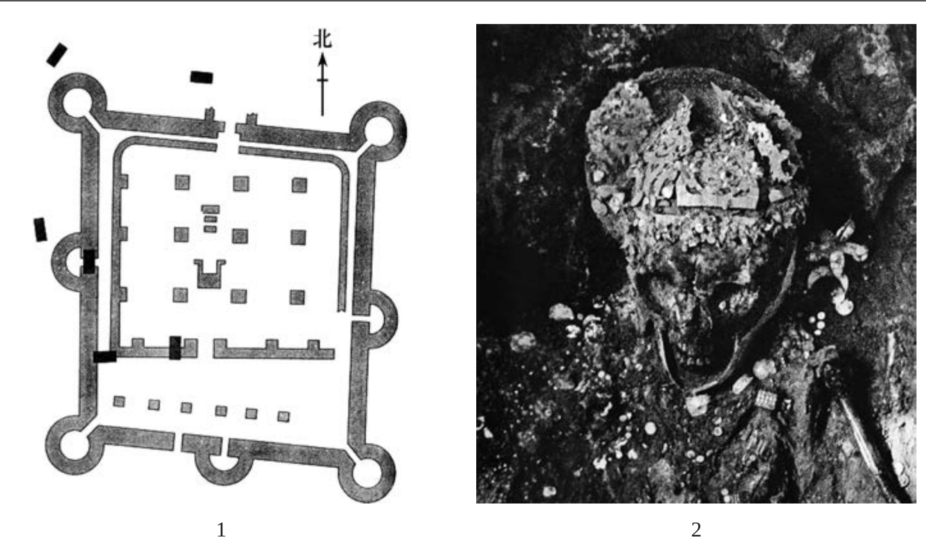


图二　新疆地区发现干尸及纺织品下颌托

1. 尉犁县营盘墓地 M15 男尸　2. 洛浦县山普塔拉墓地（84LSIM24：36-2）
3. 洛浦县山普塔拉墓地（84LSIM24：27-4）4. 民丰县尼雅墓地（95MN1M6：A）

三、"黄金之丘"的金质下颌托

"黄金之丘"（Tilly-Tehe）位于阿富汗北部席尔巴甘东北 5 千米处，1978 年 4 月苏联和阿富汗考古学家在调查时发现了 8 座墓葬，其中 6 座墓葬位于一个神坛或庙宇遗址上，1978 年 4 月至 1979 年 2 月由苏联和阿富汗考古学家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发掘了其中 6 座墓葬（图三，1），主持者为苏联考古学家 V. I. 沙里阿尼迪，墓葬出土了大量珍贵遗物，其中金器达两万余件，此墓地也被学界称为"黄金之丘"的宝藏（或席尔巴甘的宝藏），除四号墓墓主人为男性外，其他墓墓主人均为女性，墓葬出土的器物既有来自中国的汉镜，也有来自希腊、罗马和安息等国的器物，对研究中西交通具有十分重要



1　　2

图三　阿富汗"黄金之丘"墓葬分布及六号墓下颌托出土状况

1."黄金之丘"墓葬分布图　2.六号墓下颌托出土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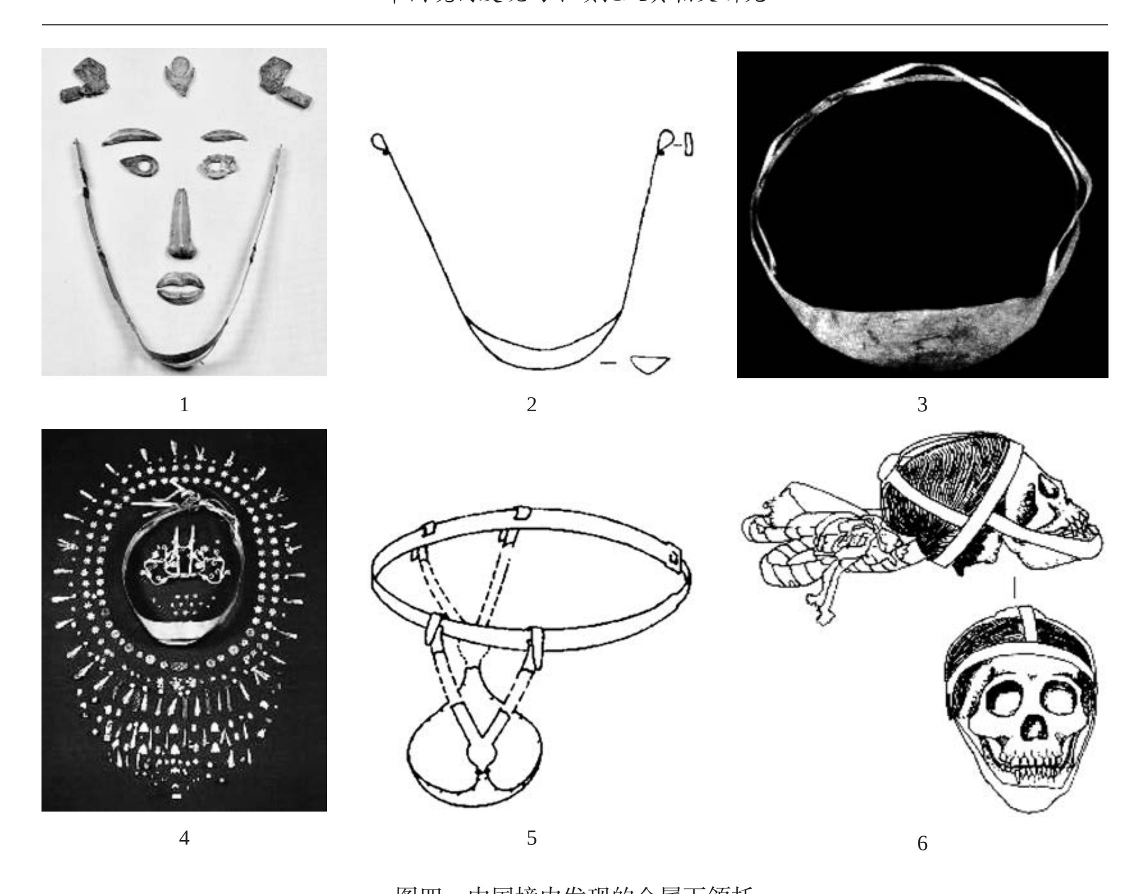
的意义。经过研究，大体可以确定这 6 座墓葬为公元前 1 ~ 公元 1 世纪大月氏王族的墓地[31]。经发掘的 6 座墓葬中除一号墓外，其他墓葬均出土了金质下颌托（图三，2），下颌托结构基本相同，大体为半圆形，两端有圆形或长方形孔，从出土情况判断，下颌托应与有机质的细绳组合使用，即下颌托有圆形或长方形孔的一端系于细绳上，细绳另一端可能固定在头顶上。没有发掘的 2 座墓葬后来遭到盗掘，是否出土下颌托不得而知。

四、下颌托的形制和演变

关于下颌托的形制，因材质不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玉质下颌托和纺织品下颌托的形制比较简单。先秦时期的下颌托在考古发现时多与玉覆面一起出土，因此考古报告或简报中也将下颌托作为玉覆面的组成部分予以报道，但是我们认为，下颌托并不是玉覆面的一个构成部分，而是作为独立的葬具来使用，曾侯乙墓仅出土的玉质下颌托而没有发现玉覆面似乎可以说明这一点。这首先是因为二者的使用功能不同，玉覆面的主要作用不仅在于覆盖墓主人的面部，而且要彰显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使用下颌托则是为了防止墓主人下颌骨脱落，保持逝者有较好的面容。其次是二者的表现手法不同，玉覆面应是附着在丝织品等有机物上，在一个平面上表现人的脸部特征；而下颌托则以其凹面托住逝者的下颌，四角或两端用有机质的绳子或细线等系于死者头顶或额上的带饰上，试图表现一个立体的空间。因此，关于先秦时期玉质下颌托的使用方法，我们认为可能主要存在着以下几种：一是将玉覆面缀在丝织物上，丝织物的面积较大，除覆盖在墓主人面部之外，多余部分包裹住墓主人头部，然后将下颌托置于墓主人下颌处，将连接玉

质下颌托的绳子或细线等系于墓主人头部，这样下颌托不仅托住了墓主人的下颌，而且系住了附着玉覆面的多余丝织物部分；一是将玉覆面直接缀在丝织物上，玉覆面和丝织物的大小与墓主人脸部的大小基本相同，玉质下颌托直接托住墓主人下颌，然后系于其头顶，这样下颌托和玉覆面及其丝织物就没有直接关系了；一是墓主人没有使用玉覆面，使用时以下颌托两端穿孔系细绳或带子，下颌托凹面直接托住墓主人下颌，最后将带子系于头顶。其中前者裹头的现象在《仪礼·士丧礼》中有类似的记载："掩，練帛，广终幅，长五尺，折其末。"郑玄注："掩，裹首也。折其末，为将结于颐下，又还结于项中。"贾公彦疏："掩，若今人幞头，但死者以后二脚于颐下结之，与生人为异也。"说明当时人死后是用"掩"将头部裹起来，来代替帽子，因为逝者是不戴帽子的[32]。

玉质下颌托基本为半圆形，通常凹面为素面，凸面饰有纹样，使用时用下颌托的凹面托住逝者下颌，再以有机质的绳子或细线等固定于头顶。纺织品下颌托通常为一条带状织物或细绳，部分纺织品下颌托上还出现了椭圆形护颌罩且两端各连接一条带子或细绳，一些椭圆形护颌罩托住下颌的地方还留有椭圆形或条状孔，使用时下颌托的两端多系于头顶。金属下颌托根据其结构和功能可以分为顶带、额带、颊带和勺形托体（部分下颌托没有勺形托体，而是与颊带类似的金属带，本文称之为带状托体）等几部分，其中具有顶带、额带的金属下颌托数量较少。根据金属下颌托的形制可以将其分为三型，即A型、B型和C型。其中A型结构为颊带+勺形托体（或带状托体），此类下颌托，根据颊带长短、颊带末端结构和下颌托的整体形状又可以分为Aa型、Ab型和Ac型，Aa型颊带较长，颊带和勺形托体（或带状托体）大体为半圆形或半个椭圆形，在颊带顶端均有较小的圆形或条状孔，使用时以细绳等有机物固定于头顶，以史道德墓（图四，1）[33]、固原九龙山M33和阎婉墓等出土品为代表。Ab型颊带较短，颊带和勺形托体大体呈"V"字形，颊带末端各有一个向外弯曲形成的小圆环，使用时以细绳等系于头顶，以耒阳M60（图四，2）[34]和衡阳北宋墓等出土品为代表。Ac型颊带较长，颊带和勺形托体大体呈椭圆形或圆形，使用时颊带顶端相互缠绕于头顶，两侧颊带多为一条，部分为两条或多条，以王建墓（图四，3）[35]和西安贺若厥墓（图四，4）[36]等出土品为代表；B型的结构为额带+颊带+勺形托体、此类下颌托在使用时首先要以勺形托体托住下颌，再将颊带置于脸颊两侧，最后将额带套于额上并将颊带末端固定于额带上，以大同南郊M107（图四，5）[37]等为代表。C型下颌托结构为顶带+额带+颊带+勺形托体，此类下颌托目前仅在吐尔基山辽墓（图四，6）[38]发现一例，使用时首先以勺形托体托住下颌，再将颊带置于脸颊两侧，而额带和顶带应是连接为一体的，其中顶带呈"十"字形，最后将颊带的末端固定在额带上。部分A型下颌托的勺形托体底部有椭圆形或条状开口，如史道德墓和贺若厥墓等出土品，与此类似的开口在新疆地区汉晋时期的纺织品下颌托或护颌罩上曾发现过，显示了二者可能存在的着渊源关系。根据对山普拉墓地出土的19件护颌罩的分析，其中5件有椭圆形开口的护颌罩所出土墓葬其墓主人均为男性，而14件女性墓主人使用的护颌罩均没有开口，说明当时纺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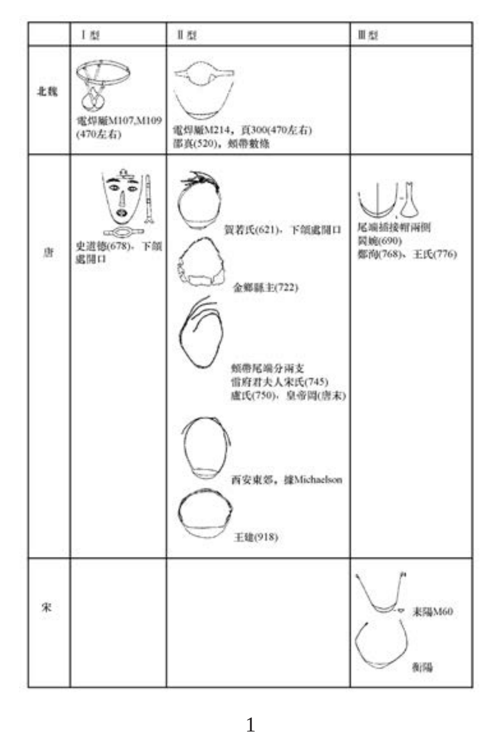
图四 中国境内发现的金属下颌托

1. Aa 型（史道德墓） 2. Ab 型（湖南省耒阳县城关宋墓，M60：5） 3. Ac 型（王建墓）
4. Ac 型（贺若厥墓） 5. B 型（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墓，M107：6） 6. C 型（吐尔基山辽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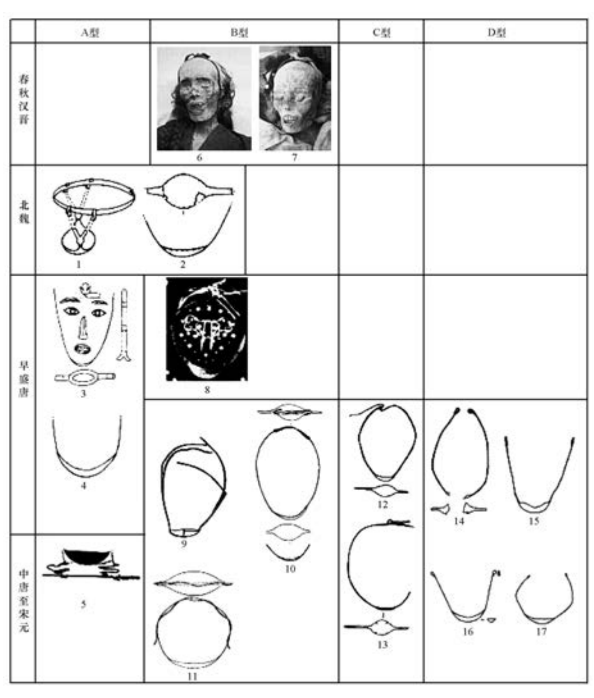
品下颌托或护颌罩上是否有开口与墓主人性别关系密切。虽然个别使用勺形托体底部有开口的金属下颌托的墓主人为男性，但是女性墓主人下颌托的勺形托体上也发现过类似开口（如贺若厥墓），而且多数男性墓主人使用的金属下颌托上并没有发现此类开口，可见在金属下颌托的勺形托体上是否有开口与墓主人性别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史道德墓和固原九龙山 M33 与下颌托一起使用的冠饰上均出现了日月图案，这种的纹样表明墓主人可能为信仰祆教的中亚或西亚人士。B 型和 C 型下颌托的勺形托体底部没有发现开口，说明唐代中期以后金属下颌托勺形托体发生了变化。安徽棋盘山元墓发现的金属下颌托形制较为特殊，其颊带为链条形，顶带为长条形，与冠饰配合使用，其他金属下颌托的颊带均为带状。

玉质下颌托由于发现较少且延续时间不长，其形制变化不大。纺织品下颌托多为一条带子或细绳，其主要变化是有的下颌托出现了包裹下颌的护颌罩及护颌罩上是否存在椭圆形或条形孔，但是否存在护颌罩、有孔与否并不意味着时代的早晚区别，其中护颌罩上是否存在椭圆形或条形孔与墓主人性别关系密切，即男性墓主人的护颌罩上有椭圆

形或条形孔，女性墓主人则没有。金属下颌托不仅数量最多，而且形制和演变也比较复杂。宋馨教授（图五，1）和吴小平先生（图五，2）[39] 先后对金属下颌托和纺织品下颌托的形制进行过研究。本文通过对国内外金属下颌托的梳理，发现其演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黄金之丘”金质下颌托的形制较为简单，仅在颊带顶端留出圆形或长方形孔，以备连接细绳和固定之用；托住下颌的部分还没有出现勺形托体，与颊带并无多大差别。北魏平城时代金属下颌托最大的变化是出现了勺形托体和额带，同时颊带出现了分叉的现象；勺形托体的出现使得下颌托固定下颌时不易滑落，托举和固定下颌的作用更为明显；额带的出现则为解决下颌托的固定提供了一条最为简洁的方法，即依靠额带、颊带和勺形托体完全能够固定逝者的下颌，避免了用绳子系于头顶时出现滑落的问题。北魏及其以后下颌托颊带的分叉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形状为“Y”字形，二是颊带分为较细的几股。国外收藏的 2 件北魏金质下颌托（图六，1、2）的勺形托体和颊带上还出现了较为复杂的纹样，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 M1（图六，3）[40] 和 M3 发现 2 例勺形托体和颊带的纹样同样表现出复杂化的倾向。勺形托体和颊带分叉一直为后代所沿袭，其中颊带分成较细几股的情况多于颊带呈“Y”字形分叉的，而额带的使用并不普及，隋唐至元代的金属下颌托上多数没有纹样，工艺也较为简单，勺形托体和颊带出现精美纹样和复杂工艺的情况仅在吐尔基山辽墓发现一例。此外金属下颌托颊带顶端



1



2

图五　宋馨教授、吴小平先生的下颌托形制演变图

1. 宋馨教授的金属下颌托形制演变图　2. 吴小平先生的金属下颌托、纺织品下颌托形制演变图



1 2 3

图六 北魏金质下颌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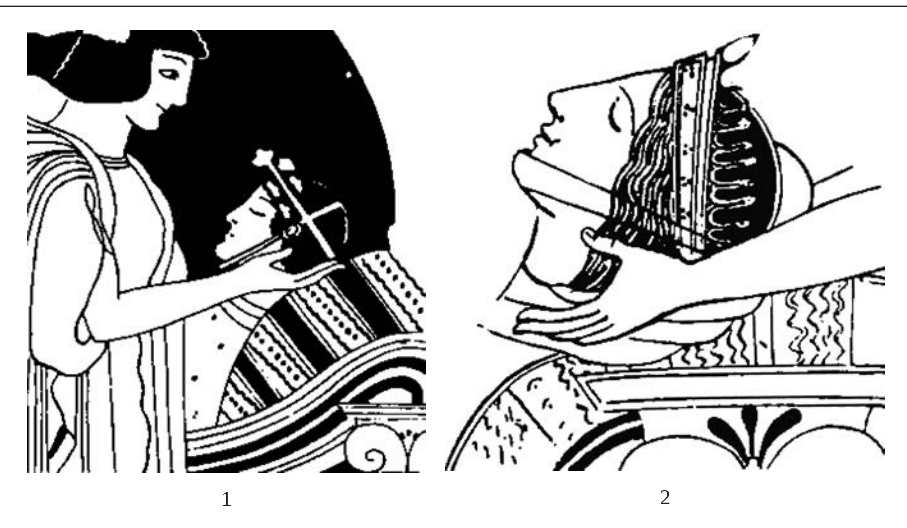
1. 瑞士 Pierre Uldry 藏品 2. 比利时私人收藏 3. 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 M1

还出现了弯曲成环的现象，以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这种形制的下颌托其时代应在唐代中晚期至北宋时期[41]。

五、下颌托的渊源及传播

目前中原地区的玉质下颌托见于西周晚期至战国早期，此后中原地区此类下颌托消失。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玉质下颌托的使用存在着比使用玉覆面更为严格的制度，另一方面是两汉时期玉衣的出现完全取代了使用下颌托的必要性。

宋馨教授的文章中曾提及在公元前 1200 ~ 前 800 年，希腊的阿提卡（Attica）与雅典（Athens）地区的墓葬中出经发现了金质和铅质下颌托，截止到公元前 4 世纪阿提卡地区的墓葬中还发现有金质下颌托，并与唇盖一起出现，希腊地区出土陶瓶上发现的与“下颌托”相关的图像（图七）时代在公元前 6 ~ 前 5 世纪。目前在希腊、阿富汗“黄金之丘”、新疆这三个地点发现的下颌托呈点状分布，缺乏能够表明相互之间存在联系的有力证据。同时，希腊地区发现的下颌托与阿富汗“黄金之丘”下颌托之间时间跨度过大等原因，使我们无法确定两地的下颌托是否存在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新疆地区发现的丝织品下颌托在年代上与希腊地区的下颌托接近或稍晚，但是在希腊与新疆之间的广阔范围内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现纺织品下颌托，因此我们也不排除希腊地区和新疆出现的下颌托是各自独立起源的可能性，即二者之间可能不存在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新疆地区的部分纺织品下颌托在使用方法和结构等方面不但与“黄金之丘”金质下颌托较为相似，而且“黄金之丘”的墓葬中还出土有汉代铜镜，同时，考虑到大月氏人的迁徙时间和路线等因素，我们认为“黄金之丘”金质下颌托的出现应该受到了新疆地区纺织品下颌托的影响，北魏平城地区出现的金属下颌托可能受到了以“黄金之丘”金质下颌托为代表的大月氏葬俗的影响。上述认识我们能够从当时北魏与大月氏的交往中窥见一



图七　希腊地区出土陶瓶上发现的下颌托图像

斑，而北魏太武帝时大月氏人在平城制造玻璃[42]则为这样的推测提供了证据，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平城地区的金属下颌托与“黄金之丘”金质下颌托在时间上存在一定的差距，所以上述推测还需要更多考古资料的佐证。关于玉质下颌托和纺织品下颌托的关系，就时间来看新疆地区的部分纺织品下颌托要早于中原地区发现的玉质下颌托，就形制和质地来看二者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我们还不能确定二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或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

大月氏人在金属下颌托的传播中可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历史上大月氏曾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其首领的头颅又被匈奴老上单于做成酒器，大月氏因此而被迫西迁[43]。这样的切齿之恨和对头颅的特殊情感，可能促使大月氏王族在死后以贵金属黄金来保护自己的头颅及防治下颌骨的脱落。大月氏与北魏的频繁交流，导致与“黄金之丘”金质下颌托类似的金属下颌托在平城地区出现。北魏在中原统治的稳定及迁都洛阳，促使这一器物先后流传至洛阳地区、西安地区、内蒙古地区，而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等政权范围内还没有发现这一器物。李唐王朝建立以后，金属下颌托又出现在当时的两京地区和原州地区（今宁夏固原地区）等，而李唐皇室成员（如李徽和阎婉等）及安史之乱以后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又促使下颌托传入广大南方地区，宋元时期则流传至更广的范围内。但是北朝之前原州地区以西一直到“黄金之丘”的大月氏王族墓地，均没有发现金属下颌托，因此，上述地区金属下颌托的发现同样值得期待。

另外，宋馨教授的文章中曾转述一位韩国学者的话，韩国现在也存在将逝者下颌托紧的现象。笔者曾就下颌托问题求教多位韩国及日本考古学者，了解到目前为止，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古代遗迹中还没有发现过此类器物。汉唐时期，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与中国交流密切，在典章制度和社会生活方面深受古代中国的影响，因此下颌托是否随着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文化交流而传入上述地区，仍有待于以后的考古发现。

六、下颌托的作用

关于下颌托的作用，我们认为应该从其具有的功能和体现的精神两方面去考虑，其基本功能在于固定逝者的下颌，防止人体自然死亡后脸部肌肉变化引起的面部变形或下颌骨脱落；而下颌托所体现出来精神应与我国古人“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和尊重逝者的朴素思想密切相关。因此我们推测下颌托的安装应在人体自然死亡后不久的一段时间内完成，此时逝者的皮肤和肌肉等软组织还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使用下颌托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有效阻止逝者的脸部发生变形，保持较好的面容，便于亲朋好友及相关人士瞻仰遗容等。对于部分学者认为的下颌托的出现和使用与祆教或萨满教有关，特别是近年来发现的虞弘、安伽、史君和康业等这些来自中亚、西亚地区的与祆教关系密切的人群墓葬中没有发现一例下颌托，虽然上述部分墓葬存在被盗现象，但是我们认为就目前国内外的考古发现而言，很难看出金属下颌托的出现和使用与祆教或者萨满教有直接关系，特别是宋代及其以后，祆教在中国几乎消亡[44]，而这一时期仍有一定数量的金属下颌托出现。另外，也有学者曾对山普拉墓地发现的下颌托进行了研究，认为和田地区风沙肆虐且较为频繁，山普拉发现的下颌托不排除有防风沙的作用[45]。

宋馨教授的文章中曾经提及国外收藏的两件北魏金质下颌托，从上面的人物服饰及纹样来看，其应属于北魏平城时代（398 ~ 494 年），年代可能在孝文帝“太和改制”之前。北魏平城时代的帝后除孝文帝葬于洛阳长陵、冯太后葬于大同永固陵外，其他帝后均葬于“金陵”，“金陵”所在地也成为北魏历史及考古的重要议题之一，“金陵”的位置有左云说[46]、托克托说、和林格尔说、右玉说[47]等多种说法。已经发掘的北魏帝后陵墓仅有冯太后的永固陵[48]和宣武帝的景陵[49]，但是两座墓葬均被多次盗掘，没有发现与下颌托相关的器物。目前国内所见的北魏下颌托，从质地上来说有金质、银质、铜质、铜鎏金和铅质等。从墓主人的身份来看，仅有陕西西安市发现的邵真墓（北魏正光元年，520 年）能够确定墓主人身份，即邵真为阿阳令、假安定太守，其他发现下颌托的北魏墓葬均无墓志出土，墓主人身份也无法确定。需要提及的是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北魏墓（M1 和 M3）[50]出土的黄金下颌托是目前国内出土最为精美的北魏下颌托，不仅用材和制作工艺考究，而且纹饰精美、结构复杂，同时还出土了玻璃器和来自西域的银碗、金珠、鎏金铜铺首和鎏金铜耳杯等器物，由于墓葬严重被盗，出土器物中没有发现能够确定墓主人身份的文字信息，但是出土器物表明其身份应该非常高。因此北魏时期下颌托使用者的身份仍然存在着较大差异，而国外收藏的这两件北魏金质下颌托为我们寻找北魏“金陵”和探讨北魏帝后的葬俗提供了新的线索。

七、结　　语

中古时期中国与中亚、西亚地区交往频繁，下颌托作为与中外文化交流密切相关的一种器物，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就中国境内发现的下颌托而言，按照质地可以分为玉质下颌托、纺织品下颌托和金属下颌托三大类。其中玉质下颌托发现于西周晚期至战国早期，使用者为当时中原地区的诸侯国国君或国君夫人；纺织品下颌托流行于汉晋时期，多发现于新疆地区；金属下颌托首先在北魏平城地区出现，并沿用到了元代。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使用下颌托与祆教或萨满教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是有其特定的功能性和精神性。希腊地区发现的金属下颌托、纺织品下颌托与中国发现的金属下颌托、纺织品下颌托很可能是各自独立起源的，没有证据表明二者存在着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阿富汗“黄金之丘”发现的金质下颌托可能受到了新疆地区纺织品下颌托的影响，而北魏平城的金属下颌托应是受到了以“黄金之丘”金质下颌托为代表的大月氏葬俗的影响而出现的。

因此我们认为西周晚期至战国早期中国境内发现的玉质下颌托不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物质性和精神性的高度统一，而且还为研究当时的社会制度等提供了重要资料。而自北魏平城时代开始，代表外来文化符号的金属下颌托既见证了中古时期中外文化的频繁交流，又说明了外来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

注　　释

[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2] 杨军凯．北周史君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隋虞弘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4]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8（6）.

[5] 张正岭．西安韩森寨唐墓清理记［J］．考古通讯，1957（5）.

[6] 国内最先由考古发现的下颌托应是 1942 年 9 月 ~ 1943 年 9 月由冯汉骥、吴金鼎和王振铎等人在前蜀王建墓中发现的“银下颌托”，但是王建墓报告直到 1964 年才正式出版，报告中称为“银颐托”。见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图版三七，5 银颐托.

[7]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J］．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8] Shing Müller. *Chin-straps of the Early Northern Wei:New Perspectives on the Trans-Asiatic Diffusion of Funerary Practices*［J］.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2003, 5 (1):27-71．相关中文稿见宋馨.

中国境内金属下颌托的渊源及演变——兼谈下颌托与流寓中国粟特人的关系［A］，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本文所引宋馨教授文章及图片均出于此文。

［9］ Sonjia Filip. *Preparations for The Long Night-Burial Customs in Tang-period China*［A］. *Sonjia Filip. (eds) The Lady with the Phoenix Crow: Tang-Period Grave Goods of the Noblewoman Li Chui(711-736)*［C］. Regensburg:Regensburg Books, 2014.

［10］ a．冯恩学．吐尔基山辽墓辽墓萨满金帽的文化溯源［A］．新果集——庆州林沄先生七十华诞论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b．冯恩学．下颌托——一个被忽视的祆教文化遗物［J］．考古，2011（2）．

［11］ a．吴小平，崔本信．三峡地区唐宋墓出土下颌托考［J］．考古，2010（8）．

b．吴小平．论我国境内出土的下颌托［J］．考古，2013（8）．

c．吴小平．唐宋时期三峡地区移民史迹考察——以下颌托为对象［A］．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三次年会论文集（2010）［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12］ a．王春燕．关于吐尔基山辽墓下颌托的一点思考［J］．北方文物，2014（2）．

b．王春燕，佰嘎力．内蒙古伊和卓北魏下颌托的前世今生［N］．中国文物报，2014-8-15，第六版．

［13］ 付承章．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下颌托问题初探［J］，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7）．

［14］ a．王银田、王亮．再议“下颌托”［A］．暨南史学（第九辑）［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b．王银田．下颌托与祆教无关［N］．中国文物报，2014-10-24，第六版．

［15］ 王维坤，赵今．再论我国境内出土下颌托的性质及其来源——兼与冯恩学、吴小平二位先生商榷［A］．两个世界的徘徊——中古时期丧葬观念风俗与礼仪制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16］ 周大成．我国古代的“下颌托”介绍一种防止死后下颌骨脱落的特殊装置［J］．口腔医学纵横，1986（2）．

［17］ a．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三次发掘［J］．文物，1994（8）．

b．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J］．文物，1994（8）．

c．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J］．文物，1995（7）．本文图一，1 引自宋建忠．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山西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93．

［18］ 根据梁带村 M27 的出土器物的铭文判断，墓主人可能为芮桓公。由于出土时下颌托位于墓主人口中，所以发掘简报及相关报道认为此件器物为玉琀，但是参考其大小（长 5.8、宽 2.4、厚 0.4 厘米，见蔡玫芬．赫赫宗周——西周文化特展［M］，台北：台湾“故宫博物院”，

2012：258，图 146）、四角的穿孔及晋侯墓地出土玉质下颌托，笔者认为这件器物为下颌托。

［19］ 邹衡，谭维四（主编）．曾侯乙编钟（上）［M］．北京：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2015：91，图 3～71．

［20］ 孙庆伟．西周玉器［M］．台北：财团法人震旦文教基金会，2005．本文图一，2 引自该书第 256 页，图 248．

［21］ a．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 15 号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9（1）．
b．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 1995 年发掘简报［J］．文物，2002（6）．本文图二，1 引自该期封二．

［2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新疆山普拉——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本文图二，2、3 分别引自该书第 232 页，图 436-1；第 228 页，图 428-1。根据报告描述，山普拉墓地共出土 19 件护颌罩，但是报告中只有 12 件护颌罩的文字和图片，因此本文统计表中也只对 12 件护颌罩做了统计。

［23］ 李吟屏．新疆和田出土彩棺及其相关问题［J］．考古与文物，2002（Z）．

［24］ a．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95 年民丰尼雅遗址 I 号墓地船棺墓发掘简报［J］．新疆文物，1998（2）．
b．中日共同尼雅学术调查队．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二卷）［M］，京都：中日共同尼雅学术调查队，1999．本文图二，4 引自该报告图版百五，2．

［25］ a．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且末县扎洪鲁克古墓葬 1989 年清理简报［J］，新疆文物，1992（2）．
b．王炳华．新疆古尸［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26］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考古研究所．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1997（2）．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28］ 束家平．江苏扬州曹庄隋唐墓葬［Z］，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13）．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29］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30］ 宁夏固原地区发现了 3 例金质下颌托，1 例发现于史道德墓中，见 a. 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史道德卒于仪凤三年（678）三月，葬于同年十一月。1 例发现于九龙山墓群，时代为隋末唐初，见 b.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九龙山汉唐墓葬［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M33 下颌托出土时仍套在墓主人头部，保存较好。
1 例为 1989 年宁夏固原市征集品，时代为唐代，见 c. 宁夏固原博物馆．固原文物精品图集（下）［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31］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黄金之丘”墓葬介绍及研究的资料较多，如 a. 林保尧．西伯尔罕遗宝记［J］．艺术家，1983（4）．
b．吴焯．西伯尔罕的宝藏及其在中亚史研究中的地位［J］．考古与文物，1987（4）．
c．梅村．大夏黄金宝藏的发现（上、下）［J］．文物世界，1991（6），1992（1）．
d．沙里阿尼迪著，李淞译．大夏国的黄金艺术品［J］，西北美术，1997（2），该文是当

时主持发掘的苏联考古学家 V. I. 沙里阿尼迪在 1990 年第 3 期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文章的译文，原文见 Viktor Ivanovich Sarianidi. *The Golden Hoard of Bactria*［J］. *National Geoeraphic*，1990（3）. 本文图三，2 引自该文第 51 页，略有修改.

e. 石兴邦，彭树智. 古物文明［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f. 白云翔. 汉式铜镜在中亚的发现及其认识［J］. 考古，2010（1）.

g. 林梅村. 贵霜帝国的万神殿［A］. 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暨丝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 年.

h. 张文玲. 黄金草原：古代欧亚草原文化探微［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i. V. I. サリアニディ（著）、加藤九祚（訳）. シルクロードの黄金遺宝——シバルガン王墓発掘記［M］. 東京：岩波書店，1988，本文图三：1 引自该报告第 29 页，図版 5.

g. 樋口隆康. 出土中国文物的西域遗迹［J］. 考古，1992（12）.

［32］ 陈公柔. 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J］. 考古学报，1956（4）.

［33］ 宁夏固原博物馆. 固原历史文物［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第 213 页，图 124.

［34］ 衡阳市文物工作队. 湖南耒阳城关镇六朝唐宋墓［J］. 考古学报，1996（2），第 267 页，图三四：12.

［35］ 同［6］.

［36］ 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陕西新出土文物选粹［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103，图 102.

［37］ 同［7］：233，图一〇五 G，1.

［38］ 同［10］：565，图一，2.

［39］ 同［11］b：100，图一.

［40］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锡林郭勒盟文物保护管理所、正镶白旗文物管理所（王晓琨等）. 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地 M1 发掘简报［J］. 文物，2017（1）.

［41］ 同［11］a.

［42］（北齐）魏收. 魏书·卷一百二·大月氏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4：2275. “大月氏国，都卢监氏城，……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本文所引正史均为中华书局版，不再赘述。《北史卷·九七·大月氏传》（3226 ~ 3227 页）也有类似的记载。也学者认为大月氏人在平城制造的是琉璃建筑材料，见王光尧. 关于青花起源的思考［J］，故宫博物馆院刊，2003（5）.

［43］（东汉）班固. 汉书·卷九六上·大月氏传［M］，3890，3891“：大月氏国，治监氏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

［44］ 施安昌. 古代中国的火祆教［A］. 火坛与祭祀鸟神［C］.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

［45］ 郭物. 新疆洛浦县山普拉墓地中的祆教因素［A］. 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暨丝路文化国际学术研

讨会论文集［C］.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
［46］ 魏坚. 金陵与畿上塞围——左云北魏遗存初识［A］. 边疆考古研究（第 9 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47］ a. 李清俊. 北魏金陵地理位置的初步考察［J］. 文物季刊，1990（1）.
b. 古鸿飞. 北魏金陵初探［J］.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2（5）. 文中作者提出了北魏金陵共有三处，即云中金陵、盛乐金陵和没有冠以地名的金陵。其中云中金陵为北魏早期皇陵，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一带；盛乐金陵是北魏定都盛乐时期的皇陵，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西北；没有冠以地名的金陵位于今山西省右玉县大南山一带.
［48］ 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 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J］. 文物，1978（7）.
［4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洛阳古墓博物馆. 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J］. 考古，1994（9）.
［50］ a. 同［40］.
b. 同［12］b.

Study on the chin-straps found in China and its related studies

Abstract: The chin-straps are one of the objects concerned by many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 according to its texture,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jor categories: jade chin-straps, textile chin-straps and metal chin-straps. Jade chin-straps mainly appeared in the pre -Qin Period, textile chin-straps were popular in the Han-Wei period and mostly frond in Xinjiang area, metal chin-straps were popular in the period from Northern-Wei to Yuan dynasty and at the time of when the were reincarnated region region as the center spread to the surrounding area. The present study shows that no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e of chin-straps and Shamanism or zoroastrianism,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ncient idea of “death is like life”, jade chin-straps, textile chin-straps and metal chin-straps whether or not there is further studies are needed between the three kind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luence and be influenced.
Key Words: chin-straps; the Pre-Qin Period; Northern-Wei; Sui-Tang Dynasty; Darouzhi

试论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的“图像程序”

吉艺龙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北京，100872）

本文拟从画像观者的角度探讨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的“图像程序”（pictorial program）。该屏风图像的分布出自设计者的“刻意设计”（intended design），屏风正面的列女、高士图像供榻上者观看，背面的臣仆、训诫图像供侍者观看。设计者巧妙地利用屏风自身的结构特点与观者的视野范围，从而分别实现屏风“成教化、助人伦”的功能。本文还进一步揭示屏风从日常使用品转变为丧葬仪式中的道具后，屏风上的群像作为墓主画像被赋予的新的丧葬意义。

一、绪　　论

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发现于 1965 年 11 月，据墓中出土墓志可知，该墓为北魏司马金龙与其夫人贺豆跋姬辰的合葬墓。该墓规模宏大，虽早期被盗，但仍出土了大批陶俑、生活用具及墓志等文物，其中尤为珍贵的是墓葬中出土的漆画屏风。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集中出土于该墓后室甬道及后室南部，由于早期盗扰与腐败剥落，屏风出土时已严重损毁，发掘者共发现较为完整的漆画木板五块，每块长约 0.8、宽 0.2、厚 2.5 厘米，上下两侧皆有连接用的榫卯。墓中还出土了同属该屏风的漆画残片若干、画框 5 块、木档 3 件，另出土石棺床 1 件、石雕柱础 4 件，推测与屏风存在组合关系。

现存的漆画屏风材料尚未全部发表[1]，但就已发表的材料，有多位学者进行了极有价值的研究，其中内容涉及图像志考证、图像学研究、屏风复原、绘画与书法艺术、漆器工艺等方面。

针对该漆画屏风，学者最大的争论焦点在于漆画木板与石棺床、石雕柱础之间的组合关系，根据不同的组合关系与摆放位置，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复原方案[2]。值得注意的是，屏风复原方案的讨论不能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而应以屏风性质的确定作为屏风合理复原方案的基础。

近年来，随着大量北朝石榻围屏的出土，更多的相关材料走进了学者的视野。对比北朝时期的石质石榻围屏，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具有极强的特殊性，该屏风是同时期出土的唯一一件木质漆画屏风，也是同时期唯一一件正反两面绘制图像的屏风。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

相比北朝石榻围屏性质与意义有何异同？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究竟是作为墓主生前爱用之物随葬于墓中，还是为实现独特的丧葬意义而特别定制的？更多的问题等待学者研究解决。

相比对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复原与丧葬意义的研究，针对该漆画屏风“图像程序”的研究相对较少。究其原因，主要是现有漆画屏风剥落缺失严重，给整体的“图像程序”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按照学者的屏风复原方案，可能现有的屏风漆画木板遗存尚不足原来屏风的一半[3]，难以整体复原。但就漆画屏风现存的图像而言，仍留给我们研究的空间，可以通过对现存部分图像内容与逻辑关系的分析，进而推测整个漆画屏风的“图像程序”。

以上是针对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本体的研究概况。在方法论上，本文则参考了美术史学者的成果，如巫鸿先生对武梁祠的研究，巫鸿先生在专著中认为武梁祠是在武梁的“刻意设计”下施工完成的，武梁祠表现了武梁个人的历史观与宇宙观[4]。相对这种“刻意设计”的诠释模式，曾蓝莹则在对安丘董家庄汉墓的研究中另辟蹊径，指出了该墓无规律制作特色下隐藏的作坊、丧家、格套之间动态的三角关系[5]。

鉴于研究对象的客观情况与既有的研究成果，本文将对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分三部分进行讨论：首先说明屏风上图像的分布情况，然后从屏风画像观者的角度探讨漆画屏风作为日常使用品的“图像程序”，最后当屏风进入墓葬，其原有的图像程序被抛弃，进而产生了新的丧葬意义。

二、屏风图像分布

现存屏风上的内容可以分为若干相对独立的图像单元，每个单元由图像、题记与榜题组成，少数单元只有大篇训诫文字。扬之水女士与谢振发先生已对漆画屏风上各图像单元的内容进行了细致的识读，现将漆画屏风图像分布情况列表如表一：

表一　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图像分布表

第一块和第二块拼合				第三块				第四块和第五块拼合			
A面		B面		A面		B面		A面		B面[6]	
图文内容	文献来源	图文内容	文献来源	图文内容	文献来源	图文内容	文献来源	图文内容	文献来源	图文内容	文献来源
有虞二妃	列女传	李善养孤	后汉书	启母涂山	列女传	鲁义姑姊	列女传	孙叔敖母	列女传	汉成帝与成公	高士传
周室三母	列女传	李充奉亲	后汉书	鲁之母师	列女传	楚成郑瞀	列女传	卫灵夫人	列女传	齐宣王与匡倩	韩非子
鲁师春姜	列女传	素食赡宾	后汉书	楚庄樊姬	列女传	楚子发母	列女传	齐田稷母	列女传	训诫题记	《说苑》与严遵《座右铭》
班女婕妤	汉书	临渊履冰	诗经	和帝□后	后汉书	训诫题记	出处未知	七贤人物	出处未知	剥落不清	

简报称另存有晋公子重耳（出处未知）、蔡人妻（出自《列女传》）、黎庄夫人（出自《列女传》）、张孟谈与高赫（出自《韩非子》）、鱼与鱼之子（出自《韩诗外传》）漆画残片及题记残片[7]。

关于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的图像分布规律，扬之水女士提出屏风正面画列女，背面画先贤[8]。谢振发先生认为图像的排布大体依照《列女传》的卷次，正面侧重君臣之义，反面侧重个人品性操守[9]。

通过上表可知，屏风上文本材料大多能找到传世文献的出处，而且各图像单元所涉及主题庞杂、文献来源散乱，分布虽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以类相从，但同时又多有打破规律之处。这一现象说明屏风的设计者并非以单一的文本或美术作品作为整体设计的框架。

从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整体构图来看，设计者应该受到了手卷的影响。该漆画屏风虽然是由长约 0.8、宽约 0.2 米的木板榫卯拼合而成，但构图却不同于同时代的石榻围屏和墓葬壁画中以“牒”为单位的屏风，而是上下等分为四层的构图。推测漆画屏风制作流程应该是由单块木板拼合后统一髹漆，然后打上界格等分为上下四层，最后在每层中绘制漆画[10]，所以构图时也打破了单块木板的界限。以第一块和第二块拼合 A 面的图像为例，为了表现故事的情节，每个单元各有长短，周室三母、鲁师春姜、班女婕妤三个单元都只描绘了一个情节，所以在第一块和第二块拼合中已经画完，而有虞二妃单元有三个情节，所以需要延续到下一块木板中。

这种上下等分几层的构图类似于一些汉画像石与北朝墓道壁画，而从屏风明确的故事展开方向来看，则显示出其与手卷紧密的联系。屏风上的图像单元凡有情节先后顺序的，方向都是从右向左，这与手卷的展阅方向相同。例如，“有虞二妃”中，从右向左按照故事发展，依次是舜与二妃、浚井、涂廪的情节。“孙叔敖母”先绘孙叔敖斩双头蛇，再绘孙叔敖母教育孙叔敖。“临深履冰”则先绘如临深渊，再绘如履薄冰。想象屏风最后的成品类似于上下排列的四幅手卷，观看的顺序也是从右向左。而屏风上下等分四层，每层高约 20 厘米，正接近于《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洛神赋图》等传世手卷的纵高[11]，尺寸上的接近免去了绘制屏风时缩放所产生的失真。这种不同于分牒式屏风，等分四层横向展开的结构既反映了当时的审美情趣，又反映了屏风设计时可能存在的手卷粉本。另外，众多学者也从内容与技巧等方面讨论了漆画上图像与《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之间的联系[12]。例如，屏风上的“班女婕妤”与“卫灵夫人”，都与顾恺之手卷具有构图上的相似性。

但从屏风粉本与制作的角度同样难以发现图像分布的规律。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图像单元之间都缺少明显的逻辑关系。设计者设计屏风时，像是制作剪贴画一样，“裁剪”不同来源的材料，经加工后“粘贴”在屏风木板上。

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究竟是出自统一理念的刻意设计，还是无规律的制作，本文拟复原屏风的使用场景，从屏风图像观者的角度回答这一问题。

三、屏风在日常使用中的“图像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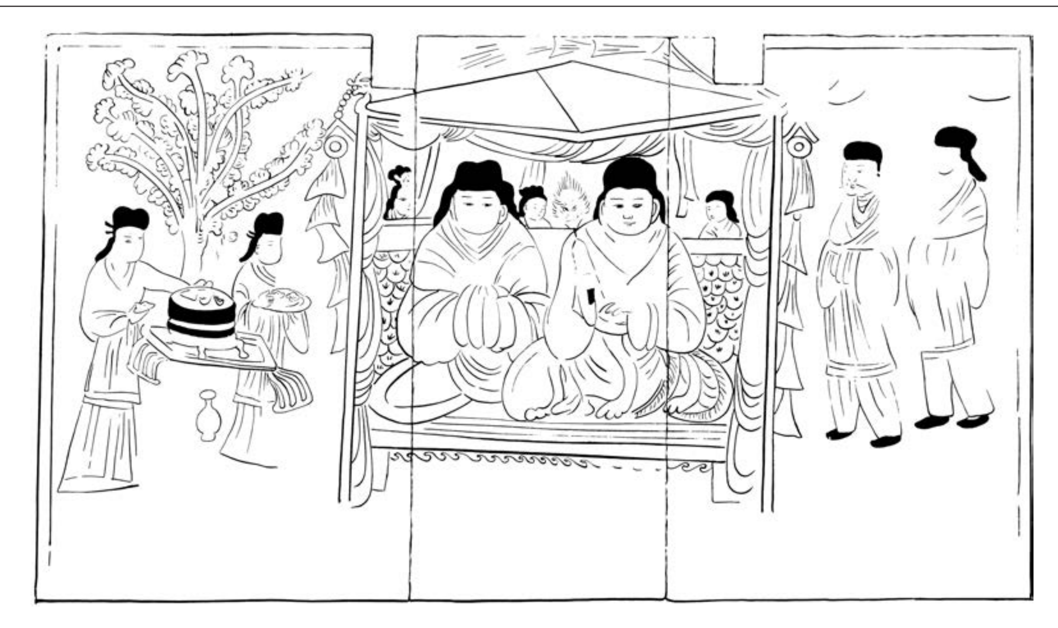
屏风，先秦未有其名，文献多称之为“扆（依）”“皇邸”，如所谓“负依而坐”即背靠屏风而坐。根据实际需要，屏风也可以放置于居室内各处，通过屏障风寒、遮挡视线，从而隔离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尊位”。

司马金龙墓同时期的传世美术与墓葬美术中，多有屏风图像的出现，这些图像应较为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屏风在日常使用时的场景。在这些图像中，屏风大多俯视角度呈“∏”形，即所谓“屏风鞈匝，蔽我君王”[13]，主人坐在榻上，而床榻被左、后、右三面的屏风障住，在屏风外面是侍立的侍者。

例如，北齐徐显秀墓北壁壁画（图一）[14]与大同智家堡石椁壁画（图二）[15]，都描绘有墓主夫妇并坐于床榻之上、背靠屏风的正面像，屏风后则侍立有侍者。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中也绘有屏风日常使用的场景，在“和帝□后”中，榻上女子应为汉和帝的皇后（邓后或是阴后），屏风后站立着四名女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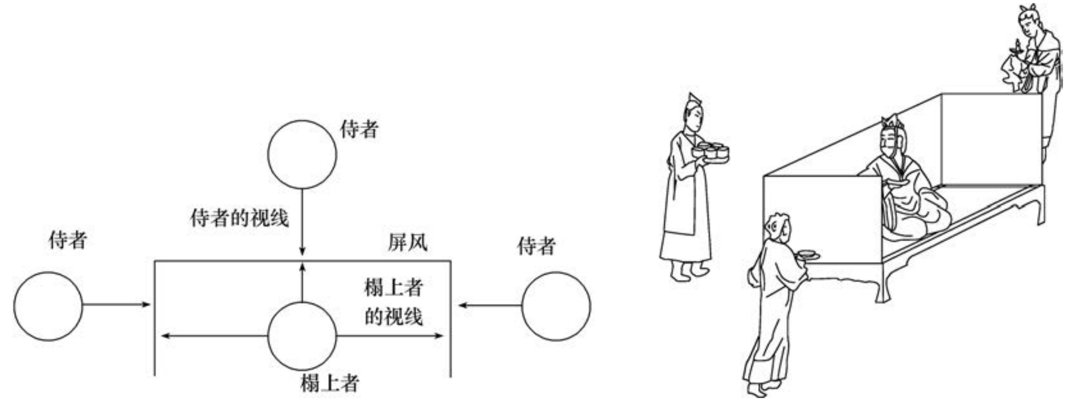


图一　北齐徐显秀墓北壁壁画



图二　大同智家堡石椁北壁壁画摹本

屏风作为“屏障”用的家具，自然而然地隔离出了两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一个空间是属于榻上者的“尊位”，一个空间是属于侍者的“卑位”。而由于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屏风正反两面都绘有图像，这使得榻上者只能看到屏风正面的图像，而侍者只能看到反面的图像（图三、图四）。



图三　屏风日常使用场景俯视角度示意图（笔者绘图）

图四　屏风日常使用场景想象图（笔者绘图）

关于屏风图像的观者，文献也多有记载。例如，《汉书》记载汉成帝与班伯讨论屏风上所画的商纣与妲己[16]，《后汉书》记载东汉光武帝在会见大臣宋弘时偷窥新画屏风上的列女图像[17]。另有左思《娇女诗》“顾眄屏风书，如见已指擿”[18]，讲的是观看屏风上的文本材料。

根据这些文献可知，屏风上的图像与文字不仅仅是装饰性的，而且具有现实的功能，可以作为欣赏、研讨、训诫、指擿之用。而文献中坐在床榻上的人能够随时“顾”“指”屏风上的图像，指的就是屏风正面的图像。

汉唐时期漆画屏风是具有极高价值的奢侈品[19]，在具体实现屏风图像重要的训诫功能时，设计者是不会不考虑观者问题的。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正反两面的图像需要分别实现对“尊位”的榻上者与“卑位”的侍者的训诫功能，设计者也就是基于这样的“图像程序”进行“刻意设计”的。

同一件屏风，榻上者与侍者处于不同的视野下，会看到完全不同的内容。在这样的思考框架下，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一下漆画屏风上的图像内容。在屏风的正面，榻上者所看到的内容见表二。

表二　屏风正面（榻上者视野）图像列表

位置	正面图像（榻上者视野）	故事内容
第一块和第二块拼合	有虞二妃	尧的两个女儿嫁给了舜，共同侍奉凶顽的公婆
	周室三母	三代周王的三位母亲具有贤德，能胎教，生子圣贤
	鲁师春姜	鲁师教导被婆家逐出的女儿五伦之道
	班女婕妤	成帝婕妤班氏以为圣君有名臣在侧，不与之同辇
第三块	启母涂山	大禹治水在外，其妻启母涂山教育启，以继承大禹事业
	鲁之母师	鲁母师与众儿媳相约，遵守时间，赐尊号为“母师”
	楚庄樊姬	樊姬有知人之明，辅佐其夫楚庄王称霸
	和帝□后	疑为和帝皇后邓绥临朝主政之事
第四块和第五块	孙叔敖母	孙叔敖斩两头蛇，其母教育其阴德报应之理
	卫灵夫人	卫灵夫人有知人之明，称赞国中贤臣蘧伯玉
	齐田稷母	齐相田稷之母教育田稷廉洁忠孝
	七贤人物	魏晋风流名士团体
推测为正面图像的漆画残片	黎庄夫人	黎庄公夫人与黎庄公夫妻感情不和，却不离不弃

表二中所列的就是榻上者坐卧于榻上即可指擿、顾眄的屏风正面图像。可以发现，这些图像的题材包括列女与高士，故事主人公的阶级多为贵族，而故事主题则涉及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流行的两个非宗教意识形态——“名教”与“自然”。屏风正面图像是对“名教”与“自然”两种矛盾的道德标准的融合，使“成教化，助人伦”成为一种幌子，而真正的目的则是让屏风的主人享受自身所处阶级在道德上的优越性。

而反观屏风的反面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氛围。侍者所看到的内容见表三。

重新审视一下这些已被释读为表扬德行的“贤士图”，这些德行涉及忠孝、谨慎、牺牲、秩序、礼教等，从整个社会来看，这是一种处于“尊位”的榻上者们强加于处于“卑位”的侍者们的阶级道德。

表三　屏风反面（侍者视野）图像列表

位置	反面图像（侍者视野）	故事内容
第一块和第二块拼合	李善养孤	主人病没，忠仆李善保护幼主
	李充奉亲	李充在母亲面前休掉存私房钱试图分家的妻子
	素食赡宾	茅容杀鸡供母，而以素食招待客人
	临渊履冰	似指侍者应具的态度
第三块	鲁义姑姊	战乱时母亲牺牲自己的儿子去救外甥
	楚成郑瞀	媵女郑瞀重礼法，不仰观楚成王
	楚子发母	楚将子发母教育其子与将士同甘共苦
	训诫题记	训诫文字，有关谨言慎行、三缄其口
第四块和第五块	汉成帝与成公	隐士成公不受汉成帝之召而教授成帝的郎官
	齐宣王与匡倩	匡倩与齐宣王讨论娱乐活动，以批判大小易序、以下犯上
	训诫题记	一篇为周公训诫伯禽的文字，一篇为严遵的《座右铭》。都是守弱居下的道家思想与温良恭俭的儒家思想
	剥落不清	
推测为反面图像的漆画残片	蔡人之妻	蔡人有恶疾，其妻不改嫁
	张孟谈与高赫	赵襄子击败智伯后以不失君臣之礼的高赫为首功
	鱼与鱼之子	卫大夫史鱼生谏不成，死则尸谏

对于作为观者的侍者，屏风漆画“成教化，助人伦”的功能被屏风设计者赋予了另一种狡猾的含义。这里的“教化”“人伦”与侍者的阶级道德悄悄画上了等号，为了强化这种道德，屏风反面的人物被塑造为阶级道德的楷模，训诫文字成为阶级道德的教材，侍者通过对屏风的观赏，膜拜楷模、学习教材，从而强化了阶级道德。而设计者又巧妙地利用屏风的结构特点使理论与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想象，在侍者的视野下，当他们侍立于屏风周围、观赏到屏风反面的人物故事时，会产生认识层面的改变，当侍者试图进一步用理论指导实践的时候，他们会“意外地”发现实践的对象——榻上者就坐在屏风的另一面。

由此可知，屏风设计者的“刻意设计”：他巧妙地利用了屏风作为家具的结构特点与榻上者、侍者的视野范围，“刻意设计”屏风图像正反二元的“图像程序”，从而使“成教化、助人伦”达到了一种“因材施教”的效果（图五）。

图五　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正反二元图像程序示意图

四、漆画屏风性质的转变

学者一般认为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为墓主生前所爱用之物。例如，郑岩先生在讨论北朝石榻围屏时认为："（石榻）围屏上的图画并不是直接从日常生活中搬用的，而往往是特别设计的"，而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属于特例，其是"司马金龙生前曾使用的原物"[20]。谢振发先生认为："原是墓主司马金龙生前置于座右以自警醒的漆画屏风，虽然随墓主一起埋入地下，仍然沿袭着现实世界的摆设手法置于座右。"[21]本文上一部分对漆画屏风作为日常使用品的图像程序的分析，也验证了这一观点。屏风的设计者是将屏风作为日常使用品进行设计的，其预期的屏风图像观者是榻上者与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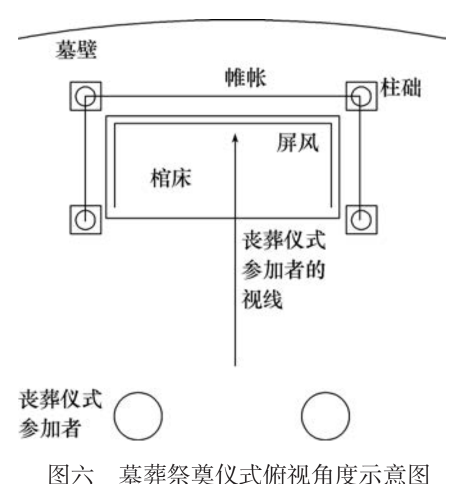
有关学者同时也讨论了屏风在魏晋南北朝墓葬中所具有的特殊的丧葬意义。例如，齐东方先生指出晋制葬仪中的墓葬祭祀活动与墓室祭台的设置[22]。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中所发现棺床、几案、帷帐、屏风等，不仅仅是"大象其生"对生宅室内场景的模仿，而且是"事死如事生"对墓主生前爱用之物的陈列，同时还是墓葬中举行祭奠仪式的物质遗存。也就是说，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虽然原本是墓主生前的实用品，然而当漆画屏风作为随葬品进入墓葬后，屏风完成了从日常使用品到丧葬祭奠仪式道具的转变，被赋予了全新的丧葬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墓葬中还出土了木质的屏风边框，上面的忍冬、人物、朱雀图案是与石雕柱础与棺床相一致的，而与屏风漆画木板上的图像不一致。进一步推测，屏风在日常使用中有原本配套的边框与床榻，但是出于进入墓葬后摆设的技术性原因或其他风格、意义层面的原因，临时制作了与石雕柱础、石棺床图案相一致的边框。虽然屏风在日常使用与作为随葬品的组装摆设并不一定遵循同一套方案，但应大体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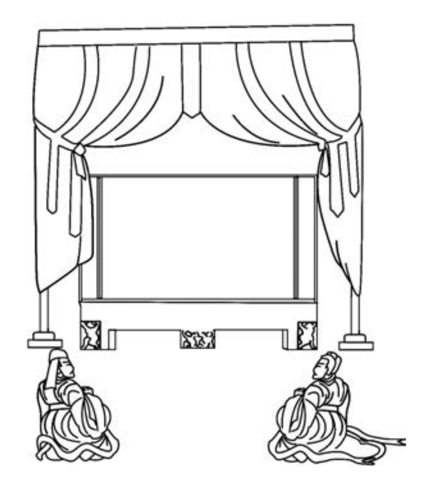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屏风使用场景的图像中，无一例外屏风都是与床榻直接连接，并无专门使用屏风柱础者。而从屏风使用场景的图像多出现帷帐，以及魏晋南北朝墓葬中出土的同类石雕柱础来看，笔者认为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的复原方案是漆画屏风放置于石棺床上，而石雕柱础是作为帷帐座放置于石棺床四周的。

随着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进入墓室，从日常使用品变为丧葬祭祀道具，其"图像程序"也在此基础上发生了改变。设计者在设计屏风时，有明确的预期观者，不会想到屏风会进入墓葬成为随葬品，进而成为丧葬仪式中的道具。而在丧葬仪式中，将引入第三类屏风图像的观者，即丧葬仪式的参加者。

在丧葬仪式的现场，屏风背面的图像被帷帐或狭小的墓室空间遮挡，只有屏风正面的图像可以被丧葬仪式的参加者看到。而参加者很可能按照固定的活动路线完成丧葬仪式，并借机观看屏风正面的图像，而不太可能在墓室中自由活动，更不可能在相对狭小的空间中窥探漆画屏风的背面。在这种情况下，设计者原本设计的正反两面二元的图像程序被彻底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图像意义——利用屏风正面所图画的群像作为墓主夫妇的画像（图六、图七）。



图六　墓葬祭奠仪式俯视角度示意图
（笔者绘图）



图七　墓葬祭奠仪式场景想象图
（笔者绘图）

可以作为对比的是，在北朝石榻围屏上无一例外都有墓主人的画像，无论墓主画像是正面偶像型的还是在一定场景之中的。这种选材一致性的背后应有其功能性的考量，一方面是将墓主画像作为丧葬仪式中祭祀、礼拜的对象，另一方面是利用墓主画像以表现文献中所称的“神位”。而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上并没有墓主的画像，就需要高士、列女的群像代替墓主像实现这些功能。

郑岩先生曾专文探讨唐以前墓主画像的问题，文中认为墓主画像并不具有写实性，而是画工利用通用的符号，在社会普遍奉循的价值观的影响下创作的[23]。这也是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上群像能够作为墓主夫妇画像的社会风俗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屏风上图像具体的形象与情节并不重要，决定图像内容的并非是图像的形式，而是社会的普遍期待。虽然屏风上有明确的榜题、经典的情节，画的是列女与高士，但在幽暗墓室中，丧葬仪式的参加者认为屏风上应该画有墓主的画像，那么这些历史人物群像就在丧葬仪式中充当了墓主画像。

可以与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对读的一例是河南洛阳北邙出土的石榻围屏画像，上面的群像被考证为孝子故事[24]。这些孝子故事皆有榜无题，图像则舍弃了经典的场景与细节，故事的人物被简化为坐在榻席上的男女。这种处理方式可能与作为随葬品的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同样都是借用其他经典图像的格套来充当墓主画像。

五、结　　语

不少考古学者曾以侦探破案比喻考古学研究，如陈胜前先生曾说：“微观层次上的考古学研究最像刑事侦查。就是利用一切可能发现的物证及物证分析来寻找导致事件的原因。”[25]曹兵武先生也曾说：“考古学家犹如现代社会派往古代社会的侦探，总希望

通过考古发掘能够获得更多的关于古代的信息。”[26]两位先生的论断同样适用于美术考古的研究。

在本文中，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的设计看似无规律，而破解其“图像程序”的关键在于屏风图像的观者。仅仅把研究的视野局限于作为封闭系统的屏风本体，则难以发现本体所包含的全部信息。探索屏风的图像程序也不止步于了解图像之间的逻辑关系，同时也试图揭示与漆画屏风相关的一干人的行为与思想。

通过对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个案的探讨，本文最后要强调的是美术考古的复杂性。

画工、设计者、艺术家的设计理念能否准确无误地传递给观者，在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的讨论中，先后提供了正反两个案例。屏风的设计者认为屏风会作为日常使用品，有明确的屏风图像预期观者，从而“刻意设计”了正反二元的“图像程序”。而随着屏风进入墓葬，与祭台、几案、帷帐等共同成为墓葬祭奠仪式中的道具，此时，可能作为墓葬设计者的丧家将屏风正反二元的图像程序彻底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作为墓主夫妇画像引出的全新的丧葬意义，而这一切都是屏风设计者所始料未及的。

在中国古代美术中，无论是地上的世俗美术还是地下的丧葬美术，列女、孝子、高士都是画工、艺术家们钟爱的题材，虽然地上美术与地下美术之间通过画工、粉本建立起了技法、构图上的联系，但图像的观者、功能、意义却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在本文的讨论中，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具有一系列地上世俗美术的特点，如大量的文字题记、座右训诫的功能、对于日常使用场景中观者的考量，而同一件屏风却又是作为丧葬仪式的道具随葬于墓葬中，这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地上世俗美术与地下丧葬美术之间既联系又区别的关系。

注　　释

[1] 关于该屏风正式的材料只有《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简报。本文图片依据的是：中国美术全集编委会．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原始社会至南北朝绘画［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153～163．

[2] 共有四种不同的复原方案。第一种方案认为漆画木板与石柱础组合放置在棺床前面。第二种方案认为漆画木板与石柱础组合以障住床后。第三种方案认为漆画木板与石柱础组合，是放置在石棺床上的四尺屏风。第四种方案为漆画木板直接架设在石棺床之上或安插在石棺床周围边缘石槽内。还有观点认为漆画木板与石棺床、石雕柱础皆无关。

a．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J］．文物，1972（10）：20～64．

b．易水（杨泓）．漫话屏风——家具谈往之一［J］．文物，1979（11）：74～79．

c．杨泓．考古所见魏晋南北朝家具（中）［J］．紫禁城，2010（12）：54～67．

d．韦正．北朝高足围屏床榻的形成［J］．文物，2015（7）：59～68．

e．宋馨．司马金龙墓葬的重新评估［A］．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出版社，2004：561～581.

［3］ 如果屏风是“十二牒”，那么现在只有完整的“五牒”漆画木板。如果屏风要障住石棺床的三面，那么缺失的要更多。

［4］ 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5］ 曾蓝莹．作坊、格套与地域子系统：从山东安丘董家庄汉墓的制作痕迹谈起［J］．美术史研究集刊，2000（8）：33～86.

［6］ 表中关于木板的编号依据简报，A 面与 B 面则是为了行文区分两面所设，都没有复原层面的意义。

［7］ 同［2］a.

［8］ 扬之水．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屏风发微［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3）：34～41.

［9］ 谢振发．北魏司马金龙墓的漆画屏风试析［J］．美术史研究集刊，2002（11）：1～55.

［10］ 还有一种可能的方案是分别在每块木板上绘制，再按照顺序进行组合，牒式的屏风很可能就是这样绘制的。而这种方案设计时会尽量将同一组图像与文字集中于同一块木板上，观察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应不是这种画法。另外一个现象是只有第一块和第二块拼合的木板的正反两面分别有一道纵向的界格，而其他木板则无，这种现象笔者未能得出合理的解释，但却进一步说明了屏风复杂的材料来源。

［11］《女史箴图》大英博物馆本纵 24.8 厘米，故宫博物院本 28.5 厘米；《列女仁智图》故宫博物院本 25.8 厘米；《洛神赋图》故宫博物院本 27.1 厘米，辽宁省博物馆本 26.3 厘米，弗利尔美术馆本 24.1 厘米。虽非原本，但尺寸应都接近于原本。

［12］ a．古田真一，曲翰章．对六朝绘画的一项美学考察——关于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画屏风［J］．国外社会科学，1993（6）：52～56.

b．志工．略谈北魏的屏风漆画［J］．文物，1972（8）：55～60.

［13］ 西京杂记（古小说丛刊）·卷四·梁孝王时忘忧馆时豪七赋［M］．北京：中华书局，1985：27.

［1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3（10）：4～40.

［15］ 王银田，刘俊喜．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壁画［J］．文物，2001（7）：40～51.

［16］ 汉书·卷一〇〇·叙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3：4200，4201.

［17］ 后汉书·卷二六·宋弘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6：904.

［18］ 玉台新咏笺注·卷二·娇女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90.

［19］ a．盐铁论校注·卷六·散不足［M］．北京：中华书局，1992：356．“故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

b．历代名画记·卷三·论名价品第［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43，44．“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华、孙尚子、阎立本、吴道玄屏风一片，值金二万，次者售一万五千；其杨契丹、田僧亮、郑法轮、乙僧、阎立德一扇值金一万。”

由此可见我国汉唐时期漆画屏风作为奢侈品价值之高。

［20］ 郑岩．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61．

［21］ 同［9］．

［22］ 齐东方．中国古代丧葬中的晋制［J］．考古学报，2015（3）：345～366．

［23］ 同［20］：192．

［24］ 赵超．关于伯奇的古代孝子图画［J］．考古与文物，2004（3）：68～72．

［25］ 陈胜前．考古推理的结构［J］．考古，2007（10）：42～51．

［26］ 曹兵武．考古埋藏学赘议［J］．南方文物，2016（2）：56．

Discussions on the Pictorial Program of the Lacquer Painting Screen from Sima Jinlong Tomb

Ji Yilong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a lacquer painting screen from Sima Jinlong tomb discovered in 1965 by Chinese archaeologists near Datong city in Shanxi province and proposes to analyze the pictorial program of the lacquer painting screen from a perspective of viewer: the viewers of famous women and sage figures are the nobles in bed and the viewers of loyal servant figures and admonish text are the standing servants. The lacquer painting screen produced a new funeral significance after the screen was placed in the tomb.

Keywords: Sima Jinlong tomb; lacquer painting screen; pictorial program; funerary ritual; funerary significance

赤谷城地理位置的探索及研究展望

孙 危　　肖 霄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郑州，450001）

乌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游牧民族，战国至西汉初年在今河西走廊地区活动，西汉中期迁至西域地区立国，其辖境为以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在此之后又频繁活动于中亚东部地区。作为一个国家，乌孙延续的时间也很长：上起西汉，下至南北朝时期，在西域历史上叱咤风云达5个世纪之久[1]。乌孙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中的第一大国，《汉书·西域传下》载："乌孙国……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而当时的西域诸国中，户、口、胜兵这三项最多的是龟兹，分别是6970户、81317口、胜兵21076人。均远逊于乌孙，由此可见乌孙之强盛。乌孙与两汉政权，特别是西汉王朝关系密切，先后有两位汉家公主远嫁乌孙，此举对汉乌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均起到了重要影响。据《汉书·西域传下》载："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2]这说明赤谷城是乌孙的都城，更是乌孙国的政治中心所在。所以，对赤谷城的研究是乌孙相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两汉时期"丝绸之路"相关研究的重要一环。而对该城的研究前提，首先就要确定其地理位置。本文将以文献材料为基础，并结合相关的考古发现，对赤谷城的地理位置展开探索并就今后的研究进行一些展望。

据史料载，乌孙属行国，即以游牧经济为主。因此，像这样的国家是否有"城"的存在，学界一直以来众说纷纭。首先，若根据张骞的记述，即"乌孙……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来看，乌孙应该不存在定居的情况，那就更遑论"城"的存在。再者，西汉时以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为公主，与乌孙昆莫猎骄靡和亲。猎骄靡年老，语言不通，公主悲愁，自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3]据此可以看出，当时即便是贵为昆莫右夫人的细君公主，初到乌孙时也只能居住在类似于今之蒙古包的穹庐中。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游牧民族是否存在定居情况都有争议。但随着考古发掘中对游牧民族定居证据的发现日益增多，游牧民族也存在着定居现象这个观点逐渐得到认同。例如，就目前的考古资料而言，在部分乌孙时期的遗址中有住宅遗迹，此外还发现了陶

器、石磨盘等遗物，因而，有学者逐渐认同乌孙时期存在着定居的情况。其中，A. H. 伯恩施坦在鲁郭沃耶村（现名为库兰）附近进行调查时发现了鲁郭沃耶丘遗址。在该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由泥砖修建的住宅遗址，还有陶器、石磨盘等遗物[4]。

1962 年，K. A. 阿奇舍夫在科特梅尼套山脉的南坡上发现了一处较大的遗址——阿克塔斯 2 号遗址，这里地处克格尼河右岸的库拉伊拉峡谷中[5]。在该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用石块砌成地基的固定住宅，并且与这些住宅一起被发现的还有用于饲养动物的棚舍遗迹。此外，还发现了石锄和石磨盘等遗物。而在靠近该遗址的南面山坡处则发现了许多自流渠，在这些自流渠所灌溉的土地上还围有篱笆。阿克塔斯 2 号遗址的年代为 1 ~ 3 世纪。另外，通过古植物的样本检测，发现图楚萨伊遗址的居民种植了小麦、黍和大麦，并且利用人工灌溉的形式来浇灌这些农作物[6]。总之，这些考古证据或许可以证实，乌孙居民中至少有一部分应该属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状态。由此还可以推测，乌孙境内或许存在着“城”。这就为我们研究赤谷城的地理位置提供了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

对“赤谷城”地理位置的研究，长期以来都是以文献为主。而相关考古发现的日益增多，为该城的位置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证据。

关于“赤谷城”地理位置的研究，学术界有多种观点，但大体可分为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赤谷城位于特克斯河流域，丁谦、孟凡人等主张此说，具体位置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温宿县、乌什县之北，特克斯河之南[7]。第二种观点认为，赤谷城在纳林河的上游，谭其骧即主张此说，具体来说是在伊什提克[8]。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赤谷城位于伊塞克湖沿岸地区，国外专家大多支持此意见，并且，随着国际学术交流日渐频繁，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开始支持此观点，如杨建新、刘国防等。

随着考古调查和发掘的不断开展，伊塞克湖沿岸地区发现了不少遗迹和遗物，因而给赤谷城地理位置的探讨提供了不少证据。本文将主要探讨第三种观点。具体来看，第三种观点又可细分为几类略有差异的看法。其中，杨建新先生认为赤谷城位于伊塞克湖东南[9]；刘国防先生认为赤谷城位于伊塞克湖东北岸的蒂普或其南一带[10]；苏北海先生则认为赤谷城为冬都，其位于伊塞克湖东南一带，而特克斯河流域为乌孙的夏都[11]；俄国的谢苗诺夫认为其在伊塞克湖西南的阿特巴什河下游[12]；俄国的巴透尔德认为赤谷城位于伊塞克湖东南一带[13]；日本的内田吟风则推断赤谷城在伊塞克湖东的纳林果勒[14]；《中亚文明史（第二卷）》亦认为赤谷城当位于伊塞克湖盆地，但确切位置尚未确定。

克拉普罗特认为，乌孙王“居住在赤谷城或红谷城，它靠近盐海或盐湖——又称热海或暖海的东岸”。里特尔援引克拉普罗特的观点写道：中国人把乌孙王的居住地称为赤谷城，意为红色的河谷。该城位于盐海或热海，即伊塞克湖的东边。也许基于克拉普罗特的观点，以及亚金夫对赤谷城位于伊塞克东北方向的意见，里特尔和首位对天山西段进行研究的学者 П. П. 谢苗诺夫在前往伊塞克湖旅行时，注意到了当地关于秋巴河口

古代废墟的传说。“根据布鲁特人的说法，在秋巴河口边，即伊塞克湖东端水下埋藏着一座古代城市废墟。布鲁特人相信，只有在水位较低时才能看到这座古城废墟。”[15]而《俄罗斯皇家地理统计词典》的第 3 卷中则写道，据《中国编年史鉴》记载，赤谷城“位于伊塞克湖东北岸”，“很可能有关秋巴河口发现古城的那些传说所指的就是赤谷城”[16]。颅骨学杂志中的一位作者赞同 П. П. 谢苗诺夫关于赤谷城位于秋巴河口的意见，“消亡城市的传说和水下建筑的断壁残垣可能是属于被毁灭的赤谷城的，而这些从湖中冲上来的物品则属于这座城市的居民——乌孙人”[17]。

由于伊塞克湖周围的诸多考古发现，以及学术研究对赤谷城的地理位置的发现有所进展，所以不少专家学者逐渐认同“赤谷城”应该就在伊塞克湖附近。

就文献而言，赤谷城地理位置的确定，主要是根据《汉书》和《新唐书》中的相关记载。其中，刘国防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用功颇深，他在《汉代乌孙赤谷城地望蠡测》一文中，根据中国古代文献对赤谷城的地理位置进行了细致推测，其研究结果认为赤谷城位于伊塞克湖东北岸的蒂普或其南一带[18]。

而从考古学方面的研究来看，19 世纪以来不断有各国的专家学者对伊塞克湖附近进行发掘和研究，这为乌孙赤谷城地理位置的判定提供了不少证据。19 世纪初至今的约两个世纪中，这里的考古学研究工作可分为两个阶段，具体如下。

第一阶段，多是在伊塞克湖附近进行简单的调查，并初步了解到伊塞克湖周围及水下有遗迹和遗物的存在，进而推测部分遗址可能为乌孙赤谷城，具体如下。

19 世纪 20 年代，鞑靼商人伊萨耶夫首次对伊塞克湖的水下遗迹进行了报道。稍晚，瓦里汉诺夫在久普斯湾一带发现了城址。关于在伊塞克湖岸边发现的遗物，曾被认为来自于乌孙赤谷城[19]。

1856 ~ 1857 年，著名的旅行家谢苗诺夫在天山地区考察，他曾在日记和书中记录到伊塞克湖中发现的遗物，其时代是十分古老的，赤谷城应该位于库尔梅尼湾[20]。

1869 年，Г. А. 科勒帕科夫斯基对科伊萨雷景区进行了首次调查，发现大量的历史遗迹，有砖块、人骨、陶器以及中国的方孔铜钱[21]。因而推测此处可能有古城址。

1872 年，军事研究者科斯杰尼科在《七河边区概述》中提到伊塞克湖中发现的遗物和两处巨大的水下遗迹，一处是乌孙的首府赤谷城，另一处是基督教教堂[22]。

1888 年，阿布拉莫维奇到伊塞克湖了解养鱼业的情况，他提到：“相较于 1887 年秋季，水位有所升高……如果天气晴朗，在图拉伊戈尔通讯站附近，从离岸 60 俄丈（约 128 米）的水面向下望，可以看见水下有用石头建成的墙壁。河水还将一些烧制的砖块冲到了岸上。另外，一些中国的铜钱、铜器和陶制的食器，以及人的颅骨也被冲到湖岸边。据说，湖所在的位置曾经是一座中国城市，后来城市被废弃了，但没有人知道发生过什么，也没有人知道这座城市的名字[23]。”虽然没有明确证据证明这是什么时期的城市。但可以推测，它很有可能就是乌孙的赤谷城。

至 19 世纪末，已积累了许多关于这些古迹的信息，并引起了阿里斯托夫等学者的

兴趣。阿里斯托夫在自己的论著中用专门的一章来描述乌孙的日常生活、赤谷城以及其他伊塞克湖沉没的古迹[24]。

第二阶段，主要是对伊塞克湖周围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和调查，进而发现了更多的遗迹和遗物，并了解了各个遗迹的分布范围和年代。这对寻找赤谷城提供了更加科学的依据，简述如下。

1926 ~ 1927 年，П. П. 伊万诺夫对科伊萨雷景区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并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和中世纪的遗物，其中包括陶器、砖块、磨盘、石块、钱币、装饰品、动物骨骼和人骨等遗物[25]，并绘制了系统的伊塞克湖沿岸考古遗迹分布图[26]。而这里发现的石人像和鄂尔浑－叶尼塞文字则能证实，在城市出现前，科伊萨雷所在的地区是操突厥语的游牧民族的居地[27]。

1958 ~ 1960 年，吉尔吉斯科学历史研究所对伊塞克湖水下遗址进行了非常专业的科学考察。在此次水下调查工作中，发现了伊塞克湖岸边的诸多遗迹，如托鲁－阿伊吉勒、巴耶托沃、库尔斯卡耶、奥伊塔勒、卡梅尼卡、科伊萨雷、哲德奥古兹等。他们从湖底被冲刷的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刀、矛头、镞和圜底陶器。此外，还有用于祭祀的青铜鍑、石磨盘、纺纶、平底陶器。并且在水下考古作业中发现了沉没的墙体遗迹，以及带有乌孙文化特点的陶器、中国铜镜等遗物。此次水下考古工作所获材料得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就是，湖底一部分的遗物属塞人－乌孙游牧文化[28]。

1960 年，在 Д. Ф. 维尼克的领导下，吉尔吉斯苏维埃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伊塞克湖考古队对科伊萨雷景区内的遗迹进行了发掘。这些遗迹毗邻湖岸，此外考古队还派遣蛙人潜入伊塞克湖中，对这一区域内沿湖岸长约 6 千米的湖底进行了调查。在调查工作中，他们发现了一些时代较早的、被淹没的废墟。他们还在卡瓦克村附近发现了一个时代较早的城址群和遗址群，其中前者有卡瓦克 1 号、卡瓦克 2 号和卡瓦克 3 号城址，后者则有博加特洛夫遗址群，共包括有五处居址[29]。尽管科伊萨雷景区内的大量遗物时代较晚，因而被推测为中世纪的城址。但在该遗址内发现了突厥时期的遗物，并且在遗址周围还发现了时代较早的城址群和遗址群。而据《资治通鉴》载，隋炀帝大业五年条：“（西突厥）处罗（可汗）多居乌孙故地。”唐武德二年条：“（西突厥）统叶护立……勇而有谋，北并铁勒，控弦数十万，据乌孙故地……[30]”因而可推测，此时乌孙已经南迁。而《北史 · 西域传》载：“乌孙国，居赤谷城，在龟兹西北……”据同传的“蠕蠕”条载：“其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并且 437 年，北魏使董琬等前往乌孙，《北史 · 西域传》如是记载：“琬过九国，北行至乌孙国。”[31]可推测，在 4 世纪下半叶，乌孙还没有南迁。综上研究认为，乌孙大概可能是在 5 世纪中叶左右南迁至葱岭内外[32]。因突厥占领乌孙故地时间与乌孙南迁的时间相距不远，而赤谷城又是西域重镇，因此不管是柔然还是突厥很有可能在控制乌孙故地后继续沿用赤谷城或在原有的废墟上新建城市。

1983 年发现了达尔罕水下城址。其部分遗物属塞人，这部分遗物来自湖底，包括

了 2 把保存较好的青铜短剑、1 件带流的青铜鍑、1 件用于祭祀的大型青铜鍑的侧壁残片、3 块石磨盘残件和一些陶片[33]。虽然这些遗物属于塞人，但乌孙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国内有乌孙、匈奴、塞人、月氏等民族混居，因而也可能是乌孙国的塞人所遗留。

2003 年，从伊塞克湖湖底又打捞出许多遗物。并在卡拉－奥伊湖区进行了水下调查，在距离湖岸边 2 ~ 3 千米，深约 5 米的湖底沉沙中发现了一件较大的青铜鍑。另在距其 10 米处，也发现了青铜鍑。此外还从湖底发现了大量完整的圜底器和带有纹饰的陶器。这些遗物根据其特征，大致可判断时代为公元前 4 世纪 ~ 前 3 世纪。另外发现有其他遗物，其时代为塞人－乌孙时代（公元前 3 世纪 ~ 前 1 世纪）[34]。

从大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来看，伊塞克湖东北岸及其以南区域存在着许多关于乌孙活动的痕迹，并且发现有城址，还发现了一些与中国相关的遗物。乔坎・瓦利汉诺夫报道说：在伊塞克湖东南发现了古城遗址，并在古城址内发现了汉式建筑、汉代遗物和汉字题铭，在古城址郊外还发现有古代灌溉渠道[35]。乌孙与西汉王朝联系密切，而细君、解忧两位和亲公主也都长期居于赤谷城。因而，这些汉代建筑和遗物很有可能与此有关。

除了关于赤谷城遗址和水下考古发现的证据以外，还在伊塞克湖沿岸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墓葬。这些墓葬也为寻找赤谷城的位置提供了有力证据，分述如下。

1928 ~ 1929 年，瓦耶沃德斯基和格里亚兹诺夫在伊塞克湖附近地区进行了考古发掘，他们发掘的是古代游牧人的冢墓，墓中出土的随葬品有圜底陶器、带柄铜镜，其中柄部为鸟首形象，此外还有短剑、镞等，这两位学者认为这些遗物属乌孙时期（公元前 3 世纪 ~ 公元 1 世纪）[36]。

在伊塞克湖东岸的卡拉科里市附近也发掘了三处墓地。其中一处墓地位于卡拉科里市郊的一座木材加工厂附近，这里地处卡拉科里通往阿克苏的道路出口。这处墓地共有六座大型冢墓，它们呈链状南北向排列。封冢直径在 40 ~ 50 米，而高在 4 ~ 5 米。封冢下面有三个墓圹，自北向南呈一条直线排列。每个墓圹上面都有巨石堆，其中最大的石块高度能达到 0.75 米。而石堆的高度则在 1 ~ 1.5 米，宽度在 3 ~ 4 米。因为墓地所在地区并没有这种巨石，因此这些巨石应该是从卡拉科里河的河谷地带运送过来的，该河距墓地约有 2 ~ 3 千米。并且，在墓葬中出土有产自中国的漆器，表明该墓的年代下限为 1 世纪[37]。这些冢墓规模很大，可以想象修建时所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呈链状分布的墓地，则应是家族墓地的特点。每一座冢墓埋葬的都是一个家庭或家族中的代表人物。如此看来，每一条呈链状分布的冢墓群中均包含了几代人的墓葬。而在这些冢墓中所使用的葬仪也可谓非常奢华。其中大多数的墓葬中出土了相当多的奢侈品，如金器、用黄金扣饰装饰的服装、来自中国的漆器，此外可能还有很多不为我们所知的随葬品。这其中的一些遗物可能为舶来品（中国的漆器、希腊－巴克特里亚的金质萨提头像等）。并且，A. И. 杰列诺日金和 M. B. 瓦耶沃德斯基于 1929 年在楚河流域、伊塞克

湖沿岸以及杰尔斯克伊—阿拉套山脉等地区进行的考古调查，发现呈链状分布的冢墓多见于平坦的河流两岸、伊塞克湖岸边的台地以及山麓地带，而这些地区均属于越冬之处[38]。

另外，在距卡拉科里市 4 ~ 5 千米处，还有两处墓地。它们位于山麓地带的缓坡上，占地总面积达 0.7 平方千米，墓葬有数百座之多。这些墓葬上面的封土并不大，直径在 8 ~ 15 米，高在 0.2 ~ 0.8 米。其中的一些从地面上来看很不明显，即只能在凸起的表面上看到两三块石头，或是在石块上生长着带刺的灌木类植物。绝大多数封冢的高度在 50 ~ 60 厘米，且呈链状分布，从外形上来看，它们与卡拉科里墓地的封冢非常相似。

伊塞克湖东岸发现大型的乌孙墓葬，或许可以推测乌孙的贵族多聚集于此，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赤谷城可能就位于伊塞克湖附近。

经过第二阶段的科学发掘，在伊塞克湖附近发现遗址的同时，也发现了在伊塞克湖东北岸及其以南地区分布着大量乌孙时期的墓葬。一般墓葬区的分布与居住地具有密切的关系。墓葬区一般不会离居住址太远。这说明伊塞克湖附近有乌孙人聚集于此并在此活动。而对于游牧民族而言，很少有大量人口聚集的现象。能聚集如此多的人口，就应该是作为游牧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所在。而且，伊塞克湖东北岸附近发现的墓地规模较大，随葬品丰富，当为贵族墓葬。如此大规模的墓葬，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建造出来。因而这附近应该有“城”，进而聚集大量的劳动力。

这座能聚集大量的乌孙贵族和劳动力的“城”应该就是赤谷城。另外，根据伊塞克湖的地理环境观察来看，其海拔较高，四面环山，湖东岸位于昆格山与中部天山山谷之间，气候受伊塞克湖影响，夏季凉爽，冬季不甚寒冷。并且河流广布，地势平坦，是理想的驻牧之地。这也与史料中对赤谷城“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樠”[39]的记载相符。并且，在伊塞克湖东北岸的湖边地带，至今还广泛生长着一种低矮的草本植物——碱蓬，其为紫红色，这可能与赤谷城的命名有关系。至今当地人仍然称呼蒂普西南地方为 Chigu（赤谷），这很有可能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记忆[40]。此处交通便利，也是商贸路线的重要通达之所。因此，赤谷城很有可能就位于此地。

关于赤谷城的地理位置问题，学术界一直在进行着不懈的研究，尤其是伊塞克湖附近大量的考古发现、伊塞克湖的水下古城址遗迹的发现和水下遗物的打捞，以及“丝绸之路”的研究，使“赤谷城”越来越成为研究热点。关于“赤谷城”，由于文献记载较少，而且乌孙为游牧民族，考古发现多为墓葬，城址发现还是非常少的，而伊塞克湖附近的发现也多为中世纪的城址，因此对于“赤谷城”的研究而言，一大困难就是相关资料非常少。

根据现有的资料，可对赤谷城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大胆的推测。

首先，关于赤谷城的地理位置，笔者大致同意苏北海先生的观点，即赤谷城为冬都，特克斯河流域为夏都[41]。而根据上述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对赤谷城位置的判断依据有了更多的补充。其中，根据我国的文献记载来判断，赤谷城应该位于伊塞克湖东

北岸及其以南地区。而在这片区域内，就考古调查和发掘而言，也确实发现了许多关于乌孙的遗迹，特别是大量墓葬和部分城址的发现，其中一些墓葬为大型的贵族墓葬，可能为当时乌孙贵族聚居的区域。此外，在个别遗址内还发现了来自中国的遗物。这些证据使我们可以大胆推测赤谷城应该位于此地。但这并不意味之前有学者所认定的赤谷城位于特克斯河流域是错误的，只是它不是赤谷城，而是乌孙的另一个都城罢了。游牧民族的都城一般都有夏都、冬都之分，像乌孙这样的游牧民族也不例外。所以赤谷城很可能是乌孙的冬都，夏都则可能在特克斯河流域的昭苏盆地。

从特克斯河流域的考古发现来看，乌孙墓葬主要分布在昭苏附近的几个县境内，其中以昭苏和特克斯两县最多。就这两个县而言，又集中在从特克斯河流域到天山的这片草原地带[42]，且不乏规格较大的墓葬。其中，昭苏县下台地图古墓葬达 200 座之多，而最大的土墩墓墓底周长有 260 米左右[43]。昭苏县喀拉墓地有土墩墓 72 座，其中规模较大的 M1 封堆直径有 30 米，M4 封堆直径为 28 米[44]；昭苏县巴斯喀拉苏西墓地有土墩墓 141 座，其中规模较大的 M1 封堆直径为 21 米，M2 封堆直径为 21.6 米[45]。这些墓葬规模宏大，绝非一般的平民所能够修建的，应该属于大贵族所有。作为夏都的昭苏盆地，其环境适宜，是发展畜牧业的优良牧场。因为夏天主要是随畜逐水草，也是一些统治者游山玩水的好时节。所以作为夏都，昭苏盆地尽管有许多乌孙的大型墓葬，但却并不一定有大型的居民点[46]。另外，从地理和气候特点来看，以昭苏县为例，其海拔在 1000 ~ 2000 米，年降水量一般为 500 毫米，全年日照时间有 2400 多个小时，年平均气温只有 2.5℃，无霜期也只有一百天。这种气候和地理特点，不适宜农业生产，但却非常适合发展畜牧业[47]。而据《汉书 · 西域传》载："汉遣长罗侯常惠将三校屯赤谷。"说明赤谷城是有农业存在的，赤谷城应为乌孙的冬都，因位于伊塞克湖附近地区的赤谷城，较之昭苏地区，雨雪较少，且冬季亦没有昭苏寒冷，故适合作为冬都。

其次，赤谷城的性质问题。众所周知，乌孙是一个典型的游牧国家，对于传统的游牧民族而言，"城市"的需求并不是特别强烈。故赤谷城究竟是传统的城市还是一个临时性的大型居民点，或者它只是单纯汉家公主居住的地方。之前的推测认为，乌孙只是一个纯粹的游牧民族，因而不需要城市，也不会有具有定居性质的城市。赤谷城最初应是为汉朝公主所建，因她不能适应乌孙的"圆顶毡房"，乌孙昆莫便为她建造了宫殿，而且昆弥也只是两三月才来此地看望她一次。在这种宫殿中，肯定要建造能供仆人和随从居住的房屋，此外侍奉公主及其子女的手工艺人、商贩、菜农及种庄稼的农民也开始在附近定居。还值得一提的是，因乌孙属游牧民族，可能并不需要用来长期定居的城市，所以在汉朝最后一位和亲公主解忧公主于公元前 51 年返回汉地后，又经过了 10 ~ 15 年，赤谷城被毁，它总共存在了约 60 年[48]。

然而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学术界多倾向于赤谷城属临时性的大型居民点，但多半只是推测，并无确凿的考古学证据。就与乌孙相关的考古发现而言，目前考古学家已

在外伊犁、准噶尔和吉尔吉斯斯坦阿拉套的山麓地带、中央天山地区、伊犁河和楚河流域以及楚河与伊犁山脉的峡谷地带，发现了大量的日特苏类遗址，具有定居性质是这种遗址的显著特征。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日特苏类遗址的时代属于乌孙时期，而最典型的则应该是萨雷托加伊遗址[49]。

发掘结果表明，这处遗址的住宅遗迹面积达到了数平方千米。此外还在地表采集到了石锄、石磨盘、石碾和陶器，其中陶器中可识别出来的器型有双耳罐、碗。并在该遗址附近发现了灌溉渠的遗迹[50]。所以，根据这些证据，我们可推断赤谷城也有可能是传统的城市。此外，还有学者对伊塞克湖打捞出来的遗物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赤谷城并非是外来民族于公元前2世纪修建的，换言之，该城的建设者是乌孙当地的居民[51]。就目前所发现的考古遗物而言，较文献记载中提到的该城年代要早大约5个世纪。所以赤谷城不仅仅是乌孙游牧统治者的大本营所在地，也是手工业者和农民云集的一座城市。但作为一个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国家，乌孙的农业规模并不会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维系赤谷城的存在，首先可能还要依靠商业，即收取过路费。由于张骞凿空西域之后，开通了沙漠丝绸之路，赤谷城当位于丝绸之路的重要干线上，所以有了重要的财富来源。其次，由于汉乌关系的密切，西汉方面也应该会经常大批量的给予乌孙粮食、丝绸等物品，而乌孙除了自用以外，或许还把剩余部分又投放到丝绸之路的市场上。这样不但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也能长久地维系赤谷城的存在。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可说明赤谷城不仅是一个固定的城市，同时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商贸中心，该城与中国及乌孙周边的其他国家还保持了长期的商贸互动[52]。

我们今后的研究方向，第一，要搜集更多的关于乌孙赤谷城的考古资料，并继续深入研究伊塞克湖地区的相关考古发现。尤其是伊塞克湖的水下调查工作一直在进行之中，这里确实发现了大量的古代遗迹，因此需要我们根据已确定的乌孙考古文化特征来判断水下的遗物是否为乌孙所遗留，还要根据其他的考古资料为赤谷城位置的确定寻找蛛丝马迹。第二，要在特克斯河流域开展一些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并结合已有的乌孙考古发现，进而确定乌孙夏都的所在地，最终解决赤谷城的地理位置问题。

另外，众所周知，乌孙在西迁伊犁河流域之前是典型的游牧民族。西迁之后畜牧业虽仍占绝对优势，但农业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在1世纪之后，在与乌孙有关的考古遗迹中，陶器这种代表农耕文明和定居生活的遗物发现的数量很多。所以，我们在寻找赤谷城位置的同时，还要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判定赤谷城的性质，进而确定乌孙这样典型的游牧民族是否存在定居及农业经济，进而对乌孙的经济状况进行一个较为全面且深入的剖析。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乌孙考古研究”（项目批准号：15BKG013）的阶段性成果。

注　释

［1］ 钱伯泉．乌孙的西迁、扩散和消失［J］．新疆社会科学，2006（5）：115～121．

［2］ （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同［2］．

［4］ Байпаков К. М. Оседлость, земледелие и городская жизнь у саков и усуней Жетысу (Ⅶ до н. э. —Ⅳ в. н. э.). Феномен кочевничества в истории Евразии. Номадизм и развит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й коференции. Алма-Ата, 2007.

［5］ Акишев К. А. Зимовки-поселения и жилища древних усуней. Извест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КазССР No 1. Алма-Ата，1969.

［6］ 同［4］．

［7］ 孟凡人．乌孙的活动地域和赤谷城的方位［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1）：31～35．

［8］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9］ 杨建新．关于汉代乌孙的几个问题［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2）：66～79．

［10］ 刘国防．汉代乌孙赤谷城地望蠡测［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1）：118～128．

［11］ 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88．

［12］ 谢苗诺夫．1856—1857 年天山游记［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

［13］ 〔俄〕巴透尔德著，赵俪生译．七河史［M］．兰州：西北民族学院语文系蒙古语教研室．1978．

［14］ 内田吟風．月氏のバクトリア遷移に關する地理的年代的考證（下）［J］．東洋史研究，1938（5）．

［15］ Аристов Н. А. Усуни и кыргызы или кара-кыргызы: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и быта населения западного Тянь-Шаня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е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географии. — Б.: Илим, 2001. 582 с.

［16］ 同［15］．

［17］ Известия общества любителей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при И. москов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том 68, Москва, 1890 года, стр. 177.

［18］ 同［10］．

［19］ Плоских В. В. История и проблем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затонувш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Иссык-Куля（по архивным данным и материалам экспедиционных изысканий）.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кандидат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Бишкек —2012.

［20］ 同［19］．

［21］ 同［15］．

［22］ 同［19］．

［23］ 同［15］.

［24］ 同［19］.

［25］ 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урочища Кой-Сары.

［26］ 同［19］.

［27］ 由吉尔吉斯斯坦的考古人员整理并提供 .

［28］ 同［19］.

［29］ Работы Иссык-Куль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тряда в 1959 году. Извест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КиргССР. Сер. обществ. наук. - 1961. - Т. 3. - Вып. 3.

［30］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31］ （唐）李延寿．北史・西域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2］ 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33］ 同［27］.

［34］ 同［19］.

［35］ 同［11］.

［36］ 同［19］.

［37］ М. В. Воеводский и М. П. Грязнов. Усуньские могильники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 // ВДИ, № 3, 1938, стр. 162-179.

［38］ 同［37］.

［39］ 同［2］.

［40］ 同［10］.

［41］ 同［11］.

［42］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民族研究所考古组．昭苏县古代墓葬试掘简报［J］．文物，1962（Z2）：98 ~ 102.

［43］ 同［42］.

［44］ 伊犁地区文物管理所．昭苏县喀拉苏墓葬发掘简报［J］．新疆文物，2000（1，2）：30 ~ 37.

［45］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昭苏县巴斯喀拉苏西墓葬考古发掘报告［J］．新疆文物，2014（2）.

［46］ 苏北海．汉代乌孙居地考［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1）：20 ~ 28.

［47］ 同［11］.

［48］ 同［15］.

［49］ 同［4］.

［50］ 同［4］.

［51］ 同［19］.

［52］ 同［19］.

Research on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Chigu City

Sun Wei　Xiao Xiao

Abstract: The Wusun were an important ethnic group in northwest China during the Han dynasty. It was the most important group among the thirty-six western countries recognized by the Han dynasty. Two princesse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successively married with the Wusun Kunmo. Therefore, in this period, the Wunsun maintained close contact with the Han dynasty. Chigu City was the capital of the Wusun and their political, economic, military and cultural center. The study about Chigu Cit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Han and the Wusun, and on the Silk Road in general.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the Chigu City is still widely debated. Until now, most studies are based on historical texts. Many remains, however, were found during archaeological survey and excavations at Lssyk-Kul Lake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 The latter provide some reliable evidence for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Chigu City. The Wusun was mainly sustained by a pastoralist economy, so that their capital cities were likely divided into winter and summer capitals. Based on both historical texts and archaeological data, we concluded that Lssyk-Kul Lake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 was the location of the winter capital of the Wusun, thus the location of Chigu City. In addition, a large number of relevant archaeological sites were found in the Tekesi River basin, which might have been summer capital of the Wusun.The enquiry on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Chigu City is essential to research on the subsistence mode of the Wusun,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se pastoralist groups also had settlements and practiced agriculture.

Key words: Wusun; Chigu City; geographical location

北齐《闾子燦墓志》笺证

郭晓燕[1]　李鹏为[2]
（1. 晋中市博物馆，晋中，030600；2. 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邯郸，056002）

近年来发现了《北齐故征虏将军西兖州别驾闾子燦墓志》[1]（以下称《闾子燦墓志》），根据志文可知其出土于安阳古野马岗。墓志“正方形，边长 54 厘米。志文 27 行，满行 30 字。未见志盖”[2]。志文书风粗犷，布局亦不甚整齐。根据志文可知，墓主为北齐征虏将军、西兖州别驾闾子燦，系柔然王族后裔，《闾子燦墓志》的出土，对于研究柔然王族后裔进入中原以后的相关情况提供了重要信息。

一

为研究方便，参酌已有释文，现将墓志释录如下（图一）：

君讳子燦，字思明，河南洛阳人也。其先业居北海，世系单于，自古称强，历今弥」盛。任真行朴之性，无文成化之道，盖出天然，不关礼教。缃素所以共传，簡竹由」来是载。至如今者，可略而述。太祖弗，即茹茹国主，魏道武之䀀，以家国离艰」，爨同犯伯，因拥户四万来宾，魏主赐爵高昌王、驸马都尉，于是世贤相继，冠盖」连阴，六条之美接宣，三司之盛不绝。是以室同万石，荣比五侯。世秉日磾之忠」，门出季札之让。祖懿公雅好文史，遵仁履义；父穆公俊杰飘举，流誉一时」；君禀气积善之征，岸出昆山之润；讵假学成，本应天挺，譬珠匪斫，方竹自青。得」于怀抱，萧然靡秽；年居木马，智号成人。爰处青矜，问一知十。是以名与日下均」奇，谕共黄中比异。心脱文史，尤重交结。席满胜宾，辙多长者。年被召为司州主」簿，寻为孝明帝挽郎。神州取吏，才地兼萃。大行选士，人资并擢。无愧此时，君独」标美。永安元年，以挽郎定第，解褐司空西閤祭酒；天平二年，除冠军将军转兼」从事中郎。自□履槐庭，□整鼎务。助味成结，庶功无爽。又除征虏将军。遭穷停」解，居丧过礼，毁几灭性。鸠茹可俦，鹿甓斯偶。每辰号洞，凄感四邻；有慰发声，哀」动行路。御史中丞高仲密处四丛之崇，高献台之选，闻君籍甚，引入绣衣，以礼」告辞，苦不获

免。一乘聪马，五察黄沙。明目张胆，豪家俟息。武定元年，文襄皇帝」当霸魏之朝，居推毂之重，躬临选部，广抽髦俊，特以郎官久杂，兰艾同斑，留意」沙汰，非人莫任，擢补别兵郎中，莅职三载，出为西兖州别驾。既骋骥足，实□士」元之风。朝敦吏首，便拟邦国之诔。方致休征之位，庶保黄苟之期。溘」同朝露，春秋卌一，以天保二年五月十六卒于圣城。粤以天保三年十一月廿」一日葬于野马岗东北豹祠之南，刊石勒名，寄之泉壤。其词曰：

履真成化，据武称雄。文不假餝，道自敦风。威流海□，气慑西戎。洎宾赤县，蕃屏维」功。乃祖及父，六条三事。杞梓接连，歌谣刊志。载生兰芷，含奇挺异。实符应善，高」门是嗣。由孝显忠，入从簪屐。起绩神州，发声纨绮。似桂含芳，陵冬禅美。如松叹」月，临秋未毁。助鼎有谐，杞兰旌谕。绣衣逢靡，

图一 《闾子璨墓志》拓片

海沂闻附。信结朋侪，政兼行住。逸」翮始冲，殲善何务。有生终灭，主理谁嗟。所凄报施，顿爽幽遐。松门一远，泉路方」赊。亲宾掩泪，行渡停车。

二

根据志文可知，墓主闾子燦，字思明，河南洛阳人，系柔然后裔。太祖弗，祖闾懿，父闾穆。太祖弗，应即武定二年（544年）《征虏将军兖州高平太守闾祥墓志》（下文称《闾祥墓志》）[3]所载闾祥之高祖“阿弗”。据安阳旧出《闾伯昇墓志》[4]志文可知，闾伯昇与闾祥二人世系相同，显系兄弟，已有学者指出[5]，无须赘述。《闾祥墓志》载明墓主系茹茹国主之六世孙，阿弗为闾祥兄弟二人之高祖。而在《闾子燦墓志》中，闾弗系其太祖，如此，闾祥兄弟辈分要高于闾子燦。闾祥武定二年卒，卒年五十三，则其生于491年。而闾子燦天保二年（551年）卒，卒年四十一，则其生于510年，比闾祥晚生二十年，而世系已远隔两代。

闾祥兄弟墓志均未详言其高祖闾弗事迹，而《闾子燦墓志》的出土，使得我们对于闾弗的经历有了清晰的了解。阿弗是“魏道武之聟”，“聟”，“婿”的异体字。阿弗入魏在北魏初年。“以家国离艰，爨同犯伯，因拥户四万来宾。”“爨”字，原释作“橐”[6]，误，《说文·爨部》：“齐谓之炊爨。[illegible]象持甑，冖为竈口，廾推林内火。凡爨之属皆从爨。”墓志“[illegible]”字“冖”下之字从“廾”从“灬”，正是“爨”字。所谓“爨同”，即“同爨”，同灶居食，不分家之意。《礼记·檀弓上》：“从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缌。”《魏书·杨播传》：“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缌服同爨，庭无间言。”皆是其意。“犯伯”，指兄弟不睦。这段话实际上隐晦地叙述了闾子燦这一支柔然后裔来到北魏的历史背景，是一段异常珍贵的史料。《魏书·蠕蠕传》里也非常清楚地记录了这段史实。《魏书·蠕蠕传》：

> 地粟袁死，其部分为二，地粟袁长子匹候跋继父居东边，次子缊纥提别居西边。及昭成崩，缊纥提附卫辰而贰于我。登国中讨之，蠕蠕移部遁走，追之，及于大碛南床山下，大破之，虏其半部。匹候跋及部帅屋击各收余落遁走，遣长孙嵩及长孙肥追之，渡碛。嵩至平望川，大破屋击，禽之，斩以徇。肥至涿邪山，及匹候跋，跋举落请降。获缊纥提子曷多汗及曷多汗兄诰归之、社仑、斛律等并宗党数百人，分配诸部。缊纥提西遁，将归卫辰，太祖追之，至跋那山，缊纥提复降，太祖抚慰如旧。

道武帝于登国六年（391年）讨伐蠕蠕，此时蠕蠕由地栗袁二子共管，长子匹侯跋管理东部蠕蠕，次子缊纥提负责西部蠕蠕，缊纥提依附铁弗部刘卫辰。结果此役蠕蠕大败，匹侯跋、缊纥提俱降。匹侯跋先降，缊纥提先败降再遁，最终不得已方降。及至后

来，缊纥提之子曷多汗以及社仑、斛律等宗族又西走，曷多汗等人为北魏长孙肥截杀，社仑等人转投匹侯跋，社仑后又杀匹侯跋北遁，自立为丘豆伐可汗。匹侯跋子启拔、吴颉等十五人归北魏。《魏书》嗣后未复言北魏对缊纥提的处理结果，但其本人依附铁弗部，其子及宗党反叛，势必给北魏留下了负面印象，对其处理结果可想而知。而匹侯跋与诸子归附北魏以后，并无二心，因此北魏政府对于匹侯跋这一支柔然后裔给予了相当的优待，据志文可知，道武帝曾以女许之，并赐匹侯跋为高昌王[7]。匹侯跋与缊纥提作为兄弟，却意见不同，最终缊纥提一族反叛北魏，曷多汗等人丧命，匹侯跋亦以身死，双方彼此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魏书·蠕蠕传》所载柔然人名均系音译，我们认为，匹侯跋就是《闾祥墓志》《闾子燦墓志》中所提及的“弗”。“弗”在帮组物部，“跋”在并纽末部，古无轻唇音，“跋”“弗”双声可通。匹侯跋即闾祥兄弟的高祖“阿弗”、闾子燦的太祖“弗”，闾祥、闾伯昇、闾子燦都是匹侯跋这一支柔然裔的后人。这也就是《闾子燦墓志》所言的“家国离艰，爨同犯伯”的真实史实。只不过作为闾氏后裔，却不得不为尊者曲笔隐言。而至此，我们也明晓闾祥兄弟墓志为何对于祖先事迹一笔而过了。

在闾子燦之前，阿弗这一支柔然后裔就已随孝文帝迁都到了洛阳，所以闾子燦就出生在洛阳。闾子燦成年以后，被辟为司州主簿。司州原在平城，太和十七年（493 年）孝文帝迁都以后，司州便改置于洛阳，见《魏书·地形志》。司州主簿一职由刺史自辟，秩为从七品下。适时北魏肃宗孝明帝驾崩，闾子燦被选任为孝明帝的挽郎。挽郎，即于葬仪中负责引灵柩、奏挽歌之青年。始设于东汉。而至北魏时期，挽郎成为公卿子弟入仕的门径之一，于此学者有专论[8]，略。根据目前可见史料与出土墓志材料初步可知，与闾子燦同时为孝明帝挽郎的，有檀翥[9]、裴宽[10]、赫连迁[11]等人。这些人任挽郎时的年龄不一，如最大的当属赫连迁，当年十九岁，最小的如裴宽，当年十三岁。闾子燦当年十八岁。闾子燦能和这些人同时成为挽郎而定第，反映出了闾氏家族在北魏中后期仍然保持着较高的政治地位。

在北魏肃宗的葬礼结束以后，永安元年（528 年），闾子燦解褐司空西閤祭酒，秩为正七品上。北魏肃宗驾崩以后，尔朱荣入洛，旋即发生河阴之变，闾子燦有幸躲过此劫。但直至天平二年的这 7 年间，闾子燦竟毫无事功可言，升迁停滞，实有违循例，愈证此时政治之混乱。直到东魏小朝廷成立，政局逐步稳定，闾子燦才有了出仕的机会。天平二年（535 年），闾子燦除冠军将军，转兼从事中郎。冠军将军为从三品，从事中郎为从五品。冠军将军系散官，以从三品散官身份兼任从五品的从事中郎，是以散官兼实职，以武官兼文职，以高位兼低职，这样的情况较为少见，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魏初年朝政制度的不完善。其后所授之征虏将军亦为从三品，与冠军将军无别。可以说在北魏末至东魏初的动荡年代，闾子燦鲜有出任实职的机遇。而就在这一时期，闾子燦又遭遇了“穷难”，解除了原来的职务。“鸠茹可俦”，“鸠茹”典故出自《续汉书·礼仪志（中）》：“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哺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

噎。”“鸠”指鸠杖，“茹”即糜粥。北魏政府在汉化过程中同样重视养老问题，政府会对一些年迈元老会赐予几杖、安车，对于普通老年人也会授予鸠杖。北魏孝文帝就曾三次赐予平城、洛阳等都城老人鸠杖[12]。志文所言，显然是指此时墓主的父母之一可能没有活到七十岁就去世了；“鹿麑斯偶”，麋鹿群居，《诗经·桑柔》：“瞻彼中林，甡甡其鹿。”郑玄《笺》：“视彼林中，其鹿相辈耦行，甡甡然众多。”孔颖达《疏》：“鹿乃走兽，犹以其类相善，辈偶而行。”乃指麋鹿相偕而生。“毙其偶”，盖谓父母中有一人去世。父母离世，闾子燦停解职务，居家守孝。

在闾子燦守孝期间，元象元年（538 年），高欢任命高慎（字仲密）为御史中尉，负责监察之事。闾子燦受到了高仲密的邀请，出任御史之职。高仲密任御史中尉的时间从元象元年至兴和三年（541 年）。兴和四年（542 年），高仲密已经外出为北豫州刺史。从志文中可以窥见闾子燦在御史职位上做了很多工作，因此，我们初步判断，闾子燦任御史可能是在兴和元年（539 年）左右。武定元年（543 年），“文襄皇帝当霸魏之朝”，直接点出高澄已经成为位于邺都的东魏朝廷的实际控制者。“躬临选部”，选部，即吏部，高澄此时兼任吏部尚书。闾子燦被高澄命为别兵郎中，不再任御史一职。别兵郎中秩第四品。别兵郎中一职，由来已久。曹魏时期，始置五兵尚书，“五兵”分别为中兵、外兵、骑兵、别兵、都兵。至晋，中兵、外兵又分左右，与旧五兵合为七曹。北魏沿置，则有“七兵尚书”之名。《隋书·百官志中》记载了北齐时期五兵尚书的明确职责。中兵、外兵、都兵、骑兵皆可据知其大略内容，北齐之际仍有“七兵尚书”之职，但别兵曹署之职能迄今未详。唯据墓志可知，东魏时期，中央仍置有别兵曹署，为研究北朝时期中央政府的军事制度，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武定三年（545 年），闾子燦被遣为西兖州别驾。孝文帝时便已置西兖州[13]，西兖州“治定陶城，后徙左城”[14]，即今山东菏泽定陶及定陶西南一带。闾子燦此后一直担任此职，直至病逝。北齐天保二年，闾子燦病逝于圣城（地点不详，未知何地），翌年葬于邺城野马岗闾氏家族墓地。

综观志文全篇，无疑具有强烈的动乱年代的色彩。闾子燦一生经历颇为复杂，其本人出自柔然王室，身份尊贵，志文虽未提及其祖、父仕宦经历，但恐怕二人都保留着较高的政治地位，不然后来闾子燦不太可能以挽郎定第。北魏肃宗驾崩，寻即天下大乱，闾子燦因此丧失了仕进的机会。直到“（高仲密）闻君藉甚，引入绣衣”，才迎来人生中一段惬意的时光。“绣衣”，又称“绣衣吏”“绣衣使者”“绣衣直指”，始见于《汉书·武帝纪》：“泰山、琅邪群盗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胜之等衣绣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诛。”后多用“绣衣”代指御史中丞及侍御史。志文显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身为御史的闾子燦“一乘聪马，五察黄沙”，在这一时期过得颇为适意。“聪马”，即“骢马”，也特指御史，《后汉书·桓典传》：“典执政无所回避。常乘骢马，京师畏惮，为之语曰：‘行行且止，避骢马御史’。”“黄沙”，指“黄沙狱”，《晋书·高光传》：“武帝置黄沙狱，以典诏囚。以光历世明法，用为黄沙御

史，秩与中丞同。”可见当时闾子燦之地位，仅次于高仲密。但好景不长，闾子燦出任御史，是由当时和高欢集团尚处于同盟关系的高仲密所任命的，但随着高乾、高昂兄弟的先后死去，高仲密也受到了排挤[15]，高欢集团与以高乾兄弟为代表的河北豪族势力的矛盾呈现出公开化的趋势。高仲密被遣为北豫州刺史的翌年（武定元年二月）即据虎牢叛逃西魏，史称高仲密所选御史“多其亲戚乡闾”[16]，深为高澄所厌。高仲密未离任之前，高澄就已经“奏令改选焉”[17]。是以高仲密叛逃之后，这些人更是多遭裁汰。志文遣词于此亦颇有无奈、为己开脱之意，表明自己并非主动，而是高仲密彼时位高权重，在面对高仲密邀延时“苦不获免”。不过这恐系其应对高欢集团的托词罢了[18]，毕竟高仲密此时已经西入关中，自己也只得自保求存。所幸由于东、西魏对峙的紧张局面，为了稳定形势，高欢、高澄等人对高仲密余党并没有采取惩罚措施，而是听从了封隆之的建议[19]，不再激化矛盾，河北豪族与高仲密密切者遂得抚慰安定。闾子燦也接受了新的官职任命，开始了新的工作，最终被遣任西兖州别驾，巧合的是，高仲密曾于元象初任兖州刺史，他的同族闾祥已在他之前就担任了兖州高平太守，武定二年已卒于任上。闾子燦被任命为西兖州别驾，恐非随意，三者之间可能存有某些因果关系。未得确证，暂存疑。

邺城野马岗[20]以东存有闾氏家族墓地，这一点在柔然闾氏出土墓志中有所证明。天兴七年（404 年），闾麟葬于邺城西南十五里（墓志记载，与今单位长度不同，下同）、野马岗东十里；兴和二年，闾伯昇葬于邺城西南十八里；武定二年，闾祥葬于邺城西南十五里。从北魏道武帝时期开始，柔然闾氏家族就已经在邺城选择兆域，邺城西南十五里至十八里附近，野马岗以东十里左右，即其家族墓地所在。其位置在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习文乡邺城遗址西南，或在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柏庄镇黄庄村、韩庄村一带。需要注意的是，从北魏初年内附的柔然重要人物闾大肥之弟闾麟开始，就在邺城选择家族墓地，而非平城，值得深思。我们认为，唯一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的原因便是天兴元年（398 年）北魏道武帝才迁都平城，平城尚处于营建初期，城市规划刚刚起步，而邺城自曹魏以来大力营建，十六国时期又先后作为后赵、冉魏、前燕的都城，也是后燕最为重要的城市之一，已成规模，作为曾经的都城，其声名早已为柔然上层所知，因此，这些内附的柔然王室成员，最终选择了邺城西南一带作为自己家族的墓地。从当时的地理环境来看，邺城西南十五里，已在当时的漳河南岸，距离当时仅有的邺北城甚远，属于郊野之地，是一块合适的家族墓地选址区域。

三

整篇志文的书写风格呈现出了楷、隶杂糅的特征，文字或以楷书技法起笔，以隶书技法收笔。整体书刻水平一般，笔画颇为平淡，缺少生气，结体不均，只保持了左右基本的对称。此外，在这篇墓志当中，还出现了一些笔误与缺字漏刻的现象。例如，

“讵假学成”的“讵”被刻成了“詎”，句义全非；再有在文末的词首句“文不假髣，道自敦风。威流海□，气慑西戎。泊宾赤县，蕃屏维功”中，“海”字之下，明显漏刻一字，而匠人浑然不觉，主葬者亦未重刻。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与闾子燦家族衰落有关。

柔然王室族裔自道武帝时期开始，因各种原因，多有投归北魏者，北魏政府对于这些柔然王室成员，都给予了优待礼遇，如其太祖弗，道武帝就赐爵高昌王、驸马都尉；后来归魏、见诸史书的闾大肥，道武帝也给予其“尚华阴公主，赐爵其思子。与其弟并为上宾，入八议”[21]的较高待遇。再有闾祥的曾祖懃，还“袭王爵司空公”，等等。长期的政治优渥，使得这些投魏的柔然王室成员们对北魏皇室保着较高的忠诚度，因此他们的很多政治行为也和北魏皇室高度一致，譬如随孝文帝迁都，并接受汉化等皆是其证[22]。当然，这些柔然王室成员之所以能够得到北魏政府的长期礼遇，和北魏与柔然长期时战时和的关系是分不开的。通过给予归附北魏的柔然王室族裔以较高的政治地位的方式来向柔然宣示恩威，进而对北方柔然政权进行拉拢和瓦解，是北魏政府长期执行的民族政策之一。北魏末年以来，由于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北魏拓跋宗室的式微，皇权失落造成的政治动乱就使得无人再顾及与柔然的外交政策，况且东、西魏时期，柔然国主阿那环势力渐盛，东、西魏争相与之和亲，东魏北齐时期的高欢集团已将重心放在联络柔然的新兴势力方面，对于这些已然汉化并且处在集团核心之外的柔然早期王室后裔便不再关注，早期内附的柔然闾氏家族的政治地位不断下降，这也就使得闾子燦的家族境地每况愈下，最终在墓志的书刻方面有了最为直接的体现。因此，这方墓志的发现，对于我们了解柔然早期王室后裔在东魏北齐时期的生存面貌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附记：在撰写过程中，山西大学赵瑞民教授、扬州市考古研究所朱超龙对本文多有是正，谨申谢意。

注　释

[1] 收录此墓志拓片之书释作“闾子杰”，但细观之，当系“燦”字。且墓志言墓主字“思明”，与“燦”意合。参见贾振林编著．文化安丰［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226.

[2] 贾振林编著．文化安丰［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226.

[3] 同［2］.

[4]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337～339.

[5] 王连龙．新见北朝墓志集释［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100.

［6］ 同［2］，186.
［7］ 王连龙先生曾对“阿弗”被封为“高昌王”有所质疑（同［5］），笔者亦有同感，疑《魏书·蠕蠕传》中“高昌王”乃“晋昌王”之讹。西晋时，晋惠帝改新兴郡为晋昌郡，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并云中、九原、晋昌属定襄。是知晋昌之名，在北魏初年仍存。道武帝封匹侯跋为晋昌王，应以今山西北部原晋昌郡之名封之。此晋昌与河西晋昌无涉，北齐唐邕也曾被封为晋昌王，此晋昌则在敦煌郡矣。
［8］ 黄桢．新出北齐赫连迁墓志考释［J］．文物世界．2016（4）：24～28.
［9］ 周书·卷三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1：687.
［10］ 周书·卷三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1：594.
［11］ 同［8］.
［12］ 魏书·卷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1～190.
［13］ 何德章．北魏太和中州郡制改革考释［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3）：27，28.
［14］ 魏书·卷一百六中［M］．北京：中华书局，1974：2540，2541.
［15］ 何德章．高乾兄弟的命运——东魏解散豪族私家武装的过程［J］．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998：42～49.
［16］ 北齐书·卷二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4：273.
［17］ 同［16］.
［18］ 在肃宗驾崩以后，尔朱荣入洛，立元子攸为帝。在元子攸与尔朱荣的矛盾激化过程中，元子攸采取了重用河北豪族势力以抗衡尔朱荣的策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高乾兄弟才由此登上了更广阔的政治舞台。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时的闾子燦站在了以元子攸为代表的北魏朝廷一方，很有可能在这一时期，闾子燦就已经结识了高乾、高仲密兄弟。是以后来高仲密被高欢任命为御史中尉之际，高仲密自然想到了闾子燦，并将其邀延入台。
［19］ 北齐书·卷二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4：303.
［20］ 孔德铭．安阳古野马岗考［J］．殷都学刊．2015（2）：34～39.
［21］ 魏书·卷三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4：728.
［22］ 在《闾祥墓志》中，志文称闾氏家族“苗裔轩皇”，说明至北魏末年，进入北魏的柔然族裔已经逐渐汉化，这和北魏皇室的汉化进程基本一致。

The Annotation of “Lv Zican’s Epigraph” in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Guo Xiaoyan Li Pengwei

Abstract: “AnFeng Culture” incorporates an epigraph of Lv Zican in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which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value. It record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 early royal family of the “Rouran Khaganate” kingdom called “Fu”, who came to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According to the Lv family,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Fu” was “Pi Houba” is from the early “Rouran Khaganate” kingdom. Lv Zican’s epigraph also reveals his relationship with Gao Zhongmi, it provides valuable information to stu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escendant of this royal family.

Keywords: Lv Zican; Rouran Khaganate; Pi Houba; Gao Zhongmi

金《王甫墓志》考释

么乃亮[1]　苏　丹[2]

（1. 辽宁省博物馆，沈阳，110067；2. 辽宁美术出版社，沈阳，110000）

在辽宁省博物馆进行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过程中，我们整理发现了一张金代《王甫墓志》拓片，系民国时期初拓（图一）。经查，《王甫墓志》原石为罗振玉旧藏，现藏于旅顺博物馆。罗继祖先生曾对该墓志做过相关研究，发表于 1940 年出版的《满洲史学》三卷二期[1]。因志文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可为辽金史研究提供新的材料，故在多方搜求罗继祖先生考证文章无果的情况下，笔者不揣简陋，对此墓志重新检释，据墓志拓片抄录志文，并参考相关文献及其他辽金石刻资料，对墓志涉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图一 《王甫墓志》拓片

一、志文抄录

《王甫墓志》原石近正方形，边长 68、厚 9.5 厘米，无界格。志文阴刻楷书，书刻不佳，首题："故昭文馆直学士知宜州崇义军节度使王公墓志铭"，共 15 行，行最多者 28 字，共计约 394 字，志文字迹漫漶，释读比较困难，兹抄录并标点如下：

故昭文馆直学士、知宜州崇义军节度使、王公墓志铭

公讳甫，字慕卿，家居安德州安德县人□。曾保德，洺州刺史。祖□，□武军节度使、度支使。父□华，忠正军节度使。子男六人，公为长。公幼颖解，年二十一当辽，寿昌元年进士第，任□□县令，治有迹。随朝为枢密院令史，又为中书省主事，改诸行宫都署司主事，改大理知政，除御史知杂事，皆有能称。出为上京副留守，城拔，从太祖皇帝归□□。今上即位，以公为宋□使，既归，称旨，授宜州节度使，□则州□□□。以疾卒，享年五十三。公为人正直，不尝□□，以此终其身而无愧焉。夫人张氏子遵义，公既卒，遵义诣阙以闻，上嗟悼之，且怜其遗孤，特赐进士及第，□太子洗马。久之，任冀州衡水令，卒于官。女子三人，长□□，后并幼。□□□□□□以次□人□□□□□。生子三人，赵九、赵十、赵十一尚幼。孙男一人绍祖，女一人□□□□天会七年闰八月□十四日葬公安德州清凉山。第三司副使、昭文馆直学士、□□□□□□□□□知锦州安昌县事、武骑尉、赐绯鱼袋，□谨□□述。铭曰：

弱冠杰然，登华□籍。历官于朝，厥有显迹。云何不淑，不□之□。□安□□，尚冀有后。

二、王甫生平及仕历

志主王甫，字慕卿，生平事迹不见于史籍文献。据墓志记载，王甫于金太宗天会七年（1129 年）葬于安德州清凉山，享年 53 岁，古人按虚岁计算年龄，逆时上推，可知王甫生年应为辽道宗大康三年（1077 年），但墓志载："公幼颖解，年二十一当辽，寿昌元年进士第。"按王甫寿昌元年（1095 年）进士及第时为 21 岁推算，其应生于辽道宗大康元年（1075 年）。由此可知，王甫应于金太宗天会五年（1127 年）去世，而在两年后，即天会七年葬于安德州清凉山。

王甫的结衔为"昭文馆直学士、知宜州崇义军节度使"。"昭文馆直学士"为王甫的官，代表品级，为从四品下[2]；"知宜州崇义军节度使"是王甫的实职，即职事官。宜州，据向南先生考证，其故址在今辽宁义县[3]，辽太祖时已有宜州崇义军。宜州最初为耶律倍俘定州人户所建私城，辽世宗时期发展为积庆宫所属斡鲁朵。《金史·地理志》

载："义州，下，崇义军节度使。辽宜州，天德三年更州名。户三万二百三十三。"[4] 可见，金前期仍然沿用辽宜州之名，直至金海陵王时将宜州改名为义州。金承辽制，《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记载："节镇，设置节度使的大州，辽袭唐制，于大州置节度使，另有军名，兼管军事、民政，称某州某军节度使。"[5]可见，宜州军号为崇义，王甫职至金代宜州范围内的最高军政长官。

墓志记载，王甫"寿昌元年进士第"，据《辽史》记载，寿昌元年（1095 年）"放进士陈衡甫等百三十人"[6]，王甫当为寿昌元年所放进士中的一员。王甫进士及第后被授予某官职，据墓志依稀可辨"任□□县令"，随后，由于其"治有迹"转迁为"枢密院□史"一职，这是王甫进士及第后初次转迁之职。"枢密院□史"，《辽史·百官志》失载，辽承唐宋之制，《宋史·职官志》载："枢密院，凡房十有二。吏三十有八，令史十三人，书令史十五人。"[7]王甫所任之职应为"枢密院令史"。按《辽史·营卫志》载："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汉人枢密院、中书省唯摘宰相一员，枢密院都副丞旨二员，令史十人，中书令史一人，御史台、大理寺选摘一人扈从。"可见，辽朝汉人枢密院设令史一职，位于都副承旨之下。"枢密院令史"一职在辽代石刻文献中多有记载，《添修缙阳寺功德碑记》撰写者为"枢密院令史、太子洗马郑昉"[8]。《尚暐墓志》载："（尚暐）清宁五年及第，当年勾充枢密院令史。"[9]《孟有孚墓志》载其："弟曰有常，今为太子洗马、枢密院令史。"[10]通过上述文献及石刻资料可知辽朝确有"枢密院令史"一职，可补《辽史·百官志》之阙。值得注意的是，《杜悆墓志》载其："咸雍十年二十岁，一举上□。大康四年，授檀州军事判官，莲幕赞筹，竹符疑绩。七年，□室充枢密院令史。"[11]《王师儒墓志》载其："年二十有六，举进士，屈于丙科。特授将仕郎、守秘书省校书郎。执政者惜公徒劳于州县，擢充枢密院令史。"[12]《王泽墓志》载其："以开泰七年，登进士第。释褐，授秘书省校书郎。次除营州军事判官。□□伻理，宥地试难。宣充枢密院令史。"[13]此三人均为进士及第后，于地方任职一段时间，初次转迁朝官官职为"枢密院令史"，这与王甫进士及第后所历仕途非常相似，更加印证王甫所任之职为"枢密院令史"，进而也能说明一般释褐进士入仕朝官后，首任官职多集中于枢密院充任令史主文薄之类的文职事务[14]。

王甫从"枢密院令史"一职起，开始步入朝官系统，随后转迁至"中书省主事"。《辽史·百官志》在中书省的参知政事下设"主事"一职[15]，应为王甫所任之职。按《旧唐书·职官志》载，中书省下设"主事"四人，为从八品下[16]。关于"诸行宫□署司□□"一职，《辽史·百官职》在诸行宫都部署院下设诸行宫都部署、知行宫诸部署司事、诸行宫副部署、诸行宫判官等职，并不见"诸行宫□署司□□"，《王师儒墓志》载王师儒之长婿贾焞曾任"诸行宫都部署司主事"[17]，由此推测王甫所任之职可能为"诸行宫都署司主事"，诸行宫都部署院属官之一，《辽史·百官志》不见，可补史阙。王甫所历官职中，除诸行宫都署司主事属北面官外，其余皆为南面官之属。随后王甫"改大理知政，除御史知杂事"，"大理知政"一职，据《马直温妻张馆墓志》载，马

直温之长女“曰枢哥，适殿中少监、大理寺知正耶律筠。”[18]据此推断王甫所任“大理知政”应与耶律筠所任大理寺知正为同一职，又据统和二十年（994 年）圣宗令“大理寺置少卿及正”[19]，推断志文所载“大理知政”当为“大理知正”之别字。“御史知杂事”一职检阅《辽史》及辽代石刻资料均无记载，金朝左企弓“自御史知杂事，出为中京副留守，按刑辽阳”[20]。金承辽制，左企弓与王甫均由御史知杂事迁转至中京副留守，由此看来辽朝御史台下也当有御史知杂事一职，又补《辽史·百官志》之阙。

王甫在辽朝所任最后官职为“上京副留守”。辽朝实行军政合一制度，五京是其地方最高行政机构，“留守在京中既主民政、又管司法、必要时还兼军职，地位重要”[21]。副留守则协助留守主管京中各政务。王甫自进士及第后入仕，由县令最终转迁至上京副留守，可见辽朝统治者对他的重视。志文记载，王甫出任上京副留守时，上京被完颜阿骨打攻陷，正与《辽史》《金史》所记相吻合，此时正是他人生之重要转折点。《辽史》记载：天庆十年（1120 年）“五月，金主亲攻上京，克外郛，留守挞不也率从出降”[22]。《金史》亦记载：天辅四年（1120 年）五月，“上亲临城，督将士诸军鼓噪而进。自旦及巳，阇母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挞不野以城降”[23]。时任上京留守挞不也（野）率众投降。《金史·卢彦伦传》载：“天辅四年，（卢）彦伦从留守挞不野出降。授夏州观察使，权发遣上京留守事。”[24]时年 46 岁的王甫作为上京副留守，降金后也应被授予某官职，墓志缺载。志文称：“今上即位，以公为宋□使。”据史料记载，金天会元年（1123 年）至天会五年（1127 年）期间，金太宗曾遣使来往北宋 8 次[25]，一次告哀使，两次正旦使，一次遗留使，一次告登位使，一次生辰使，两次泛使。《宋会要辑稿》载：绍兴四年（天会十二年），“枢密院言：大金元帅府差到，奉使元不曾分使副，今来并作一等锡赐。其人从自入界，诸处并不曾到申分三节，并已依中节锡赐”[26]。说明金初各项制度并不完备，遣使制度并无正、副使之别，属官也无三节人之分。史料中并无王甫出使北宋的任何记载，说明王甫此时仅为属官中的一员，又据“今上即位”推测，王甫可能是天会二年（1124 年）高兴辅、刘兴嗣这批告登位国信使三节人中的一员，回朝后，被授予宜州节度使，掌管宜州范围内军政事务。官至上京副留守的王甫降金后，因出使北宋顺利完成任务，才被授予节度使一职，可以看出，王甫降金后所任官职并不高，也从侧面反映出降金辽系汉人在金初并未受到统治者的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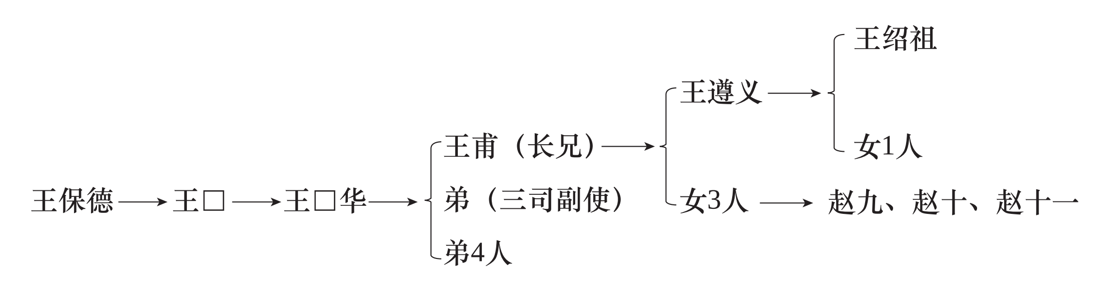
三、王甫家族世系

志文称王甫“家居安德州安德县人□”。《辽史》载：“安德州，化平军，下，刺史。以霸州安德县置，来属。统县一：安德县。统和八年析霸城东南龙山徒河境户置。初隶乾州，更属霸州，置州来属。”[27]《金史》载：“永德，辽安德州化平军安德县，世宗大定七年更今名。北有凌河。镇一（阜安）。”[28]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 年）将辽安德州改名为永德州，因此，金太宗天会七年（1129 年）时之安德州即为辽代之安德州，即今

辽宁省朝阳市五十家子村[29]。

墓志记载："曾保德，洺州刺史。祖□，□武军节度使、度支使。父□华，忠正军节度使。"王甫的曾祖父名曰保德，任洺州刺史。按古人婚嫁生育较早推算，王保德应为辽中期之人，洺州在今河北永年东南之旧永年[30]，时为宋地，洺州刺史当为遥领。其父□华任忠正军节度使，《元丰九域志》记载："寿州，寿春郡，忠正军节度。治下蔡县。"[31]寿州，在今安徽凤台，同为宋地，忠正军节度使也应为遥领之职。王□华，生子六人，王甫为长子。

王甫夫人为张氏，二人共生育子女四人，独子名为王遵义。志文记载，王甫死后，金太宗特赐王遵义进士及第，太子洗马，随后又任冀州衡水县令。《金史·地理志》载"冀州，上。宋信都郡，天会七年仍旧置安武军节度。户三千六百七十。县五、镇三：信都、南宫、衡水、武邑、枣强。"[32]冀州在今河北衡水辖区。值得注意的是，志文记载，王遵义"卒于官"，说明撰写墓志时王遵义已去世，如前文述，王甫死于天会五年，而葬于天会七年，或许因为王甫死后两年，其独子也去世了，因此两年后，即金天会七年改葬王甫于安德州清凉山。王遵义有子一人，名为王绍祖，女一人。王甫有女三人，其长女已逝世，其余均年幼，长女适赵姓，生三子名为赵九、赵十、赵十一。综上，王甫家族世系简表如图二。



图二 王甫家族世系简表

由世系表可清晰地看出王甫一支仅王遵义、王绍祖二男，因此墓志记载，王甫死后，"上嗟悼之，且怜其遗孤"，又有其外孙赵九、赵十、赵十一之记载，更在铭辞上强调其"尚冀有后"，均说明王甫一支男丁不足。

志文最后记述了王甫之弟。结合墓志书写惯例，通过上下文看，撰文者应为王甫之弟。其结衔为"三司副使、昭文馆直学士、□□□□□□□□□知锦州安昌县事、武骑尉、赐绯鱼袋"。"三司副使"一职，据《金史·百官志》载："三司，泰和八年，省户部官员置三司，谓兼劝农、盐铁、度支，户部三科也……副使一员，正三品。"[33]昭文馆直学士为其官，王甫与其弟同为昭文馆直学士，从四品下。知锦州安昌县事为其实职，锦州即今辽宁省锦州旧城。武骑尉为其勋级，从七品[34]。绯鱼袋为其赐，是身份等级的一种标志[35]，《金史·舆服》载："惟公朝则又有紫、绯、绿三等之服""文资五品以上官服紫……六品、七品服绯芝麻罗。八品、九品服绿无纹罗""五品服紫者红鞓

乌犀带，佩金鱼，服绯者红鞓乌犀带，佩银鱼，服绿者并皂鞓乌犀带。”[36]可见金朝公服分紫、绯、绿三等，鱼袋分金、银两种，鱼袋与紫、绯服相配形成金朝的章服制度。

四、结　　语

综上所述，王甫墓志虽内容不多，字迹漫漶，但仍可从中钩沉志主的生平仕历及家族世系，且其中所涉官职也可补史之阙。通过王甫降金前后所任职官，还能窥见金初统治者对降金辽系汉官的授官情况，对还原历史及辽金史研究多有补益，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注　　释

[1] 罗继祖．金崇义军节度使王甫墓志跋［J］．满洲史学，1940，3（2）：35，36．

[2] 杨军．辽朝南面官研究——以碑刻资料为中心［J］．史学集刊，2013（3）：3～19．

[3] 《辽代石刻文编·刘承嗣墓志》“宜霸州城”注释记载：“宜州，《地理志》：‘宜州，崇义军。兴宗以定州俘户建州，治弘政县。’《方舆纪要》：‘弘政废县，辽置弘政县为宜州治，在今卫东北二十五里，金移今治。’《奉天通志》：‘今义县城二十五里无弘政县遗址可考，辽既以弘政为附郭，则必在今县治。若确在城东北则不得以附郭视之。纪要所说恐因明统志而误，非其实也。又今义县城内有辽代建置大奉国寺及塔可为辽宜州治此之确证。’按，《通志》其说甚是，宜州故址当在今辽宁义县镇。又，辽志以为宜州兴宗以定州俘户建州，然据《王郁传》《王悦墓志》及《王裕墓志》知太祖时已有宜州崇义军，辽志有误。”见向南．辽代石刻文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51．

[4] （元）脱脱．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559．

[5] 蔡美彪．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91．

[6] （元）脱脱．辽史·卷二六·道宗本纪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4：308．

[7] （元）脱脱．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7：3799．

[8] 同［2］：464．

[9] 同［2］：498．

[10] 同［2］：471．

[11] 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辽代石刻文续编［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304．

[12] 同［2］：645．

[13] 同［2］：260．

[14] 高福顺．辽朝释褐进士的政治生活角色——以释褐进士迁转朝官与地方官为中心［J］．东北史地，2015（1）：39～50．

[15] （元）脱脱．辽史·卷四七·百官志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4：775．

［16］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5：1850．
［17］ 同［2］：647．
［18］ 同［2］：635．
［19］ （元）脱脱．辽史·卷一三·圣宗本纪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4：145．
［20］ （元）脱脱．金史·卷七五·左企弓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1723．
［21］ 杨树藩．辽金地方政治制度之研究［A］．宋史研究集［C］．台湾："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9（11）：364．
［22］ （元）脱脱．辽史·卷二八·天祚帝本纪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4：339．
［23］ （元）脱脱．金史·卷二·太祖本纪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5：34．
［24］ （元）脱脱．金史·卷七五·卢彦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1716．
［25］ a．天会元年十二月，"遣孛堇李靖告哀于宋。"（《金史·交聘表》）
b．宣和五年（天会元年），"十二月乙巳，金人遣高居庆等来贺正旦。"（《宋史·徽宗本纪四》
c．天会二年四月，"以高术仆古等充遗留国信使。"（《金史·交聘表》）
d．天会二年四月，"高兴辅、刘兴嗣充告即位国信使如宋。"（《金史·交聘表》）
e．天会二年八月，"以孛堇乌爪乃、李用弓为贺宋生日使。"（《金史·交聘表》）
f．天会二年十二月，"孛堇高居庆、大理卿丘忠为贺宋正旦使。"（《金史·交聘表》）
g．天会三年六月，"遣李用和等以灭辽告庆于宋。"（《金史·交聘表》）
h．天会三年七月，"以耶律固等为报谢宋国使。"（《金史·交聘表》）
［26］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M］．北京：中华书局，1957：78册，3092，3093．
［27］ （元）脱脱．辽史·卷三九·地理志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4：487．
［28］ 同［4］：560．
［29］ 金士殿．辽代安德州今地考［J］．社会科学辑刊，1982（5）：93，94．
［30］ 同［2］：287．
［31］ （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五·淮南路［M］．北京：中华书局，1984：199．
［32］ （元）脱脱．金史·卷二五·地理志中［M］．北京：中华书局，1975：600．
［33］ （元）脱脱．金史·卷五五·百官志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5：1244．
［34］ （元）脱脱．金史·卷五五·百官志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5：1223．
［35］ 同［2］．
［36］ （元）脱脱．金史·卷四三·舆服中［M］．北京：中华书局，1975：976，982．

Research on “Epitaph of Wang Fu” of Jin

Yao Nailiang　Su Dan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epitaph, Wang fu living in the end of Liao and early Jin, is a metropolitan graduate with honors in Liao Dao Zong Shouchang years. Since then embarked on career and has rich experience. He served as the highest official of Liao is Shang Jing vice Left. Later, he capitulate to Jin and served as Chong Yi military commissioner in Yi Zhou. Five generations of Wang Fu are government officials. But, Wang Fu’s family is in short of man. Although the epitaph of Wang Fu has a few content and blurred handwriting, we can find his life history and family official career. The official positions involved can help us make up the missing of historical books. According to his official before and after surrender to Jin, we can also have a glimpse at the rulers of early Jin award the official status to the officialdom of the Liao who surrender.

Keywords: Epitaph of Wang Fu; the end of Liao and early Jin

克尔木齐文化名称考 *

策·特尔巴图[1]著　特尔巴依尔[2]译

（1. 蒙古国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蒙古国乌兰巴托；2.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2）

近十年来，蒙古国青铜时代的考古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内容。值得一提的是，蒙古国考古学家们与外国学者合作，不断发现和研究分布在蒙古国各地区的远古时期历史文化。2000年之后，蒙古国新发现几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同时对这些考古学文化进行科学命名。例如，近几年发现并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蒙古国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的“克尔木齐”文化的名称问题，准确地说是命名该文化的地名问题。笔者注意到，研究该文化的有关学者用Kemuci、Shamirshak、Ke’ermuqi、Chemurchek、Kermuci、Qermuqy等几种不同的称谓，产生误解和混乱现象，对该考古学文化的准确认识及相关研究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消极的影响。于是笔者于2012年8月在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进行短期考察时，对克尔木齐文化遗存分布的主要地区进行了走访。

阿勒泰市西南25千米处有一条由北向南流的小河，当地蒙古族牧民把这条小河称作Khemceg（汉音译克尔木齐）。该河源于阿尔泰山南麓，一直向南流至从哈拉额尔齐斯河（艾比河）右侧注入。现在把这条小河和该地区一同称作切米尔切克，但这名称出现时间显然很晚。据当地牧民介绍，该地名是1980年全疆实行地名更新与统一时，根据哈萨克语的读音音译而来的，而当地的蒙古族牧民现在仍然沿用着传统的名称Khemceg（克尔木齐）。根据当地蒙古族牧民的解释，Khemceg一词是蒙古语，意为“爱美”“美丽”“漂亮”等。

一、考古研究中所用的克尔木齐文化的名称

克尔木齐文化最初由中国考古学家李征所发现并命名。他在1962年发表在《文物》期刊上的简报《阿勒泰地区石人墓调查简报》里用发现遗存的地名，即克尔木齐[1]来命名了这一考古学文化。从此，中国和西方考古学家在考古学上广泛引用了该名称[2]。1990

* 原载蒙古国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编《STUDIA ARCHAEOLOGICA》，2014年，Tomus XXXIV。

年，俄罗斯的考古研究资料里才出现克尔木齐这一名称。作为该领域考古研究主力之一的A.B. 瓦列诺夫（А. В. Варёнов）首次把该文化介绍到俄罗斯。他在大多数文章中都用了克尔木齐这一名称[3]。在他 1999 年发表的《北新疆克尔木齐墓地青铜时代新文化的文物》一文中认为，将该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克尔木齐”或是更准确的突厥语“切米尔切克”才是更为妥当的想法[4]。他虽然没有说明引用这两个名称的原因，但我们不难想到，他可能认为，将人口日益增长的哈萨克人普遍称作“切米尔切克”这一名称是准确的想法。至于为什么不用原来的蒙古语或蒙古音译的名称，我们无法猜想。2002 年瓦列诺夫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继续运用了“克尔木齐”这一名称[5]，由此可以推断，对新疆地区考古深有研究的瓦列诺夫都无法确定该文化的名称，他对“切米尔切克”一词还心存怀疑。中国学者所引用的原地名在欧亚地区考古书籍中广泛引用。例如，俄罗斯学者别赫帖儿（А. В. Бехтер）、哈瓦林（С. В. Хаврин）等在他们关于新疆青铜时代文化和西伯利亚与中亚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的著作中也引用了克尔木齐这一名称[6]。并且俄罗斯著名学者莫洛丁（В. И. Молодин）、著名汉学家科米斯萨罗夫（С. А. Комиссаров）等在 2004 年发表的文章中把该文化的名称写成克尔木齐并括号里注明切米尔切克。同时莫洛丁、阿尔金（С. В. Алкин）等在 2012 年发表的《新疆铜石并用时代及早期青铜时代文化研究》一文中把该文化的名称音译为 Kermuci 或 Qermuqy[7]。虽然俄罗斯考古学家科瓦列夫（А. А. Ковалев）不是首次用切米尔切克这一名称的人，但他是唯一一个一直沿用克尔木齐这一名称的人。他 1998 年发表的文章就引用了 Kermuči-Kormuqi 或 Čermunok Qicrmuqiok 的音译[8]，并在 1999 年发表的论文中用了另一个 Xermixe 音译[9]。此外，他在近期发表的论文中指出该河的名称早年（1960 年初）称之为克尔木齐[10]，他的这种行为是在尊重和遵循事实。近几年俄罗斯和蒙古国考古学者也开始引用切米尔切克这一名称[11]。除上述几个误读、错写的名称之外，还有错音译的情况也存在。例如，英文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文章虽然少，但也出现了“Shamirshak”等错误音译的现象[12]。

二、“克尔木齐”这一地名在历史地图中的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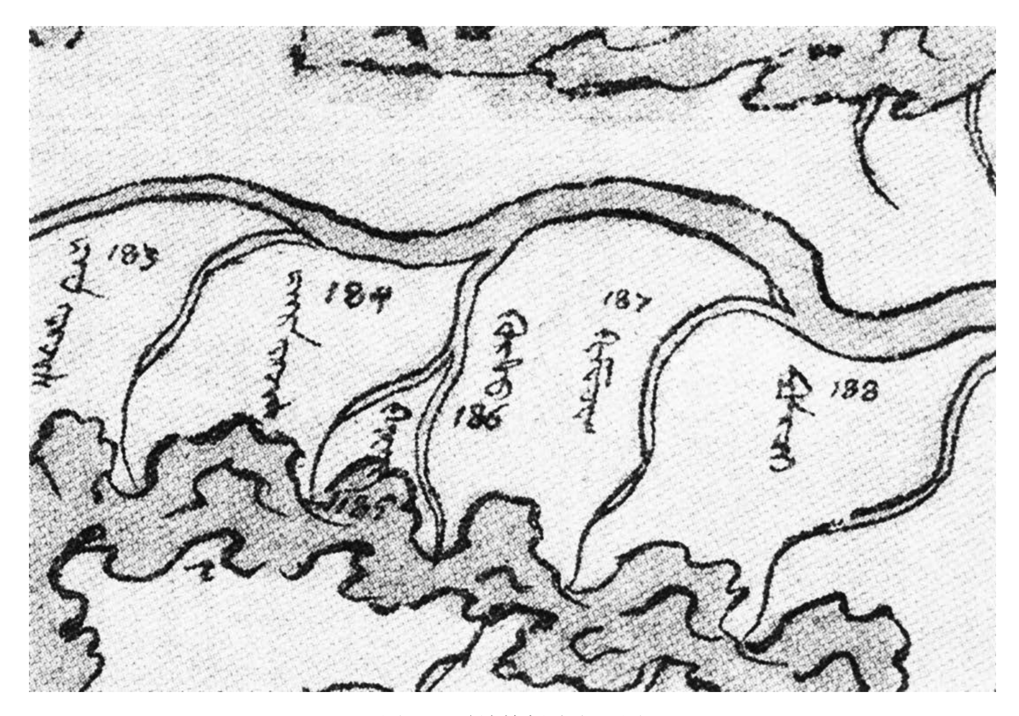
之所以“克尔木齐”这一次在该文化的命名中不被常用，是因为有的学者不尊重和重视沿用当地原有的地名。因此，近两年笔者搜集相关资料时找到了跟该地名有关的几幅地图。下面分别介绍几幅地图中记载该地名的名称。

1. 雷纳特 1734 年地图

历史研究中以“雷纳特地图”著称的地图绘制于准噶尔汗国时期。1716 年俄瑞战争期间被俄军俘虏的瑞典炮兵军士长约翰 · 古斯塔夫 · 雷纳特（J.G.Renat）在流放至西伯利亚期间又被准噶尔汗国俘获。雷纳特在准噶尔汗国滞留 17 年，亲历了策妄阿喇布坦和噶尔丹策凌时代。他在准噶尔汗国期间教授准噶尔人给炼铁、制造大炮和弹药等技

术，与此同时运用欧洲的印刷术印刷书籍和创办印刷厂等。最重要的是，他于 1733 年回到瑞典时带回了两幅准噶尔汗国的地图。有关他的事迹和他带回瑞典的地图许多学者进行过研究[13]。1734 年雷纳特回到瑞典后，他带回去的地图虽然引起一部分研究者的重视，但一直未能引起公众的关注。直到 150 多年后的 1878 年，这两幅地图的复制本在瑞典皇家图书馆里被发现（复制本是在原图的基础上复制而来的）后来，俄罗斯沙皇地理协会研究人员立即获取该地图的彩色照片并于 1881 年发表[14]。没过多久，用托忒文绘制的原图从瑞典乌普萨拉图书馆中被发现。

雷纳特的这两副地图，分别称之为雷纳特 1 号图和雷纳特 2 号图，最大的比例 1∶1600000，另一个比例为 1∶2600000[15]。两幅图都用托忒文编写。俄罗斯学者鲍培（N.Poppe）认为该图是汉语地图的翻译版，但没有足够的证据[16]。但雷纳特曾证实，该地图是噶尔丹策凌亲手绘制的[17]。该图里连最小的地名都记得很清楚，从这点看，雷纳特 1 号图就是真正的卫拉特蒙古地图。至于雷纳特 2 号图，雷纳特说是对照汉语地图绘制的[18]。虽然雷纳特 2 号图在很多方面跟明清时期汉文地图相似，但值得一提的是它与康熙、乾隆时期绘制的地图在很多方面有不同之处，绘制的比前者更加细致。因此，无可否认，雷纳特有可能混淆了地图的来历，或者有关该图来源的信息根本就是错误的。学者一致认为该地图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卫拉特蒙古地图，对蒙古历史文化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虽然有些小的误差或错误，但比起雷米佐夫的地图，此地图在当时算是最精细、最准确的地图。不仅如此，它比 1760 年乾隆时期绘制的地图还要精准[19]。



图一　雷纳特托忒文地图



图二　雷纳特用拉丁文音译的地图

我们关注的克尔木齐文化地名在雷纳特 1 号地图中有记载（图一、图二）。值得注意的是，在地图中标记的位置也特别真实和准确。从如此清楚地记录这样不起眼的小河名的情况来看，其可作为证明该图的确是由卫拉特人自己绘制的一个佐证。

后来，“雷纳特地图”用托忒、拉丁文、西里尔文各复制了一份，在这三副复制的地图及其翻译版本中可见几种不同的克尔木齐河名称的音译（表一）。根据语言学研究和实地调查的结果可知，“克尔木齐”一词在卫拉特方言中读为之为“hemceg”“hemeceg”或“kemecek”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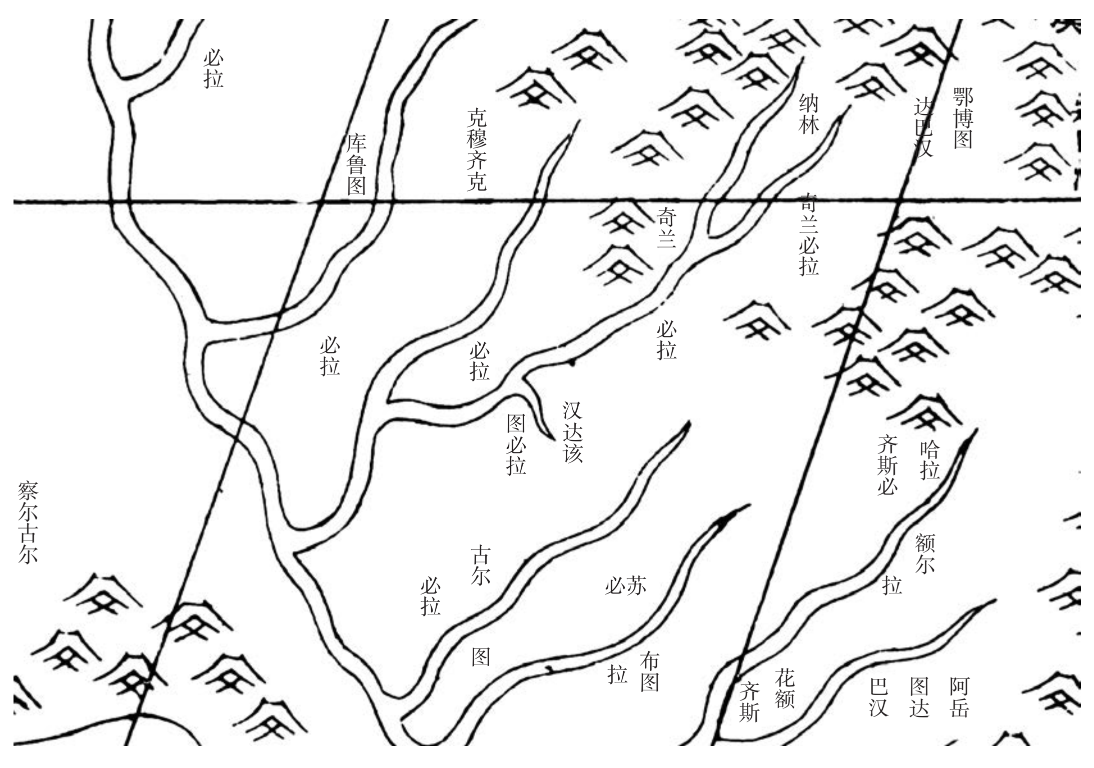
表一　克尔木齐河名称音译

地图上的地名的编号	托忒文 1	复制版地图的西里尔文音译	复制版地图的拉丁文音译	复制版地图的瑞典音译	Я. А. Бенцелштерн 复制的版本音译
187	[托忒文]	Кэмэзекъ（Кэмузэкъ）	Kemezek（Kemuzek）	Kemeseck	Kemeseck

2. 1760 年出版的乾隆皇帝地图

清代康、雍、乾三朝时期分别绘制了三幅地图，这三幅地图对了解 16 ~ 17 世纪亚洲内陆的地形、地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学者评价这三幅地图的绘制已达到当时世界级的水准[20]。尤其是乾隆时期绘制的地图大部分是由当时在北京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

完成的。因此，运用了西方的制图方法，与康熙时代绘制的地图一样具有经纬度。西方学者一直认为，乾隆时代的地图是康熙时代地图的复制本，但乾隆时代的地图还新增加了新疆和西藏，尤其是西藏部分记录的比较详细[21]。1855 ~ 1858 年，满清王朝平定准噶尔之后才有可能研究这一地区的地形和绘制地图。虽然绘制地图的时候，资料是传教士搜集完成的，但可以看出他们利用使者或参考了记载当地地名的书籍，如现在俄罗斯阿尔泰哈卡斯共和国境内的傣勒茨克叶湖（Teletskoye Lake）原名是阿拉坦淖尔，意为金色的湖。该地图是用满文和汉文绘制的，我们手里的满文版中记录的额尔齐斯右侧注入的很多小河中可以看到克尔木齐河[22]（图三）。并且在该地图上的位置与现在的地理位置一致，所以至少在 17 世纪时已经以克尔木齐（Khemchiq）一词来命名该河。当时为了避免产生音译上的错误，对地图上地名专门打了引号，因此，没有理由怀疑满语的音译。



图三　乾隆年间（1760 年）绘制的汉文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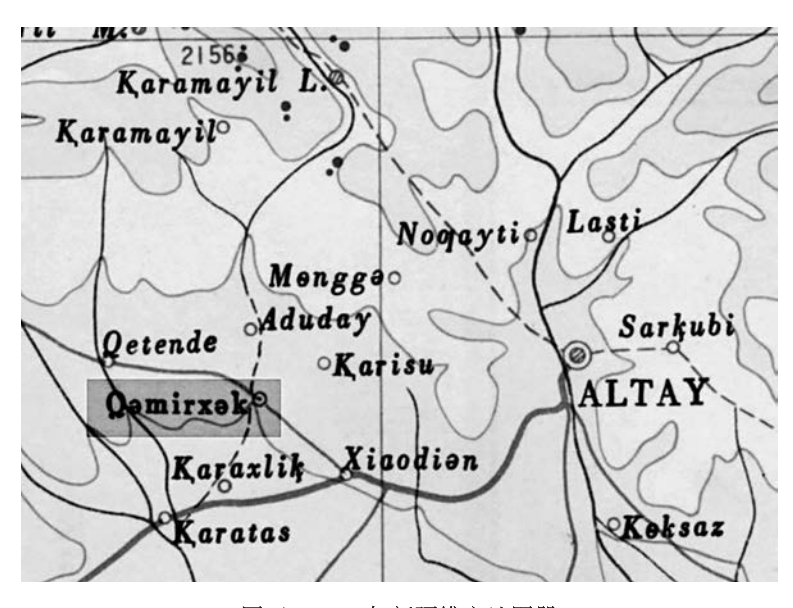
1966 年台湾出版了 1760 年绘制的乾隆时期汉文版地图，图中把克尔木齐河音译为克穆齐克（kemuqike）[23]（图四），根据汉字音写方法和黏着语语法的特点，满文地图中的 hemchig 这一词用汉语只能音译为克穆齐克。

1881 年 Г. Н. 波塔宁出版的《西蒙古游记》中有两次用 kemerchik 这一词记录了克尔木齐河，这可能是当时的称谓[24]。根据他的记录，至少到 19 世纪末蒙古人仍在那条小河两岸过着游牧生活。例如，1860 年底察罕格干[25]（棍噶扎勒参）与



图四　1942 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和海军出版的地图

边境上的俄罗斯官员发生矛盾，把寺庙迁至现在的阿勒泰市，即当时的黄庙（承化寺）。Г. Н. 波塔宁旅行经过这一带时，据说察罕格干（棍噶扎勒参）自塔尔巴哈台领来的额鲁特，或者波塔宁所使用的术语叫作巴尔里克[26]或巴尔拉格（Barlag）的人们居住在 keran 和 kemerqik 两个邻近的河谷[27]。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在该河下游的哈萨克族也游牧于此。当时在此地不仅有游牧，各种不同的民族也不同程度的经营着农业生产。20 世纪初，此地的名称也出现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和海军指挥部在 1942 年出版的地图中（图五）。该图中标记的地名与 19 世纪末期的一样，以



图五　1966 年新疆维文地图册

Kemerchik 一词标记的[28]。20 世纪末，随着哈萨克族人口日益增长，把克尔木齐改为切米尔切克。1966 年，新疆所使用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编写的维吾尔文地图册中把克尔木齐音译为 Qemirxek[29]，用西里尔蒙文音译为 kemirshek。从这点看，到 1960 年为止一直沿用着克尔木齐河原名。

三、结　　语

据以上历史地图的研究可以得出，至少在 16 世纪初这条小河被称为克尔木齐（kemtsek 或 hemtseg）。这一词为蒙古语，意为“爱美、漂亮、美丽”，同时也不能排除该词的词根是游牧在阿尔泰山的图瓦人的图瓦语的可能。新疆阿勒泰地区、蒙古国巴彦乌勒贵省青格勒苏木、科布多省布彦特苏木等地至今仍有图瓦人分布着。除此之外，图瓦共和国境内的主要河流的名称也叫克尔木齐（hemtseg）。另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是，俄国人雷米佐夫（Semyon Remezov）绘制的地图（1699 ~ 1701 年）中标记的从色楞格河左岸注入的一条小河名称也叫克尔木齐（kemtsek）（图六）[30]。



图六　雷米佐夫绘制的地图

中国考古学家李征首次发现克尔木齐文化遗址，并用该地名来命名这一考古学文化。但后来又出现了关于克尔木齐文化不同的名称版本。笔者认为对考古研究中已经形成的文化名称进行随意更改或用现代名称来替换等行为是不遵循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的。国外学者中也出现乱用文化名称的现象。不沿用从古传承至今的原蒙古地名而用其他名称代替是不妥当的，所以我们在这问题上应遵循传承的原则。2012 年笔者在新疆阿勒泰地区进行短期调查时，亲临克尔木齐文化遗址分布地区，走访当地蒙古牧民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从古至今该河的称谓为克尔木齐（hemtseg），显然切米尔切克一词是克尔木齐一词的错音或谐音。因此，在遵循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的同时，跟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也要尊重地名的传承问题。从以上列举的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到，目前在新疆北部、蒙古国西部、哈萨克斯坦东部等广阔地域内发现的克尔木齐文化遗存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称谓，据不完全统计，现至少有 7 种音译的名称。这对该文化的认识和研究产生了误导和混乱，所以我们认为该文化应以克尔木齐（hemtseg）一词来命名更为妥当。

注　释

［1］ 李征．阿勒泰地区石人墓调查简报［J］．文物，1962（2）：103 ~ 108.

［2］ Chen Kwang-tzuu and Hiebert F.T. The Late Prehistory of Xinjiang in Relation to its Neighbors. – in: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J］.Vol. 9, No. 2, 1995, pp. 246-300.

［3］ a. Варенов. Варенов А.В. О скифо-сакском компоненте в могильнике Кэрмуци（в сравнении с могильниками железного века Южной Сибири）［C］. –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тоги последних лет: Сб. тез. науч. конф., посвящ. 35-летию гуманит. фак. НГУ. – Новосибирск,1997. стр. 40-44.

b. Варенов А.В. Южносибирские культуры эпохи ранней и поздней бронзы в Восточном Туркестане.［A］. –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науки в Сибири. 1998, №3, стр. 60-72.

c.Варенов А.В. Скифск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изКитайской частиАлтая. – Итоги изучения скифской эпохи Алтая и сопредель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A］. – Барнаул, 1999, стр. 26-31.

d. Варенов А.В.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ой культуры эпохи бронзыиз могильника Кээрмуци в Северной Синьцзяне. – в сб.: Евразия : культур. наследие древних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Вып. 2 : Горизонты Евразии.［A］.–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9, стр. 11-28.

e. Варенов А.В. Новая культура эпохи бронзы из китайскойчасти Алтая.［J］. – Древности Алтая. №4. – Горно-Алтайск, 1999, стр. 60-65.

f. Варенов А.В.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е древности из могильника Кээрмуци в Восточном Туркестане（Синьцзяне）. – Археология и культурна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A］. –Владивосток, 2002, стр. 253-262.

［4］ Варенов А.В.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ой культуры эпохи бронзы из могильника Кээрмуци в Северной

Синьцзяне. – в сб.: Евразия : культур. наследие древних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Вып. 2 : Горизонты Евразии. [A] –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9, стр. 11-28.

[5] Варенов А.В.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е древности из могильника Кээрмуци в Восточном Туркестане (Синьцзяне) . – Археология и культурна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A] . –Владивосток, 2002, стр. 253-262.

[6] Бехтер А.В., Хаврин С.В. Степные бронзы из провинции Ганьсу и Синьцзян-Уйгурского автономного района Китая и проблемы восточной линии синхронизации. [A] .—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Прибайкалье в древности. Улан-Удэ, Чита: 2002, стр. 73-78.

[7] Молодин В.И, Алкин С.В. Памятники афанасьев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на северо-западе Китая (Синьцзян) . – Афанасье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2. [A] . - Барнаул: Азбука, 2012, стр.153-156.

[8] Kovalëv A. Überlegungen zur Herkunft der Skythen aufgrund archäologischer Daten. [J] . – Eurasia Antiqua. 1998, Vol. 4, pp. 247-271.

[9] Kovalëv A. Die ältesten Stelen am Ertix. Das Kulturphänomen Xemirxek [J] .– Eurasia Antiqua. 1999, Vol. 5, pp. 135-178.

[10] Ковалев А. А. Древнейшие статуи Чемурчека и прилегающих территорий. [A] . – СПб., 2012.

[11] Тишкин А. А., Грушин С.П., Мунхбаяр Ч. История открытия комплексов ранней бронзы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части Ховд аймака Монголии. [A] . – Чемурчекский культурный феномен.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следних лет. – СПб., 2012, стр. 15-31.

[12] Wei Ming Jia P., Betts A.V.J. Re-analysis of the Qiemu'erqieke (Shamirshak) cemeteries, Xinjiang, China. [C] . – in: The 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 Vol. 38, No. 3/4, Fall/Winter 2010, pp. 275-317.

[13] Макшеев А.И. Карта Джунгарии, составленная шведом Ренатом, в времена его плена у калмыков, с 1716 по 1733 год. [J] – Записк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 XI. – СПб.: Изд. ИРГО, 1881.\Baddeley J.F. Russia, Mongolia, China. Vol. I. [A] – New-York: Burt .Franklin, 1963; Poppe N. Renat's Kalmuck Maps. [J] – in: Imago Mundi. Vol. 12, 1955, pp. 157-159. Rosén S. Commentary of the Renat Maps. Commentary Project of the Center for Central Eurasian "Civilization Archive". http://cces.snu.ac.kr/com/17rnte.pdf. Jan, 2014.

[14] Макшеев А.И. Карта Джунгарии, составленная шведом Ренатом, в времена его плена у калмыков, с 1716 по 1733 год. [J] . – Записк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 XI. – СПб.: Изд. ИРГО, 1881.

[15] Baddeley J.F. Russia, Mongolia, China. Vol. I. [J] . – New-York: Burt .Franklin, 1963.\Poppe N. Renat's Kalmuck Maps. [J] – in: Imago Mundi. Vol. 12 (1955) , pp. 157-159.

[16] Poppe N. Renat's Kalmuck Maps. [J] . – in: Imago Mundi. Vol. 12 (1955) , pp. 157.

[17] Baddeley J.F. Russia, Mongolia, China. Vol. I. [J] . – New-York: Burt .Franklin, 1963. CLXVIII, CLXXVIII.

[18] Baddeley J.F. Russia, Mongolia, China. Vol. I. [J].– New-York: Burt .Franklin, 1963.CLXXV, CLXXVIII.

[19] Poppe N. Renat's Kalmuck Maps. [J]. – in: Imago Mundi. Vol. 12（1955）, pp. 159.

[20] Laura Hostetler. Early Modern Mapping at the Qing Court: Survey Maps from the Kangxi, Yongzheng, and Qianlong Reign Periods. – in: Chinese History in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Eds. Yongtao Du and Jeff Kyong-McClain. [M]. Lanham, – Lexington Books, 2013, pp. 15.

[21] Laura Hostetler. Early Modern Mapping at the Qing Court: Survey Maps from the Kangxi, Yongzheng, and Qianlong Reign Periods. [M].– in: Chinese History in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Eds. Yongtao Du and Jeff Kyong-McClain. – Lexington Books, 2013, pp. 17.

[22] Бира 满语中意为河流。

[23] 张其昀 . 清代一统地图 [M]. 台北：“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1966：89.

[24] Потанинъ Г.Н. Очерки Съверо-Западной Монголіи. Выпускъ I. Дневникъ путешестія и матеріалы для физической географіи и топографіи С. З. Монголіи. [A]. – СПб., 1881, 27, 31.

[25] 察罕格干（Tsagaan gegeen）棍噶扎勒参（1835-1895），又名嘉穆巴图多普，是喇嘛教的转世活佛佛，号“喇嘛尕若”（白喇嘛）。蒙语为察罕格干（白佛）。

[26] 巴尔里克（Barliq）或巴尔拉格（Barlag）是指当时生活在塔尔巴哈台巴尔鲁克山的厄鲁特人。

[27] Потанинъ Г.Н. Очерки Съверо-Западной Монголіи. Выпускъ I. Дневникъ путешестія и матеріалы для физической географіи и топографіи С. З. Монголіи. [A]. – СПб., 1881, 27.

[28] Jacobson-Tepfer E., Meacham J. Photography by G. Tepfer. Archaeology and Landscape in the Mongolian Altai: an atlas. [A].– Redlands: ESRI Press, 2010. 9, Fig. 1.14.

[29] Zhonghua. Zhonghua Həlk Jumhuriyiti Xinjiang Uyəur Aptonom Rayoni Həritiliri Toplimi. [J]. – Xinjiang Uyəur aptonom rayoni həritiliri toplimi tüzüx weyyüənhuyi. 1966: 84-85.

[30] Ремезовъ. Ремезовъ С.У. Чертежная книга Сибири. NA. 1699-1701.

Reconsidering the Name of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 “keermuqi”

Tsagaan.Turbat

Abstract: Taking the change of name for the “Khemcek” Culture as an example, the present article article discusses potential issues on the naming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by modern traditions, which pay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confusion and misleading conceptions caused by the diverging naming practices employed in modern cross-cultural and transnational studies. For instance, “Khemcek”, as a place name, was consistently used since ancient times in

China; it, however, was abandoned by the late 20th century AD and replaced by “Qemurqek”. Such dramatic change in the naming tradition has unexpectedly caused great confusion to scholars in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and prevented an accurate and complete re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is archaeological culture. Therefore, without a standardized and well-recognized name, it is often impossible for researchers outside of China to access online resources on relevant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Inspired by the issues caused by change of name on the “keermuqi” Culture,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the naming of an archaeological culture should give full consideration of the revelant places’ historic names and avoid making unnecessary changes by personal preferences.

Keywords: keermuqi; Archaeological Culture; Name; Bronze age; Altai

阿尔泰早期游牧民族墓葬出土的中国古代漆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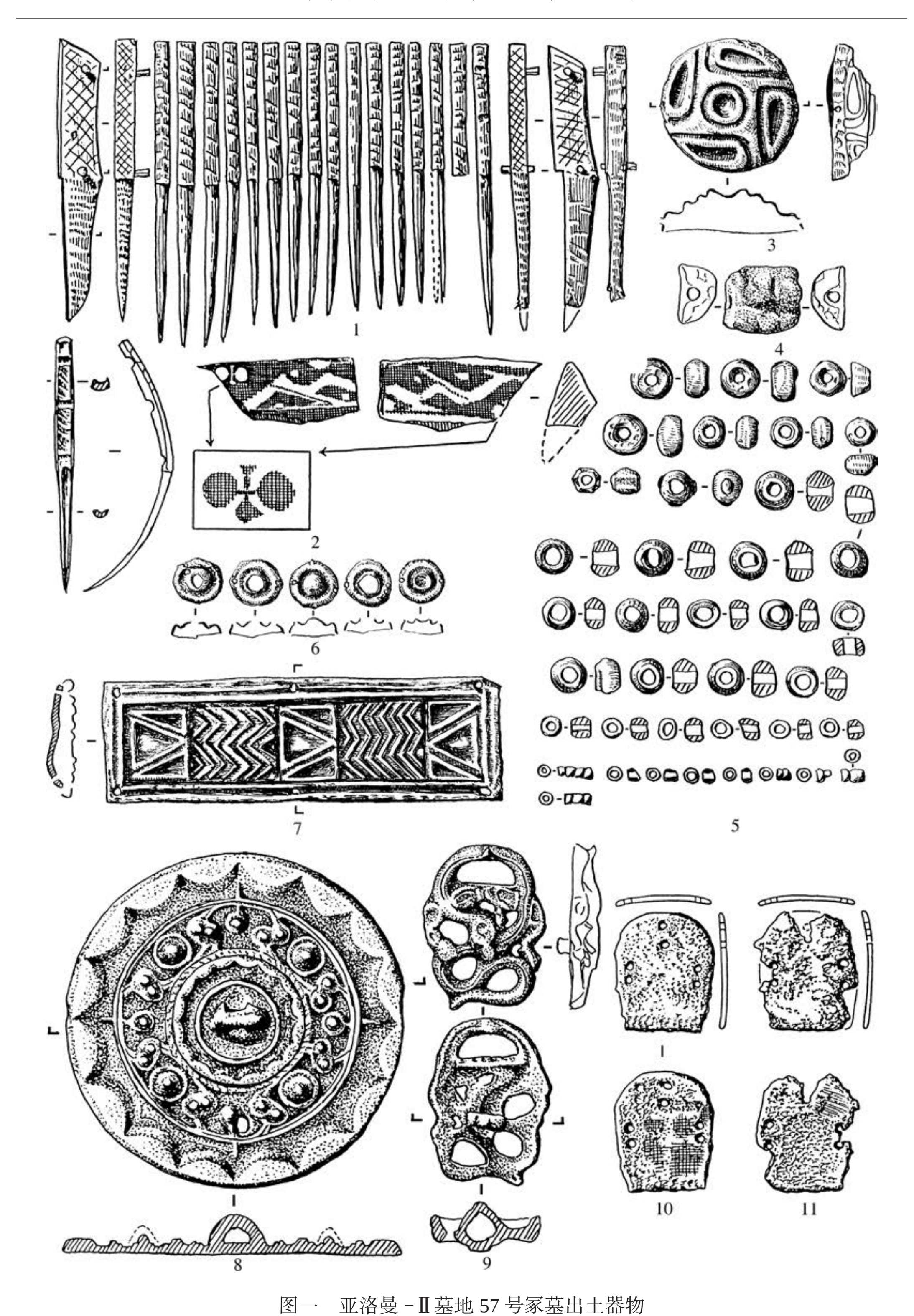
阿列克谢·提什金

（俄罗斯国立阿尔泰大学，俄罗斯巴尔瑙尔）

阿尔泰巴泽雷克时期（公元前 6 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 2 世纪）游牧民族“王”冢出土的中国古代器物，学者已经反复讨论过了[1]。近十年来，在阿尔泰发掘的布朗－科巴文化乌斯季－埃季甘期的墓葬中，就发现了来自古代中国的器物[2]。乌斯季－埃季甘期正是中亚匈奴国存在的时期[3]，相当于中国的西汉时期。尽管俄罗斯学者认识到公元前 1 千纪后半期中国文明对戈尔诺－阿尔泰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但是还没有对其做全面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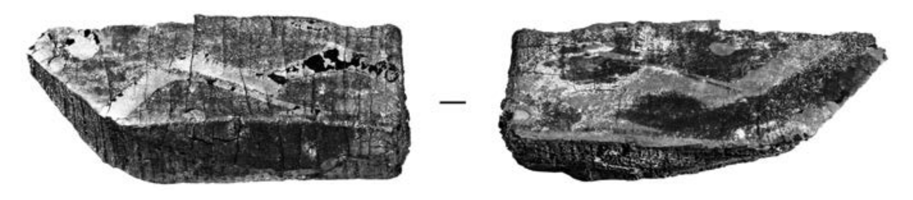
亚洛曼－Ⅱ墓地位于阿尔泰中部，卡通河的左岸（地理坐标 N50°31.524′，E86°33.350′；海拔 805 米）。近年我们在该墓地的 57 号冢墓中发现了一些漆器，该墓属科巴文化早期，年代为公元前 2 ~ 公元 1 世纪，其中有些是 ^{14}C 测定的年代[4]。人们注意到，在女性死者的周围摆放了各种各样的并且是保存很好的器物（图一）。大部分器物分布于颅骨周围：骨梳子（图一，1、2）、大银泡（图一，3）、玻璃和石质珠子（图一，4、5）、有色金属浮雕小泡饰（图一，6）、金浮雕牌饰（图一，7）、青铜镜（图一，8）、装有动物骨头的木盘残片；纺织物碎片和两个铁制铠甲片（图一，10、11）。我们不能排除部分器物（镜子、梳子和铠甲片）原来装在袋子里，而其余器物则是头带（图一，3、6、7）和项链（图一，4、5）的组成部分。在腰部发现了一件透雕青铜扣，造型为咬尾蜥蜴（图一，9）。在发掘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些其他器物。在上述所列的出土器物中，有一件涂黑漆的木器碎片，表面绘有红色图案（图二），该器物可能是耳杯的耳部。此外，还发现许多饰有黑地红色曲折纹图案的碎片。类似的器物在中国相当广泛地流行于公元前 3 世纪末期到公元前 2 世纪，它们的年代大概也是如此。

*　本文为课题“古代与中世纪的阿尔泰和周边区域的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形成与演化：综合复原”的部分成果，得到了俄罗斯研究基金的支持，经费号：№16-18-10033。本文正文由南京大学张良仁教授翻译，英文摘要由 N. Seregin 翻译。



图一　亚洛曼－Ⅱ墓地 57 号冢墓出土器物

1、2. 骨梳子　3. 大银泡　4、5. 玻璃和石质珠子　6. 有色金属浮雕小泡饰　7. 金浮雕牌饰　8. 青铜镜
9. 透雕青铜扣　10、11. 纺织物碎片和铁制铠甲片



图二 涂漆的木胎部分双面视图

（亚洛曼－Ⅱ墓地 57 号冢墓）

据研究，亚洛曼－Ⅱ墓地 57 号冢墓出土漆器碎片所用的木材是红木。红木为热带地区豆科檀属木材，主要产于印度、中国南部及东南亚。对漆器碎片的 X 线荧光分析表明，红色的图案所用的颜料为朱砂。对这种颜料化学成分的分析表明，所用的黏合剂是生物聚合剂漆酚，来自漆树的树汁[5]。

除 57 号冢墓外，漆杯的残片也发现于 43 号冢墓。亚洛曼－Ⅱ墓地出土的马镫皮带上的装饰品、51 号冢墓出土的女性腰带上的覆盖物、咬尾蜥蜴状的透雕青铜扣环都可能涂有朱砂调成的红漆[6]。类似器物和装饰技术在早期铁器时代的阿尔泰艺术中没有发现，表明亚洛曼－Ⅱ墓地 57 号冢墓出土的漆器应来自于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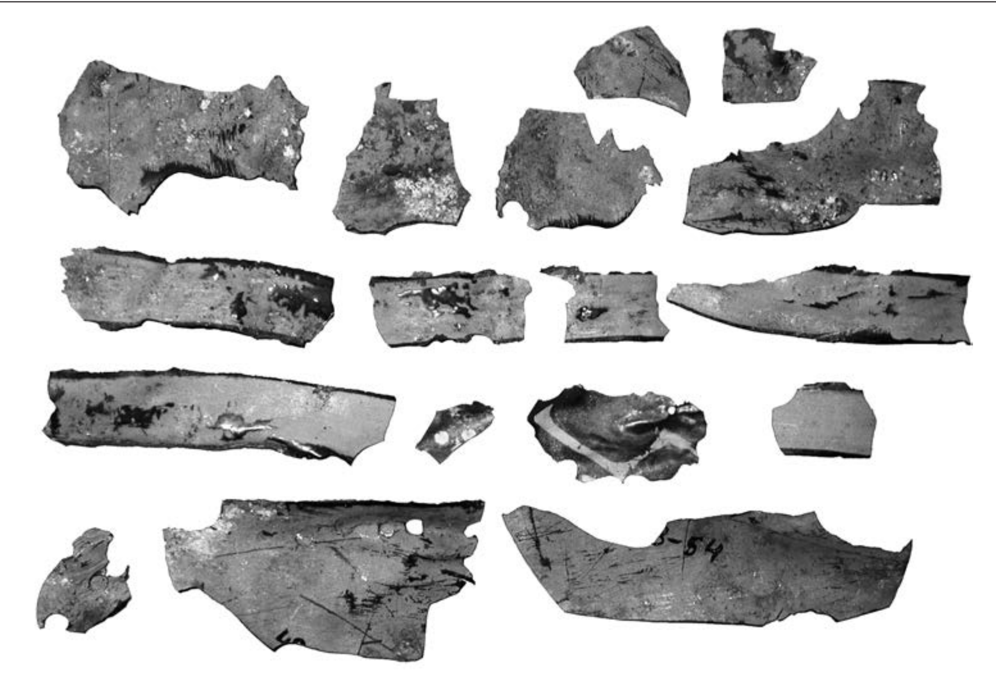
与亚洛曼－Ⅱ墓地出土的漆片相似的器物还见于 M. П. 格里亚兹诺夫 1927 年发掘的希别墓地[7]。现在这件器物已经发表了三个木炭样品的 ^{14}C 测年结果，经过树轮校正的年代范围为：① sigma cal 公元前 760 ~ 前 390 年，公元前 380 ~ 前 200 年，公元前 360 ~ 前 170 年；② sigma cal 公元前 800 ~ 前 200 年，公元前 390 ~ 前 190 年，公元前 390 ~ 前 110 年[8]。这说明这座墓形成于巴泽雷克文化的晚期。希别墓地的“漆杯”问题曾引起学者们的讨论[9]。2006 年，笔者有幸观摩了这些材料。在国立艾米塔什博物馆东欧和西伯利亚考古部的№4888 藏品中，仅仅保存了几块漆器碎片（图三）。漆器的木胎已经不见，仅存有小块黑色漆片，其上可装饰鲜艳的红彩图案。其器物形态接近于亚洛曼－Ⅱ和希别的器物（图二、图三）。

深入检索材料，笔者在巴泽雷克的几座冢墓中又发现了一些材料。类似的图案见于若干类器物，它们出土于若干墓地，其年代为公元前 1 千纪后半期。曾经有学者做过这些资料的收集和研究[10]。在此我们需要简要介绍一下现有的资料。

1）希别“漆耳杯”残片（藏品№4888/54）（图三）和其他一些资料（藏品№4888/101、162）[11]。

2）巴沙达尔－Ⅰ（图四）“在颅骨旁边发现了黑漆和红漆的大块残片，它们原来大概是覆盖在死者的头带上的”（藏品№2066/24）。上面能清晰地看到亚麻编织的粗糙纺织物的痕迹。С. И. 鲁坚科曾经在自己的专著中提到，在马坑里发现了完整的红漆和黑漆遗物，它们原来可能是涂在马鞍上的[12]。他还提到一件弓箭袋的薄桦树皮残片上面涂了朱砂。

3）巴泽雷克－4 出有漆器残片（藏品№ 1686/107、108、154、155）。Л. Л. 巴尔科



图三　希别墓葬出土的漆片
（M. П. 格里亚兹诺夫发掘）

娃曾经挑选了一些样品，做了化学分析[13]。在冢墓的器物目录中，发掘者 С. И. 鲁坚科没有列出这些资料。

4）巴泽雷克 –5（藏品№1687/153）“涂有红色漆的普通马鞍”[14]。此外还有其他的漆片。

5）巴泽雷克 –6（藏品№2064/7） 红漆板[15]。

6）巴泽雷克 –7（藏品№2064/5-6）“皮带，涂有红漆”[16]。它们是衣服的一部分。

7）图埃克塔 –1（藏品№2179/916，918）和图埃克塔 –2（藏品№2180/840）[17]。

8）蒙古诺音乌拉尔山脉的匈奴冢墓发现许多涂有漆的器物[18]。

С. И. 鲁坚科的专著很少提到漆器，不过关于漆器他谈了一些十分具体的看法[19]。С. И. 鲁坚科认为，阿尔泰游牧民族同中国人的联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并且晚于他们与西亚和中亚的来往[20]。 除此之外，他还说到这些漆器可能是当地



图四　巴沙达尔 –I 遗址出土的漆片
（С. И. 鲁坚科发掘）

生产的，因为当地具有所有漆器生产所必需的材料[21]。

Л. Л. 巴尔科娃对漆器的化学和物理特征做了专门的研究。上面所说的样品在国立艾米塔什博物馆的实验室做了分析和研究[22]。她谈到，漆器的生产在中国开始于西周，在战国时期（公元前 453 ~ 前 221）达到了鼎盛。Л. Л. 巴尔科娃支持 С. И. 鲁坚科的观点，认为漆器制造可能不限于中国中原地区，也可能发生在阿尔泰地区[23]。但是要证明或者驳斥这种观点暂时还没有有力的证据。在我们看来，Л. Л. 巴尔科娃得出的一条结论是重要的，即巴泽雷克和希别出土的漆器是相同的，而与诺音乌拉出土的年代较晚的漆器不同。

2006 ~ 2008 年，由笔者发起，对阿尔泰古代游牧民族冢墓群出土的漆器进行了多学科研究[24]。虽然所有的分析样品涂的是酚基漆料，但是它们的一些工艺特点不同于来自亚洛曼－Ⅱ墓地的 57 号冢墓出土的器物。希别出土的一些漆器残片（藏品№4888/54）带有棕色斑点，表明漆中含有少量的铁（Fe- 约 80%）。X 线荧光分析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分析者 С. В. Хаврин）。此外，分析还发现了大量的锰（Mn- 约 16%）和钙（Ca）。上述的分析数据说明，这些器物或者涂的是所谓的生漆，或者漆料中添加了少量的铁。如果研究传统的漆工艺，那么这种物理化学性能不高的漆（也就是几乎不使用铁的漆）只能用作底层漆。当人们用它作为地子，然后在上面用红色颜料描绘图案时，那么可能说明工艺流程受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和简化。

木材上的漆层首先是要起防护作用，然后才是装饰作用。漆层之所以能起保护作用，是因为它能够遵循准确的干燥要求（在一定湿度和温度条件下）。离开了最佳条件以及随意改变成分（漆、染料）都会降低对漆器的保护作用，因为它没有形成百分百“结合”的空间结构[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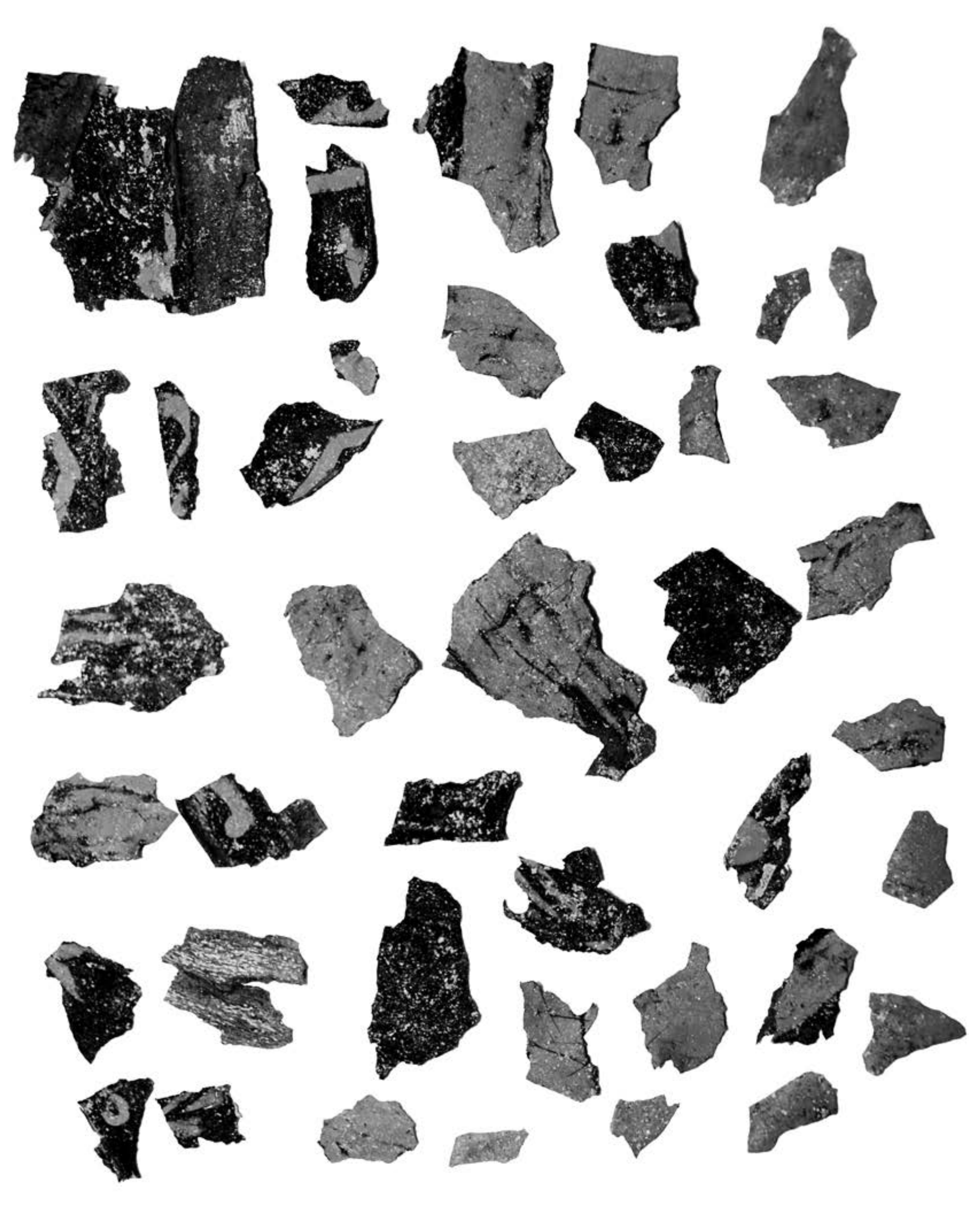
从器物的损坏特征来看，酚基漆层具有保护作用。在希别（4 个样品经过分析）和亚洛曼－Ⅱ出土的所有样品中，漆层（准确地说是朱砂颜料和漆本身）都有了极好的强度，脱落发生于与腐朽的木胎之间。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希别出土的一个漆器样品中，朱砂层和漆层之间也出现了脱落。希别的№1 和№2 样品的朱砂层很厚（国立艾米塔什博物馆的同事 О. И. Новикова 和 С. В. Хаврин 的分析结论），其中的颜料颗粒很大。这就说明，两种颜料都没有经过很好的研磨。颜料层多孔、破碎，也就是说它从一开始就被漆黏合物质破坏了。在希别出土的所有器物上，朱砂的颜色都不太鲜艳和饱和，远不如亚洛曼－Ⅱ墓地 57 号冢墓的朱砂颜色。亚洛曼－Ⅱ样品的颜料部分，除了朱砂以外，还有铁和铜的氧化物。而希别样品的朱砂颜料发现有钙的填充物。为了得到更加鲜艳的红色色调，制作“希别耳杯”的工匠使用了带有高度着色成分的物质，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漆的保护作用。在希别出土的样品№3 和№4 上，所涂的漆层十分薄，这可能说明，器物的制造者没有大量的漆可供使用。亚洛曼－Ⅱ出土漆器的工匠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这里的样品坚硬匀称，器物两边可以看到极为鲜

艳的缺口。一边的漆保持了亮丽的光泽和极高的硬度。我们可以推测，器物很少在阳光下使用。否则我们看到光泽会暗淡，因为紫外线的照射对漆酚会有损害。样品另一边的漆有点暗淡，光泽略差并带有裂纹。在缺口处能清晰地看到“典型”东方漆器的层次构造：下面是几层黑漆，鲜艳亮丽，色泽均匀，结构致密；上面涂有薄而饱和的棕红色朱砂。

但是，亚洛曼－Ⅱ漆器与其他遗址（巴泽雷克－6、巴泽雷克－7、巴沙达尔－Ⅰ、朵盖巴雷－Ⅱ等）出土的漆器样品的最大区别是，它实际上并不含铁。漆的黑色是通过添加带有镍杂质的铜而获得的（铜镍比例为 98∶2）。铁确实存在于样品中，但是含量十分微小，不仅不能获得漆器的饱和颜色，也完全不能达到黑色和类似的硬度。漆料中的微量锰也和生漆中铁和锰的含量完全相同。在亚洛曼－Ⅱ出土的文物中，我们看到了保存非常好的东方漆器样品。但是，它的颜色是通过使用铜镍合金来获得的。我们怎么解释这种漆器传统工艺的改变呢？可能出于某种原因，制造者手头缺乏铁器，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太可信。铜和镍的含量远远超过了获得上乘颜料所需的条件。这里值得提醒一下，在获得东方漆器的现代工艺中，在漆料中加铁是通过将铁器（如铁钉）放在漆液中完成的。由此，人们得到了最佳的铁漆比例。上述高含量的铜（带有镍杂质），可能只是在制作时使用了有色金属容器的缘故。看来，漆液在铜镍合金容器中存放了一段时间，然后涂覆到器物上。由此结论引出了新的问题：什么样的证据可能反映了工艺流程的改变？铜－镍合金是从哪里落入制造者手中的？为什么工匠手里会没有铁？上述问题中有些可以找到答案。比如，我们知道，中国有大量的铜矿，也有大量的朱砂矿（主要分布于云南省）；中国有铜镍硫化矿（铜和镍的比例为 1∶15），同时也有黄铜矿、镍黄铁矿和含镍的磁黄铁矿（比例为 1∶2.2），等等[26]。

上述的研究经历表明，阿尔泰地区古代冢墓出土漆器的研究还没有结束，并且需要在多学科水平上加以继续。所以，我们给国立艾米塔什博物馆的同事们提供了样品，用以进行重复分析。这些资料和其他一些现有资料可以帮助考古学家探讨现有问题，继续研究阿尔泰地区游牧民族同南部一些邻国的联系问题，并且能结合其他中国器物研究所发掘冢墓的年代。

最后我们应当指出，漆器样品还在继续增加。笔者不久前在发掘布格雷遗址（阿尔泰西北山麓）时得到了一些新资料（图五），使我们能够继续研究，并进行比较分析。为此，俄罗斯学者必须同中国和日本的专家携手开展研究。还有一个方面我们必须注意，漆器属于很好的炭样来源，可以成为 AMS 年代测定的合适资料。这样一来，细致且迫切的工作正等待着研究者，不过上面我们已经提出了一套研究方案。



图五　布格雷遗址 4 号冢墓出土的木胎残块和漆片
（阿列克谢·提什金发掘）

参考文献

[1] a. Руденко С. И. Культура населения Горного Алтая в скифское время [M].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53.

b. Руденко С. И. Культура населения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Алтая в скифское время [M].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60.

c. Яценко С.А. Костюм древней Евразии: ираноязычные народы [M]. Москв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06.

[2] Тишкин А. А., Горбунов В. В. Горный Алтай в хуннуское время: культурно-хрон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J]. Россий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2006(3): 31-40.

[3] a. Тишкин А. А., Горбунов В. В. Предметный комплекс из памятника Яломан-II на Алтае как отражение влияния матери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ы хунну [C]. Социогенез в Северной Азии. Иркут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рку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5, Часть I: 327-333.

b. Тишкин А. А., Горбунов В. В. Комплекс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в долине р. Бийке (Горный Алтай) [M]. Барнаул: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лта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5.

[4] a. Тишкин А.А., Горбунов В. 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огребально-поминальны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очевников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м Алтае [C]. Проблемы археологи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Сибири и сопредель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во Ин-та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СО РАН, 2003: 488-493.

b. 同 [1] c.

c. Тишкин А. А. Результаты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го изучения материалов памятника гунно-сармат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Яломан-II [C].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археологии России. -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ститута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Сибирск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2006: 384-387.

d.Тишкин А. А. Создание периодизационных и культурно-хронологических схе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и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концепция изучения древних 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х народов Алтая [M]. Барнаул: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лта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7: 264-267、270-275.

[5] Тишкин А. А., Хаврин С. В., Новикова О. Г. Комплексное изучение находок лака из памятников Яломан-II и Шибе (Горный Алтай) [C]. Древние 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е кочевник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Барнаул: Азбука, 2008: 197.

[6] Тишкин А. А.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женской одежды хунну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п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м материалам из Горного Алтая [C]. Снаряжение кочевников Евразии. Барнаул: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лта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5: 195-201.

［7］ a.Баркова Л. Л. Курган Шибе и вопросы его датировки［J］.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Эрмитажа, Ленинград, 1978(19): 37-44.

b.Баркова Л. Л. Погребение коней в кургане Шибе［J］.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Эрмитажа, Ленинград, 1979［20］: 55-65.

c. Баркова Л. Л. Курган Шибе. Предметы матери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из погребальной камеры［J］.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Эрмитажа, Ленинград, 1980(21): 48-58.

［8］ Алексеев А. Ю., Боковенко Н. А., Васильев С. С. Евразия в скифскую эпоху: радиоуглеродная и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хронология［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Теза, 2005: 258.

［9］ 同［6］.

［10］ 同［6］.

［11］ 同［6］：44.

［12］ 同［1］a：38，42，44.

［13］ 同［6］：44.

［14］ 同［1］a：374.

［15］ 同［1］a：40，56，375，рис. 14.

［16］ 同［1］a：117，118，375.

［17］ 同［6］：44.

［18］ a. Umehara S. Studies of Noin-Ula finds in north Mongolia［M］. Tokyo, 1960.

b.Руденко С.И. Культура хуннов и Ноинулинские курганы［M］.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62.

c. 同［6］.

d.Полосьмак Н. В., Богданов Е. С., Цэвээндорж Д. Раскопки кургана хунну в горах Ноин-Ула, Северная Монголия［C］. Проблемы археологи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Сибири и сопредель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ститута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Сибирск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2006, Том XII, часть I: 460-462.

［19］ 同［1］a.

［20］ 同［1］a：168, 267, 356，357.

［21］ 同［1］a：167.

［22］ 同［6］：42-44.

［23］ 同［1］a：167.

［24］ 同［4］d.

［25］ 同［4］d：198，199.

［26］ 同［1］a：167.

Ancient Chinese Lacquerware Excavated from Early Nomadic Tombs in Altay

A. A. Tishkin

Abstract: In tombs of the Scythian and Xiongnu periods of the Altai Mountains, there have been found a good number of fragments of Chinese-type lacquerwares. Employing the results of natural scientific analyses,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study of Warring-States and Han Dynasties Chinese-type lacquerwares from the cemeteries of Yaloman- Ⅱ and others. However, the lack of comparable data of contemporaneous Chinese lacquerwares from China, does not allow the paper to address the question of production area. But the method of this paper points to a new direction of research for Chinese lacquerwares.

Keywords: Altai Mountains; early nomadic people; Chinese lacquerwares

巴泽雷克墓葬的地理方位

马丽娜·奥切尔－嘎力雅耶娃著[1]　朱彦臻译[2]

（1. 联邦俄罗斯科学院塔塔尔斯坦分院考古研究所史前部，俄罗斯喀山；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北京，100006）

一、引　　言

戈尔诺－阿尔泰（Gorny-Altai）遗址的年代可追溯到斯基泰（Scythian）文化时期，无论从自然地理还是从历史文化特征而言，它在传统上都被认为是欧亚草原带历史遗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的巴泽雷克（Pazyryk）文化墓葬已经成为斯基泰文化时期整个欧亚草原最具代表性的象征。在此发现一处保存独特的墓葬遗存，包括木乃伊遗体和随葬的马骨遗骸，以及许多木制、皮制、羊毛和其他有机材料所制的手工艺品，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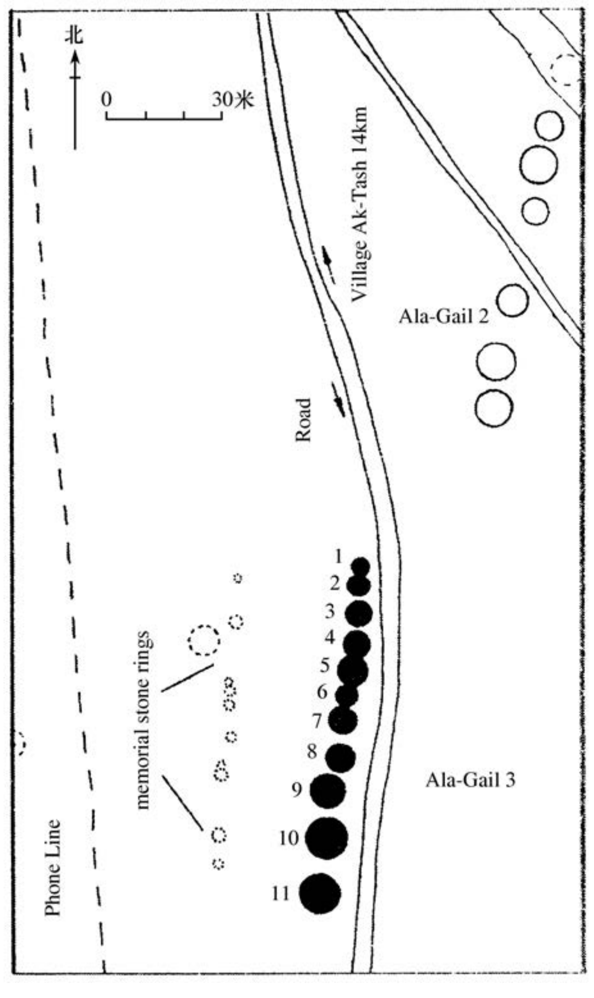
巴泽雷克文化长期以来一直是致力于研究斯基泰和萨尔马提亚（Sarmatian）的学者所关注的重点。根据最新的数据，在135个戈尔诺－阿尔泰墓地中共有569个巴泽雷克墓葬，其中212个墓葬（占墓葬总数的37.3%）随葬有马（Tishkin，Dashkovskii，2003：144）。该遗存由年代前后相继的两大类墓葬遗存所组成：①早期巴泽雷克文化阶段（mid - VI - V c. BC），②晚期巴泽雷克文化阶段（Ⅳ—Ⅲ cc. BC）。这两个年代序列是基于戈尔诺－阿尔泰遗址的相关年代研究得出的，其中包括M. P. 格列亚兹诺夫（Gryaznov）、S. I. 鲁金科（Rudenko）、L. S. 玛莎德洛夫（Marsadolov）和A. S. 苏拉扎科夫（Surazakov）的研究成果，同时还有从大型巴泽雷克墓葬中提取的^{14}C证据（Eurasia in Scythian epoch ... 2005：165～169）。

从地质角度看，阿尔泰山（Altai）是一个由多个山脊组成的大型山系，其主脉东西横向延伸，位于蒙古国北部和西北西伯利亚低地之间的戈尔诺－阿尔泰山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阿尔泰山系由西北到东南逐渐升高，卡顿－崔（Katun'-Chui）山脊是其主峰，而在该地区的西部、中部和东南部，有相当大的草原地带集中于干涸的河床地区和山脉南坡的阶梯状地带。从地理特征来看，阿尔泰草原应该被定义为草原板块（patchy）（形成了一个个类似岛屿的样子），因为它没有像欧亚草原的其他区域一样，形成连续的带

状区域。这些大的草原板块位于该区域的核心地带，分布于山体的中、高洼地区域，并且常常与宽度不一的河谷相连。

阿尔泰山的另一个地理特征对畜牧业的发展极为重要。高原南面的山坡正对亚洲腹地，其大陆性气候极为显著：春季温暖干燥，夏季炎热，其植被是典型的岩石荒漠草原。但是在冬季和初春，南部的山坡上可以饲养家畜，因为那里是多风的卡顿（Katun）河中部的草原阶地。也就是说，在阿尔泰的中部，整个冬季几乎都没有降雪，这对冬季饲养家畜是十分重要的（Kiriushin，Tishkin，1997：8～93）。

巴泽雷克墓葬通常表现为带有石围的土冢（Earth Mounds），它们在草原上形成南北向延伸的链状。在每一个墓葬的西侧都有具有纪念意义的石圈，东侧有成排直立的石头，也就是所谓的巴拉巴拉石（balbal）（图一～图三）。其中，贵族墓葬通常在



图一　阿拉－盖伊勒墓葬群

（Ala- Gail Burial mound group）

（Kubarev, Shulga，2007：Fig.25,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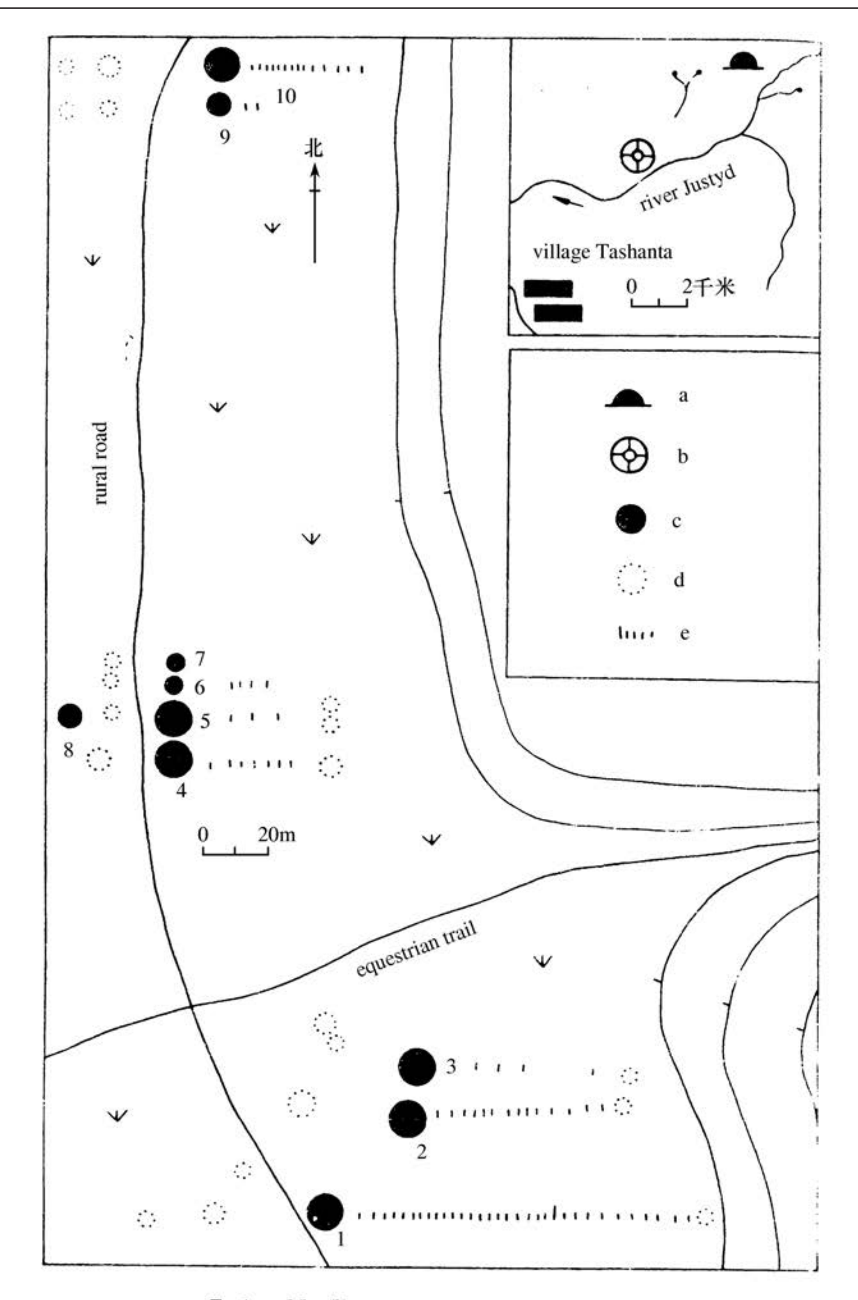


Табл. II. **План могильника Юстыд I.**

а — исследованный могильник, *б* — керексур, *в* — раскопанные курганы, *г* — восьмикаменные кольца, *д* — балбалы.

图二　尤斯坦特Ⅰ号墓葬群

a. 墓葬群　b. 赫列克苏尔（中世纪）　c. 墓葬（巴泽雷克文化）　d. 祭祀圈　e. 巴拉巴拉石（立石）

（Kurgan Group Ystyud-I. a - Burial mound Group, b - Hereksur（Middle age）, c - Burial Mound（Pazyryk culture）, d - Memorial stone rings, e - balabals（vertically set stones））

（Kubarev，1991：Fig. 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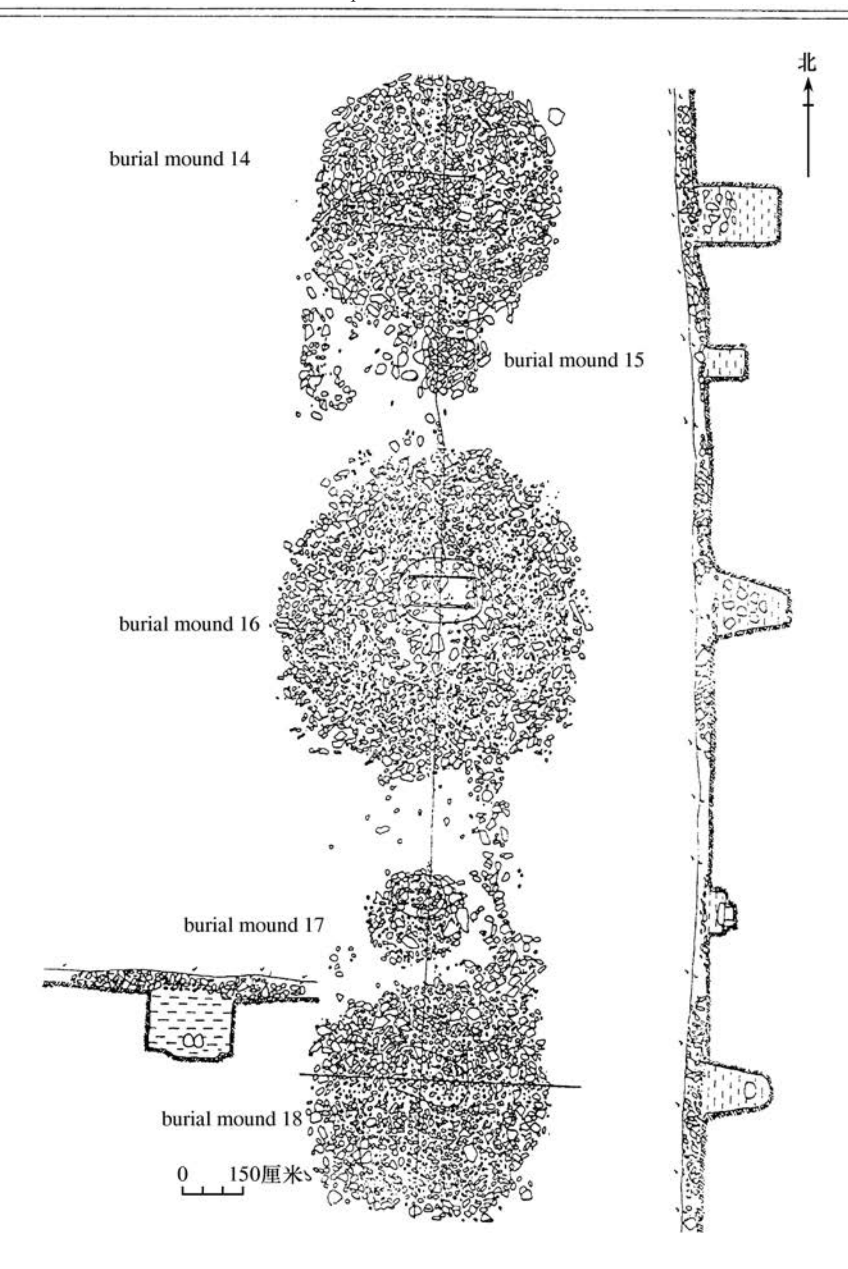


Рис. 13. Тыткескень-VI. Курганы №14-18

图三 忒特科斯肯Ⅵ号墓葬群 14 ~ 18 号墓

（Tytkesken-VI. Burial Mounds 14-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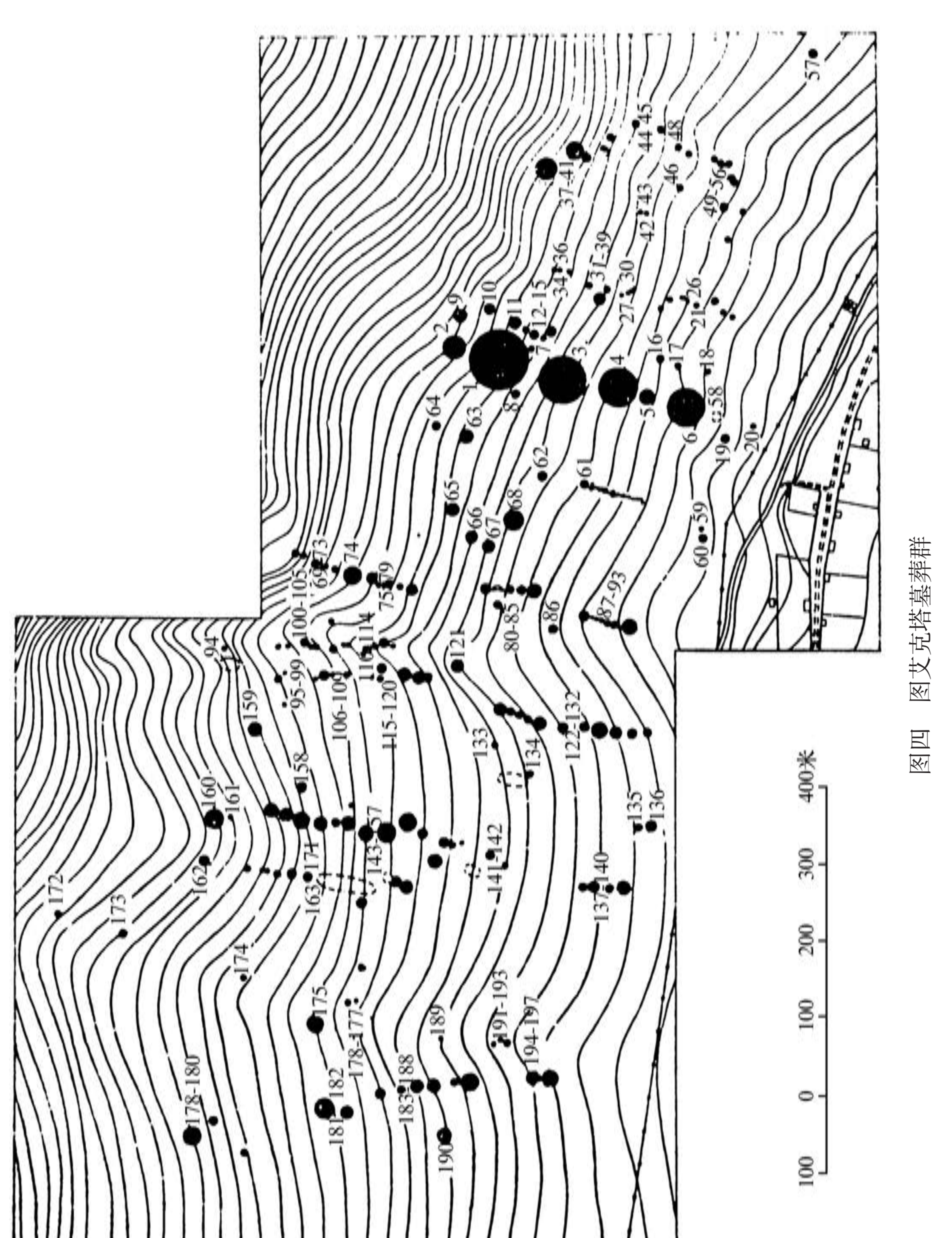
（Kiryushin, Stepanova, Tishkin，2003：Fig.13）

所谓的“墓葬区（kurgan field）”被发现。例如，1954 年，在位于乌苏尔（Ursul）河左岸的图艾克塔（Tuekta）村，在方圆 110 平方千米的图艾克塔（Tuektinsky）墓葬区内，经证实有 197 座不同时代的土冢，以及成排的立石和砖石建筑构件等珍贵的资料被记录下来（Rudenko，1960：96 ~ 106）。大部分的墓葬形成了南北向排列的链状，但也有一些是单独存在的或没有特定的分布规律。在墓地的东侧，有四个大型土冢依次排列开来，其中最北端的两座已经被挖掘，被称为图艾克塔一号墓和图艾克塔二号墓（图四）。据记载，在巴沙达尔（Bashadarsky）墓地，存在一些由 57 个土冢组成的墓葬组群，最东端有三个大型土冢，由北向南依次排开，角度略有偏移。其中部和南部的两组已经被发掘出来，被称为巴沙达尔一号墓和巴沙达尔二号墓。什伯（Shibe）墓地位于乌苏尔河左岸，及其与塔尔迪河汇合处 1 ~ 2 千米的范围内，由 124 个土冢组成，形成了 4 大墓葬组群。东部组群有 66 个墓葬，其中 6 个大型土冢形成一列，以其为中心，环绕分布着其他的土冢。最北端的大型土冢已经被发掘出来，被命名为什伯墓葬（Shibe kurgan）（Barkova，1978：37 ~ 44）。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大型墓葬都位于整个墓葬区的东部，他们面向东方，是整个墓地的“领头羊”。同样地，别列里（Berel）墓地最大的两个土冢：大别列里墓葬（Big Berel kurgan）和别列里 2 号墓葬（Berlel kurgan II）也位于墓地主体区域的东端，由北向南依次排列（Samashev et al，2002：Pic.1）。

二、墓葬及殉马坑的上层结构

依照惯例，巴泽雷克墓葬一般只有一个墓室，死者随葬的木椁通常位于墓穴的南壁，而马坑则位于墓穴的北部，处于墓壁和木椁之间的位置。这些随葬马被放置在一个稍低一些的木架上，即在木椁建成之后，沿着墓坑的北壁放置一个特殊的架子，用来安置随葬的马匹。在木椁下葬前，放置随葬马的架子以及墓穴底部都要经过精心的修饰，墓坑的底部铺有仔细挑选的石头，其上覆盖有一层碎石，然后把墓椁放在上面，其上再覆盖一层树皮，这层树皮可盖住随葬马和墓穴。在大多数情况下，马匹被放在架子上，其主人的木椁则被放在墓坑的更深处。例如，在阿克－阿拉哈墓地（Ak-Alaha-3）的 1 号墓葬中，第一层随葬马距当时地表 1.5 米，而木椁则位于距当时地表 2.8 米的位置（Polos，mak，2001：58 ~ 68）。

显而易见的是，之所以要制作一个架子来安置随葬的马匹，是因为墓葬的空间不足，而同时又想把随葬的动物都安置在木椁之中。如果有足够的空间，这些马匹可能会沿着木椁的北墙依次放置，或者成组排列，就像卡坦达（Katadinsky）墓葬一样，16 匹马被分成了 4 排（Sorokin，1969：Fig. 9）。如果在木椁与墓穴的北壁之间没有足够的空间，有些动物则会成摞放置，层层堆积至木椁顶端的高度（图五）。在发掘中，这种形制可能不那么明显，因为它们大多数的残骸是在较低的位置被发现；只有头骨和上层部分马匹的骨架在木椁的顶部暴露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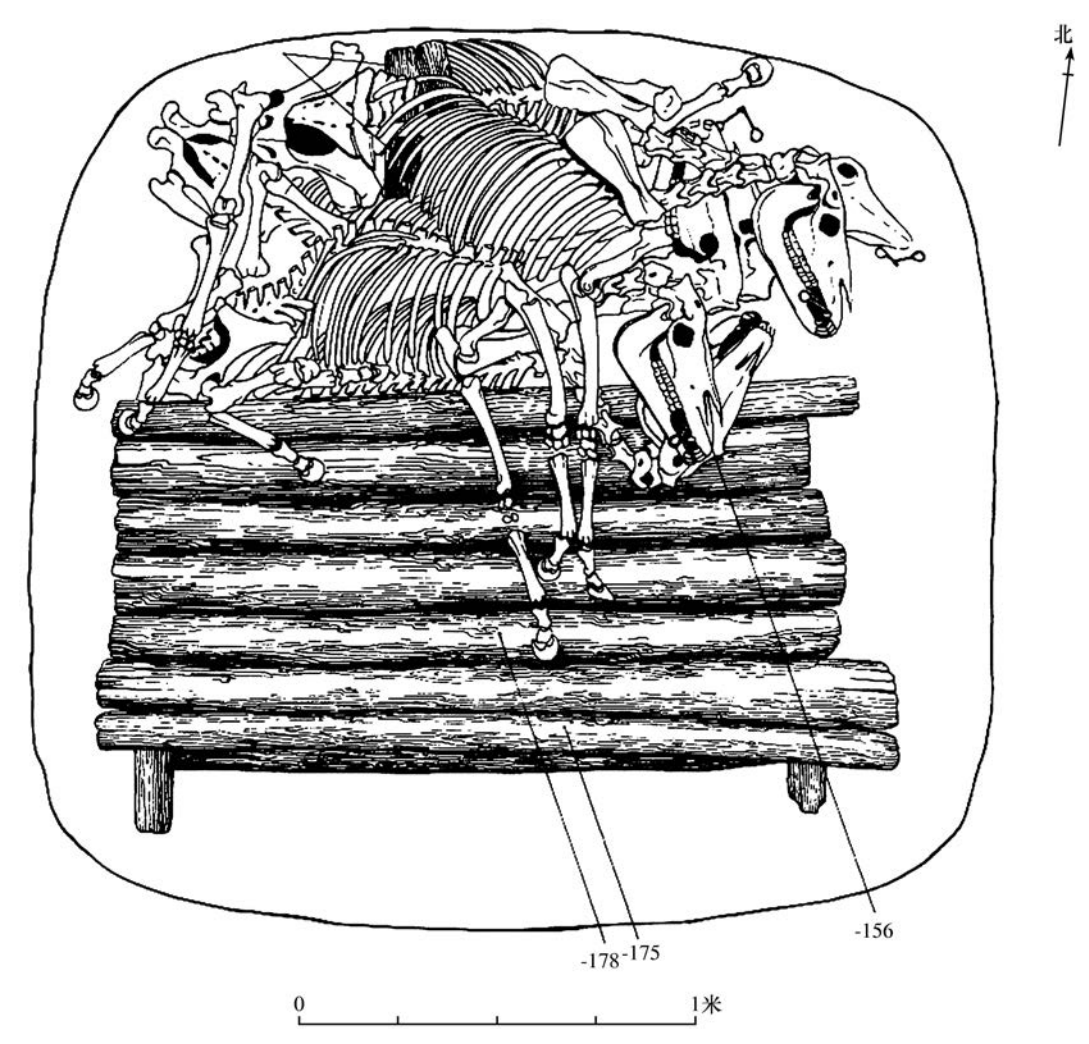


图四　图艾克塔墓葬群

南北向链状排列（巴泽雷克文化）其他埋葬堆（中世纪）

（Burial Mound Group Tuekta. Meridional burial mound chains（Pazyryk culture）, other burial mounds（Middle Age））

（Rudenko，1960：Fig.52）



图五　阿克－阿拉哈墓地 1 号墓的木椁及其上面的马，二者共同构成墓葬的上层结构

（Ak-Alaha-5, mound 1. The wooden frame vault and the upper horses（horse）constitute their upper level）

（Polosmak，2001： Fig. 8）

以上的证据表明，随葬的马匹构成了墓葬的上层结构，这一点在第二巴泽雷克墓葬中表现尤其明显，其 7 匹随葬马均位于墓葬的填土之中。在第三巴泽雷克墓葬中，它的 14 匹随葬马的位置到了墓室的天花板处。这就是为什么在发掘过程中，考古学家必须绘制出两次墓葬平面图，因为木椁的拱顶和上层随葬马共同构成了墓葬的上层结构，而其下半部和墓主人则被掩埋在更深的地层中，是墓葬的下层结构。

此外，在大量的巴泽雷克墓葬中发现了二次葬，其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与巴泽雷克文化同期，另一类则年代稍晚，如中世纪的突厥墓葬和阿尔泰历史时期的墓葬。本次发掘工作的主要关注点在第一类墓葬中，它主要葬有一些随从人员，其与墓主人在同一土冢之中，死后在另一个世界继续陪伴他们的主人。例如，在阿克－阿拉

哈墓地的 1 号墓葬中，记录着这类二次葬是随着那些重要人物的墓葬而一同建造的（Polosmak 2001：62 ~ 67）。在乌兰德雷克 1 号墓地（Ulandryk- Ⅰ）的第 9 号墓葬中，我们还发现了另外一种二次葬，其墓穴距当时地表 0.7 米，这表明了独立个体的二次葬和这些随葬马是否都属于其上层建筑还值得讨论。也就是说二次葬的人群和随葬马这两者的社会地位应当是差不多的，因为他们都被埋藏在专门为墓主人建造的墓葬建筑——库尔干中。一方面，巴泽雷克文化的这些随葬马被埋葬在死者的周边；另一方面，他们又相互分离，分离他们的不止有木制的双层棺椁葬具，还有社会地位的差别。

三、人骨、随葬品和随葬马在墓葬中的排列顺序

根据巴泽雷克文化的习俗，死者总是被埋葬在木椁中靠近南壁的位置，放置于地板或类似棺床一样的物品上。

沿着墓葬北壁或在墓葬的东北角会有一系列的随葬品，通常被归为家居用品，如腿上饰有羊骶椎骨的木桌、铁刀、圆底带把木勺、高领鼓腹小底陶壶等。通常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发现，包括衣物、珠饰和死者的武器，而与经济领域有关的物件通常用陶器和刀具来表示。值得注意的是，餐具的数量总是与木椁中死者的数量相对应，这不仅指包括随葬的水罐，还包括带羊椎骨的木桌和木勺。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套“经济”物件通常具有明确的个人特征，事实上，每一个死者都必须配备这样的随葬品组合，他们的放置方式（他们在墓室里被分开放置）清楚地表明他们应该被分开存放。

在公共墓葬中，成年人总是被埋葬在南部，而青少年则被葬在他们前面更偏北的地方。在有男性和女性的墓地中，后者则像年轻人一样总是被安置在男性的北面。因此，巴泽雷克文化的死者由南向北依次放置，年轻人处于长者人的“看护”之下。在这个排列系统中，男性的地位超过女性，甚至在埋葬有儿童的墓葬中也是如此（图六）。此外，在同性别组合的墓葬中，其尸身的放置也遵循这一排列原则。例如，在乌兰德雷克 2 号墓地（Ulandryk- Ⅱ）的 6 号墓葬中包含了两个女性遗体，随葬有 3 匹马。位于南部的女性，通过其“萎缩的下颌骨”和脱落的牙齿（这些牙齿整齐地放置于挂在死者腰带上的一个袋子里）我们可以知道，她的年纪较大，而位于北部的则是一个更丰腴的年轻女性（Kubarev，1987：172）。

上文已经提到过，在巴泽雷克文化的墓葬中，马匹都是随葬在墓葬的北部，置于棺椁的后侧，放在了特制的木架或地板的上面。因此，巴泽雷克人按人类遗体及随葬品其重要性，由南向北降序排列。南部的位置被成年男性占据，这是死者中地位最为突出的部分，其次是女性和儿童，接下来是所谓的有关经济生活的随葬品，包括一个罐子、一个勺子和每一个死者都有的饰有羊骶骨的桌子，最后，在木椁的后面随葬马匹。在巴泽雷克这种遗体和随葬品的标准排列方式下，随葬马占据了其最远处和最低等的位置。



Табл. XX. **План погребения кургана 4 могильника Юстыд XII.**

1 — обломанные удила с остатками деревянных псалий; 2, 3 — украшения узды; 4, 5 — зеркала; 6 — обкладка деревянной круглой бляхи; 7, 8 — зооморфные нашивные бляшки; 9 — бляшки, нашитые на головной убор в вертикаль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 10 — рельефная пластина с полосками-подвесками; 11 — серия «зубчатых» нашивных полосок; 12, 13 — кольцевидные серьги с подвесками; 14 — обломки двух керамических сосудов; 15 — обломки деревянного блюда; 16 — железный нож; 17 — крестцовые позвонки овцы; 18 — обломки деревянного ковша; 19 — пятно черной краски; 20 — лиственничная кора.

图六　尤斯坦特 7 号墓地，4 号墓，墓中人骨、随葬品及马匹的埋葬顺序

（Ystyud- XII. Burial mound 4. The Arrangement Order of Human Remains, Grave Goods and Horse Corpses in the Burials）

（Kubarev，1991：Tabl. XX）

墓葬中这种遗体、随葬品和随葬马的排列顺序早已被发掘者认同，但是到目前为止，考古学家还没有特别关注这个原则的普适性特征。事实上，这种死者遗体和配套遗物的特定排列顺序，正是理解整个墓地为什么会南北排列，以及这些土丘为什么会链状排列的关键。

四、墓葬群的南北向排列

巴泽雷克文化的墓葬遵循南北向排列的特点，其墓葬的内部布局也同样如此。一般来说，它们的墓葬规模不大，且仅有一个墓穴。从地表来看，大部分形成了长长的链状，从北到南呈一条线，这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我们识别巴泽雷克文化墓葬与其他文化类似遗存的标识。例如，阿凡那萨耶夫斯基（Afanas‘yevsky）地区青铜时代墓葬的栅栏链，就是西北—东南方向。

巴泽雷克文化墓葬群呈南北向分布的特点，并不受地形条件的限制。在一些情况下如巴沙达尔和图艾克塔墓地，他们跨越了从西向东延伸的山谷或斜坡。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如忒特科斯肯Ⅵ号墓地（Tytkesken - Ⅵ），如果地形本身是南北向，墓葬则会沿着河流或斜坡排列。因此，很明显墓葬群的南北向排列与地貌特征无关。至于其为什么会如此在地表有序的排列，严格来讲，应从其墓葬的内部构造中寻找答案（Shul，ga，2003：31 ~ 37）。

实际上，将墓葬和纪念性建筑依次排列的原则在古代非常普遍，学者对这种现象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认为它是为了适应地形而利用空间所做的努力，有人认为它是为了符合审美观念所做的努力，还有一些人认为这是墓群世代延绵的实例，代表了他们渴望千秋万代，对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的期盼（Chernopitsky，1980：176 ~ 186；Savinov，1997：126 ~ 128）。根据 P. I. 舒勒伽（Shulga）的说法，古人把他们的墓葬建筑看作是死后的居所，此外，他认为墓葬结构与死者生前住所的设计有直接的相似之处。巴泽雷克文化的考古资料似乎支持这一观点，研究人员已多次指出巴泽雷克文化的木椁与其生活区的建筑有相似性，包括木椁上的桦树皮防水涂层，宽敞的墓室挂有地毯，并可分为起居室和卧室等不同的部分。此外，人们认为，第一类巴泽雷克墓葬中木椁的内部，墙壁上的开口是一个门道，其位置垂直于墓群排列的方向（Shulga，2003：36）。对此舒勒伽指出，一些现代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蒙古，他们的住房有类似的链状布局，它们的入口与住房排列方向垂直（Rudenko，1960：327；1980 年的 Viktorova，图 9），但他也指出“这种朝向的原因尚不清楚”（Kubarev，Shulga，2007：39）。

事实上，学者对墓葬呈链状有序排列的结构有许多不同的看法。考虑到南部地区对于游牧民族的重要性，L. S. 玛莎德洛夫认为，这些呈链状的土丘面向南部，是为了增加更多的土冢（Marsadolov，2000：69 ~ 72）。然而，S. S. 索罗金（Sorokin）基于对 kok-su 墓地的研究，则持相反的观点——即这些土冢是从北到南排列（Sorokin，1974：

90、91）。而 V. D. 库巴列夫（Kubarev）则认为，新增加的土冢是从南北两端向中央的土冢靠近（Kubarev，1992：8、9）。为了加以证明，他采用树轮测年和测地天文学的方法，对乌兰德雷克 1 号墓地墓葬群进行了检测。为了得到木椁的树木样本，在发掘工作结束 30 年之后，乌兰德雷克 1 号墓的 15 个墓穴再次被打开。针对此次采集的 78 个木材样本的分析表明，这条墓葬链以原来的 3 个土冢为基础，向南和向北均有延伸（Bykov et al，2004：258 ~ 267）。

还有一些具体的资料可以表明，在土冢链中究竟哪一端是后来建造的。例如，鲁金科指出，图艾克塔 2 号墓地比图艾克塔 1 号墓地建成年代要晚，因为图艾克塔 2 号墓地的石堆和石围叠压了位于南部的图艾克塔 1 号墓地，因此后者的年代应比前者要早。值得注意的是，一名年龄在 40 ~ 45 岁的男性被埋在 1 号墓地中，一名 35 岁的女性被埋在 2 号墓地中，墓葬的规模和埋藏深度也显示了墓主人地位的差异：1 号墓直径 68、高 4.1 米，使其成为由 197 个土冢组成的图艾克塔墓地里六大土冢链中规模最大的一个（Rudenko，1960：93 ~ 6，图 52）。2 号墓地位于大型土冢链的最北端也是最远处，其规模大致是 1 号墓地的一半：直径 32、高 2.6 米。还值得注意的是，不同规模的墓葬似乎与其埋藏深度相互匹配，因此，埋藏男性的 1 号库尔干深度是 7.9 米，而埋藏女性的 2 号库尔干深度只有 4.5 米。实际上这两个墓葬的相似之处仅在于其随葬马匹的数量，它们都包含 8 匹随葬马，这可能表明死者在巴泽里克文化的社会等级体系中属于同一阶层。因此，似乎很明显的是，先有了最初最大的在北侧埋葬男性的墓葬，后加入了小的埋葬女性的墓葬。

此外，如果考虑到住处之间比较所反映出来的墓主人的声望差异的民族志资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住宅门址朝向与房屋排列的顺序是垂直的。值得注意的是，蒙古包的入口通常朝南；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蒙古人、布里茨人、卡尔梅克人（蒙古语民族）传统上以南向为基准识别他们的位置。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朝西就是正确的，于是最受尊敬的人的蒙古包（khoton，游牧单位）设在了蒙古包排列的边缘，也就是处于最南端及最西端，而其他人就可以把他们的蒙古包设在它的左边，形成一列，或在其后形成第二行，但从来不会设在最尊贵蒙古包的右边。库巴列夫引用了类似的事实，他特别提到了 K. V. 维雅特基纳（Vyatkina）的文章，封建时代的蒙古，"贵族和最富裕的人在游牧营的西南部搭起了蒙古包"。他们的儿子不能在他们的父亲面前搭起蒙古包，而穷人的住所总是最遥远和最落后的（Kubarev，1987： 124）。

显然，一排蒙古包里的右面是留给那些更重要或更尊贵的人，在蒙古人的营帐中，蒙古包呈东西向排列，或者好几列这样排开形成长方形，而最受尊敬的蒙古包就是在右侧最南端的那个。对此，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有趣的事实是语言学方面的材料，在蒙古语中，南部被描述为前方、前部，而北部则是后面和后部。因此，南方或前方的内涵是积极的，与光明有关，相反，北方或"后方"则被视为黑暗的和危险的。在蒙古人的民间故事和史诗传说中，他们的敌人通常从其后方出现，这并不是偶然。

从这个讨论继续下去，可以推测就巴泽雷克南北向分布的墓葬而言，前方是与东方相关，而后方则与西方相关。在巴泽雷克文化中，空间分布是以东为起点的，这一点与现代突厥语系的国家类似（值得注意的是，突厥语系游牧民族的蒙古包是面向东方的），右侧南部的位置是最尊贵的地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巴泽雷克文化的墓地中，其遗体、随葬品和随葬马会从南到北，按照其重要性降序排列了。此外，通过推断墓葬链状布局的分布模式，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巴泽雷克文化家族墓地中，如果死者的地位比较高，那么就将其墓葬放置在墓葬链的南侧，如果死者是一个年轻人或在氏族社会中的地位比较低微，他的墓葬就会被放置在北侧。同样，如果我们认为前方有着积极正面的含义，而后方被认为是消极负面的，那么就有可能解释为什么巴泽雷克文化的墓葬链会向东侧偏移。为了说明这一点，笔者早已指出，在巴沙达尔、图艾克塔和别列里墓地中，大型的贵族墓葬总是集中于墓地的东侧，规模巨大的皇家墓葬总是位于“前方”，而在其后的是许多平民墓葬。

我们不应忽视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巴泽雷克文化墓葬中，就马葬而言，是连同他们的主人一起被纳入到南北向的链状布局中的。

五、南北排列的墓葬链的转变

有时，巴泽雷克墓葬链可能会有东西向分布的情况，舒勒伽认为这是方向偏移的结果，主要是偏向东方。这种偏移有时可以达到 45°，呈东北—西南走向。就像上文讨论的游牧民族的蒙古包一样，呈东西向排列的墓葬会沿着河流、山脉或者台形地的边缘分布，顺着这些地形的特征排列，可能会偏离南—北经线的方向多达 45°。然而，如果地貌特征完全呈东西向，那么墓葬链就会恢复他们原来南北的经线方向，垂直于自然物体。

墓葬链如果有方向的偏移，通常是偏向东方的，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它们会偏离到西方。舒勒伽认为，乌兰德雷克 2 号墓地和马勒图鲁 4 号墓地（Maltalu-4）中，这一偏移非常轻微，在乌科克（Ukok）高原的维列赫卡勒金 2 号墓地（Verhny Kaldzhin-2）中，这一比例更高一些（高达 27%）。后者中出现的偏差不仅影响到死者的方向，而且还影响到了巴拉巴拉石分布的方向——它们偏向了西北方。

舒勒伽还引用了一些还需进一步验证的初步资料，即在一些未发掘的墓葬区，其巴拉巴拉石分布于西侧，这可能是整个墓葬区域 180° 旋转所导致的结果，即死者是朝西的，而将随葬马安置在南部（Shul’ga，2003：3 ~ 32）。用传统的平面布局来描述这种现象，它们则属于根据镜面原则布局的墓葬。据记载，在北部黑海海岸的斯基太人墓葬群中，也出现有这种按照镜面原则布局的墓葬（Ochir-Goryaeva，2012）。

根据上文已讨论过的巴泽雷克人的意识形态，东方被认为是安全可靠的，因而其墓葬链多数还是向东偏移。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舒勒伽在图艾克塔墓地中所指出的有趣事实。鲁金科曾指出，图艾克塔 1 号和图艾克塔 2 号墓地的墓葬及其内部存在向南偏

移的情况，这个偏移的角度是 16°（Rudenko，1960： 107）。值得注意的是，整个图艾克塔墓地墓葬链偏移的角度也是 16°（Shulga，2003： Fig. 60，4）。这一事实表明，墓葬链上每一个后来起建的坟冢，都是按照一定的角度和方位建造的，其具体是由第一个建造的墓葬的位置决定的。那时的人们很有可能会使用一些“标识”，包括粗糙的工具，如用绳子和钉子做成的原始指南针。否则，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墓葬内部的轴线与整个墓葬链条的位置之间可以如此精确匹配。

与此类似的有关蒙古包位置情况似乎很有说服力。然而，对于相关的人类学证据，更重要的是大量存在且容易证实的资料，这些证据恰恰可以在古人留下的公共墓地中找到，我们从中可以找到数百个这样的例子。根据提什金（Tishkin）和达斯科夫斯基（Daskovsky）的说法，在他所记录的巴泽雷克文化的 600 个墓葬中，公共墓葬占了 39%，即共有 234 个墓葬（Tishkin, Dashkovsky，2003： 174）。因此，公共墓葬为本文的论点提供了坚实的事实依据，我们甚至都可以不用蒙古包的相关资料。

如果只考虑到规整的（根据他们的地位特点）按照南北向原则布局的墓葬，我们就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人类遗迹、随葬品和墓葬本身的布局，很直观的体现出了特定人群的空间系统观念以及对宇宙的认识。因此，本文所讨论的蒙古人的民族学资料只代表一种个例，即两种来源独立的资料以一种合乎逻辑且令人信服的方式相辅相成，这有助于我们透过大量的考古材料来澄清和阐释其背后的规律。然而，应该再次强调的是，上述证据的类比并不能用来证明巴泽雷克木椁被人们视为死者的家。南北取向的蒙古包，以及巴泽雷克文化墓葬包括墓室和随葬马在内的地表景观，是一种表现了其特定民族传统空间的定位模式，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巴泽雷克人的世界观。

六、南北向轴线和垂直原则

显然，死者埋葬的阶层顺序远比其南北向原则要重要得多，这一点在墓葬排序中有很明显的体现，即其南北向的排序原则有时会被打破，或执行的并不严格，但是死者的上下等级原则（在苏联时代曾叫作“先后”原则）却是强制执行的。值得注意的是，相同的排序原则同样精准地体现在“反序”遗址中，在这些墓葬中，墓主人的朝向与标准原则相反，其随葬马的朝向与墓主人保持一致，但是随葬品还是遵循定制，放置在木椁的北部（Kubarev，1992：1992；Sorokin，1974：62 ~ 91）。

上述例子表明，在墓葬链中晚期加入的墓葬所严格遵循的模式很可能不仅仅是技术精度的问题，同时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例如，这可能需要考虑到人口观中有关整个宇宙和家族的等级观念。根据学者舒勒伽所发现和认定的“垂直原则”，无论墓葬在布局中有什么样的特点，死者在墓葬中的位置都必须严格垂直于整个墓葬链的轴线，即使链条位置有变化，从空间坐标的角度而言死者空间方向上也表现出不规则性，我们仍可以观察到垂直现象。此外，我们还可以指出另一个相关的事实：巴泽雷克墓葬木椁的长轴

总是垂直于整个墓葬链的轴线。

因此，现在看来墓葬链的延伸遵循一些理想的布局原则，出于对死者的尊重，其应该严格遵循垂直的放置原则。此外，在线状分布的墓葬链条中，与理想相符的是垂直布局原则，显然远比他们的东向原则更为重要。因此，巴泽雷克文化的东向原则并没有被当作像“垂直”定位那样需严格遵循强制性原则。墓葬链的布局，让人联想到军队中站位。如上所述，即使在位置完全相反的“倒置”的墓葬中，死者的“倒序位置”也从未违背过垂直的原则。

七、墓西侧的灵堂

如果我们考虑到巴泽雷克墓葬链及其相关结构，如墓葬环状祭祀建筑和巴拉巴拉石排列等，这种可观察到的严格的垂直轴线布局与直线分布原则背后的观念就会清晰。

这些所谓的祭祀圈（memorial ring）是由石头制成的，位于巴泽雷克墓葬链西侧的不远处，每个土冢可能有几个，有时也只有一个。到目前为止，在纪念环内发掘出土了陶器、骨头和木炭碎片等，这表明葬礼宴会或“祭祀灵魂”的仪式都是在坟墓的西侧举行的（Kireev，1999：8 ~ 92）。纪念环被设在墓葬的西侧，表明在巴泽雷克文化中，死者的世界与西方有关。到目前为止，这一观点并没有受到该领域任何学者的质疑。因此，如果这个观点是成立的，那么它应该可以进一步说明，在巴泽雷克文化中，东方是与生者的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对这个观点的支持可以在二元对立的民族志资料和古代文化的世界特征的二元模型中找到（Zhukovskaya，1983： 127 ~ 138）。

古代文化的二元对立体系包括基于“正负”原则的若干配对符号，如果一组中的一个被认为是有利的（正面的），那么另一个则是不利的（消极的），就像左与右、男性与女性、熟悉和陌生、神圣和世俗、生与死，都被引用为具有普遍性的例子，即与不同的文化有关。因此，考虑到古代世界的二元模型，我们可以认为，在巴泽雷克文化中，东方是与生者的世界相连，而其死者南北埋藏的墓葬链则是分隔两个世界的线，这就是为什么巴泽雷克人要遵守“垂直”的原则，这是为了防止任何有可能打破这个分割线的行为。

八、现世及巴拉巴拉石排列

在考古学研究中，关于立石或者巴拉巴拉石功能的讨论由来已久。这些竖石同样按照“垂直度”原则，在南北向分布的墓葬链东侧呈线性分布。如果一个墓葬链从这条线上有所偏移，那么它的巴拉巴拉石列，也会随之移动。在笔者看来，这表明他们服从于普世语义意识形态，这在巴泽雷克墓葬组合的标准“建筑规划”的表达中被找到。

关于竖石阵列的象征意义有多种解释，其中最为合理的是 V. N. 特卡切夫（Tkachev）的观点——世界二元模型论，这在他的文章《亚洲游牧建筑中的草原地标》中有详细的

讨论（Tkachev，1983：158 ~ 170）。在该文中，巴拉巴拉石被认为是一种定向的方式，作者认为它们是为了“强调纪念建筑的方位参数”，直立的巴拉巴拉石就像是标杆一样，指向建筑物，因为它们是从远处的草原景观的平面上看到的。这一论点得到了舒勒伽的支持，他指出在森特勒克（Sentelek）墓葬资料中，为了弥补地形的缺失，竖石在地势低洼的地方往往会变高，竖石列中第一块和最后一块石头（第二十块）的高差是 4 米（Shul’ga，2003：6 ~ 31）。

在植被长高的季节，这些直立的竖石仍可作为指向石圈的路标，因为它们仍然表明“葬礼队伍到达葬礼地区的方向，同时也作为记忆仪式的助记手段”（Tkachev，1983：158 ~ 170）。这种对巴拉巴拉石的解释在逻辑上符合上文讨论的巴泽雷克文化墓葬二元性的特征。巴泽雷克亡灵的亲属只能从东侧进入墓地，因为这是与生者相连的一方，它也被解释为“正确”的一面。因此，这也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巴拉巴拉石会只分布于六分之一的巴泽雷克墓葬中，以及为什么它们不仅被放置在战士的墓葬旁，同时也分布于妇女和儿童的墓葬边。学者胡迪雅科夫（Khudyakov）对这一现象一直大为不解，根据他的估计，在库巴列夫发掘的 137 个墓葬中，发现了近 24 个巴拉巴拉石（Khudyakov，1997：87）。因此，很明显巴拉巴拉石的排列是有地标性的，不仅向特定的墓葬指示方向，而且为整个家族墓葬链的纪念建筑指路。

值得注意的是，死者的亲属应该从“右边”进入坟墓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现象在别的墓地中表现也很明显。例如，在北部黑海地区的斯基太人墓葬土冢的东桥上有类似的竖石纪念碑，此外，在别沙迪尔墓地（Besshatyr）东侧的大型墓葬的入口处，有一堆石头呈螺旋状排列（Akishev，1963： 28，Fig. 3）。

随葬马像他们主人的坟墓一样，也沿着这条线排列，将西方世界的亡灵与东方的世界生者分隔开来，这确实是戈尔诺 – 阿尔泰和北方黑海考古遗存之间的根本区别。北部黑海海岸的斯基太人的墓葬同样是东西向排列，亡灵的世界位于西部，地位最显赫的墓主人也位于大型墓葬链的南北轴线上。但是，北部黑海沿岸的斯基太人的随葬马并不在墓葬轴线上，而是集中地位于墓葬区的西侧，也即是他们主人的后面。

笔者认为，这一差别可以用一种更为复杂和先进的特点来解释，即斯基泰人的社会组织具有早期国家的特点。与此相类似，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中世纪的墓葬，即欧洲所谓的“王墓”，它们开始也随葬有马和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也都被葬在和墓主人不同的地方。

九、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得知，目前正在进行的有关巴泽雷克文化墓葬的研究，揭示出其每一座坟冢的排列都严格遵循一定的标准，反映出巴泽雷克人群的家庭及社会层级结构。

其次，本次调查的结果表明，巴泽雷克文化墓葬沿着南北轴线分为两个部分，分别

是代表生者世界的东侧和代表亡灵世界的西侧。更重要的是，在墓葬的西部区域我们发现了纪念建筑和埋葬礼仪的相关遗迹。根据这一证据并结合巴泽雷克人的信仰，我们可以得知在巴泽雷克文化中，亡灵的世界在西方。

最后，根据巴泽雷克人的观念，西方是消极和落后的方向，而就地理方位而言，东方是他们的出发点和基点。这种空间定位被认为是每个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因此，本文所得出的结论为斯基太游牧民族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注　释

［1］ Akishev K.A. Kul’tura sakov doliny reki Ili （VII-IV vv. do n. eh.）［A］. Drevnyaya kul’tura sakov i usunej doliny reki Ili［M］. Alma-Ata: b/i, 1963. S. 9-136.

［2］ Barkova L.L. Kurgan SHibe i voprosy ego datirovki ［A］. ASGEH［M］. 1978. Vyp. 19. S. 37-44.

［3］ Bykov N.I., Bykova V.A., Panyushkina I.P., Slyusarenko I.YU. Dendrokhronologicheskaya i geodezichesko-astronomicheskaya otsenka posledovatel’nosti sooruzheniya kurganov v mogil’nikakh pazyrykskoj kul’tury Altaya ［A］. Kompleksnye issledovaniya drevnikh i traditsionnykh obshhestv Evrazii ［C］. Barnaul: Altajskij gos. un-t, 2004. S. 258-267.

［4］ Viktorova L.L. Mongoly［M］. M.: Nauka, 1980. 136 s.

［5］ a. Evraziya v skifskuyu ehpokhu: radiouglerodnaya i arkheologicheskaya khronologiya［M］. SPb: Teza, 2005. 290 s.

b. ZHukovskaya N.L. Binarnye oppozitsii v traditsionnoj mongol’skoj kul’ture［A］. Iskusstvo i kul’tura Mongolii i TSentral’noj Azii［C］. CH. 2. M.: Nauka, 1983. S. 127-138.

c. Kiryushin YU.F., Tishkin A.A. Skifskaya ehpokha Gornogo Altaya ［M］. Barnaul: Altajskij gos. un-t, 1997. 233 s.

d. Kiryushin YU.F., Stepanova N.F., Tishkin A.A. Skifskaya ehpokha Gornogo Altaya. CH. II. Pogrebal’no-pominal’nye kompleksy pazyrykskoj kul’tury［M］. Barnaul: Altajskij gos. un-t, 2003. 234 s.

［6］ Kubarev V.D. Kurgany Ulandryka ［M］. Novosibirsk: Nauka, 1987. 302 s.

［7］ Kubarev V.D. Kurgany YUstyda ［M］. Novosibirsk: Nauka, 1991. 270 s.

［8］ Kubarev V.D. Kurgany Sajlyugema ［M］. Novosibirsk: Nauka, 1992. 219 s.

［9］ a. Kireev S.M. Trizna i triznovaya keramika Majminskikh pogrebenij rannego zheleznogo veka ［A］. Drevnosti Altaya ［C］. Gorno-Altajsk: Gorno-altajskij gos.un-t, 1999. Vyp. 4. S. 92-98.

b. Kubarev V.D., SHul’ga P.I. Pazyrykskaya kul’tura （kurgany CHuj i Ursula）［M］. Barnaul: Altajskij gos. un-t, 2007. 281 s.

［10］ Marsadolov L.S. Planigrafiya mogil’nikov Gornogo Altaya VI-IV vv. do n.eh［A］. Pyatye istoricheskie chteniya pamyati Mikhaila Petrovicha Gryaznova ［C］. Omsk: OmGU, 2000. S. 69-72.

［11］ Polos’mak N.V. Vsadniki Ukoka［M］. Novosibirsk: INFOLIO-press, 2001. 336 s.

［12］ Ochir-Goryaeva M.A. Drevnie vsadniki stepej Evrazii［M］. M.: Taus, 2012. 486 s.

［13］ Rudenko S.I. Kul’tura naseleniya TSentral’nogo Altaya v skifskoe vremya［M］. M.; L.: AN SSSR, 1960. 359 s.

［14］ Savinov D.G. “Ideya” ryada v drevnikh i srednevekovykh pamyatnikakh TSentral’noj Azii i YUzhnoj Sibiri［A］. CHetvertye istoricheskie chteniya pamyati M.P. Gryaznova［C］.Omsk: Omskij gos. un-t, 1997. S. 126-128.

［15］ Sorokin S.S. TSepochka kurganov vremeni rannikh kochevnikov na pravom beregu Kok-su (YUzhnyj Altaj)［J］. ASGEH . 1974. №16. S. 62-91.

［16］ Tishkin A.A., Dashkovskij P.K. Sotsial’naya struktura i sistema mirovozzrenij naseleniya Altaya skifskoj ehpokhi［M］. Barnaul: Altajskij gos. un-t, 2003. 429 s.

［17］ Tkachev V.N. Stepnye orientiry v kochevoj arkhitekture TSentral’noj Azii［A］. Iskusstvo i kul’tura Mongolii i TSentral’noj Azii: Doklady i soobshheniya nauchnoj konferentsii［C］. M.: Institut ehtnografii, 1983. CH. 2. S. 158-170.

［18］ KHudyakov YU.S. Pominal’nye pamyatniki pazyrykskoj kul’tury Gornogo Altaya［A］. ZHrechestvo i shamanizm v skifskuyu ehpokhu［C］. SPb: Gos.EHrmitazh, 1996. S. 87-89.

［19］ CHernopitskij M.P. Kurgannaya gruppa kak arkhitekturnyj ansambl’ (opyt kompozitsionno-khudozhestvennogo podkhoda)［A］. Skifo-sibirskoe kul’turno-istoricheskoe edinstvo［C］. Kemerovo: Kemerovskij gos. un-t, 1980. S. 176-186.

［20］ SHul’ga P.I. Mogil’nik skifskogo vremeni Lokot’-4a［M］. Barnaul: Altajskij gos.un-t, 2003. 203 s.

［21］ Samašev Z.S. Die Fürstengräber von Berel［A］. Im Zeichen des goldenen Greifen. Königsgräber der Skythen［C］. München; Berlin; London; N.Y.: Prestel Verlag, 2007. 340 s., 2007. S. 132-138.

The Geographical Orientation of Pazyryk Kurgans

Maria Ochir-Goryaeva

Abstract: This paper details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asyryk burial mounds — their spatial analysis, which so far has been largely overlooked by researchers of Scythian archeological sites. It contributes to a more detailed understanding of the spati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kinship and family hierarchy in the particular archeological culture. Besides, it contains new evidence shedding light on the Pasyryk system of geographical orientation.

Keywords: Pazyryk burial mounds; geographical orientation; spatial analysis

俄罗斯考古学家 M. A. 杰夫列特岩画研究学术史回顾 *

肖 波

（广西民族博物馆，南宁，530028）

玛丽安娜·阿尔塔西诺夫娜·杰夫列特（M. A. 杰夫列特），是著名的苏联和俄罗斯考古学家及岩画学家，俄罗斯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铜时代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自 1966 年以来，一直在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91 年后改为俄罗斯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获得初级研究员、高级研究员和主任研究员的职称。她参加了在 1953 ~ 1990 年进行的苏联中西部、高加索、中亚、西伯利亚地区的考古调查。此外，她是 1990 年苏联岩画大会的召集人和组织者。此次大会汇集了全苏联所有主要的岩画研究专家，分为一般问题、西北部和西部、乌拉尔、高加索、中亚和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和远东等 6 个方面进行讨论，研究范围涵盖苏联所有岩画分布区，研究内容涉及从理论到实践的方方面面，是整个苏联岩画研究的里程碑，并于当年由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了本次会议论文集《苏联岩画研究的问题》。社会职务方面，除了担任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岩画大会的通讯会员之外，她还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苏联委员会正式成员。2012 年，因与 E.Г. 杰夫列特合著《岩石中的神话：俄罗斯的岩画世界》一书，她被俄罗斯科学院授予扎布林奖。该奖以俄罗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国家历史博物馆主要创始人之一的伊万·伊格罗维奇·扎布林的名字命名，授予那些为考古学做出巨大贡献的研究者。此外，在 1958 ~ 2008 年的 50 年时间里，她共发表、出版论文和专著 281 部，其中著作 11 部。

一、M. A. 杰夫列特的主要学术活动经历

M. A. 杰夫列特于 1933 年 6 月 13 日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阿尔塔希尔·哈恰图诺维奇·杰夫列特是土库曼斯坦人，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民族学专业，后追随土耳其第一任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并作为其副官，战后则工作于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其资料现收藏于俄罗斯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母亲叶卡捷琳娜·德米特

* 本课题研究得到“广西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八桂学者项目的资助。

里耶夫娜·杰夫列特是《社会主义改造与科学》杂志的秘书，其主编是著名的苏联早期领导人布哈林。1938年布哈林在大清洗运动中被杀害时，她因为在家照顾孩子而免受牵连。后来，她进入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基础图书馆（即现在的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工作直至退休。

M. A. 杰夫列特出生于祖母居住的高尔基州（1990年后改为下诺夫哥罗德州）的韦特卢加市。在她两个月大时，随其母亲返回莫斯科市。周边的环境对其专业的选择产生了很大影响。其舅父列夫·德米特里耶维奇·谢维亚科夫院士是苏联采矿领域的创始人之一，而父亲远征的故事从孩童时代起就激发了她对旅行和探险的渴望。故她最初希望成为一名地质学家，但最终吸引她的却是考古学。中学毕业后她进入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简称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学习，并在著名考古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基谢廖夫（Серг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Киселёв）的指导下开始科学研究工作。后者则因其著作《南西伯利亚古代史》的中文版在中国发行而广为人知（原译者将其名翻译为吉谢列夫）。她的本科毕业论文是关于哈卡斯地区的大萨尔贝克古墓的，该墓由C. B. 基谢廖夫1954～1956年调查时所发现。M. A. 杰夫列特参与了该墓的发掘工作，并随后发表了其第一篇论文《塔加尔文化的墓葬建筑》[1]。1957年，她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毕业，随后，继续跟从C. B. 基谢廖夫攻读硕士学位。1962年C. B. 基谢廖夫去世后，其硕士生导师改由H. Я. 梅尔佩尔特担任，但是她仍然深受前者的影响，并在1966年硕士毕业论文《早期铁器时代的叶尼塞盆地中部的部落》中，对C. B. 基谢廖夫的一些观点进行了论证。例如，她对H.Л. 奇列诺娃所持的塔加尔时代铁器外来因素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在对双金属（即由两层不同种类的金属或合金构成的材料）工具和武器进行类型学分析后，认为绝大多数的双金属不是从外部输入，而是在本地“土壤”上发展起来的。M. A. 杰夫列特观察到铁制品的形式是从当地青铜制品连续发展而来，因此这些铁制品系本土起源[2]。此外，她还参与了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分院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叶尼塞河水库建设区的考古学研究（1958，1960～1970），并有了一些新的发现。M. A. 杰夫列特在论文中提出，在早期铁器时代叶尼塞河中游地区的哈卡斯－米努辛斯克盆地，除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森林草原地区之外，还有两个由当地青铜时代晚期发展而来的考古学文化，即叶尼塞河右岸和左岸，她的研究成果促使Г. A. 马克西门科夫将塔加尔文化的森林草原区单列出来[3]。此外，还涉及了塔加尔部落的一些社会经济史问题。学生时代的科学研究经历影响终身，从此，叶尼塞河流域一直是M. A. 杰夫列特关注的焦点。

自1966年以来，M. A. 杰夫列特一直在俄罗斯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并从次年开始对图瓦地区进行了系统的调查与研究。最初两年，她作为A. Д. 格拉齐领导的苏联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萨彦－图瓦考古调查队成员之一，对图瓦中部和萨彦峡谷拟建设的萨彦－舒申斯克水电站区域的古代文化遗迹进行了综合研究。这是苏联史上最大的科考活动之一，最初计划在1965～1972年进行，但由于工程的不断延期，结束时间一再

推后。A. Д. 格拉齐邀请 M. A. 杰夫列特参与调查，但并没有计划组织一个专门的岩画研究团队，只是允许后者在发掘的空闲时间开展图瓦地区的岩画研究。最初，由于 A. H. 利普斯基、H. B. 利奥捷耶夫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南部的泰加林地区成功发现了岩画，M. A. 杰夫列特暗中希望在图瓦东北部的泰加山林中找到类似的东西。1975 年她在托扎进行发掘，该地区是图瓦、米努辛斯克、贝加尔湖沿岸和蒙古国等地的结合部，文化交流频繁。通过 7 次以上的田野发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早期、斯基泰时期、匈奴和突厥时期的文化序列，同时也在叶尼塞河萨彦峡谷的水电站淹没区发现了大量岩画。自 1976 年以来，M. A. 杰夫列特完全从托扎发掘转向萨彦峡谷岩画的识别和鉴定。

在其整个科学生涯中，岩画始终是她终极兴趣所在。最初，C. B. 基谢廖夫将其注意力引向了岩画，就是萨尔贝克草原上制作于塔加尔墓葬石板上的图画。之后，Б. A. 雷巴科夫参观哈卡斯岩画展后建议她写一本关于大波雅尔岩画的书[4]。在 1962 年，她开始对波雅尔山脉的岩画进行研究。自那时起，叶尼塞河流域的岩画开始进入其学术视野。她的岩画遗址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并产生了许多科学问题，对古代岩画含义阐释的课题特别令其着迷，但首要问题是岩画的发现和临摹问题。自 1973 年以来，她领导了萨彦 - 图瓦岩画考察队，对叶尼塞河上游和中游地区的岩画展开了系统的研究。主要工作开展于叶尼塞河的萨彦峡谷中由于萨彦 - 舒申斯克水电站的修建而被淹没的岩画遗址。总体而言，她关注的岩画范围非常广泛：从北部哈卡斯境内的苏列克岩画直至南部图瓦中部和南部的岩画，从西面的小阿尔巴特岩画直到东面的沙拉博利诺岩画。她还走访了许多现今位于萨彦 - 舒申斯克水电站库区底部岩画点，如焦伊斯基、索斯诺夫卡 · 焦伊斯基、坎杰吉尔等[5]。几十个岩画点在其直接参与下得到了发现和研究。1983 年，其博士毕业论文《叶尼塞河岩画》通过答辩。这是一部充分利用当时所有能获取的资料来综合研究叶尼塞岩画的著作。M. A. 杰夫列特在对其进行分期和断代的基础上，对大量的岩画图像进行了本体研究。岩画资料的引入，为我们对该地区居民最初的意识形态、观念进行重建提供了可能。随着研究的深入，她也开始关注岩画中所反映的古代文化交流问题。她在《叶尼塞河萨彦岭地区青铜时代岩画》一文中指出，亚洲和美洲太平洋沿岸岩画的主题非常类似，一系列北美沿岸人面像岩画的原型似乎可以在中国北方的岩画中找到，“来自内蒙古的古代移民经过几个批次推进到北方。通过凿刻在阿穆尔河下游和安加拉河沿岸地区的人面像岩画可以对其迁徙路径进行仔细研究。来自中亚的移民前往北方的通道有两条，一条沿着太平洋沿岸，另一条是沿着安加拉河谷地到泰加林地区和叶尼塞河地区。不同类型的人面岩画均指向中国北方的一个区域——内蒙古的阴山等地”[6]。此外，在她的影响下，其女儿——俄罗斯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任所长 E. Г. 杰夫列特也很早就对古代艺术尤其是岩画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写作、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岩画的书籍和文章（其中相当一部分为二人合著）。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正是由于 E. Г. 杰夫列特的工作，萨满教在岩画研究中的重要性才越来越受到她的重视，并

在其后期岩画的解释工作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另外，由于 E. Г. 杰夫列特主要学术经历开始于苏联解体以后，有更多机会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因此，相当数量的作品为英文写作，有力地推动了俄罗斯岩画研究向外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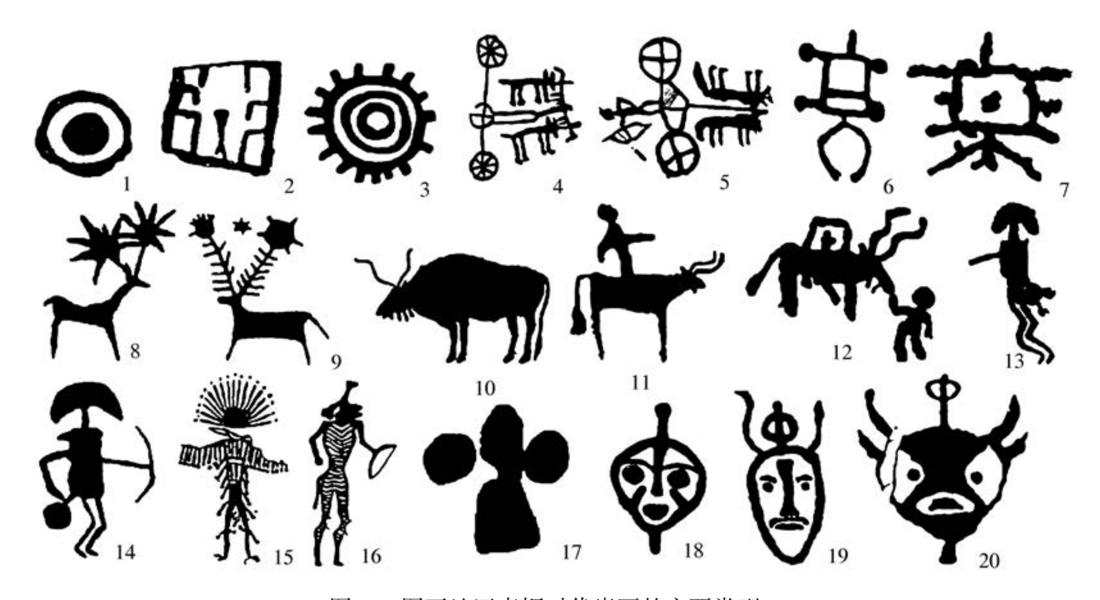
自从 20 世纪中期以来，M. A. 杰夫列特开始出版叶尼塞河上游和中游地区的岩画[7]。在《考古发现》杂志中，定期出现其关于叶尼塞岩画遗址的调查工作。与此同时，她还发表了一系列专门用于叶尼塞岩画的刊布、断代和解释的文章和书籍。1976 年她首次出版了《大波雅尔岩画》和《乌鲁克－海姆岩画》两部著作；1980 年，出版了《穆古尔·苏古尔岩画》一书，随后是《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岩画》（1981 年）、《游牧之路》（1982 年）、《石书》（1990 年）、《萨彦海底部的岩画（阿尔德·莫扎加）》（1998 年）、《萨彦峡谷的石制指南针》（2004 年）、《莫扎加·科穆扎尔——萨彦水电站淹没区的岩画遗迹》（2009 年）等。这些著作不仅包括岩画遗迹的资料，而且包括相关的学术史回顾和对主要岩画研究人物的学术活动介绍。对于学术界前辈，她认为我们应该持宽容态度，存有温情和敬意。他们成果中正确的部分我们应该吸收，错误的部分很多也是时代和历史条件所限，不应过加苛责，显示出强烈的人文情怀。

二、关于岩画年代的问题

岩画研究中最复杂和最棘手的问题是岩画的年代问题。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墓葬中会出土一些带有图像的石棺，石棺上的图像在内容、题材和制作方法上与某些岩画非常相似，我们能够据此来判断该类型岩画的大致年代。但大多数岩画都不具备此种条件，我们只能根据某类岩画主题来推测其年代范围。例如，岩画中的弓和箭年代均不早于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还没有双轮马车，其出现年代不早于青铜时代。斯基泰和匈奴－萨尔马特鍑的岩画图像年代范围基本可以确认[8]。此外，车马具、工具和武器等也都可以用来作为判断岩画年代上下限的依据。总之，岩画年代的确定主要是基于与考古出土文物的类比。但这并非唯一的方法。在《游牧之路上的岩画》一书中，M. A. 杰夫列特大致总结出以下一套岩画断代的方法，即综合利用岩画的制作技术、岩画类型、岩晒程度、地衣生长速度、岩画图像的叠压关系，以及仅仅依靠对图像本体进行分析等[9]。同时，她还指出，在岩画学上没有通用的方法，并且反对仅使用其中某一种方法开展岩画研究[10]。此外，她还建议针对不同地点的岩画使用某些特定的断代方法。例如，由于穆古尔·苏古尔岩画的岩体在洪水期会被淹没，它们的相对年代由相同条件下岩画的侵蚀程度决定，她据此区分出大量的从青铜时代到现代民族志时期图像的年代[11]。

M. A. 杰夫列特的岩画断代工作主要集中于叶尼塞河上游和中游，其中尤以上游图瓦地区的工作最为出色。根据她的研究，在叶尼塞河上游地区迄今为止还没有早于青铜时代的岩画[12]。同时她指出："可能在萨彦峡谷内存在新石器时代的岩画，但依据目前的手段，我们还不能将其区分出来。"[13]随后，她将整个地区的岩画按照年代序列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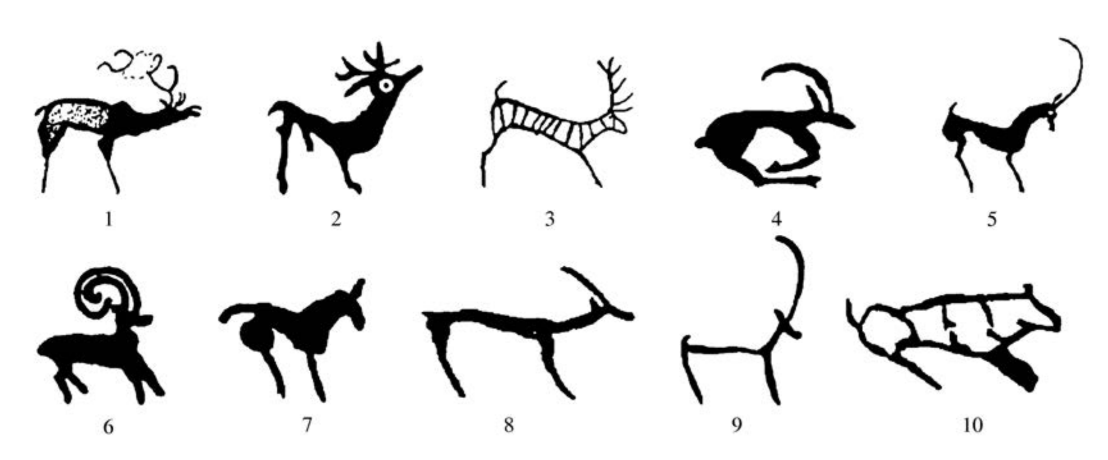
分为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匈奴－萨尔马特时期、中世纪时期及现代民族志时期等 5 个发展阶段。青铜时代岩画的主题包括人面像、双轮马车、类人型图像、公牛、头带太阳符号的动物、拉伸的兽皮、中心带点的圆圈和住宅、太阳符号等（图一）；斯基泰时期的岩画主要包括各种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风格的动物图像，其年代为公元前 7 ~ 前 3 世纪（图二）；公元前 1 ~ 公元 5 世纪，是 C.B. 基谢廖夫所谓的匈奴－萨尔马特时期，此时的图像主要是具有该时期特征的鹿、马、鸟和鱼等图像（图三）；图瓦地区属



图一　图瓦地区青铜时代岩画的主要类型

1. 中心带点的圆圈　2. 住宅　3. 太阳符号　4、5. 双轮马车　6、7. 拉长的兽皮　8、9. 头带太阳符号的动物　10 ~ 12. 公牛　13 ~ 16. 类人型图像　17 ~ 20. 人面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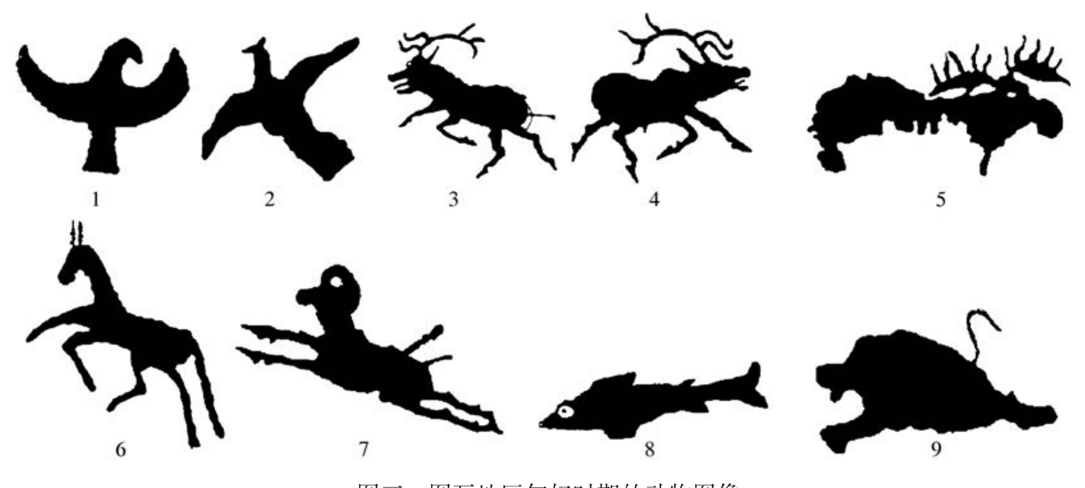
［*Petroglyph on the bottom of the Sayan Sea*（*Mount Aldy-Mozaga*）. Vol. 40 no.1. c.18-56.］



图二　图瓦地区斯基泰时期的动物图像

1 ~ 3. 鹿　4 ~ 9. 羊　10. 猛兽

［*Petroglyph on the bottom of the Sayan Sea*（*Mount Aldy-Mozaga*）. Vol. 40 no.1. c.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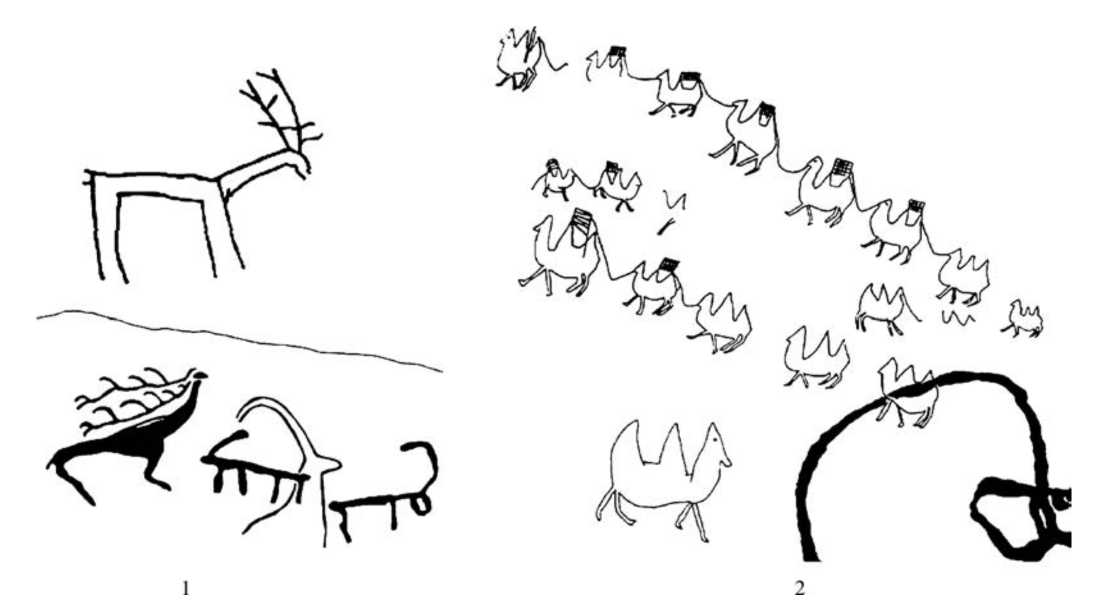


图三　图瓦地区匈奴时期的动物图像

1、2. 鸟　3～5. 鹿　6、7. 马　8. 鱼　9. 猛兽

［*Petroglyph on the bottom of the Sayan Sea*（*Mount Aldy-Mozaga*）. Vol. 40 no.1. c.67.］

于中世纪时期的岩画数量很少，均是通过与周边地区已知岩画类型比较而得，按照年代关系，她又将其分为早晚两期，其中早期图像主要是身体呈俄语字母“П”的各种动物图像（图四，1），年代属于 9～10 世纪[14]，晚期图像主要是双峰驼（图四，2）；图瓦地区的民族志时期岩画年代为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主要内容包括集体狩猎、民族服饰、鹿和山羊等动物图像（图五）[15]。后来有学者对其观点进行了部分修正，如 Л. Д. 恰达姆巴将图瓦地区的岩画分为人面像、蘑菇状头颅的人像、战车和公牛等类型，



图四　图瓦地区中世纪时期的动物图像

1. 身体呈“П”的动物图像　2. 双峰驼图像

［*Petroglyph on the bottom of the Sayan Sea*（*Mount Aldy-Mozaga*）. Vol. 40 no.1. c.67.］



图五　图瓦地区现代民族志时期的岩画

（*Петроглифы на кочевой тропе*. M., 1982в. с.118-121.）

而牛的图像根据风格特征以及身体和角的形状又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其年代历经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早期、青铜时代晚期直至斯基泰时期，并认为本地区的岩画主要是本地起源，与中亚地区的岩画多有类似之处。同时，M. A. 杰夫列特将该地区的部分人面像岩画断为青铜时代早期[16]。

现在，我们对叶尼塞河上游地区最典型的岩画图像人面像的年代做进一步讨论。据M.A. 杰夫列特的统计，整个萨彦峡谷共在 8 个地点发现了超过 300 幅的人面像，其中穆古尔·苏古尔一个岩画点就超过 250 幅，阿尔德·莫扎加有近 40 幅，其余人面像岩画

分布在剩下的 6 个岩画点中。其制作技术均为敲凿法，包括有轮廓和无轮廓两种类型，这些人面像岩画的形状绝大多数为椭圆形，卵形次之，圆形最少。人面像头部多饰以角状物，但在两个角之间通常还有射线状物体，射线数目不一，以一根居多。部分人面轮廓内刻有条纹或者括弧类的形状，与民族学材料中经常见到的纹身比较相似。这些人面像看上去并非具象的人脸，而更像某种仪式中使用的面具（图一，17 ~ 20）。

关于叶尼塞河上游人面像岩画的年代，俄国学术界观点比较一致，即认为其均属于青铜时代作品。例如，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将比日克提克 – 哈亚人面像岩画的年代断为青铜时代，或者更确切地说，属于奥库涅夫时期”[17]。而在谈到穆古尔 · 苏古尔岩画时，A. A. 佛尔莫佐夫写道：“最有趣的是 30 幅面具。佩戴有公牛角或者有三只角的头饰，在面颊处有表示刺青的条纹和括弧，所有这些都将图像和奥库涅夫的面具岩刻联系在一起。”[18] Л. Д. 恰达姆巴也认为：“米努辛斯克盆地和图瓦的奥库涅夫艺术互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首先是通过风格上有所模仿的大量的带角人面像岩画。”[19]随后，他进一步写道：“图瓦地区暂时还没发现石器时代的岩画，最早的岩画属于青铜时代的作品。具体来说，属于青铜时代的岩画则有面具（即人面像 – 笔者注）、有蘑菇状头部的类人型图像、战车以及其他一些图像，但是最主要的图像是公牛，而人面像岩画年代均属于青铜时代早期的奥库涅夫时期。”[20]事实上，将该地区人面像岩画的年代完全归于奥库涅夫文化时期是有问题的。因为就目前的考古出土资料来看，奥库涅夫文化主要分布在北部的哈卡斯 – 米努辛斯克盆地一带，而南部的图瓦地区遗址和墓葬都很少，间接反映了该地区的人口面貌，因此，很难将图瓦地区数量如此之多的人面像岩画以及其他一些类型的图像归为奥库涅夫时期。

与之不同的是，M. A. 杰夫列特则将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穆古尔 – 苏古尔类型的人面像岩画断为青铜时代中晚期[21]。她在《乌鲁克海姆岩画》一书中指出：“某些奥库涅夫岩画与钦格 – 穆古尔 · 苏古尔组岩画存在着某种无可争议的相似性。”[22]她认为：“图瓦岩画，包括面具图像在内，比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奥库涅夫类人型图像年代要晚。奥库涅夫时期可以被看作是图瓦面具图像年代的上限，而下限是前斯基泰时期。”[23]随后，她又进一步将这个年代限定在公元前 2000 年中期以后直至斯基泰时期以前[24]。在《萨彦海底部的岩画（阿尔德 · 莫扎加山）》一书中，她继续总结到：“萨彦峡谷岩画的特点是靠近水源并且面向河流……在阿尔德 · 莫扎加崖壁上的人面像的布局中可以观察到一种明确的规则：离叶尼塞河越近，人面像与河流的方向越一致，它们与穆古尔 · 苏古尔经典的类型越相似，从而年代也越古老。我们必须假定最古老的人面像是被刻在岩画不多的崖壁上，位于河水边上并与水流的方向保持一致。”[25]

此后，在阿尔然 2 号墓葬中发现了两块带有人面像的石板残片。该墓位于图瓦北部的图拉诺 – 乌尤克盆地。2000 ~ 2004 年由俄罗斯考古学家丘古诺夫主持发掘，其年代为公元前 7 世纪左右，属于斯基泰时期的早期阶段。而在该墓葬中的祭祀坑中共出土了 34 块带有岩画的石板残片和 4 块鹿石[26]。此外，在其下还另有一个属于奥库涅夫文化时期的文化

层，其中就包括 2 块带有人面像的石板残片，“其年代被断为公元前 14 ~ 前 12 世纪，属于奥库涅夫文化的后半阶段”[27]。人面像用石制工具敲凿而成，两幅人面像均残缺，只有部分轮廓。穆古尔－苏古尔类型中不少人面像与其形象类似，其年代也大致相同，即属于奥库涅夫文化的后半阶段。这个新的发现是对 M.A. 杰夫列特早期论断的一个有力支撑。

同时，M. A. 杰夫列特将其年代下限定为前斯基泰时期也是有道理的，这个前斯基泰时期由于文化内涵不明确，具体属于哪种文化还不能确定，但是处于奥库涅夫文化和斯基泰文化之间，只能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或者卡拉苏克文化。俄罗斯学者普遍认为，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卡拉苏克文化和奥库涅夫文化基本上是同时被塔加尔文化取代的。可见，奥库涅夫文化传统与后两种青铜时代文化在叶尼塞河上游地区有一个并存的过程。因此，人面像岩画的作画传统完全可能延续到卡拉苏克文化末期。而塔加尔文化实际上是斯基泰文化在南西伯利亚的一种地方类型，随着斯基泰文化全面取代本地文化，一种新的宗教思想观念和造像传统取代了原有的观念和传统，人面像岩画也被新的以动物为主的形象所取代。因此，青铜时代晚期即前斯基泰时期可以大致断为该类型岩画年代的下限。

三、关于内容的解释

M. A. 杰夫列特是“神话学派”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她认为，岩画图像的解释必须置于岩画场景中，岩画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与自然环境隔离的图画，还应该研究其功用及具体使用方式。岩画场景反映的是古代神话题材，而古人的宗教神话观念“物化”在古代的绘画和雕塑等造型艺术中。她坚决反对将岩画仅视为一种单纯的图像或者语言文字的研究方法。近年来，M. A. 杰夫列特这种神话思维在其与 E. Г. 杰夫列特的合著中得到更进一步的体现。其主要逻辑前提是：古人通过神话这个中介来认识世界。从广义上讲，神话是最早的一种特殊思维形式、理解世界的方式、精神文化的原始形态，构成了一个广泛的精神世界，是全人类共同经过的意识阶段。概而要之，神话反映了宇宙的根本问题[28]。

M. A. 杰夫列特将神话视为解开古代岩画密码的钥匙，她对岩画语言的描述特点是最大程度上尽力去支持这种猜想。而在东北亚地区，所谓的神话很多都与萨满教有关，因此她也高度关注“萨满教与岩画”关系的问题。其基本研究方法是通过考察某些特定图像来重建古人宗教观念的某些片段，这其中就包括跳舞的人、带射线状头饰的人、祖先神像、巨人、带蘑菇状帽子的人、面具及各种动物图像等。她注意到，跳舞的人与萨满教仪式有关；祖先神像尤其是那些表现为女性的形象是人类的起源神话的一种反映；船象征着灵魂之舟；女人和公牛的组合是神话中“圣婚”的象征。而在岩画中，经常会出现两匹马的缰绳分别被系在树的一端，这棵树正是世界树的象征。此外，在穆古尔·苏古尔类型人面像中，有一类酷似面具，M. A. 杰夫列特认为，“它们本身并不代表具象的人，而是表示曾经存在过的面具，萨满和巫师能够戴着这些面具完成某种宗教仪式”[29]。此外，其他一些动物以及诸如衣服、房子类的物品也被其认为是相应神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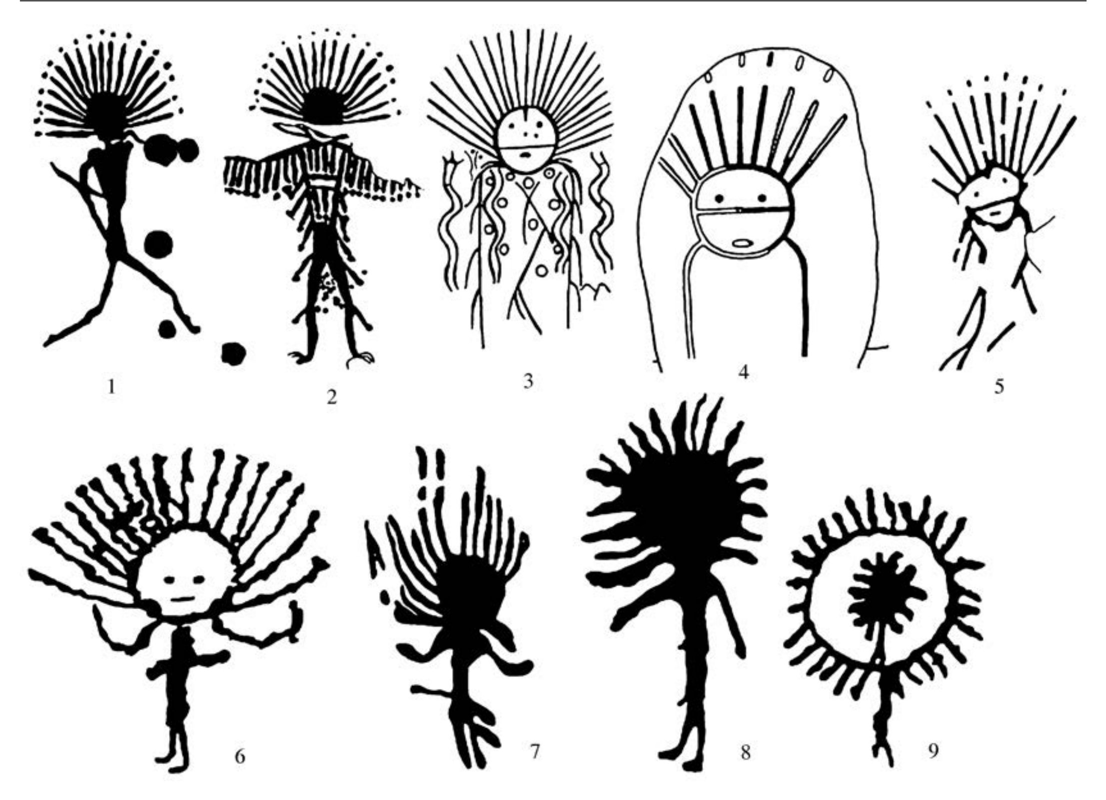
的反映。事实上，岩画画面中的所有图像构成了一个整体，共同再现了某种宗教仪式，“……戴着面具，穿着相应服装的仪式参与者可以祈祷，向天空举起双臂，跳仪式性的舞蹈。在圣像顶端是另一个世界的许多神秘的生物，象征着祖先的灵魂”[30]。仪式的场景已经消失了，但仪式的文本经过代代延续，转化成神话传说流传下来。

在所有的岩画图像中，她尤其关注流行于亚洲北部和中部地区的类人型图像。她注意到，“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人的形象在南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的岩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31]。M. A. 杰夫列特事实上是最早将叶尼塞河、安加拉、勒拿河中部、外贝加尔、托姆河完全不同的类人型图像联系在一起，并指出举起双臂向天空祈祷状的类人型图像大多属于青铜器时代，与向天祈求的仪式有关，广泛存在于岩画和其他时期的艺术中[32]。

在 1992 年发表的文章中她就对哈萨克斯坦东部和西伯利亚南部地区的一些具有太阳射线状头饰的类人形图像进行过研究[33]。随后，她在广泛考察世界各地的太阳神话之后，认为这些图像都是太阳神话的反映，描绘的是天神或者太阳神[34]。美国学者王朋林（Пенглин Ванг）在《岩画中萨满阶层的图像隐喻和数字帮助下的萨满教概念化》一文中将这种日首人身形的岩画与中国古代的“日者”相联系，并指出“‘日者’即中国古代社会的‘萨满和巫师’，萨满的名称同时包含‘太阳’和‘天空’两种意思”[35]。В. Д. 库巴列夫也认为这种图像反映的是萨满教主题[36]。Andrzej Rozwadowski 在《太阳神还是萨满？中亚地区“日首”形岩画的阐释》一文中对这种形象进行了全面的分析，首先指出了学术界存在的“太阳神”和“萨满”两种观点，随后对这两种观点进行了逐一分析，并将中亚尤其是哈萨克斯坦地区的“日首人身”形岩画放在具体的语境下来探讨，结合岩画周围的环境以及该类型岩画与画面中其他图像的相互关系进行细致的分析，认为日首人身形岩画正是萨满形象的反映[37]。

抛开具体的观点不谈，在这里，我们发现了 M. A. 杰夫列特研究方法中的一个重要缺陷，即她一方面用神话观念去解释岩画图像；另一方面，也经常性地使用萨满教的一些观念对岩画进行解释，而这两种解释理论有时会产生矛盾，“日首人身”形岩画的解读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作者将岩画从现实的语境中剥离开来，直接与神话传说中的某个形象等同，事实上违背了作者本身所提倡的一些岩画研究原则，即岩画的解释必须置于特定的时空环境中。实际上，萨满教作为北亚和中亚地区的一种古老宗教形式，本身就包含了众多的神话观念，可以说，萨满教的宗教思想体系与该地区的神话观念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我们可以用某些具体的图像去复原萨满教的某些场景，但是，必须建立在有一个完整的萨满教理论体系的基础之上，这样才能尽量避免解释的逻辑产生矛盾。

除了带有太阳射线状头饰的人像之外，她对“X”射线风格的人像也很感兴趣（图七）。所谓“X”射线风格，也被称为骨架风格，这种类型人像的特点是人的胸部带有辐射状线条，看上去像人体透视后的结果。对于这种图像的语义解释，学者大多认为其描述的是萨满入教式中的断身仪式，与萨满失去肉体的神秘体验和沉思自己的骨骼有关。А.П. 奥克拉德尼科夫指出，“这种‘骨架’风格起源于公元前 2000 年末至前 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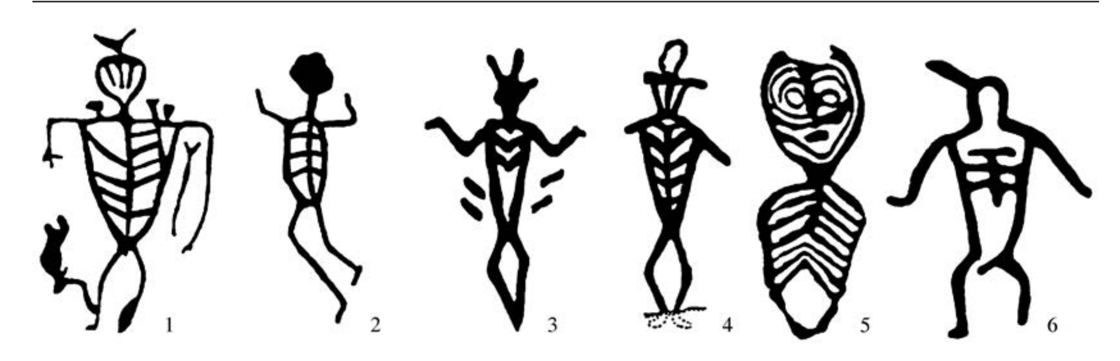
图六　带有射线状头饰的岩画和壁画

1、2. 卡拉科尔墓葬绘画　3、4. 奥库涅夫石柱　5. 叶尼塞河上游　6、9. 吉尔吉斯斯坦　7、8. 哈萨克斯坦

（*Мифы в камне. Мир наска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России*. 2005a. c.159-161.）

年初叶的泰加森林部落艺术传统，与萨满教意识形态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38]；伯查得·布伦特杰斯则认为：“沿阿穆尔河定居的部落创作的人面像和‘骨骼’风格的岩画都是萨满教的反映。”[39]对 M. A. 杰夫列特而言，其对“X 射线”风格人像的解释主要体现在与 E. Г. 杰夫列特合作出版的书籍中。她们认为，这些图像通常出现在萨满服饰中，而萨满服饰是萨满宇宙观的集中体现，骨骼状的服饰是萨满祖先骨骼的象征，为萨满提供保护，确保萨满能够存活。另外一种解释是，萨满在经历过断身仪式的身体切碎后重新复活。因此，骨骼象征着穿戴者本身的骨骼[40]。通过对西伯利亚岩画中“X 射线风格”的人形图像、持鼓的人形图像以及戴有射线状头饰的人形图像的微观分析，并与萨满教装饰及用具进行比较，E.Г. 杰夫列特指出：“萨满教的世界观是西伯利亚人复杂的象征体系中的基本组成部分……岩画主题为探寻萨满教概念的早期根源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机会。”[41]

伊利亚德将这种现象解释为萨满教的死亡和再生性入会式，并指出：“布里亚特萨满的选择如同其他地方的萨满一样，包含着一个非常复杂的迷狂体验，在这一过程中，萨满候选人据信受到拷打、切成碎片、处死，而后又复活。只有这一入会的死亡和再生才使得萨满显得神圣。”[42]实际上，这种巫师仪式性地死亡与再生曾经普遍流行于世



图七 “X”射线风格人像

1. 贝加尔湖 2. 托姆河 3、4. 安加拉河 5. 黑龙江下游 6. 奥廖克马河

（*Мифы в камне. Мир наска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России*. 2005а. с.320-3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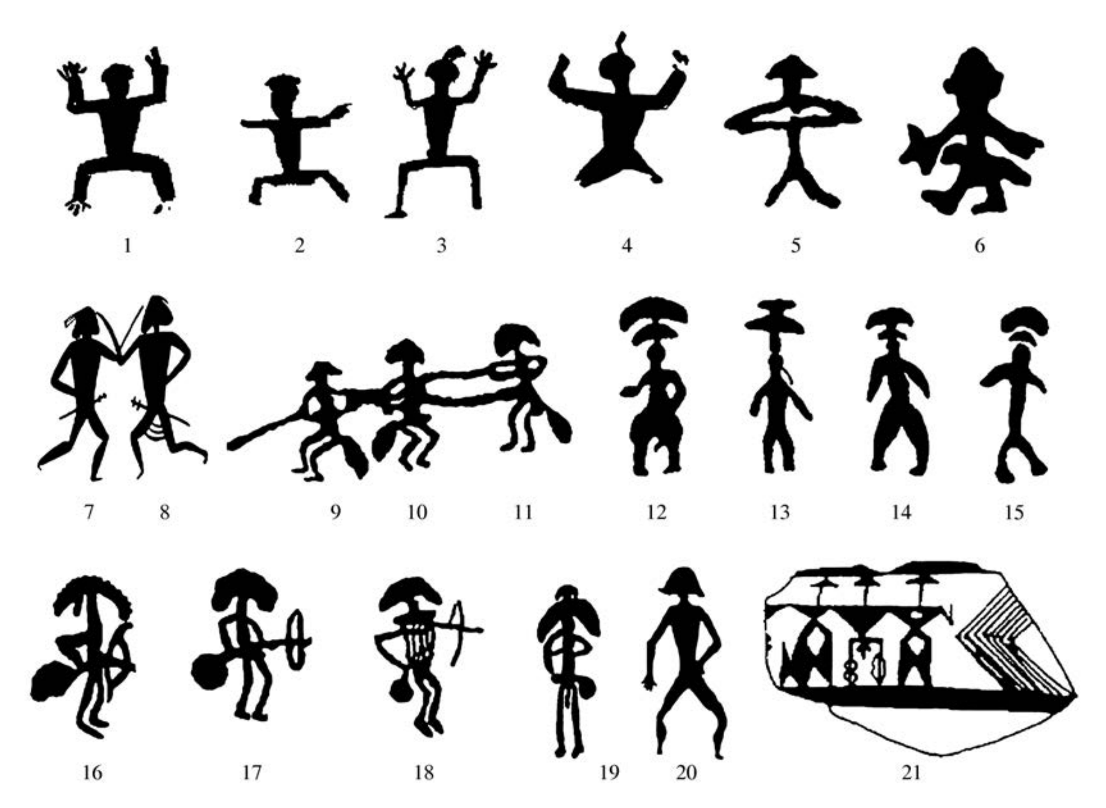
界各地，并至今在部分原始民族中留有孑遗。关于这一点，伊利亚德在其名著《萨满教——古代迷狂术》（*Shamanism: Archaic techniques of esctasy*）一书中进行过非常详尽的论述。

叶尼塞河岩画中有一种特殊的蹲踞式人像，其带有类似于蘑菇状的帽子，M.A. 杰夫列特认为这些是神话中所谓的蘑菇人图像，这些图像通常被认为与萨满巫师的迷狂体验有关。这种类型的帽子在欧亚大陆的岩画中经常可见，但总体而言，对各地区的岩画本身来说，均属于非典型类型（图八）。这些岩画外形差异性较大，但共同点为均在头顶上方有一个类似蘑菇盖的装饰物，部分岩画点中的蘑菇形象更为完整，像整个蘑菇从人头顶上长出，其根部也清晰可见（图八，12 ~ 15）。另外，在近东地区还出土了一件带有类似人像的彩陶，表明这一主题的岩画年代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图八，21）。事实上，这类蘑菇都属于致幻蘑菇。2017 年 10 月 13 日，《科学报告》发表了一篇名为《*Psilocybin for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 fMRI-measured brain mechanisms*》的文章，文章指出，从致幻类蘑菇中提炼的一种精神化学药物——裸盖菇素可能有助于治疗抑郁症[43]。表明某些类型的蘑菇的确有致幻功能。在西伯利亚的民族志材料中，也有大量关于萨满食用致幻蘑菇来进行意识转换（altered states）的例子。在这里，致幻蘑菇是作为麻醉药使用，而意识转换则是萨满进行迷狂体验、实现天地交通的重要一步。这种致幻蘑菇通常指的是蛤蟆菌（fly-agaric），在美洲印第安人和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均有萨满巫师食用蛤蟆菌的习俗，而在西伯利亚地区，这种习俗保存至今。西西伯利亚的曼西人（Mansy）通常将萨满称为“食用蛤蟆菌的人”[44]。但是，在西伯利亚民族志材料中，并非仅仅萨满可以食用蛤蟆菌，实际上，所有想与神灵沟通的人都可以食用。正如部分学者指出的那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蛤蟆菌已经不是单纯的蘑菇，而是一个中介，是所有人的萨满”[45]。

实际上，致幻蘑菇与大麻以及其他毒品一样，同属于致幻剂的一种，均是用来协助萨满进行迷狂体验。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早在 2500 年前就提出斯基泰人有抽

食大麻以获得迷狂体验的习惯，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有关萨满吸食大麻的记载；伊利亚德指出，为了达到迷狂的目的，萨满会使用“包括毒品、鼓和被灵魂附体在内的各种手段”[46]；郭淑云认为：“在祭祀仪式上，萨满有时使用某些致幻药物以获得与神相见、与神合一的体验。”[47]这里的致幻药物就包括大麻。王纪潮也指出：“世界各地的萨满所用的麻醉药一般是有毒物，如致幻蘑菇、佩约特仙人掌、莨菪、大麻、曼德拉草等。”[48]此外，这种萨满借助大麻来实现迷狂体验的例子在考古出土文物中也有所发现。我国考古学家在 2500 年前的新疆洋海墓地中发现了萨满干尸，而陪葬品中有迄今为止最古老且保存完好的大麻[49]。

通过研究，M. A. 杰夫列特逐步地引导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即岩画只不过是宗教世界观的复杂体系和过去的精神文化物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既具有普遍的价值，又具有区域性的特点。她在作品中特别注意到了岩画与萨满教的关系



图八　戴蘑菇状帽子的人像

1～4. 左江岩画　5、6. 贵州岩画　7、8. 印度岩画　9～11. 蒙古岩画　12～15. 楚科奇岩画　16～19. 叶尼塞河上游岩画　20. 泰国岩画　21. 近东彩陶

（1～4 引自《花山崖壁画资料集》；5、6 引自《贵州岩画——描述与解读》；7、8 引自《世界岩画资料集》；9～19 引自 *Siberian Shamanistic Rock Art. Spirits and Stones. Shamanism and Rock Art in Central Asia and Siberia*.; 20 引自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Thailand: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hrough the Thirteenth Century*.; 21 引自《试析近东和东南欧地区史前彩陶上的舞蹈纹饰》）

以及岩画和神话关系的问题。她写到，岩画的语义解释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话题。研究人员只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第一步，尽可能破译岩画作品的隐含意义，渗入原始人精神生活的领域是一项未来的任务[50]。诚然，用岩画的资料重建古人的世界观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但是，正是 M. A. 杰夫列特这位科学先行者大胆迈出的一小步，对考古学，尤其是宗教考古学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对中亚和部分北亚地区岩画开展的研究使她也能够涉足诸如喇嘛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的起源等问题。在岩石上描绘的恶魔面具被认为是喇嘛教中羌姆面具的古老原型。通过比较叶尼塞河上游地区与印度河上游的人面岩画图像，能够展示带有角状头饰的宗教面具在该地区的传播情况，以及信仰佛教的古代居民在该地区的活动情况。作者得出的结论是，由于这些接触，这种原始的造像艺术被北方的佛教——喇嘛教吸收，并被后期的羌姆舞蹈所吸收。此外，描绘表示天体图形符号的岩画遗址，与露天的太阳神庙功能类似，均是太阳崇拜的反映，表明在亚洲草原和山麓地带的古代居民中存在一个发达的太阳崇拜系统。这一结论使她重新审视了琐罗亚斯德教的起源问题。她认为，青铜时代分布最广泛的这些祭仪，可能与一个新的太阳宗教的诞生有关[51]。

四、结　　语

M. A. 杰夫列特是苏联以及俄罗斯当代最重要的岩画研究者之一。她成功地将岩画研究发展成为考古学中的一个独立部门，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她提出了按条件的独特性来对岩画进行分类的观点，即综合考虑每个地区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自然气候、民族文化以及其他诸如主题、风格、图像的位置以及制作技术等方面的特性。同时，她还提出了一套开展实地调查研究的方法，包括对遗址本身进行全面的描述，对岩画的年代和结构关系进行论证，以及对每个岩画点的图像进行临摹，而临摹通常是分组进行，以便观察单个图像在整幅画面中的构图情况。在研究中，她通常将具有类似主题的图像放在一起进行类比，这使年代的论证有了更可靠的依据。此外，她在岩画遗址的保护工作方面也颇有建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叶尼塞河水电站修建后，萨彦峡谷被水淹没，岩画沉入水底，她的相关研究成果几乎成了唯一记载这些遗迹的资料。最后，在岩画的语义学研究方面她也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她的神话学和萨满教的研究方法在苏联和俄罗斯都具有很多的追随者。而她对西伯利亚岩画与中国岩画关系的论述时至今日也还具有启发意义。

注　　释

[1]　Дэвлет М.А. Погребальные сооружения тагар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J]. ВестникМГУ, 1958 (4)：59-69.

［2］ Дэвлет М.А. Племена бассейна Среднего Енисея в раннем железном веке［A］. Автореф. Дис. … канд. Ист. наук［C］. М., 1966б：7, 8.

［3］ 同［2］：10 ~ 19.

［4］ Алтуфьева Н. М. , Лачугина А. А. Люди Центра Азии［M］. Кызыл : Центр Азии. 2006：296.

［5］ Дэвлет М.А. Петроглифы Енисея. Автореф. дис. … докт. ист［M］. наук. М., 1982б：4.

［6］ Дэвлет М.А. Бронзовый прототип наскальных изображений личин-масок в Саянском каньоне Енисея［J］. Социальные и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науки. 2013（1）：20.

［7］ Дэвлет М.А. Большая Боярская писаница［J］. СА. 1965б（3）：124-142.

［8］ Дэвлет М. А. Петроглифы на кочевой тропе［M］. М., 1982в：17.

［9］ 同［8］：17 ~ 21.

［10］ Дэвлет М. А. Петроглифы Мугур-Саргола［M］. М., 1980а：225-243.

［11］ 同［5］：1 ~ 48.

［12］ 注：О. С. 萨维托娃和 Л. Ю. 基托娃则指出，М. А. 杰夫列特曾从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岩画中区分出属于石器时代的图像，但相关资料作者并未搜到，不知所据何本。见 О. С. Советова, Л. Ю. Китова. Марианна Арташировна Дэвлет -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археологи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A］. Тропою тысячелетий: К юбилею М. А. Дэвлет［C］. Кемерово: Кузбассвузиздат, 2008：21.

［13］ 同［8］：22.

［14］ Окладников.А.П., Запорожская В.Д. Ленские писаницы［M］. Л.: АН СССР. 1959：132.

［15］ 同［8］：47 ~ 116.

［16］ Чадамба Л.Д. Сюжеты и стили в наскальном искусстве тувы［J］. Извес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 А.И.Герцена. 2008（74-1）：544-548.

［17］ Okladnikov A. P. Liki drevnego Amra［M］. Novosibirsk. 1968：75.

［18］ Formozov A. A. Naskal "nye izobrazheniia v Tsentral" noi Tuve［A］. Arkheologicheskie otkrytiia 1966［C］. Moscow. 1967：133, 134.

［19］ 同［16］：544.

［20］ 同［16］：544.

［21］ Дэвлет М.А. О головных уборах антропоморфных изображений эпохи бронзы на Верхнем Енисее. Вопросы археологии Хакасии. Абакан［C］. Abakan, 1980: 54.

［22］ Дэвлет М.А. Петроглифы Улуг-Хема［M］. М., 1976：16.

［23］ 同［21］：54.

［24］ Дэвлет М.А. Петроглифы на дне Саянского моря（гора Алды-Мозага）［M］. М.: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мысли. 1998：147.

［25］ Дэвлет М.А. Petroglyph on the bottom of the Sayan Sea (Mount Aldy-Mozaga)［J］. Anthropology &Archeology of Eurasia, 2001 (1)：17.

［26］ Дэвлет М.А. Человек и его место в системе мироздания（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петроглифов бассейна

Верхнего Енисея) ［A］. Изобразительные и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е традиции в искусстве Северно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C］. Кемерово., Кузбассвузиздат. 2012 (IX) ：10, 11.

［27］ Семёнов В.А. Плита с окуневской личиной со стоянки Кара-Орга в Туве. ［A］. Наскаль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обществе［C］. Кемерово., Кузбассвузиздат. 2011 (2) ：133.

［28］ Дэвлет М.А., Дэвлет Е.Г. Мифы в камне［A］. Мир наска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России.［C］. Сб. докл. междунар. конф. М., 2005а：75.

［29］ Чадамба Л.Д. Памятники наска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яноском каньоне Енисея（Республика Тыва）［J］. Извес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 А.И. Герцена. 2008 (3) ：321.

［30］ Мартынов А. И. Учёный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науку（к юбилею М.А. Дэвлет）［A］. Тропою тысячелетий: К юбилею М. А. Дэвлет［C］. Кемерово: Кузбассвузиздат. 2008：27.

［31］ Медведев В.Е., Скобелев С.Г. Наскальные рисунки Евразии［A］. Первобыт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C］.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92：29.

［32］ 同［30］：26.

［33］ Дэвлет М.А. Солнцеголовые антропоморфные фигуры казахстанских петроглифов и их восточные параллели［A］. Маргулановские чтения［C］. Сб. материалов конф. М., 1992д：209-212.

［34］ 同［28］：241.

［35］ Пенглин Ванг. Графические метафоры состояний шамана в петроглифах и концептуализация шаманизма с помощью чисел［J］.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ий форум. 2006 (5) .

［36］ Кубарев В.Д. Шаманистские сюжеты в петроглифах и погребальных росписях Алтая［J］. Древности Алтая. 2001, 6.

［37］ Andrzej Rozwadowski, Sun gods or shamans? Interpreting the ‘solar-headed’ petroglyphs of Central Asia［A］. The Archaeology of Shamanism［C］. N. Price（ed.）, 2001.

［38］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Петроглифы Байкала - 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й культуры народов Сибири. ［M］. Наука. 1974:149-153.

［39］ Burchard Brentjes. Rock Art in Russian Far East and in Siberia, from http://www.rupestre.net/tracce/?p=2065.

［40］ 同［28］：318-325.

［41］ Ekaterina Devlet. Rock art and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Siberian and Central Asian shamanism［A］. The Archaeology of Shamanism［C］. N. Price（ed.）, 2001.

［42］ M. Eliade, Shamanism:Archaic techniques of esctasy［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76.

［43］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17-13282-7?WT.mc_id=Weibo_nature_20180103_PROMO.

［44］ Ekaterina Devlet, Marianna Devlet. Siberian Shamanistic Rock Art［A］. Spirits and Stones.

Shamanism and Rock Art in Central Asia and Siberia, Poznan, 2002：125.

［45］ 同［44］.

［46］ M. Eliade. Shamanism: Archaic techniques of esctasy［M］. R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95.

［47］ 郭淑云．致幻药物与萨满通神体验［J］．西域研究，2006（3）：71～77.

［48］ 王纪潮．中国古代萨满昏迷中的药物问题［J］．自然科学史研究，2005（1）：13～28.

［49］ 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鄯善洋海墓地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11（1）：99～166.

［50］ 同［28］：284.

［51］ 同［28］：367-383.

Review of Russian Archaeologist M.A. Devlet's Academic History of Rock Art Research

Xiao Bo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view of M.A. Devlet's rock art research history in the past half centur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achievements from the aspects of rock art's classfication, content, stage and date, the methods of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and the rock art semantics. We hope to promote Chinese academics'understanding of the rock arts in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based on which, Chinese researchers will find ou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iberian and Chinese rock arts, and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ock art studies.

Keywords: M.A. Devlet; rock art research; academic history; review

征稿启事

《北方民族考古》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古学科创建十周年之际创办的学术刊物。本刊本着加强学科建设，增进学术交流，普及考古文博知识的宗旨，以北方民族考古为主要特色，同时兼及中原和长江流域的考古学研究。

为及时反映最新考古学研究成果及田野考古新材料，本刊拟每年出版一辑，目前拟设置的栏目包括：①考古新发现；②研究与探索；③考古新视野；④考古与科技；⑤书评等。稿件内容以北方民族考古为主，同时欢迎其他方面的优秀成果投稿。

稿件具体要求：①论文不超过15000字，考古发掘报告字数可适度增加；②来稿请附中、英文摘要（300字左右）、关键词（3～6个）及作者简介；③注释统一采用文后注，注释格式请参考《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的样式；④译文需取得原作者的授权，以免发生版权纠纷。

《北方民族考古》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刊用意见将在收稿后3个月内通知作者。本刊不收取任何版面费，一经刊用，即奉样刊五本。

联系人：李梅田

电子邮件投稿地址：limeitian@hotmail.com（如邮件超过20M，请发至578134457@qq.com）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

邮编：100872

(K-2865.31)

www.sciencep.com



定　价: 198.00 元